

(法) 史式微著

# 江南传教史

第二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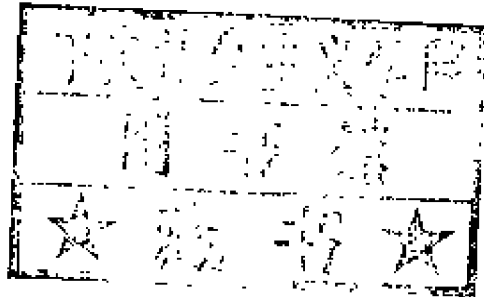
B979

51667

DHB/27  
江南传教史

第二卷

[法] 史式微 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 de la Servièr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Changhaï, Chine, 1914.  
根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 1914 年版本译出

江南传教史  
第二卷  
〔法〕史式微 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字数 240,000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3188·47 定价(七): 1.20 元  
印数: 0,001—5,300 册  
内部发行

# 目 录

## 第 一 部 分

### 年文思主教时期(1856年至1862年)

第一章 教区概况.....	3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	3
教区的新编制 中国同英法断交 葛罗男爵来上海；向神父们提出的建议 1858年的条约；伏击大沽口 梅德尔会长神父任江南中国官员与法国当局间的调解人 年文思主教的祝圣 北京朝廷拒绝赔偿大沽事件的损失；英法对中国宣战 谈判时期的上海	
二、1860年联军战争时期的教区 .....	14
孟斗班将军到上海 太平军进攻上海 欧洲人决计保卫上海 1860年战争时期的上海 蔡家湾的凶杀事件 太平军占领徐家汇 太平军被逐出上海 英法联军的战果；1860年的条约 法国军队来上海 归还老天主堂 耶稣会计划在北京设立科学机构	



三、从1860年英法联军到太平战争结束（1861年至1864年）.....43

叛乱者远离上海 卜罗德海军上将和教区 浙江长毛入侵浦南和浦东 郊区的战役 费都尔神父和卜罗德将军之死 英军撤退 “常胜军”与戈登 江苏的绥靖 年文思主教和梅德尔会长之死 郎怀仁被任命为主教

第二章 教务细节.....71

一、上海.....71

难民来上海；援助教友；向教外人传教 徐类思主教视察教务 董家渡；教友突增；节日礼仪；潘奥定修士的施诊所；徐家汇孤儿到上海避难；修道院 洋泾浜堂口的发展；杜若兰神父的传教；创办公济医院；规划女青年教育事业

二、徐家汇.....94

建筑与变迁 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徐汇公学的进展 本期的亡者

三、松江..... 103

马义谷神父与太平军 诸巷会教友 佘山

四、浦东..... 109

五、教区西部..... 112

葛必达和桑理爵神父在太平军占领区

六、崇明与海门..... 119

一起反年文思主教的骚扰事件 传教事业

七、小结 太平军之战后期的江南教区..... 123

## 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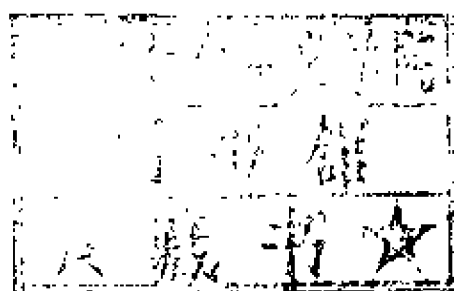
### 郎怀仁主教时期(1864年至1878年)

第一章 教区概况.....	131
一、1869年的教难.....	131
郎主教到上海 戴元英监会铎的巡阅 柏尔德密协定和无形取消的秘密文件 南京、安庆创建住院 金式玉神父西区探险 镇江、扬州、苏州教会的建立 郎主教欧洲之行 召请圣衣院与拯亡会修女来华 郎主教与江苏官员	
二、从1869年至1875年的教难.....	174
部署安庆 宁国府教友会口的创建 1869年安庆和建德的暴动 罗淑亚先生长江之行 得到的赔偿 马新貽阻止南京暴动 天津屠杀后的恐怖 谷振声神父余山许愿 建造圣母进教之佑大堂 马新貽被刺 郎主教参加梵蒂冈公会议 1871年的咨议会 天津屠杀的赔偿 若干洋人反对天主教 中国方面的记录 创立徐家汇天文台与博物院 创立若瑟学校 创立上智母院 创立圣方济学校 创立虹口圣心堂 部署苏州堂口 余山开堂 宁国府开教初期的辉煌成就	
三、从1875年的教难到郎主教逝世.....	221
长江下游地区对育婴事业的诬蔑 南京的危险 宁国府教难 黄神父被害 白来尼先生到南京 长江下游与沿运河一带的教难 南京的诉讼 恢复宁国	

府的事业 水东的朝圣 郎主教病危期间 郎主教的逝世与哀荣	
第二章 教务细节·····	273
一、上海·····	273
上海的变化 董家渡修道院 名人来访 教友善会 洋泾浜 本堂生活 耶稣教教徒的攻击 老天主堂周围的事业	
二、徐家汇·····	285
神父住院 神学院与徐汇公学 学习计划 翻译学校的计划 土山湾 工场间 印刷所 主要印刷品	
三、女修会·····	300
圣衣会女修院的开创 迁到土山湾 拯亡会 圣母院 圣若瑟院 上智小学 仁爱会修女 公济医院	
四、教区东部·····	317
浦东 浦西 苏州 常州 崇明 海门	
五、教区西部·····	330
镇江 南京 安庆 宁国府	
六、总结·····	345
附录一 1840年至1878年的南京署理主教与宗座代牧主教·····	349
附录二 1840年至1878年的教务巡阅使与教区会长···	351
附录三 1848年至1878年的法驻沪领事·····	352
附录四 教区的进展(1878年至1923年)·····	354
主要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358

# 第一 部 分

年 文 思 主 教 时 期  
(1856 年 至 1862 年)





# 第一章

## 教区概况

###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教区的新编制 中国同英法断交 葛罗男爵来上海；向神父们提出的建议 1858年的条约；伏击大沽口 梅德尔会长神父任江南中国官员与法国当局间的调解人 年文思主教的祝圣 北京朝廷拒绝赔偿大沽事件的损失；英法对中国宣战 谈判时期的上海

耶稣会总会长神父贝克斯向年文思会长转达被任命为江南署理代牧的指令时，同时指示他必须接受任命。并告知，圣父在一次召见他时，曾口头颁示，在中国的两个耶稣会传教区的会士的修会生活，仍由一位会长管理。会长的任命和撤换，按照耶稣会会典办理，并享有前任会长所有的一切职权。<sup>①</sup>

南格禄神父曾被选中担任这个棘手的职务；可是，任命到达中国时，他已不在人世了。梅德尔神父乃仍保持伏伯禄监会铎在临终前授给他的会长职权，之后又得到了总会长的追认。<sup>②</sup>

但根据罗马传信部 1851 年 8 月 12 日关于耶稣会代牧主教的部令规定：教区的代牧主教即是教区内耶稣会的会长，负

有领导管理之权。有关修会纪律事项,应遵照该会会典办理。这部令一直执行到1880年4月4日,即总会长贝克斯得到圣部修改部令的指示时止。我们将在后面谈及此事。

为了尊重徐类思主教,年文思在开头数月,只顶衔宗座署理代牧;③郎怀仁就不同,诏命到后,他即请人祝圣,任直隶东南区宗座代牧,并开始治理该教区。④

1856年11月25日,两位当选者对有关主教和会长之间在实践上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商讨,“会长对会士们的管理权既要完整独立,又要不妨碍代牧的行动”⑤。耶稣会法国省参赞吕比荣神父于1857年1月28日,对这个问题又寄来了一份意见书。⑥

年文思在管理教区的最初几年本想兼任会长,直接指挥会士。之后,经过认真考虑,完全听从了总会长神父的不同意见的劝告。总会长认为代牧主教教务繁重,不可能再有余暇去关心传教士的神修生活以及是否遵守会规等琐事。⑦

于是,梅德尔神父仍担任会长兼主教的大代权(副主教)之职。

---

① 总会长贝克斯1856年5月7日致年文思会长信,见《徐档》,卷宗B5;贝克斯1856年5月6日致梅德尔会长信,见《徐档》,卷宗F12。

② 1856年12月3日。见《中总》,第3卷第331页。

③ 总会长1856年5月6日、7日信;总会长1856年2月20日致梅德尔会长信,见《徐档》,卷宗F12。

④ 见本书,第1卷第389页。

⑤ 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21页上年文思1855年12月4日信,又《中总》,第3章第22页。

⑥ 见《徐档》,卷宗F13。

⑦ 1856年和1857年的几封信,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27—29页;见薛孔昭:《梅德尔神父传》,第103页起。

这位新宗座署理是在最艰巨的情况下上任的。中国政府既无力遏止给它造成种种困难的太平军暴乱，而又在两件严重的事情上得罪了英国和法国。1856年10月，广东巡抚手下的官员，没收挂有英国旗的划艇“亚罗”号，并拒绝赔偿，英国人就炮轰了广州的炮台及城市。1856年12月14日，中国人进行还击，烧毁了一切洋行和洋商机构。当时，法国尽管在广州也有侨民及其保护者受到损害，但仍保持着中立。1856年2月29日，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马赖神父在广西西林县被杀，中国政府又拒绝赔偿损失，直到此时，法国才下了最后的决定。1857年初，英法两国决定以武力迫使中国作出必要的让步。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勋爵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男爵，由一支远征军的舰队护送，启程来到中国。<sup>①</sup>

事情发生在1857年至1860年，在这里，我只叙述对江南教区有关的一些情节。广州被攻占后（1857年12月19日），法、英、美、俄四国向北京朝廷分别发出照会，阐明基督教列强的要求——1858年2月26日，由龚大德和俄理范两位秘书去苏州，把照会交给江苏巡抚。当时敏体尼先生已回上海领事馆，是他安排人员伴同他俩去苏州的。江苏巡抚热情地接待了使团的秘书，并负责把照会转呈满清朝廷；<sup>②</sup> 1858年3月21日，两江总督转来了朝廷的答复，仍然拒绝一切赔偿。

于是公使们决定北上，舰艇直行至白河口。1858年4月初他们在上海时，葛罗男爵对教区事务非常热情，利用他在上海逗留时期，同神父们进行了重要会谈。当时会长年文思神

---

<sup>①</sup> 见高田：《征华史（1857—1858年）》及《征华史（1860年）》；又《远东》，见《通史》，第2卷第725页。

<sup>②</sup> 见高田：《征华史（1857—1858年）》，第310页起。



父正在各地视察教务，我们的公使乃由梅德尔神父接待。梅神父在他致总会长及省会长的许多信件中，汇报了接待公使的一些情况。<sup>①</sup>

我们的公使最注意的是如何迫使中国官员遵照并实行皇帝的上谕。这些上谕原是刺萼尼先生为了天主教的利益，从中国皇帝那里争取得来的。尽管这道上谕诏令要把在十八世纪被充公的圣堂和神父住宅归还给教友，但写得十分含糊。这些建筑是旧耶稣会会士建造的，在北京有许多这类建筑。如要归还，那么将归还给谁？还给旧耶稣会的继承者，或归还给当时掌管北京教区的遣使会？关于这个问题，4月13日，葛罗男爵在上船赴北京时，很明确地问了梅德尔神父：“你是否坚持要归还你们的旧教产和旧教堂呢？”

梅德尔回答道：“我们只坚持为接受我们福音的人民做善举。假如人们归还给我们，我们也得用之于中国人民；我们不要求，也不希望有什么特殊照顾。假如我们要挟过多，人们必将憎恨我们，反妨碍了我们的慈善事业。此外，我们最好还是一心依赖天主的上智，和天主委托玉成这种使命的人们的仁爱。”

“从前耶稣会会士在北京的所有的事业及其建筑是否应该重新归还给耶稣会？”答：“先生们请原谅，这里不是这个或那个修会的权利问题，我们彼此只有一种权利，即在各自的岗位上，花尽我们的精力和一切所有。既然承蒙各位把我当作耶稣会的代表，我即用耶稣会的名义，向各位坦白宣布：我们不

---

<sup>①</sup> 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46—66页；《法信》2667、2676；会谈摘要曾发表于《通讯》，第3卷第74页起。

指望在北京或在其他地区追求任何职位和任何管理权。目前在中国有遣使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争得的一切归还给他们，由他们在各自宣传福音的地区内处理，如归还给我们奉命而接受的教区内，我们将同样地感到高兴；我们不考虑这些产业过去是属于耶稣会的或是属于别的传教会的。只要福音传得开，人灵能得救，通过我们或通过其他兄弟们来传布，这都没有关系。”

“当我讲完这话时，一等秘书站起来，紧握我的手，说：‘你们是真正的传教士、神父，怪不得你们的事业能得到天主如此的祝福。’上述谈话，我随着不同的场合，又重复了两三次，但始终只是口头的。可是我得声明，关于我们在北京另立科学机构的问题，得罪了遣使会会士，我看这并非由于公使本人，而是由于另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真正领会我答话的要旨，以致措辞失当，引起了误会。我看公使并不那样，他很理解什么是仁爱，什么是传教士之间应有的紧密的团结。传教，固不在争论地盘和争夺教产和机构上。”

梅德尔神父的答词，博得耶稣会总会长的赏识，他也向教宗庇护九世呈报了，教宗对此也极表满意。<sup>①</sup>

在中国拒绝接受可以接受的条件之后，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并毁坏了大沽炮台；于是北京派来了两位全权大臣；1858年6月13日至27日，在天津，中国同四个基督教列强签订了条约。6月27日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中的第十三款，与传教事业密切相关。

---

<sup>①</sup> 总会长贝克斯1858年7月18日信，见《徐档》，卷宗F11；吕比荣1858年7月4日信，见《徐档》，卷宗F13。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sup>①</sup>

这比刺尊尼公使争得的上谕更进了一大步。传教士们从此正式获得官方允许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

在远征白河期间，上海传说纷纷，说联军遭受惨败；有些人还说担任联军随军司铎兼翻译的，同公使一起北上的梅德尔神父，已在这次战役中丧生。这一切可尽是谣言。梅德尔会长在那时期，即使出门，也从未离开过江南，但这些消息已足以使上海周围的地方官开始对教友们作难了。<sup>②</sup>

7月3日，皇帝批准北京条约后，7月中旬葛罗男爵与额尔金勋爵来上海逗留时，调门转变了。满清官员正组织一个委员会，会同基督教列强代表，讨论建立海关税则。可是该委员会经过三个多月才组成。公使们利用这时机去了日本，同日本订立了条约，标志着日本新纪元的开始。<sup>③</sup>

中国官员终于到了上海，开始了无休止的谈判（从1858年10月至1859年3月）。不久便明显看出，中国派来的全权大臣们的使命就是不执行已签订的条约，并从中逐条逐款地加以限止，他们特别反对扬子江若干港口对外商开放。额尔

---

① 见高田：《征华史（1857—1858年）》，第445页。（此处系中法和约第十三款中文原文。——译者）

② 见《通讯》，第3卷第84页起。

③ 梅德尔1858年11月6日信，谷振声1858年9月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05页起。

金勋爵为了表示条约业已签订的既成事实，在1858年11月8日至1859年1月1日，带了多艘军舰溯长江而上直至汉口。<sup>①</sup>

直到1859年3月，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才完成使命，启程返回欧洲。

英法两公使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伯爵在上海逗留期间，屡次到徐家汇和董家渡参观，对修士和学生们的学业颇感兴趣，并施舍了大量的东西；普提雅廷曾多次到天主堂望弥撒，他对江南教区念念不忘。十二年之后，当郎怀仁主教和薛孔昭神父去罗马参加梵蒂冈公会议时，在罗马又重逢了这位俄国外交官，他还请他俩一起进餐，并表示诸多关怀。<sup>②</sup>

为了同北京朝廷正式交换经两国元首批准的条约，基督教国家的公使们约定于1859年6月在北京换约。法国派了布尔布隆，英国派了额尔金勋爵之弟卜鲁斯担任这个使命。6月初，他们到达了上海，会见了清皇朝特派的钦差。清朝官员们竭力想阻止他们北上，但终于徒然。1859年6月20日，英国一支舰队，由海军准将贺布指挥，法国则只有一艘战舰“杜坎拉”号，由司令特里科指挥，在白河口集结待命。白河口有坚强防御工事封锁着，中国官员竟无一人前来接待英法公使；贺布无视中国方面的防御准备，<sup>③</sup>决定用武力打开航道。

---

① 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21、33页起。

② 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41、151页；梅德尔1858年4月13日、7月22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75、89页。

③ 梅德尔1859年7月30日致省会长信中提到，他曾请外交官及军官们注意，要谨防中国方面的诡计；他曾劝告他们切勿以不足的武力直趋大沽。见《法信》2664。

6月25日，大沽口炮台以猛烈的炮火迎接了英法联军的登陆；虽有军官与海军们英勇奋战，但还是被迫停战撤兵，退回上海等候增援；这次战役，联军有四百三十二人丧失战斗力，法国特里科司令和英国海军准将贺布均负重伤。

这次进攻大沽要塞，贺布表现了少有的鲁莽，而中国人的诡诈却更加突出了，他们的言而无信和对外国使者的侮辱，激起了英法两国的强烈愤慨，因此英法两国决定进行报复。一次正规的远征马上开始了。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再次领军北上。<sup>①</sup> 人们可以设想大沽事件的消息会使上海产生怎样的印象，中国人都以为中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了。<sup>②</sup>

在中国内地，仇教的谣言又开始传布。上海更加恐慌。圣依纳爵瞻礼日，徐家汇第一次不接待外宾，而且谁也不敢远离租界，深怕受到袭击。8月1日，年文思主教写道：“近两三天来，一阵令人丧魂落魄的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8月1日，在几艘专运华工出国的外国轮船上，发生了不幸的骚乱之后，在洋泾浜外国人居留地一带，更是人人感到生命危殆。人们互相猜疑，洋人认为中国人在威胁，中国人认为外国人要谋杀中国人。事实上，路上确有人被击伤，也有人被杀害。租界洋人当局同中国官方进行了磋商，同意彼此采取措施，防止同样的惨案再次发生。”<sup>③</sup>

在这些日子里，神父们更极度地保持冷静。从大沽口勇

---

① 高斯：《征华史（1860年）》，第61页起。

② 同上，第71页起。《英国议会文件》转译了许多中国文件，见2687号（1860年）；卜鲁斯先生的通信。

③ 年文思1859年8月10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46页。

敢作战后来上海的“杜坎拉”号军舰上的海军要施行圣事，其中有十四名初领圣体，二十一名领受坚振，一名新教徒宣誓归正，两个戈雷的黑人领了圣洗。署理代牧不愿把这光荣任务让给他人，7月28日，他亲自在董家渡主持了这个法国水手们的节日。舰长特里科因在大沽口受了伤，伤口尚未愈合，不能离船，派了三位军官作代表，晚上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感谢署理主教，说：“军官、水手、见习水手都激动地回到舰上，他们不仅是由于领受了圣事，而且也是由于受到你如此宏量、如此热忱、如此吸引人心的招待。”<sup>①</sup>

英法在大沽口惨败后，江南的中国官员不赞同北京朝廷的种种幻想，他们了解英法海军的实力，认识到他们必将会进行极可怕的报复。当他们了解了作战实况后，立即去请求梅德尔会长，要求他在英法外交官及联军军官前斡旋调解，希望至少在上海地区能免除战事的灾祸。<sup>②</sup>

1859年7月21日，会长梅德尔接到上海道台的邀请，说愿共商大事。梅德尔在征求年文思署理的意见后，认为应当前去会见。事后，他述说道：“吴道台声称中国政府不愿战争，对白河口发生的误会深为惋惜，政府已准备交换条约，并付诸执行。他邀请英法公使上北京，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江南总督也给布尔布隆先生送来一份紧急公文，梅神父不知法国公使是否乐意接受这件公文，但是他同意从中斡旋。7月22日，在北京署理主教孟振生的陪同下，梅德尔去会见了布尔布隆公使。孟主教是来上海同公使商谈他自己教区的事务的。布

---

① 年文思1859年8月10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47页。

② 梅德尔1859年7月30日信。

尔布隆接受了公文，公文内容是求和的新建议。<sup>①</sup> 江南总督似乎忘掉了法国的一艘战舰同英国几艘军舰同样在大沽口的袭击中成了牺牲品这件事，竟恬不知耻地请求法国公使去劝说英国公使，要他不咎既往，忘掉一切所受的侮辱。<sup>②</sup>

不久，人们发觉，北京朝廷根本不考虑江南官员们呈请的建议。7月，北京《邸报》上发表了一道带有挑衅性的上谕，极力表扬大沽口袭击的挑起者，并吹嘘蛮夷已全部逐出帝国疆域。<sup>③</sup> 江南官员谋求避免战争的努力全部落空，但他们对梅神父一心协助他们的精神深表感激。上海道台对他说：“你对和平调解费神不少；我们知道你是不能直接参与外交事务的……今后，假如再遇到什么误会事，我们还得来求你多多帮助。”<sup>④</sup>

果然，数天后，梅会长又去调停一件艰巨的事务，这次却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当时，有大批中国人应募去南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做工，一时谣言纷起，说这次应募并非出于自愿，在轮船上的待遇又极度恶劣等等，也许这谣言是有根据的；于是发生了暴动，暴动发生在停泊在黄浦江的一条法国运输轮“日多达”号上。在镇压动乱中，好几名中国人被打死。被夸大的谣言更强烈地激怒了上海人民。不少外国人的住宅被抢劫，有几名洋人被杀死。中国官员请求梅德尔神父向法国公使要求，把“日多达”号上的华工遣送回家。会长神父原很

---

① 梅德尔的信同布尔布隆 1859 年 7 月 30 日的报告完全符合；又见高田：《征华史（1860 年）》，第 93 页起。

② 《英国议会文件》，2587 号（1860 年），第 69 卷第 90、98、99 页。

③ 同上。

④ 见《通讯》，第 3 卷第 93 页。

反对这类招募,认为既不道德,又很危险,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个差使;在上海道台正式承认这次应征是出于自愿后,布尔布隆便令人放二百十七名华工离船回家。<sup>①</sup>

教区会长神父这次调停的后果,使传教事业得到江南官员们的照顾。他写道:“半个月以来,我们常处于困难危险之中,中国官员极表关怀,贴出告示,并派校级官员武装宿在董家渡大堂附近,以资保护。地方当局也无法阻止一切骚扰,尤其在农村里……感谢天主,我们至今不曾遇到什么重大的悲哀事故,希望这场风暴即将过去,象过去一样不使我们经受痛苦。”<sup>②</sup>

看来上海已相当平静,不必再推迟庆祝三年来人们早已渴望的节日了。1859年5月24日,两件盖有罗马教宗渔人玉玺的诏书,颁给安德肋年文思神父,实授他为江南代牧,顶衔为贝利斯主教。<sup>③</sup>

同年10月2日,在董家渡主教大堂举行了主教祝圣典礼。主礼主教是孟振生,郎怀仁任主教时也是由他祝圣的,可惜郎主教这次不能来上海参加。梅德尔会长写信说:“孟振生主教刚才给我们中间的一位既是我们的父亲又是我们的兄弟祝圣为主教了。我们的署理主教年文思今已是贝利斯主教了。祝圣典礼进行得很顺利。大批教友从教区各地赶来参加了盛典,许多外教人士也来观礼。”<sup>④</sup>

---

① 梅德尔1859年8月15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82页起。

② 梅德尔1859年10月2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00页;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63页起。

③ 见《徐档》,卷宗B1;又总会长贝克斯1859年6月25日致年文思主教信,《徐档》,卷宗B5。

④ 梅德尔1859年10月2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60页。



有人获悉北京朝廷对欧洲列强的态度，还执迷于他们的幻想，侮辱洋人之事越来越多。12月，在好几个省内又公布了迫害教会的上谕，浙江、福建、江西已开始执行。<sup>①</sup>在江南，由于地方官员的照顾，更确切地说是由于他们担心列强进行可怕的报复，勉为其难地竭力维持着安静。可是布尔布隆与卜鲁斯两位公使认定北京朝廷的种种失信与粗暴，已无法再容忍了。<sup>②</sup>

1860年3月8日，他俩向北京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赔偿和道歉，两江总督自愿负责将通牒转呈北京。答复送来了，可又只是一场谩骂。两位公使别无他法，只有诉诸武力来解决。<sup>③</sup>

## 二、1860年联军战争时期的教区

孟斗班将军到上海 太平军进攻上海 欧洲人  
决计保卫上海 1860年战争时期的上海 蔡家湾  
的凶杀事件 太平军占领徐家汇 太平军被逐出上  
海 英法联军的战果；1860年的条约 法国军队来  
上海 归还老天主堂 耶稣会计划在天津设立科学  
机构

孟斗班将军担任法国远征部队总司令，勋爵克灵顿少将担任英国远征部队司令。海军中将夏尔内和海军准将贺布为整

---

① 见布尔热：《中国史》，第3卷第480页起。

② 见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168页起。

③ 同上，第160页起。

个舰队的舰队司令，<sup>①</sup>特雷加罗神父为法国军队的首席随军司铎。上海神父们回忆起1853年时的情景，对特雷加罗神父是极其尊敬的。<sup>②</sup>

3月12日，孟斗班到了上海，余下的远征部队也陆续前来和他汇合。<sup>③</sup>他来后不久，4月15日，在洋泾浜正举行法租界上第一座圣堂的奠基礼，该堂是奉圣若瑟为主保的。孟斗班将军和布尔布隆公使夫人被推为该教堂的保护人；远征部队的军官们为这座新堂作了慷慨的捐献。<sup>④</sup>

同一时期，会长梅德尔神父又给上海帮了一次大忙。英法联军司令们决定封锁上海，严禁中国沙船出江。这样上海就糟了。梅会长叙述说：“奉教的和不信教的商人们都来求我帮忙。孟斗班将军竟亲自向我询问。我没有提出其他要求，我只请孟将军垂怜地方。我钦佩他对执行任务的明智与热忱，他表示决不使中国人民遭受任何不必要的损害；翌日，上海代表团向法国领事先生呈上一份申请书，领事代表公使和司令官接受了申请书。下一天，即14日，孟将军召我去，对我说：‘我们方才开了一次会议，我为上海作了辩护。请快去通知那些老实人，无论在海面上或地面上，我们都不会妨碍他们的商业贸易，让他们了解到我们是有仁爱之心，并教人爱护教会的人。’我欣然从命，于是上海从死亡中苏醒了过来。”<sup>⑤</sup>

① 见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104、138页起。

② 梅德尔1861年2月8日致辣厄尔信，见《通讯》，第4卷第16页起。

③ 兰廷玉1851年4月26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3页起；施宜三、梅德尔1860年4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148页起。

④ 南志恒修士1860年7月24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83页；又缪德西《日记》，第1卷第149页。

⑤ 梅德尔1860年4月17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57页起；英国商人也是为了在上海的商业利益作了申请，见《英国议会文件》，2754号（1861年），第66卷第57页起。

不久，人们又向英法联军提出了更多的请求。当时，英法联军在上海要保护清朝皇帝的地方官的权力，而他们却又要去北京粉碎清朝皇帝的军队，这种怪现象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正陷于无政府状态。

太平军，当时民间称之为长毛，因为他们不象其他中国人那样剃头留辫子。1858年与1859年之间，太平军已失去了优势，他们由于内讧而开始分裂，最勇猛得力的将领东王和北王在内乱中丧了生；叛军撤走了1857年就驻扎在镇江、丹阳一带的队伍。这年12月27日，清兵又进驻了镇江，并开始包围南京。1858年底，额尔金勋爵溯扬子江西上时，芜湖和安庆尚在叛军手中，但南京却已被清军层层包围。<sup>①</sup>

清兵的指挥官们不急于攻城，而有意让饥馑和疾病来绞杀太平军。

1860年初，当人们知道北京朝廷一味疯狂地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时，一切都改变了。清朝兵的精锐部队都调回北方抵御英法联军的攻击。江南官员对北京战事的结局不存任何幻想，他们已丧失勇气，再也不想保卫皇朝的利益了。太平军对长江下游的形势了如指掌，决定利用时机攻占最富饶的南方诸省；他们想，占有与外国人通商的口岸，或许可以同欧洲列强取得联系，如果真能办到的话，那就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60年2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太平军突然出击，攻下了清兵的南大营：官将带头逃跑，士兵或降或散，军粮辎重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3月间，太平军又大胆出击，直取浙江省城杭州，五、六天之内即将该城攻下。太平军入城后，按

---

<sup>①</sup> 见俄理范：《杂录》，第289页起。

他们的惯例，一路烧杀抢劫，满载战利品后便安然引退。浙江省的其他富饶的城镇，在4、5月间都遭到同样的洗劫。5月29日，包围南京的清兵残余部队兵士杀了他们的许多军官，投降了太平军。<sup>①</sup>

从此，叛军即向南挺进，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了丹阳、常州和无锡，清兵一遇长毛就不战而溃。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到苏州，他借口坚壁清野，把苏州城厢区纵火烧了，这次被焚毁的财富真是不计其数。但这场大火也挽救不了这座富庶繁华的江苏省城，6月3日，苏州的清兵一见长毛，立即逃跑，叛军即进驻了城内，两江总督则潜逃到了上海。6、7月间，太平军再次夺取浙江省城杭州、松江府和近上海的几座县城。<sup>②</sup>

逃到上海的两江总督，自知无力抵抗太平军，只好低声下气地拜会了卜鲁斯和布尔布隆，请求英法联军予以支援。联军集结上海，是准备去攻打皇上的。外交官的答复很明确：只有满清皇室与英法讲和，赔偿应赔的损失，那么集结在北京周围的联军完全可以抽调出来，并能轻而易举地惩处毫无纪律的长毛。1860年6月13日，两江总督会同浙江、福建总督，联名向朝廷呈上奏折，详述他们的不幸遭遇、军队的覆灭以及人民惨遭枪杀，并恳求皇上速与外人媾和，派遣军队救援他最

---

<sup>①</sup> 葛必达神父从苏州，桑理野神父从无锡发出的信中，都以亲眼目睹的事实，作了详细的叙述。

又施宣三修士1860年4月14日的记录及葛必达神父1861年的信件，见《通讯》，第3卷第148页；第4卷第97页起。

<sup>②</sup> 南志恒1860年7月8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81、191页起；又葛必达1861年9月8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99页起。

富裕的省份，以免遭到彻底地毁灭。<sup>①</sup>

皇上的答复不久就来了。6月底，不幸的何桂清由于守土无方被降级、召回北京，不久被处死。<sup>②</sup>

当太平军逼近的消息一传到上海，英法外交官及军官们立即决定采取措施，维持上海的秩序，反对任何一方侵入，保护洋人产业，并允许继续经商。<sup>③</sup> 他们表示，不再重蹈七年前的覆辙，尽管有些英美牧师和商人同情造反者，<sup>④</sup> 如1853年对待红头那样，但此番就不让他们再有自由活动的余地了。

孟斗班将军本来就想大干一场，加上他已向教士们，尤其向梅德尔会长神父作过调查，他又看到太平军的侵扰的确给江南人民带来灾难，于是，他准备出兵挽救富饶的苏州城；可是英国人为了保持军队远征北京的实力，拒绝同他合作，他只得放弃这个计划。另外，由于太平军行军作战迅速，要挽救都来不及了，<sup>⑤</sup> 看来只有保卫上海了。江苏省的大官们一得知

① 南志恒1860年7月8日信，又卜鲁斯信件，见《英国议会文件》，2724号（1861年），第66卷第68页起。

何桂清奏折原文：“现在东南要害均为贼据，苏省已无一兵一将，全境空虚……为今日计，惟有亟为安抚夷人，坚其和议，俯如所请……顺势劝其助顺剿贼……庶几南北两畔，可期立时消释。”见《咸丰朝始末》，第52卷第15—17页，转载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53页。——译者

② 见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205页。

③ 年文思1860年6月29日、7月14日，南志恒1860年7月24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73、182页。

④ 鲍恒理1860年6月29日、7月14日信；梅德尔1860年8月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90、284页。

⑤ 参谋长施米茨上校1862年3月21日致葛必达神父信：“我们主要的错误是让太平军抢劫并夺取了苏州。当时我们是有办法防止这场灾祸的，我们必须对总司令作出公正的评价，他知道我们的任务……英法外交界却另有看法。”（高龙龔：《江南传教史》，第842页。）卜鲁斯先生也有同样的记录，见《英国议会文件》，2754号（1861年），第66卷第72页起。

卜鲁斯和布尔布隆5月23日决议的消息后，都奔到上海来，想在上海再竭力设法收复并统治省内还忠于满清皇朝的各城市。于是发生了前所未闻的怪现象，即英法联军一举两用：一面北上去进攻满清皇帝的军队，另一面却留在南方保卫上海，攻打皇帝的敌人。

上海一位耶稣会读书修士写道：“在欧洲，要把国家元首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把这省和那省分隔开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中国，只要当地居民能免遭战祸，粮食能卖个好价钱，生意多少能做下去，就什么都可以了。”<sup>①</sup>

关于英法联军的北上，我只略提几笔，仅限于众所周知的一些事实并说明它对江南教区的未来传教事业的影响。4月，第一批远征部队一来，就占领了舟山群岛；7月，英军在大连湾集结，法军在芝罘湾停泊；8月1日，联军在天津河（海河）稍北的北塘河口登陆。8月12日至21日，清兵营垒及大沽口炮台全被击溃；26日，英法全权代表进入天津，同清朝廷委派的、并无充分权限的代表们进行了无效的谈判，这样浪费了十五天。9月9日，联军向通州和北京进军；18日，谈判又开始，联军派遣的谈判大员被诱至通州，在一场蓄意策划的袭击中被俘，二十人在被俘期中丧生。9月21日，八里桥决定性的胜利，才打开了进入北京的通道；9月23日至10月3日，英法全权代表同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进行了一次谈判，也毫无结果。10月6日，皇帝的夏宫（圆明园）遭到了洗劫；10月18日和19日，英军为了报复通州的被偷袭，便焚毁了夏宫。

---

<sup>①</sup> 南志恒1860年7月24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82页起；又高田书中还记载：这时期，广东、湖广、四川的教友曾向拿破仑三世呈了一份古怪的申请书，请他来推翻满清皇朝。见《征华史（1860年）》，第212页。

10月24日，清朝廷同英国签订了和约，25日同法国签订了和约，只有此后订的条约对天主教的传教史有关。天津条约的全部条款得到批准，并增加了新的条款。和约第六款规定，皇帝出上谕向全国公布，遵守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的上谕，归还所有在教难期间被充公的圣堂、学校、公墓、财产、房屋等等，如无法归还，则按价折算，由法国驻京代表转交该处奉教之人。此外，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sup>①</sup>

经过隆重的条约交换仪式以后，10月28日举行了灵柩安葬仪式。在通州袭击中被害的谈判代表们的灵柩被安葬在法国公墓和俄国公墓。29日，在发还给北京的旧耶稣会会士的南堂内，为战事中的牺牲者举行了宗教追悼仪式，并唱了“谢主颂”和“求保护皇帝诵”，由遣使会两位主教孟振生和董若翰主礼。11月，联军撤离了北京，继后又撤离了天津，部分士兵则到上海过冬。<sup>②</sup>

天津条约从12月开始，在上海城内及其附近地区公布。<sup>③</sup>

在这次短暂而又光荣的北京战役中，上海城内要数教区

---

① 人们知道，条约第六款的法文与中文的原文有出入。中文条文中加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一句，看来应当由葛罗男爵的译员，外方传教会德拉马神父负责，此后他曾受到严厉的批评（见西蒙：《中国城》，第177页）。尽管中国人知道肇事者是谁，但他们对这条很明确的条文从未提出抗议。法国驻北京的柏尔德密公使在1865年通过一份专约，规定了行使条款规定权利的细节。1895年，公使施阿兰对条文作了说明。对这问题，可以参阅方耀华：《南京今昔》，第163页起。

② 见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406页起。

③ 范德先1860年12月3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47页。附款的附加文字只有在中文条文中见到。

的机构处境最危险。联军北上之前，孟斗班将军认为有必要向上海居民显示联军的保护实力，出动了三百名英国兵和三百名法国兵，在上海附近举行了一次军事检阅；舰队由黄浦江直驶松江，一路上没有遇到太平军。<sup>①</sup>

六百名联军和四个炮队驻在上海北面的江湾。为保卫上海南面，英国兵驻在邻近徐家汇的法华镇。法布尔上校原定带领一支法国兵的分队驻在七宝，城里绅士们恳请梅德尔神父，转请法国部队不要调防。上校同意了，于是法国兵就留驻在徐家汇。人们为他们建造了一所营房和军官住宅，这就是法国兵站驻在徐家汇的来历。<sup>②</sup>当时驻军达两百名。孟斗班北上后，法布尔上校负责保卫上海。部队分散后，徐家汇只留下了二十名士兵。<sup>③</sup>

人们担心另一种危险，即黄浦江和苏州河内充塞着那么多逃难来的船只，很可能很多太平军就隐藏在这些船只内伺机闹事。于是由两名中国官员、一名英国军官、一名法国军官组成的一支检查队，出动检查，遇有可疑的船只，就勒令驶离苏州河，或把船凿沉。<sup>④</sup>

7月，英法联军纷纷北上，上海的外国防军大大减少了。总共只有八百名英国兵、四百名法国兵和几艘炮舰守防黄浦江，这对于保卫上海城是足够了，但要保卫城外的机构似还不

---

① 南志恒1860年7月24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83页起；高龙整：《江南传教史》，第740页；蒙塔尔特：《上海史话》，第104页；又英国外交官及武官们极有兴趣的信件，载《英国议会文件》，2754号（1861年），第66卷第83页起。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84页。

③ 同上，第189页。

④ 见《通讯》，第3卷第202页；又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204页。



足。<sup>①</sup>

蔡家湾孤儿院离上海四里，徐汇公学和耶稣会会院离城两里，这三所机构的处境更为危险。

同年6月底7月初，上海道台看到由英法联军单独保卫上海感到很惭愧，他本人指挥的清兵则又是士气消沉，他对这支队伍不存任何幻想，于是便另外成立了一支西式装备、西式训练的军队，取名“洋枪队”。美国人华尔受命招募组织这支军队。在道台保证高薪和上海富商们的资助下，迅速吸收了一批各国的冒险分子，他们具有无可争辩的作战勇气，但他们都是一些目无法纪的人。<sup>②</sup>

不久，由于他们常常获胜，中国人称他们为“常胜军”。在这支军队的成员中，有不少马尼拉人、澳门人和欧洲人，他们都信奉天主教，上海的神父们曾多次给他们施行圣事。<sup>③</sup>

有一艘“孔夫子”号小汽艇，艇上的队伍也是按照华尔的招兵章程招募来的，他们完全听从华尔的指挥。<sup>④</sup>而英国人、美国人不仅供应武器及军需给太平军，同时也供应给清兵。

7月16日，华尔部队从叛军手里一举夺回了松江府城；可是不幸，8月2日的青浦一战，华尔部队却打了败仗，从此又大长了太平军的志气。<sup>⑤</sup>

---

① 这些细节是我从年文思主教、梅德尔会长、鲍恒理神父和读书修士南志恒、范德先、施宣三当时写去法国的书信中摘录来的，他们都是目睹者和当事人。每个细节我将注明上引信件上的出处。

② 南志恒信，见《通讯》，第3卷第205页。

③ 杜若兰神父信，见《通讯》，第3卷第218页；有关华尔及其部队的情况，见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202页起。

④ 南志恒、施宣三信，见《通讯》，第3卷第208、215页。

⑤ 同上，第205、209、216页。

太平军由于松江已被夺回，在溃退时他们又遭到四乡农民的纷纷追击，因为这些农民被太平军搞得家破人亡，于是太平军被激怒了，决定向上海进军。8月17日，他们的一支队伍在蔡家湾孤儿院附近路过。一个月之前，太平军曾对孤儿院大门上飘着的三色旗是尊重的。<sup>①</sup>居民们以为太平军仍然一如既往，没想到这次却上当了。<sup>②</sup>

当时，孤儿院的马理师神父没有把孤儿安置在安全场所，他们各自都从事于日常工作。17日早上，当他们得知太平军正向前开来后，马理师神父便指挥孤儿中幼小和病弱的去徐家汇，并命令其他孤儿逃往邻近的小会口。可是大部分孤儿坚决要同他们的神父留在一起。

午后，马理师神父正在小堂内，他的四周围着孤儿和相当多的教友。突然，两个长毛打开了大门，高喊着“杀！杀！”向内直冲。神父镇静如常，迎上前去，想给他们解说院内的贫穷和孤儿院行善的性质，用以缓和一下空气。不料一个可怜虫一挥刀，斩掉了神父的一个手指。神父忍住疼痛，领他们到卧室，打开钱箱，他们就从中取走了仅存的数枚银圆，满意地退走了。不久，又来了另一队；尽管神父劝阻，长毛还是把屋子洗劫了，并命令神父替他们背一大袋抢来的粮食，跟着入侵者出门。孤儿们放声大哭，哀求他们释放神父。马神父也泪流满面，表示坚决不愿和这些孤儿们分离。长毛强拖硬拉，因神

---

① 南志恒信，见《通讯》，第3卷第206页。

② 有许多人记述了这件事。施宣三9月1日、范德先8月31日、年文思11月5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93、194、216、241页起；继马理师管理蔡家湾孤儿院的薛孔昭、曾振东并就地取材补充了若干细节，见《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127页起。

父始终抗拒,一个匪徒就在他胸部刺了一枪,神父立即倒在稻田中,刽子手们又用标枪乱刺乱戳,结果神父被戳死了,他们还践踏了他的尸体。神父的传教先生和两名孤儿也同时被俘。数天后,传教先生逃了回来,上海的神父们才从他那儿得知了马神父悲惨而又光荣以身殉职的详细情节。

孤儿们在田野上乱窜乱逃,有好几个在横渡屋边河浜时淹死了;有的被惨杀;有的被虏去。傍晚,少数孤儿丧魂落魄地逃到了徐家汇,首先给神父们带来了这个噩耗。

孤儿院的管账先生,一位山东籍的好教友,那天,他也受了伤并被俘。数分钟后,长毛们却把他放了。长毛队伍远离后,这个正直人困难地爬回被匪徒纵火烧毁而已空无一人的屋子。由于几名教友的帮助,他把火扑灭了;这样,一部分建筑保存了下来。接着他就去寻找马神父的遗体,终于在稻田中找到了。只见尸体伤口累累、血迹斑斑。院内原有一口现成的棺柩,他就把神父的遗体入殓,草草埋下。在附近河浜及田野里,他又找到了二十六具孤儿的尸体,同样也给他们尽了最后的义务。<sup>①</sup>

数星期后,年文思主教写信给圣婴会常委说:“吾主要我们分担他的十字苦架,在他特别钟爱的孤儿院,担子更重……负责孤儿院的马理师神父,在整个春季,都在为孤儿们操劳。当叛军迫近,四周已陷于混乱时,他还极度镇静,常给教友和教外人以极明智的指导和最仁爱的服务。”<sup>②</sup>

年文思主教向耶稣会总会长汇报了这场惨杀事件,总会

---

① 范德先信,见《通讯》,第3卷第193页。

② 年文思1860年11月3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41页起。

1111

长回信说：“从本会复兴后直到如今，我们常羡慕那种光荣和荣誉，即老修会和新修会的传教士中，有人用鲜血印证了他们宣传的信仰。仁慈的天主消除了我们的生怕在天主眼里不如先辈的想法。在亚洲的两端、叙利亚和中国，几乎在同时期，吾主在本修会中选择了牺牲者。用他们的鲜血，为同会弟兄转求天主，使他们的工作取得丰硕成果。”<sup>①</sup>

惨杀的消息于8月17日傍晚传到了徐家汇。先是由逃来的孤儿们，继而又有一名报信人，报告了马理师神父之死。众人忧心忡忡，估计翌日长毛即将来到。<sup>②</sup>

当夜，法布尔上校决定，必须把一切兵力集中在上海，命令驻防徐家汇的二十个哨兵立即回上海。神父们觉得，不可能再在一所无设防的屋子里逗留下去了。于是他们便连夜整理行装；8月18日清晨，从蔡家湾逃来徐家汇的孤儿和徐汇公学的学生们，在神父们带领下一齐赶往了董家渡。<sup>③</sup>

董家渡也不能久留，人口稠密的城厢已乱成一团；当逃难者来到时，人们正在把主教座堂、耶稣会住院的所有贵重物件运载到有陆军和海军驻守的法租界去。在董家渡神父住院，有十二名士兵组成了一个临时岗哨驻守，以防抢劫。只剩会长梅德尔、兰廷玉和桑理爵两神父以及娄良才、方百胜两名辅理修士决定留守到最后，准备到极危险时再撤往洋泾浜。所有从徐家汇逃来的人都住在杜若兰神父的小屋内，圣堂余屋内<sup>④</sup>也住满了人。

① 年文忌 1860年11月17日信，见《徐档》，卷宗B5。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89页。

③ 同上，第190页。

④ 范德先信，见《通讯》，第3卷第193页起。

那天,当神父同孩子们动身后的数小时,叛军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家汇。诸“王”之一的忠王,就在这里设了司令部。午后,忠王的先头部队已迫近上海南门城厢区,同时,满载叛军的兵船也驶进了黄浦江。县城沿黄浦江的东段和南段是法国军队分防的地区,当叛军一出现,法军只要对准他们扫射一阵,足可阻止他们前进。<sup>①</sup>

翌日,8月19日,叛军部队沿黄浦江入侵到城墙和法租界之间的城厢区,当时的法租界被划定在沿洋泾浜一带。

防守主教大堂的十二名法国兵,很有办法护卫圣堂。海军中尉勒伯勒东命令“强力”号舰的海军登陆,向城厢区开炮,许多中国房屋着了火,抢劫者也逃得无影无踪。同时“强力”号由比泰尔海军上尉率领,溯黄浦江而上,靠近董家渡后便向该地区的街道逐条扫射,一艘英国炮舰向上挺进得更远,这种示威很有成效,董家渡的混乱平静了,蔡家湾来的孤儿又被送了回去。

20日,忠王从徐家汇出发,企图进攻上海西门及租界,这地区是由英国兵防守的;同法国兵昨天的炮火一样,英国人的炮火很快地迫使太平军后撤,并当场击毙了数百名太平军。<sup>②</sup>

21日和22日两天,长毛停止进攻。22日,英军的一名译员福雷斯特带了一个随员,扯着谈判的白旗,来到叛军前哨,受到一名长官的接待。这位长官对于洋人如此无情地以炮火相见,深表怨愤。因为太平军是应某些洋人的邀请而来的。事实确是如此,许多耶稣教牧师和英国领事密妥士先生同叛军

---

① 范德先信,见《通讯》,第3卷第194页。

② 范德先、梅德尔信,见《通讯》,第3卷第196页起;第4卷第17页。

有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到过苏州，使长毛们认为，他们来上海，英国人是肯定会援助他们的。事实上，英国人确曾暗暗地策划接待他们的朋友。<sup>①</sup>

幸而英国公使卜鲁斯先生对太平军不抱任何幻想，他终于禁止了密妥士继续和长毛保持联系。<sup>②</sup>

福雷斯特遵照上级指示，拒绝去徐家汇会见忠王，说他的任务只是传递照会。照会中确切警告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否则欧洲军队即将向太平军进攻。<sup>③</sup>

翌日，8月23日，忠王的答复送来了。象往常一样，忠王呼吁宗教团体、欧洲人士以及反对满清的各帮派联合起来；并说只要承认太平天国，就保证能得到通商的完全自由，最后他还用威胁的词句结束了回信。<sup>④</sup>

同日，有洋人骑马出城到徐家汇进行侦察，只见神父们的屋子空着，敌人向苏州方向撤走了。神父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即派娄良才和陆乾坤两位辅理修士，于24日清晨，在一小队马尼拉人的护送下到了徐家汇。他们来的正及时，因为叛军走后，一伙土匪正拥进神父住院，修士们的到来正好阻止并消弭了这次抢劫事件。屋子完整无损，只是脏污不堪、杂乱无章，因为长毛的目的原是搜抄金银财宝。据同日到徐家汇的范德先修士的估计，损失约五万法郎，附近教友寄存在神父处

---

① 施宣三信，见《通讯》，第5卷第215页；又麦克莱伦：《上海史话》，第49页；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110页；《英国议会文件》。

② 1860年8月1日，见《英国议会文件》。按照施宣三信件所述，有几位法国人也同样去探访过太平军。

③ 范德先信，见《通讯》，第3卷第197页起。

④ 高龙肇：《江南传教史》，第744页记的是8月24日，而范德先的上述信件第197页中，肯定神父们回徐家汇是在23日。

的大量财物尚不计在内。<sup>①</sup>

长毛进攻上海的消息传到后，英法联军的将官们就从北方派来了增援部队。对徐家汇神父住院原很关心的孟斗班将军，特命令重新在徐家汇设置哨岗，以资防守。<sup>②</sup>

由于其他原因，不久，危险暂时消失了。10月，忠王及其部队被召回南京去攻打清朝兵。那时，安徽的清兵在曾国藩、曾国荃两弟兄的指挥下，同太平军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从此，曾氏弟兄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后面我们将再提及他俩。但当时上海附近的几个县城仍被太平军占领着，而且他们还常常离开县城，蹂躏着松江和苏州两府的富饶农村。

12月，联军胜利部队从北京南撤，许多法国兵来上海过冬。<sup>③</sup>上海所有的岗哨由联军重新分配布防。在上海如在别处一样，我们的突击队和步兵很快地与本地人接近了。本地人对外国兵起初还有些疑惧，范德先修士信上说：“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灰色的法国军装。奇怪的是，我们的这批大老粗，在交战国的中国国土上，竟毫无困难地同中国老百姓混在一起。当我们假日散步时，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种种有趣的怪事。我们的这批天津的胜利者，在乐滋滋的时日里，他们手中的银圆，当然有的是抢来的，从他们发痒的手指缝间溜走

---

① 见《通讯》，第3卷第198页。按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90页上说，长毛们逃离徐家汇是由于听到英国军队里有印度兵。他们认为那批“黑鬼”特别可怕，因此急于撤退了，这分明是个假消息。

② 范德先信，见《通讯》，第3卷第196页；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93页；又梅德尔1860年9月30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33页。

③ 神父们特别谈到，在某个突击营和第101联队的几个营内，有不少好家庭出身的志愿军。

了……我们的士兵任意挥霍钱财，你是不难想象的。他们的一切怪事，我可以给你们写上一本书。当他们还不认识我们，突然听到我们用法语和他们交谈时的惊慌的呆相，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就是他们在喝得醉醺醺时，突然听到传教士的呼唤声，他们也会立刻表示尊敬与服从，乖乖地被领回到营房。今年冬天，给他们做些善举，正是大有可为哩。”<sup>①</sup>

假如董家渡神父们写的情况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神父们为我们的士兵做的善举真是太多了。那年在主教大堂过的圣诞节，尤为突出。圣堂内前面数排的座位上，坐着一百五十至两百名突击营士兵，他们扎营于附近的几座庙宇内；二十多名军官身穿军装站在弥撒间内，另外还有营里的军乐队。圣堂的中殿挤满了中国教友与教外人士，他们争相前来围观这些胜利者。主教弥撒从来没有这样隆重过，年文思主教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sup>②</sup>

传教士特别指出，我们的这些士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成千上万的贫苦者的慈悲心。那些可怜的贫苦人，是因为长毛的侵扰而失去了他们的一切财产，被迫逃难来上海。<sup>③</sup>

施宣三修士写道：“这种惨状深深地感动了驻扎在我们中国区(南市)内的法国士兵；他们每天把大量的面包和肉施舍给许多可怜的乞丐。目前，唯一驻扎在中国区的一个连，常常被这些饥民们包围。这种饥民们的人流，说明了我们士兵们的善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sup>④</sup>

---

① 见《通讯》，第3卷第250页起。

② 兰廷玉1861年1月26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5页起。

③ 施宣三1861年1月20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6页。

④ 同上。



兰廷玉神父每天去探访驻在主教大堂附近的一个突击营，他的叙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情景。“使高贵的法国子民争光的是，当我们法国兵不论是在城内或城厢一建立营地或哨所，就可立即看到一群群乞丐奔走相告，说：‘法兰西人好。’接着，每日两次部队进餐时，他们便成群结队而来，为的是能领取一块面包。于是他们和士兵们渐渐彼此相识了。有的士兵在人群中认识了一个可怜的老头或一个凄苦的老妪。这个老头或老妪从此就成为他的特殊照顾者。士兵们用法语对老人说：‘老头，你每天上午十时来，我会给你吃的。’继而给他打着手势，表示今天就这些了；老人明白了。第二天，可怜的老人又得到他的一份配给。好几次施饭时，我在营房门口碰到这样的老人。这真是一幅奇怪而又令人感动的情景。这些士兵的善心，也在此全部流露了。”<sup>①</sup>

驻在董家渡的突击队，就这样每天要供养四、五十名穷人。至于个别人的善举，神父们谈起来更是津津乐道。有一名突击队的下级军官，遇到一个倒在街头的老妪，他就买了一大捆稻草，背到老妪洒身的草棚里。他说：“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什么政府，只是为了这个穷苦的老妪。这不能混为一谈。”这是一个外地来的女乞丐。她不熟悉上海，她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月来，就由突击队赡养着。突击队开走的前夜，一个小班长和另一个人把他们领到董家渡教堂，先给了三天的食粮，后把他们移交给了神父们。<sup>②</sup>

---

<sup>①</sup> 兰廷玉 1861 年 3 月 3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7 页。兰神父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忠实的叙述者，我不说一切尽善尽美，也不说我们的兵士都是圣人，不，我们也有惨痛的事……只是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严重。”

<sup>②</sup> 见《通讯》，第 4 卷第 28 页起。

一名班长认养了一个满生长着可怕疥疮的孩子。班长说：“因他最令人可怜。”士兵们把他清洗干净，并替他治疗疥疮，还教他学习经言；部队出发之前，又为他捐了一笔款子，约四十个法郎左右，小“阿尔蒂尔”就由教区孤儿院收养了下来，不久领了洗礼。<sup>①</sup>这件事后来在法国，每逢圣婴会有什么庆祝活动，都被编作喜剧来演出，剧名：《徐家汇的孤儿》<sup>②</sup>，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曾取得很好的效果。

冬末，我们的远征部队撤离了上海，许多士兵把他们的日用品或家具赠送给了教区，折合两千多法郎。然而城里的大官却冷若冰霜，对数以千计避难来城的灾民们的疾苦漠不关心，连横在街头的冻尸饿殍也不收埋，这使我们的士兵十分反感。他们反复说：“上海，多么痛苦呵！中国官员真毫无心肝，听凭遭难的老百姓象狗一样的死在街上……上海要是有一万名法国兵，那些难民就不会死在街头了。”<sup>③</sup>上海人民一直缅怀法国士兵们的仁爱善举，教士们认为这对他们的传教事业是一种真正的帮助。<sup>④</sup>

在1861年的头几个月，孟斗班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施米茨上校给江南教区帮了一次极大的忙。我们曾经看到，刺尊尼先生为了使上海的已改作关帝庙的老天主堂及其附属的耶稣会神父住院归还给南京署理主教，作出过不少努力。当时中国官员声称：归还老天主堂，必将引起民众的反对，故宁以另

---

① 见《通讯》，第4卷第6页。

② 见《婴年》，第13卷第361页起。

③ 见《通讯》，第4卷第28、30页。穆德西先生在他的《日记》，第2卷第33页上对我们士兵做的好事作了很有趣的详细记载。

④ 梅德尔致圣婴会总部信，见《通讯》，第4卷第132页。

外三块土地代偿，其中的第一块即现今董家渡主教大堂所在地；而新建的洋泾浜圣若瑟堂则建造在第二块土地上<sup>①</sup>。

根据刺萼尼先生争得的上谕和天津条约附条第六款，加上不久前，法国军队曾为清军保卫上海抵御太平军作出的重大贡献，施米茨上校出主意，要清朝廷把老天主堂及耶稣会住院归还给教区。1861年1月，施米茨上校得到孟斗班的同意，到上海道台处进行活动；<sup>②</sup>始终忠于教会利益的爱棠先生，积极推动这件事的进行。<sup>③</sup>

当时的上海道台原是梅德尔会长及其他传教士的好朋友，他经过再三考虑，乃决定归还教产。战神塑像决定搬运到西门附近的另一所庙里；搬运前人们谨慎小心地把红纸条封住了塑像的双眼，说是为了掩住他的眼泪，也有人说这是象征他流的泪是血泪。<sup>④</sup>

1861年2月19日，老天主堂归还给当时法国驻上海的署理领事爱棠先生，由他转交给传教士；2月20日，年文思主教任命一位中国神父余伯禄为老天主堂本堂。余神父就在圣堂附近开办了一所小学，邻近的教外儿童便纷纷前来上学。<sup>⑤</sup>1861年4月7日耶稣复活瞻礼后的第一个主日（星期日），选定为老天主堂隆重举行恢复宗教活动的复堂仪式。<sup>⑥</sup>

---

① 见本书，第1卷第87页。

② 见薛孔昭：《葛必达神父传》，第20页起；又黄伯禄：《上海老天主堂记》，第24页起。

③ 爱棠发出的一切文件都保存在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内，见《江南教区》，卷宗第116号。

④ 富守和1861年2月29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1页。

⑤ 见黄伯禄：《上海老天主堂记》，第24页起。

⑥ 按极认真研究过中国文件的黄伯禄神父提供，那时那座关帝庙只剩下潘国光神父老堂的几堵墙和几根柱子。见《上海老天主堂记》，第29页。

这之前好几天，董家渡的兰廷玉神父在几个班的法国士兵的协助下，把老堂改装得焕然一新。丝帷绸幔、宫灯、花灯以及一簇簇由长枪、短枪和刺刀扎成的装饰品和教友们赠献的美妙的中文对联轴子等交相映辉。曾亲历其境的施宣三修士叙述说：4月7日，早上九时，<sup>①</sup>由大十字前导的迎宾大队，从圣堂出发到法国兵营所在地的豫园湖心亭茶室，迎接孟斗班将军及其随从军官。记述者又写道：“我幸福地联想到这大十字架的辉煌胜利，它久遭窘难，被迫隐藏在黑暗之中，而今日却能庄严地在满是外教人的城中心的大街上巡回游行。这些教外居民目睹我们庄重的教礼教仪，十分惊讶，满怀着崇敬。”

总司令孟斗班由六十到八十位军官簇拥着，其中有雅曼和德邦茨芒两位将军和海军少将卜罗德。年文思主教穿着主教礼服，由许多神职人员围绕着在圣堂大门口迎接迎宾大队。他先给孟斗班吻亲十字苦像，接着主教以全体教友的名义，说了几句热情洋溢的话，感谢孟斗班将军及其战友，感谢中法条约的签订，尤其感谢这座老堂的归还。主教说：“老堂的归还，说明了教外人的战神已被教友的保护神战败，迫使他不得不归还这不义之财。”总司令完全用教友的口吻作了答词：他首先感谢天主，在这次短暂而又光荣的联军战役中获有成果。接着由“强力”号驱逐舰的随军司铎拉巴-博尔德里神父举行弥撒，年文思主教在宝座上观礼。联军的一队军乐队吹奏宗教乐曲。最后，大礼以主教的祝福而告终。整整有一个星期，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参观这座发还的教堂，那里的中国神父便乘机

---

<sup>①</sup> 施宣三1861年4月14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33页起。

向他们讲解我天主教的基本信条。<sup>①</sup>

剩下的是归还先前的神父住院的问题，那时住院已充作上海绅士们集会的书院了，官方对此犹豫不决，生怕激起这个有力的团体的愤怒。4月10日，孟斗班将军照会了负责外交事务的南京代理总督，代理总督把这事转交给了上海道台。由于绅士们的拒绝，需要领事从中做许多工作。10月23日，爱棠领事写了一封愤慨的信给上海道台，气愤地叫道台追忆传教士为上海城的利益所作出的牺牲，并说，传教士们并不要求归还教区原有的全部教产，1847年让与的土地仅是一种补偿；可是旧耶稣会神父们的这所住院必须归还，这是于情于义都不容推辞的职责。

道台让步了，1862年3月19日，梅德尔会长、领事馆翻译杜若兰神父会同道台的代表们，一起商量如何归还住院并划定了住院的范围。绅士们集会的书院由公费择地另建。1863年3月，教区又买进了几幢邻近住房，这件事算结束了，城内的教会机构也更安全了。<sup>②</sup>

在老天主堂复堂后的数天，1861年4月22日，孟斗班将军离开了上海。他离上海之前的一个星期日，在最后一次参加了军人弥撒后，他向聚集在洋泾浜小堂内的各位神父话别。杜若兰神父记述道：“直到最后，他还关心我们……话别时他给我们说了几句极热情、又引人入胜而又极虔诚的话。他说

---

<sup>①</sup> 施寅三 1861年4月14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38页起；又黄伯禄：《上海老天主堂记》，第25页。年文思主教的讲话中有一个令人惋惜的缺陷，即没有提及施米茨上校，而上校对老天主堂的归还曾出过大力。当时上校已回法国，他对此事深表遗憾（施米茨 1861年7月25日致葛必达神父信，见《法信》2566）。

<sup>②</sup> 见黄伯禄：《上海老天主堂记》，第27页。

他希望这次远征，法国能给中国在显扬天主的光荣上作出贡献，而不单纯地在商业利益上斤斤计较。中国教友看到法国大官们也庄重地来望弥撒而感到光荣。”<sup>①</sup>

同时，孟斗班将军和他的好几位亲密战友曾设想一种计划，这计划如能得到巴黎的认可，那对中国的未来定将产生十分可喜的后果。在远征军从北京回来之后，梅德尔在致省会长神父的信中也提及，远征军高级参谋部的好多位军官来到上海后，认为要保存这次战争的胜利成果，最好的办法是在北京重新建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派遣耶稣会会士创办的科学、文学、艺术事业。这样，教会的和法国的影响能在中国上层阶级中起作用，进而逐步用我们的基督文化去争取这个国家。参谋部许多军官把自己的看法同梅德尔会长和其他传教士，特别同葛必达神父进行了商讨。葛神父曾带领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地教友来上海避难，<sup>②</sup>他除了照顾避难教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道德修养外，还和许多英法军官和外交官们保持了极真挚的联系。施米茨上校按额尔金勋爵的说法，是远征军中最最突出的人物，他对这项计划尤感兴趣。<sup>③</sup>他深得国王拿破仑三世的宠幸，曾为国王的传令官，他的观点比巴黎任何人的更能引人注目。<sup>④</sup>这些先生们曾就这个问题清楚地询问梅德尔会长，耶稣会是否准备在北京复兴先辈的事业。

---

① 杜若兰 1861 年 4 月 23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66 页。

② 见本卷第 16 页起。

③ 见高田：《远征史（1860 年）》第 138 页上引证额尔金的话，原话是：“皇帝的一个挚友，一位杰出的人被派到这里来了。”

④ 北京法国驻华公使馆的秘书，伯爵哥士普先生 1860 年 11 月 27 日致葛必达神父的信，虽行文暧昧，但也可见当时公使馆内的同僚都有同样的意见。

梅神父的答复却令人扫兴。我们已经看到,不论在1848年马再新神父北京之行,或在直隶划分为三个代牧区时,梅神父始终表示反对另创任何新业。他认为,江南教区已足够消耗耶稣会巴黎省的一切资源了。<sup>①</sup>

1860年,当人们提议讨论这个计划时,梅神父还是持同样的立场。他叙述说:“对于耶稣会会士会不会要求占有教区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是上级的事,我想他们是不会主动提出要求的……耶稣会会接受么?我认为,这只有上级能答复。提议的事,假定对各教区大有益处,但对本修会却大有不便。总之,我认为更为适宜的是,希望传教行圣事常能走在科学教育事业的前面。按我们看来,科学只是一种方法,而救人灵魂才是目的。”<sup>②</sup>

当然梅会长随即把不久前人们向他提出的建议和他的答复向罗马和巴黎的上级作了汇报。耶稣会法国省参赞吕比荣神父表扬了梅神父的审慎,对上北京的计划,他也不比梅神父有更大的兴趣和热忱。他特别指出,法国耶稣会巴黎省会士,由于当时国家允许教育自由,在这些年头里,已过重地承担了许多公学,为理想中的新计划再要物色一批科学人才作基础,那是特别困难的。<sup>③</sup>

① 见本书,第1卷第189页和本卷第6页起;见《法信》2768。

② 梅德尔1860年12月6日信,见《法信》2667。

③ 梅德尔1861年5月2日的复信,见《徐档》,卷宗E 5;数月之后,他又写信说:“遣使会会士已在北京了,看来他们是坚持要保留这个岗位的。考虑到我们在欧洲的事业,我们已有难以胜任的教区,只有圣部能对这事作出决定并保留他的主动权……用不到再去深思。敏体尼先生在这里曾向我们谈及此事。我们只有衷心感谢他对我们的好意。我们了解这位善良的政治家的愿望,但这是不会有结果的。”梅德尔1862年2月22日信,见《徐档》,卷宗E 9。

这个时期,耶稣会巴黎省单独要维持五个传教区:即南京、卡宴、纽约、上加拿大、下加拿大(见《耶稣会法国省历年函牍》,1856年10月,第3页)。

梅德尔会长对这个问题坦率地表示了他全部的意见，虽然篇幅冗长，我认为把它几乎全部转载还是合适的。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文件更能使人了解当时这位江南教区的杰出的救星和组织者。“困难不仅仅是寻觅科学家去当北京的传教士，并获得传教的许可，而是必须知道这些科学家们在朝廷上能做些什么，又怎样保持他们的地位？在业已站稳脚跟的俄国科学家和今后还将接踵而来的各国科学家面前，又怎样维护教会的以及耶稣会的荣誉？”梅神父认为，当时的处境要比康熙时代更为困难，因那时欧洲的初级科学知识已足使中国社会信服。之后，他又补充说：“总之，我深信，如上述事业由本会来办理，看来麻烦大而且多，对救灵事业也会有妨碍。如果由现在负责北京代牧区的传教士去办理科学和天文事业，那就毫无不便之处，并能获得良好的成果。<sup>①</sup>指望本会去北京，就要在那儿定居下来，那就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否则就达不到目的。对我们先辈的道德规范，我们自该追随仿效，但对于他们的工作，尽管是很有益的，但也并不是件件都非搞不可；我想那时，如果有其他科学家来中国，我们的先辈也很难不受到指责……科学可以由本会引进，但必须从培养和教育青年着手。我们的公学和我们的修道院正预备逐步培养造就能掌握各类科学的有用人才……不过在道德和科学方

---

<sup>①</sup> 梅会长对这问题的看法，在他 1860 年 11 月 25 日写给巴黎省会长神父的信上，表达得更清楚。信上说：“我想我应当向你倾诉，在中国，我们除现有的教区之外，别无他求。江南已足倾注我们全部的精力。我也深信，我们在这里，与人们提供的其他地点相比，危险和困难要少得多，也更能为天主稳定地多救些灵魂。所以我认为，我们不仅不去追寻其他地方，而且将尽力回避。最重要的，我认为不要去伤害遣使会的感情，他们的确值得我们尊重和敬爱。再者，在传教士之间，爱德是最重要的。”见《法信》2667；又《徐档》，卷宗 E6。



苗培育青年,不一定需要离开被称为学者之乡的江南省,只要我们在业已开创的事业上加以改进直趋完备。”

这是我们教区会长个人的意见;他坦白承认他周围的人同他的意见并不一致,尤其曾和施米茨上校及上校的朋友们磋商过这计划的神父中,许多人对这个计划比施米茨本人还感兴趣。这个问题在江南教区咨议会上没有正式提出过,但在会长神父同咨议神父的谈话中,可以肯定晁德莅神父的意见是和他一致的,即不赞成去北京另立机构,而葛必达、鄂尔璧、杜若兰三位,看来很愿意这个计划的成功。<sup>①</sup>

法国省参赞吕比荣神父在信中明确表示了罗马上级的态度:“耶稣会对此事不采取主动,因为本会负担已太重,更不愿触犯北京的传教士……神父们是否同意?为了信仰,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是乐于接受工作的。但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条件,即在首都我们必须有传教的完全自由。”<sup>②</sup>

上北京办科学事业,这问题应由法国政府同传信部来决定,耶稣会非经上级正式委托是不予接受的。这种委托是否会实现?为了这事,施米茨上校在巴黎积极地进行活动,他在致葛必达神父的许多信件中,<sup>③</sup>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活动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波折。在孟斗班将军回法国之前两个月,施米茨在离开上海时,曾拟订了两份重要的备忘录,一份是专呈拿

---

① 梅德尔 1861 年 5 月 2 日致吕比荣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E5。

② 同上。

③ 在这位杰出的军官逗留上海时,葛必达神父有幸把他引归教会,重过教友生活。我从未见过更动人心弦的书信。施米茨上校在回法国的归途中及到达法国后写给葛神父的信中,向葛神父陈述,通过葛神父的帮助,他心灵深处的种种感受。信件保存在《法信》2566、2766。

破仑三世的,另一份是手抄石印的,印了不少复本,我想必定是发给有关人员征求对此计划的意见的。<sup>①</sup>

第一份备忘录一看便知道,施米茨是吸取了梅德尔神父的上述的观点。在这份备忘录中,施米茨上校描述了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旧耶稣会会士在北京教区的地位。“一切都已消逝了,可是传统至今仍留存着。我们只要继承这个传统,我们就可重建我们在北京的势力。在法国军队取得了胜利的今天,从时间上来讲,也是最为适宜的”。为此,必须在北京“设置一个特殊的教区,由二十五到三十岁年龄的传教士组成,其中要有文学家、数学家、工程师,他们可精神抖擞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前进。唯独耶稣会具有这种多才多艺的人,足以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目前,法国军队已使北京代牧区的遣使会会士重新管理过去的主教大堂,看来对科学事业,他们提供不了如此相应的人才。假如皇上对这个计划有兴趣,那么就该向罗马教宗及传信部提出,并在巴黎的耶稣会省会长处做工作,好让他们准备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江南的耶稣会会士对这计划表示不愿考虑,他们“分散在辽阔的地区,教区已负担着繁重的任务,人员又不足,教区的各个据点的工作都已十分繁忙,势难再接受新的工作。另一方面,遣使会会士已在北京了,此地耶稣会更不愿主动地去承担一桩使遣使会会士不愉快的工作”。上校满怀爱祖国、爱教会的精神作出结论说:“为了帮助教会和增进商业利益,我们要在中国保持我们军队刚

---

<sup>①</sup> 第二份备忘录曾石印了不少复本(《法信》2566、2660),我曾在《法信》2566中找到第一份备忘录,那是葛必达神父手录的。所以葛必达神父和施米茨上校肯定对二份备忘录是商量过的,很可能葛神父参与了编写、定稿工作,但我没有确凿的证据。

刚争得的地位。我们的商业还处于萌芽状态，应设法使它发展。我们该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增加我们的任务，通过这些任务，使法国的声誉、法国的精神和法国的光荣得以发扬光大。在今天的状况下，百事都可兴办，也不会触犯任何人的合法权利，倘若迟迟不进，就会阻力丛生。”

第二份备忘录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尤其提出了建立一个庞大的科学机构的重要性。“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福音正是从北京传开到帝国各地的，所以也该在北京重新建立起中国各教区的活动中心。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首都对各省的影响，比欧洲任何王国更为敏感。因此，一旦外省获悉传教士在北京受到接待和尊敬，对于散居内地的教会同事来说，就能避免骚扰，甚至可以避免教难。这些骚扰常常会使弱小者畏缩不前，损害传教热忱。”假如上面提及的专家们是耶稣会会士，他们就能在搞好科学工作的同时，尽好传教士的传教职责。

人们可把整个或部分的北京的本堂区委托给他们，以避免和当地的传教士在执行神权方面发生矛盾。

施米茨上校用现实的观点，促使部长们密切注意。当时由于意大利的马蜂窝<sup>①</sup>和罗马事件，激怒了法国教友，部长们感到左右为难。“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否认，当时人民的宗教情感，在痛苦中又激发了。多亏了我们的胜利，耶稣会的旧教区得以在北京恢复，希望这个消息能幸运地扭转法国虔诚教友当前沉重痛苦的心情……忧心忡忡处于四面楚歌中的教宗庇护九世，接受最崇高者提出的请求，请求的又是一项迎合

---

<sup>①</sup> 马蜂窝，指意大利革命。——译者

他的夙愿，是卓越的传教事业，他岂能无动于衷……北京旧教区的恢复，可使法国惊惶不安的宗教情绪得以稳定，教权和政权之间的关系便于改善，政教双方的负责人得到全国同胞和教胞们的铭感称谢而得到应有的尊敬，最后，还得到了上天的特别保佑。”<sup>①</sup>

1861年4月，当时施米茨上校正在巴黎。4月24日，他写信给葛必达神父，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经过，说已觐见过国王，并呈上了备忘录。<sup>②</sup>拿破仑三世把备忘录交给鲁朗先生，叫他在议会开会时讨论。“我同鲁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觉得他是一位很能玉成我计划的人。鲁朗先生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却遭到图弗内尔先生的反对。<sup>③</sup>我把第二份备忘录交给他，<sup>④</sup>料他已和国王直接谈论过此事了，但至今我还没有得到消息。我曾去拜访图弗内尔先生，他完全明了北京需要有一个与众不同和可靠的教区，也明了只有耶稣会会士对复兴教区更为适宜。但他却要人们郑重考虑：‘遣使会会士目前正占领着这个教区；你的要求是要我来一个反占领。再说另一方面，遣使会的组织是卓越的法国组织，而耶稣会却远非如此。我要请艾蒂安神父来，催促他快组织一个研究团，先把组织人员呈报上来，这样我们可以把问题彻底研究一下……’政府对耶稣会很冷淡，并指责耶稣会缺少国家思

---

① 见《法信》2660。

② 见《法信》2666。

③ 图弗内尔是当时的外交大臣，见德拉戈尔斯神父：《第二帝国史》，第3卷第415页。

④ 我想这是一本石印的备忘录，保存在我们的档案中，无疑是施米茨上校复印后送来的。

想，认为他们的教育方式已是 1789 年以前的老框框了；图弗内尔还认为这是耶稣会‘对第四王朝’缺乏好感的表现。”<sup>①</sup>

施米茨上校枉自努力，终不能使他的意见占优势，图弗内尔先生仍坚持己见；果不出上校所料，北京的科学事业始终没有办成。<sup>②</sup>

此外，在这个时期，法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罗马问题以及由此而涌起的内忧外患上；远征中国没有引起全国普遍的关注，政府对远东事务也不感兴趣，而英美却对此密切注意了。施米茨上校曾给他留在中国的通讯员写信说：“我观察到人们对远东事务如此的漠不关心，我担心必将一事无成。一切事物都该从根本做起，在北京应该驻一个使节，他必须了解当地的情况和一些大事件发生、发展的经过……自从我回到法国之后，沉痛地看到人们对如此重大的事情竟置之不理，使我深感悲伤。”<sup>③</sup>

---

① 这些指责使葛必达神父暴跳如雷。在一份不幸没有注明日期的稿子里，显然是葛神父针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答复。他呼吁“在中国的任何军官和法国的外交官”，他们是目睹耶稣会的事业的，他们可以证明，谁和他们的关系最好，在 1860 年的战争中，是谁更积极有效地帮助他们。见《法信》2765。

② 施米茨 1861 年 6 月 10 日、7 月 25 日致葛必达信，见《法信》2566、2765。但不要忘了北京教区的阿尔芒·达维德神父的美好著作和他纂集的文件。见博物馆档案中他的《旅行日记》，第 8 卷，巴黎，1872 年版。

③ 施米茨 1861 年 9 月 21 日致葛必达信，见《法信》2566。在北京建立科学机构的计划，法国公使馆曾提出过不止一次。既然那时人们不向江南教区而却向直隶东南教区磋商，这里我就不谈了。我只提及一个文件，这文件说明梅德尔神父对这个问题的原有观点并没改变。他的观点也正是耶稣会最高上级的意见。1867 年巴黎省会长德蓬尔瓦神父曾向他征求意见时说：“我可能同意，不绝对拒绝，但必须审慎，不求冒进，我只是接受，绝不争取；假如人们需要我们，那么，请向罗马申请并由罗马向我们下达命令，我们表示绝对服从和忠诚。没有这个双重条件，我们决不去干预已由他人保留的地区。”见《法信》2660。

### 三、从 1860 年英法联军到太平战争结束 (1861 年至 1864 年)

叛乱者远离上海 卜罗德海军上将和教区 浙江长毛入侵浦南和浦东 郊区的战役 费都尔神父和卜罗德将军之死 英军撤退 “常胜军”与戈登 江苏的绥靖 年文思主教和梅德尔会长之死 郎怀仁被任命为主教

孟斗班将军及其参谋部动身离沪之后，海军少将卜罗德便成为上海法国驻军的首要人物，他的司令旗飘扬在旗舰“强力”号上。他同英国海军少将贺布商议之后，决定不仅要保卫上海县城、城厢区及租界，还要扩大防御范围到方圆三十英里内的各地农村；这个措施很有必要，因长毛还霸占着一些据点，他们不断向上海附近的高饶农村进行大肆抢劫，这对上海城的粮食供应和商业贸易大有妨碍。

2 月初，贺布少将上溯扬子江，到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设置英国领事馆，这些地方是按 1860 年的条约规定对洋商开放的商埠。贺布曾请一位法国军官夏努安上尉伴随同行。少将在叛军盘据的南京逗留数天，并同一些主要头目进行了会谈，他向叛军提出严重警告，不得向距上海三十英里的地区接近，否则将遭到武力的击退。<sup>①</sup>

---

<sup>①</sup> 兰廷玉 3 月 3 日信、施宜三 1861 年 4 月 14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3、45 页；又南志恒 1861 年 3 月 29 日信：“同盗贼成性的家伙作买卖，显然是不可能的，英国人对此已开始看清楚了。”

当时，长毛们受到了曾国藩部队的压力，正忙于应付安徽战事，因此扬言年内并不打算来到上海附近。<sup>①</sup>

事实上，在1861年，松江府的富饶农村没有遭到骚扰，但每天仍有不少移民不断涌到上海，因在上海的欧洲人懂得怎样叫人尊重。

这年年初，清兵受到了教训。原来，这些官兵比长毛更为无用，也同样毫无纪律。起初，他们在防守的地区四出抢掠，继而，发展到董家渡地区。保卫主教大堂的法国哨兵抓到了一个唆使抢劫、戴有红顶子的官员，把他狠狠揍了一顿之后，当作一个普通长毛，交给了当地警察。孟斗班将军借这机会，写信给两江代理总督，提出强烈抗议，信末这样说：“请你采取措施，务使这类案件不再发生；否则，案犯不管属于哪一方，我必严加惩办。”犯罪的士兵们都受到了严惩。从此，清兵和太平军不敢在上海闹事了。<sup>②</sup>

海军少将卜罗德象总司令孟斗班将军一样，表示自己是传教士的好朋友和保护者。5月30日，董家渡大堂首次举行圣体出巡，教外人竟自动打扫街道，恭迎圣体及其队伍。卜罗德少将和还在上海的雅曼将军以及许多英法联军军官，列队恭随在圣体华盖之后，更有不少士兵混杂在中国教友的队伍之中，这些教友是从各地赶来观礼的，为数约四千多人。<sup>③</sup>

6月2日，徐家汇举行迎圣体仪式，有远征军第一〇二联队的一连士兵参加，另有一小队炮兵，在圣体降福时鸣放礼

---

① 见《英国议会文件》，2976号（1862年），第68卷第23页；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127页。

② 施宣三1861年4月14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46页起。

③ 梅德尔1861年6月1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76页起。

炮，以示崇敬。<sup>①</sup>

6月29日，洋泾浜圣若瑟堂的建筑工程接近完成，便举行了第一台弥撒。从此，每逢主日，专为军人举行的弥撒吸引了许多中国教友，那里的教外人都全神贯注地瞻望着。<sup>②</sup>

7月31日，海军少将卜罗德出席并主持了徐汇公学的颁奖典礼，他慷慨地重赏了得奖者，并向院长神父说：“我十分愿意同我周围的这些纯朴的孩子们谈话，但可惜我不能讲中国话，请你转告他们，假如他们中有人需要我帮忙，尽可放心前来找我。只要他说明是徐汇公学的学生，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不会使他失望。”<sup>③</sup>

不久，海军少将为了教区的利益，放弃了先前缓和的措施。前些年，由于黄浦江左岸发生战争，使地方上遭受了灾难，而浦东浦西的富饶的堂口，直至1861年，几乎都未曾遭过殃，而这下可轮到他们去认识长毛战争的凶恶可怕了。

长毛们来自浙江，按某传教士书信指出，他们是为了反对某地方官的强征苛捐杂税而被招请来的。<sup>④</sup>

4月，长毛的先头部队在他们侵占的金山城周围出现了。从此，种种悲剧，正如浦南区本堂神父卜理奥叙述的：“自叛军夺占金山后，经常四出骚扰；每次外出必抢掠纵火，按中国人的说法，叫做‘吃光、烧光’……”梅德尔会长追述道：“可怜的地区！令人痛心的是清兵竟与叛军同谋，他们也抢劫烧杀，一有危急，随即逃散，让叛军去完成他们的破坏工作。”<sup>⑤</sup>

① 梅德尔1861年6月1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76页。

② 郁诵周1861年12月1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47页。

③ 范德先1861年8月1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94页。

④ 施宣三1861年4月14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46页。

⑤ 梅德尔1861年7月15日、10月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84、121

页。



9月，炎热的夏天过去了，长毛们又大肆活动，他们卷土南下，蹂躏了整个浦南后乃直指浦东。会长梅德尔向卜罗德少将请求援助，卜罗德毫不犹豫地立即派遣他所属的最小战舰深入黄浦，并用武装小汽艇直驶浦南；梅德尔随军出发，路经各地时，他乘机鼓励传教士及教友们。<sup>①</sup>

浦东原是富饶之地，既然清兵面对叛军无能为力，对和平的居民却又是如此的凶暴残酷，地方绅士乃有意组织仿华尔式的一支武装部队来进行自卫。原赵方济主教的传教先生钱景楠，说服了他的乡邻，集资雇佣两百名在吴淞的马尼拉水手来保卫浦东，每人每日饷银一元（当时约合五法郎），这样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长毛不敢来侵犯。<sup>②</sup>

但每月支付六千银元的巨款，对这业已枯竭的地区，确是一副可怕的重担；1862年初，马尼拉人对盘据在南桥的长毛营进行了一次漂亮的突击之后，<sup>③</sup>被遣散并退回了租界。在他们作战期间，梅德尔会长和兰廷玉、费都尔二神父曾多次前往探望，给这些粗鲁爽直而满怀信仰的人们，予以真正的安慰。<sup>④</sup>

长毛在浦南并不停留，竟直窜浦东；徐家汇附近的堂口又遭到抢掠与焚烧。从耶稣会住院高处就能遥见火光熊熊，清兵窜逃纷纭，被侵犯的市镇居民象急潮一般地奔向上海。保卫徐家汇的法国士兵们磨刀擦枪，很想给这些强盗们以应

---

① 兰廷玉1861年10月24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26页起。

② 同上，第127、174页。

③ 同上，第174页。

④ 兰廷玉1862年3月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87页。又1862年1月份的几封信件的撮录，见《通讯》，第4卷第174页。

得的惩罚，可是上级严禁他们离开岗位。要执行数月前拟定的使叛军尊重上海，并尊重上海附近地区的计划，似乎时机尚未成熟。<sup>①</sup>

1862年初，长毛从上海北面咆哮面入，上海租界以及租界内的所有财富，都处于极危急状态；已不能再犹豫不决了。1861年，对南京的长毛而言是个凶年。在安徽，曾国藩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终于收复了省城安庆。<sup>②</sup>

长毛们认为，再南下进行1860年大有收获的战斗，比较更易于着手，也更为有利。因此1861年底，从安庆被召回的忠王，又在浙江出现了，并再次夺取了省城杭州（12月29日）。1862年1月，忠王进了苏州，<sup>③</sup>长毛的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上海，在浦东筑了三个阵地，另一个阵地设在七宝，距徐家汇只两小时的路程。青浦、嘉定两个设防的县城，都成了强盗的巢穴。他们四出骚扰，侵及上海城郊及租界。假如在短期内，不捣毁匪窟，那么上海的安宁和商业也就完了。<sup>④</sup>

某些英美牧师和某些商人对长毛所寄予的幻想，终于全部破灭了。罗孝全牧师在1847年曾是天王洪秀全的传道老师，在南京太平军中度过了十五个月之后，1862年初，他费了不少心机才得脱逃出来。1月22日，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揭穿了太平天国的内幕真相，说：“我认为洪秀全只是一个狂人，他毫无能力统治任何一个有组织的政权。他同他苦力出身的

---

① 兰廷玉1861年10月24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26页起。

② 见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203页。

③ 同上，第204、214页。

④ 梅德尔、兰廷玉和金式玉都是目睹这次叛军进攻的证人，并且都有详尽的叙述，见《通讯》，第4卷第187—245页。

‘王’们，谁也不能组织一个比满清老朝廷更能为民造福的政府。”他对那些使太平天国丧尽荣誉的、惨无人道的、疯狂的暴行，作了长篇的叙述。<sup>①</sup>

上海的英文报纸先前一贯竭力反对辣厄尔海军上将的武力对抗长毛的计划，现今却天天宣传着要用十字军组织来反对那些强盗了。租界上的工部局董事也来请求贺布与卜罗德两位海军少将组织讨伐军，逐步肃清太平军设在上海四周的营地。

当时，保卫上海的英法武装实力并不雄厚。远征军剩下留在上海候船回欧的只有两千人。“但这些士兵只属于作战部，海军少将无权支配，至多只能用于保卫上海城、徐家汇和租界。所以只能说是一支后备部队，也只能在极紧急状况之下才能动用。”<sup>②</sup>

现在唯一的作战力量只有军舰了。归卜罗德少将指挥的只有“仙女”号和“强力”号两艘军舰，还有三艘炮艇、几艘小型巡逻艇。英国贺布少将则拥有较强作战能力的大型军舰及炮舰。英法两国政府都曾宣称要增援，可是1862年初，两位少将麾下只有在轻炮掩护下作战的六百名海军陆战队。“这股兵力也只能用于突击或沿黄浦江作短距离战斗、在炮舰炮火掩护下登陆或必要时掩护撤退”。<sup>③</sup>

---

<sup>①</sup> 见《华北捷报》，1862年2月8日；又《英国议会文件》，2976号（1862年），第63卷第160页；又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209页。在传教士的书信中，屡次提及上海洋人的种种转变。过去，他们一直指控远征军对太平天国作战是不义的。见《通讯》，第4卷第122—206页。

<sup>②</sup> 瓦拉纳：《北京条约后的中国》，刊登在《两个世界评论》上，1863年4月15日，第167页。瓦拉纳先生是卜罗德将军参谋部的人员。

<sup>③</sup> 同上。

华尔训练改编的一支小队伍，同他们的中尉白齐文在松江府城设了司令部。<sup>①</sup> 这支队伍有三千个中国人，另外还有马尼拉人、西洋人及美国人。<sup>②</sup>

一支最新式装备的队伍终于建立了。传教士们对这支队伍的进步和发展很感兴趣。这支军队由于作战勇猛和纪律良好，曾博得训练这支军队的法国军官们的赞扬。1861年年初，远征军总司令孟斗班将军曾委托炮兵团长达耳地福·买忒勒训练一批炮手，以便在法国军队撤离后，能继续尽职服务。买忒勒团长是一位虔诚教友，同传教士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练兵场即设在徐家汇，紧靠法国驻军的哨所。<sup>③</sup>

不久，这支队伍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绩。瓦拉纳先生述说道：“徐家汇四周的居民都是教友，由于战争，他们几乎全部破产了。但他们对传教士极为信任，由于传教士都会讲中国语言，给我们帮了大忙，成为我们的译员。两位军官及数名下级军官受命开办这所新型的军官学校，这是一个苗圃，这个学校对中国将来定会起重大的作用……军校学生多次去上海，接受联军长官及中国当局的检阅。下级军官训练他们时用法语……许多观众，凡是对宗教毫无偏见的，看到这些聪明强壮的兵士，一致认为远远超过那些由英国从印度调来的孱弱士兵。”<sup>④</sup>

---

① 见本卷第22页。

② 兰廷玉1862年3月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89页起。

③ 梅德尔1862年4月18日、兰廷玉3月5日、南志恒5月17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90—235页。

④ 见瓦拉纳：《北京条约后的中国》，第369页；勒热尼塞尔：《买忒勒在华作战概述》。

假如人们想到叛乱者人数众多，多年来又和上海的洋人作非法交易，获得无数武器配备辎重时，我们这些兵力也就微不足道了。<sup>①</sup>

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能否发动反击呢？由于白河冰封，要同北京取得联系已不可能。卜罗德既无法接到上级的指示，而又得自行作出如此重要的决策，万一失败，那代价真不堪设想。他象九年前的辣厄尔上将一样，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地负起了重任。但是，这次是上海的洋人、洋商们先要求法国军队出来干涉，英国海军司令贺布也完全同意并和他合作。瓦拉纳先生记述道：“在这危急之秋，能有一位有勇气、有能力的人挺身而出任指挥，是值得钦佩的。当他感到他执行的是最神圣的职责时，他再也不多加考虑了。卜罗德会见了贺布，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第二天，上海居民就充满了再生的希望。他们获悉英法联军又将肩并肩、手拉手地共同保卫垂危的民众，他们将再次把自己的鲜血洒在战场上。”<sup>②</sup>

长毛们预计要在中国春节（1月底）袭击上海，由于一场持续五十八小时的鹅毛大雪，致使好几天道路不通，因此推迟了他们的进攻计划。<sup>③</sup>

1月20日，长毛大胆地向驻上海的领事们下了挑战书，说：“无论如何，上海是我们必收之地，我们对洋人不会有任何

---

① 见本卷第306页；这种公开的非法交易，有枪枝、弹药、野战炮以及其他辎重，在新加坡和香港毫无阻碍地进行着这种交易。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145页起，摘录了卜鲁斯的电讯。

②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865页；日意格：《法国在中国》，载《两个世界评论》，1864年6月15日，第960页。之后，北京公使们获得恭亲王的正式许可，联军在中国境内作战。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1卷第204页。

③ 见《通讯》，第4卷第172、179页起。

损害,让我们夺取上海吧!假如你们采取对抗态度,我们必将以对待中国人的办法来对待你们:一律格杀勿论。”领事们答复说:“我们早已照会你们南京的天王,我们欧洲人要坚决保卫上海。只要你们进行小小的尝试,即等于你我之间的开战,战事就不仅限于上海,也包括上海四周在内。这就要看你们如何对待洋人而定了。”<sup>①</sup>

大雪过后,长毛们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计有两万至三万人。长毛们从青浦出发,向上海方向进军,华尔乘道路泥泞,行军困难的机会,率领八百名中国义勇兵,带头从松江城冲出,截断长毛去路,和他们激战三天,迫使这批毫无纪律的匪徒撤回青浦,击毙了他们四、五百人,俘获了八百人,并夺得小船百来条。几天之后,华尔曾来洋泾浜向杜若兰神父叙述了这次英勇战斗的经过,杜神父记述道:“华尔真是一位非凡的勇士。他精力充沛,又平易近人,而且彬彬有礼,也许我们将从此可以得救了。”<sup>②</sup>

2月20日,英法海军舰队司令相继亲自出击,从黄浦江左岸直到吴淞口全打通了,太平军逃进嘉定城内。21日,忠王亲自坐镇的高桥镇被八百名英法联军夺了回来,忠王直退到苏州。2月28日,黄浦江右岸肖塘的叛军阵地被炮轰了。上海四周畅通了,从吴淞到上海之间又恢复了自由通商。<sup>③</sup>

---

<sup>①</sup> 叶春荣神父1月20日的日记,见《通讯》,第4卷第177页;又《英国议会文件》,2976号(1862年),第63卷第144页起的译文与此略有不同。

<sup>②</sup> 杜若兰1862年5月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87页;又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127页起。

<sup>③</sup> 兰廷玉神父1862年5月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87页;又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127页起。

这是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所取得的成绩。

连续不断的胜利，证明在“洋鬼子”的反击下，叛乱者毫无招架之力，这使浦东农民们大为振奋，他们就到处追赶长毛，杀伤了很多人。传教士劝勉他们加强组织，保卫自己的家乡。海军上尉日意格先生是这次远征的参与者，他记叙道：“人们不能轻视传教士在这次法国参战中的作用……在他们的号召下，农民们手执军刀或标枪，头上裹着三色头巾，成群地出村。这头巾的颜色清楚地表示他们久已渴望的救助已经盼到了，他们有意让人们知道，法国是走在战斗的第一线的。”<sup>①</sup>

费都尔神父也参加反击长毛的战斗。他是张家楼的本堂神父，上海对面的几只大会口都属他管辖，他以勇敢和组织力强而闻名。他曾招募一小队由地方绅士出饷的马尼拉人，领导农民们驱逐、追赶骚扰农村的长毛；日意格上尉追述道：“这种组织如能继续发展的话，那么本省就有救了。”<sup>②</sup>

那时期，费都尔神父仍尽好圣职，巡视会口，宣讲圣道，讲解要理，给病人送终傅、行圣事，如在太平盛世时代一样。他的这种勇猛得近乎鲁莽的品德，并没有受到众人的赞许；根据费赖之神父收集<sup>③</sup>当时活着的证人的证词，记有“谷振声会长曾跪求年文思主教，不再许费都尔神父前往浦东，以防危险”。而年主教却认为还是让这位传教士去随从天主的灵感；仍把他派往浦东，就此送掉了他的性命。

---

① 见日意格：《法国在中国》，载《两个世界评论》，1864年6月16日，第989页。

② 同上，第990页。

③ 费赖之1880年7月23日致祁兰米信，见《法信》2773。

费都尔神父是于1862年3月4日，在离上海三里的钱家会口荣获殉教花冠的。伊宗尹神父记述道<sup>①</sup>：“那天，费神父举行弥撒后，按他的习惯，到公所附近走走，去慰问教友，探访外教人，教某些人领受圣洗，劝另一些人忍受苦难。当他走出一条巷口时，正与一队约五十名左右的长毛相遇，那一队人正向他逼近，要逃，看来已不可能，他只有立定，面对长毛，怒目面视；长毛看到他如此大胆，也紧握标枪，停步不前。神父乘机悄悄走了几步，叛乱者就逼前几步，神父再转身，第二次用目光阻止他们，神父乘机稳步后退，希望在这危险当儿能有教友来救助。但叛乱者再次向前，包围圈更小了，神父第三次以同样的大胆凝视着他们。

“长毛不敢正视神父的目光，包围圈成了半圆形。其中一个人突然用长矛向神父的喉部刺了一枪；当时神父还竭尽毕生之力，叉举双手在胸前作十字形，随即双膝下跪，作哀恳的祈祷，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天主。陪同神父出外溜达的有两人，其中一人和神父同时被叛军的长枪刺倒。当时神父看到所有长枪集中向自己身上投射，急令另一位随从者脱身逃开，当叛乱者疯狂地用长枪残酷地乱刺神父时，那正直的教友便乘隙游过小河，奔回会口，把神父濒危的坏消息告知了教友们。众人闻讯，立即拿着一切能当作武器的东西，冲向那一群叛乱者，那些人当时正准备剥去蒙难者的衣衫，想带着死者的头颅去向首领报功。教友们靠着几名菲律宾他加禄人的帮助，夺回了因仁爱而为他们作出牺牲的尸体，并保全了教区中一个最美丽的大圣堂。这座圣堂大部分原由他们出资出力

<sup>①</sup> 伊宗尹1862年3月19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94页起。



捐助建成的。长毛们恶有恶报，几乎一切叛乱者都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股长毛中只有极少数人逃脱，去向首领汇报捏造的战功，同时也不得不报告了他们的失败。”教友们立即派了专差到上海；梅德尔会长冒着生命危险，立即启程，为因长毛而牺牲者尽他最后的职责。那时浦东群盗出没，要把费神父遗体运回上海，事实不可能，于是决定筑一座临时坟墓，把遗体暂时埋下；数日之后，长毛们又来掘坟，他们把棺材毁坏，把尸体烧了。此后，人们只拾得数根遗骨，在暴乱结束后，才运回了上海。<sup>①</sup>

如马理师神父遭惨杀后一样，耶稣会总会长一得知这个光荣的噩音，即向江南教区表示公开的祝贺，说：“从耶稣会复兴以来，至今在委托本会的众教区内，独有江南教区为我们获得殉道致命的荣誉……因此更有理由爱护和同情这教区，并向该教区表示感谢。所以我用全会的名义，向江南的本会同人，尤其向你主教，我们最敬爱的神父，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感谢。”<sup>②</sup>

1861年3月底，增援部队从法国和印度开来了。“誉神”号军舰运来了三百名陆战队队员，六百名狙击兵。英国的军队由准将士迪佛立指挥，约有近三千名士兵。最后决定在4

---

<sup>①</sup> 见《通讯》，第4卷第196页起；又兰廷玉1862年3月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91页；《年鉴（1861—1862年）》中的《费都尔神父小传》，第274页；《婴年》，第14卷第393页。

<sup>②</sup> 吕比荣神父1862年5月10日信，见《徐档》，卷宗F13。但在吕比荣神父于6月28日致年文思主教和梅德尔会长的几封信里，对费都尔神父在浦东的行为，提了几点意见：“从罗马和巴黎收到的消息看来，我们会士中有若干人走得太远了，他们手执武器进行自卫，人们也许是不能原谅的……我们会士不得领导组织国家保卫队，或引导卫队作战。一个辅理修士尚不该应征入伍，更不该开枪射击。我认为身为上级，必须节制属下若干人的好战热忱。”（《徐档》，卷宗F13。）

月中采取联合行动,据久已议定的决议,先从事扫荡,肃清盘据在上海十里周围的叛乱者。4月4日、5日,长毛们在青浦附近的两个壁垒森严的营地被消灭了。17日,战事轮到浦东周浦大镇,该镇周围驻有两百多太平军。在这次战役中,法国陆战队大立战功,真是名不虚传;由上校达耳地福·买忒勒在徐家汇培训的中国自卫队,也都能出色地完成他们的战斗任务。随军同行的梅德尔会长写道:“我想不到我们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和研究军事技术的进步竟会如此地迅速;这些可爱的年青人一心只想迎敌作战,解放家乡……买忒勒先生不仅愿意训练士兵,他还想开办一所军官学校来训练中国军官。这个工作需要时间和耐心,在这方面,法国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sup>①</sup>

4月27日,防守巩固的南翔大镇,5月1日,嘉定县城,都落入联军之手。

应英法军官的邀请,梅德尔会长随军出征,既当翻译又协助舰队上的随军司铎;另外,他的许多中国教友中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华尔和买忒勒的部队。<sup>②</sup>

海军上尉日意格对梅会长在这次辉煌艰巨的战役中的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在中国士兵中,有一位穿本地服装,面色憔悴而双目炯炯的人。他因操劳过度,虚火上升而两颊通红。他就是教区耶稣会会长梅德尔神父。人们到处可见到他,他一会儿在这里招雇劳动力,一会儿又在那里准备船只,给士兵们运输军需,或为首长们寻找向导,提供情况。遇到一切意

---

<sup>①</sup> 梅德尔1862年4月18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14页;又南志恒1862年5月17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35页。

<sup>②</sup> 梅德尔1862年4月2、16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11页起。

外情况，英国兵或法国兵都同样会叫喊：“梅神父在哪里？”他成了远征军的灵魂。每当夺得一座城，人们就把被叛军俘虏的人释放了交给梅神父，他就尽力照顾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吃的、用的，并设法保证他们免遭地方官的报复。<sup>①</sup>

参加这次对太平军作战的德马罗尔舰长曾留有丰富有趣的回忆，对梅神父作了同样的好评，他说：“我认识耶稣会会长梅德尔神父……一位极聪明的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态度亲热，他到中国已有十二年，这位杰出的神父给我们帮了大忙……当我们捉到俘虏时，就是由梅神父审问他们，尽管他们不吭声或乱说谎话，梅神父总是谆谆善诱，解除他们的一切顾虑。英国的海军司令虽是个新教徒，也极尊重他，并经常向他请教。”<sup>②</sup>

军官们特别重视作为译员的梅神父，他熟悉外交，是他揭穿了中国官场的种种尔虞我诈的作风。在梅德尔神父给他上级的信件中，更突出他另一种传教宗徒的任务，也是他的主要任务。“军官们要求我伴同出征，因为假如有人倒下，我可为之扶助善终……海军随军司铎同我们相处极好，他希望在讲各种语言的联军教友中，有一位能听得懂他们语言的神父。法国海军司令、英军司令以及一位负有中国军衔的美国军官都对我敬重备至，假如我不能引导他们的士兵齐上天国，这决不

---

<sup>①</sup> 摘自《两个世界评论》，1864年6月15日，第989页。梅神父认为，从太平军手中救出成千上万个俘虏，这是件大好事，因为长毛们老是把俘虏推在最前线。梅神父在周浦解围后写道：“数以千计的俘虏从叛军手里抢了过来，并给了他们自由。我曾亲手割断了捆绑他们的绳索。”1862年4月18日，《通讯》，第4卷第213页。

<sup>②</sup> 见《太平军叛乱回忆录》（《通报》第12卷，1901年，第203页）。

是他们的过错……假如战役多或出征时间长，我将设法叫神父中有人去替代我的会长之职，至少维持到我任满为止。直到如今，这些零星小战尚无大碍，这些小战役反给了我视察教区中受苦最深地区的机会。在街道上，在兵营中，在集会时，对富人、对穷人，我到处宣传，希望众人都信仰天主，成为教友，否则中国就要完结。感谢天主，我的呼声到处有回响，在不知不觉中，这地方将逐渐成为教友的区域。”<sup>①</sup>

数天后，梅神父又写信给上级说：“我绝不参加军事行动，我只企图利用一切环境为拯救人灵；对新组织的中国新兵（自卫队），我们还能作些好事，靠这支部队，可以防止许多灾害。在最近几天，我准备随作战部队开往前线，我能为法国兵、爱尔兰兵、西班牙兵和中国兵做些好事而感到欣慰。我们必须对人人负责，传教士是不难找到为人服务的机会的。”<sup>②</sup>

4月，上海四周及县城北郊肃清了长毛后，两位海军司令按原计划溯黄浦江而上。5月12日，被太平军占领了近两年的青浦县也收复了。5月17日傍晚，联军开抵浦南南桥镇，镇的四周有宽广的河浜围绕着，还有三条战壕以及地面防御工事。太平军稳居壁垒，坚守阵地。卜罗德将军正在布置纵队突击时，一发枪弹射中了他的胸部，他立刻断了气，倒在随军司铎拉巴-博尔德里神父怀中。始终伴随着出征的梅德尔神父当时正在战场的另一地点；他一得知，立即赶了来，但已只能在海军司令的尸体旁，为这位“既是位杰出的恩人，又是教

---

① 梅德尔1862年4月16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12页。

② 梅德尔1862年4月18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313页。

区忠诚的好友”作祈祷而已。<sup>①</sup>

众所爱戴的首长突然阵亡，激怒了全体陆战队和海军以及华尔和买忒勒的士兵们。全体一致冲锋出击，这次竟忘了对战败者应有的克制，他们逢敌必杀，无一幸免。第二天又以同样的复仇狂，把近浙江边界的柘林城轰毁，三千多具尸体埋在废墟之下。梅德尔会长用他对联军军官和士兵的影响救活了三十多名逃避在他身旁的太平军。<sup>②</sup>

上海为法国海军司令举行了隆重的葬礼。5月18日，尸体安放在军医院的临时改为灵堂的一个房间里。经过数天的准备，26日，在洋泾浜天主堂举行了追悼仪式。军乐队、英国远征军的各兵种的代表以及上海商团开路前导，接着是大十字架和辅礼者，有来自各学校的学生，有四、五十名秀才，他们几乎都是教外人士，上海各绅士以及低级官员也加入行列，还有修道院的全体修士以及十五至二十名司铎走在年文思主教之前。追思布覆盖着的卜罗德遗体由十二名海军抬着。英国领事、法国领事、舰长德马罗尔以及一位英国高级军官执拂。来自其他国家的驻沪领事、上海的高级官员，其中有两位总督以及大批英法联军的军官作为殿后。年文思主教为亡者默诵安息弥撒及举行追思大礼，随军司铎博尔德里神父致悼词。遗体安葬于八年前所建成的墓地，这座墓地安葬着1854年1月6日对红头作战攻城时牺牲的军官与士兵。

---

<sup>①</sup> 南志恒1862年5月17日、金式玉5月29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36、247、248页；瓦拉纳所著的《战役总述》，叙事清晰，足资参阅，见第875页起；英总兵士迪佛立致战事办事处的报告，见《英国议会文件》，3104号（1863年），第73卷第296页起。

<sup>②</sup> 见《通讯》，第4卷第249页上梅德尔信。

数星期后，清廷敕令两江总督传令上海道台，用皇上的名义，为卜罗德致哀追悼。神父们正害怕中国官员们会不会乘机在墓前搞惯行的迷信活动时，中国官员却明智地让法国领事布置这次追悼会；上海所有的中国方面的以及欧洲各国的政界领导人物在洋泾浜天主堂出席恭与为亡者举行的安息弥撒及追思大礼。事前，许多法国军官认为不接受中国人的外教奠礼也许不妙。可是主持这次追悼会的西藏代牧杜主教会后对梅德尔会长说：“神父，我们应当感谢好天主，我们在劝化教外工作上已跨进了一大步。中国皇帝御赐的赙祭竟举行在天主教圣堂之内，而且又是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

费都尔神父和卜罗德将军的纪念堂至今还保存着。按中国惯例，为公益而牺牲的文武官员，民众应给他建立祠庙，地方官必须定期向祠中供奉亡者牌位祭祀奉香，以示崇敬。因此在松江建造了专门为纪念华尔及其因战太平军而丧生的士兵的祠庙。卜罗德将军与费都尔神父死后，浦东、浦南的民众就自发集资捐款建堂，以表崇敬。神父同教友们领受了民众的诚意，在钱家及南桥两地各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圣堂，永久纪念为战长毛而牺牲的两名勇士。<sup>①</sup>

卜罗德将军逝世后，远征军采取了另一个战策：用较少的兵力，驱逐上海四周因屡次战败而士气沮丧的长毛部队。但因法国司令的战死，安定地方的热情也随之而消失。目前，英国人的思想在远征军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在上海的商业得到保证后，对本地人民的遭遇就漠不关心了。还应该说明，面对

---

<sup>①</sup> 关于这两座圣堂，可参阅江南教区的通讯，见《天主教传教区》，第69卷第420页；第4卷第62页。

可耻的满清官兵们，即使最善良的人也感到灰心。联军把攻下的城镇交给中国官兵驻守，而转眼间，官兵又把它们送掉了。例如5月底，联军把嘉定城攻下后交给清兵，可长毛一反攻，官兵竟一触即溃，又把城丢失了。英国陆军司令官看到清兵如此畏缩无能，大失所望，就不顾清兵，把他们抛弃后自己撤走，去专事保卫上海。<sup>①</sup>已退逃的太平军，认为洋兵败逃，于是在1862年4、5月间已平定了的地区，长毛又出现了：6月10日，青浦又告失陷，并遭火焚；8月6日，华尔的部队反攻不成，终于返回。长毛步步追逼，8月26日和27日，在距徐家汇仅一公里地，太平军把前来围剿的清兵全部击溃了。

海军上校福孔担任法国军队的代理司令，8月28日和29日，他率领五百名陆战队及海军，带上八门或十门大炮，加上二百名买办勒手下的中法联队向长毛进攻，大获全胜。徐家汇四周重新获得了几个月的太平。在英军放弃的地区，战斗进行得更为激烈。<sup>②</sup>

然而，更倒霉的是，1862年的夏天，气候特别炎热，叛乱者又侵占农村，当时霍乱横生，很快就蔓延各地。<sup>③</sup>

神父们面对这些接二连三的灾难，毫不灰心。他们的会长写给法国参赞神父的一封信，就是最好的证明。信上说：“在最近一个时期，吾主愿我们参与他的十字架苦难；但为了不使

---

<sup>①</sup> 见《英国议会文件》，3104号（1863年），第63卷第396、407页起。

<sup>②</sup> 摘录梅德尔神父的几封信件，见《通讯》，第4卷第249页；翁寿祺1862年8月、9月的日记，《通讯》，第4卷第293页；福孔司令的汇报，见《英国议会文件》，3104号（1863年），第63卷第479页。

<sup>③</sup> 翁寿祺1862年6月13日、7月18日日记，见《通讯》，第4卷第254—273页起。

孱弱的我们被压倒，吾主用他的圣宠支持了我们。因此，我们的神父和修士都显得工作越忙越有劲，越艰苦，越感到快乐。有好几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倒了下去，但没有人感到惊惶失措。我经常听到他们对那些表同情示惋惜的朋友们说：‘在这里，我们的工作分配得最理想；我们的道路走得既快又稳。海军和陆军们为了争取一枚十字勋章或升上一级，必须努力创奇迹立新功，但往往又失败居多而所得又极有限。我们这些人却天天向上，日日前进，而我们的赏报又极大。我们侍奉的天主既伟大又慷慨。’”<sup>①</sup>

年底，由于战场情况的变化，上海四周摆脱了灾祸根源的长毛而略得喘息。在善于治军的曾国藩指挥下的清兵，加紧了对南京的包围，忠王被召回去保卫天京了。<sup>②</sup>此外，在浙江，华尔的部队加上由法国军官勒伯勒东<sup>③</sup>和日意格两人组织训练的中法联队（常捷军）也出击得手，宁波解放了；太平军逃离了杭州一带。<sup>④</sup>

1862年，这个对江南教区来说是恐怖的一年，就这样在相对的太平环境中结束了。上海四周的教友重返家园，传教士也恢复了工作，百废待兴，工作异常繁忙。

1862年7月31日，教区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痛心的损失。年文思主教由于工作辛苦，他慰问教友、劝化难民，而又事必躬亲，因此疲劳过度；加上他又很想会晤郎怀仁主教，共商教区大事，于是他就在7月底动身去直隶。从天津到张家庄，正

① 梅德尔1862年6月29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60页起。

② 梅德尔1862年11月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309页。

③ 1863年1月17日战死在绍兴。

④ 见高山：《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216页。



如主教本人说的,是在作“传教式”的旅行。整个旅程八天,气温酷热,经常在摄氏四十五度以上,他先是偏处在一只狭小的破船中,继而又颠簸在破烂的大车上,因此精疲力尽。7月31日圣依纳爵瞻礼日,主教感染了霍乱;虽经百般治疗,但不见效,终于在下午一时咽了气。围在他病床前的有正在那里过暑假的直隶东南区的神父们。亲眼见到主教死亡的徐听波神父记述道<sup>①</sup>:“主教逝世之前,曾作信德宣誓;他虽已病入膏肓,但当会长神父读到宣誓条文:‘我许愿服从教宗’时,虔诚的临终者尽力撑起,那时,他已不能讲话,而仍数次用力咬嚼,重念会长神父所读的宣誓条文。主教一得病,即作了遗嘱。他曾亲取纸张,记明他尚未举行弥撒的数字及其他未尽的职务……象耶稣会会士年文思主教那样的死,真是何等幸福啊!”于是,耶稣会第一任江南代牧主教便安葬在直隶神父们的公墓,他的墓碑上明确地指出:主教对传教的热心,对孤儿的慈爱,对大圣若瑟的虔敬。<sup>②</sup>

上海一得知主教逝世的噩耗后,立即为亡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礼。8月11日洋泾浜举行的追悼大会尤其引人注目。“誉神”号军舰的一队突击兵和一队陆战队的参加,为亡者增添了哀荣。福孔舰长和他所有的军官、法国领事爱棠先生及夫人也参加了这次由随军司铎举行的安息弥撒;“誉神”号军舰倒斜帆架,下了半旗,圣堂内行追思礼时,军舰鸣礼炮十五响。<sup>③</sup>

主教逝世后,梅德尔会长即任为教区代理代牧,直到年文

---

① 徐听波 1862 年 8 月 3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85 页起。

② 见《通讯》,第 4 卷第 287 页起。

③ 叶春荣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87 页。

思主教的继任者正式任命为止。1862年11月23日起，鄂尔璧神父署理了教区耶稣会会长。<sup>①</sup>

大家知道，“常胜军”在获得种种胜利战果后，他们的第一个首领华尔于1862年9月21日在浙江慈溪的一次战役中阵亡了。以后，这支部队先是由白齐文统率，由于他唐突胡闹，同江苏巡抚不合，乃由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奥伦上校接替。最后又由著名的戈登担任“常胜军”的管带（1863年2月24日）。官运亨通的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协助戈登改组并扩大了他的部队，该部队所有将校都是外籍人员。

达耳地福·买忒勒在1863年1月接替了以勒伯勒东为首的浙江一支中法联军，买忒勒离去后，这支中法联军就并入了“常胜军”。<sup>②</sup>

我不拟在这里提及戈登部队的战绩，因为没有天主教教士参加远征。我只提及“常胜军”于4月4日收复了福山、5月2日收复了太仓、5月31日又收复了昆山的战果。11月27日，在攻苏州一度失败后，“常胜军”终于在12月4日占领了这座富裕的江苏省城苏州。由于李鸿章言而无信，杀死了太平军降将，而戈登曾经答应担保他们生命安全的，因此戈登同李鸿章一度发生了矛盾。“常胜军”司令戈登为了应募入伍的更高的利益，决定继续同清兵合作，接连收复了浙江省的许多城镇。最后，在1864年5月11日，“常胜军”收复了常州，此后，“常胜军”自告解散。太平军只占领着浙江的湖州和

<sup>①</sup> 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第2、98页。

<sup>②</sup> 买忒勒如他的前任那样于1863年2月19日也战死在绍兴。以后，这支浙江的中法联军由德里碑率领，后又由海军中尉博纳富瓦率领。（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217页。）

江苏的南京城了。

南京城在 1864 年 7 月 19 日被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的部队夺回,同时期,德克碑率领的中法联军于 1864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收复了浙江省的杭州。同年 8 月 28 日,太平军自湖州撤退。以后太平军的残余部队则窜到福建、江西、广东以及四川等省的山区。<sup>①</sup>

地方平定之后,避难在上海的苏州、常州的教友返回了家园。传教士在戈登的保护和李鸿章的阻挠下,也跟着回去了。李鸿章这个人直到他离任,始终是对欧洲的思想和基督教表示仇恨的狡猾的敌人。

梅德尔会长为减轻上海居民的内战的痛苦曾出过大力,自己却没有能亲眼见到平定后的复兴。1860 年起,他的健康的身体因积劳成疾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曾充当中国官员与法国代表之间的联络员、战场上部队的随军司铎,他负责供应一万五千至两万名避难来上海的各地教友的一切生活必需品,此外还得尽好他耶稣会会长的一切职责。他身兼数职,实在对付不过来了。1862 年的酷热对他如同对年文思主教,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这年 8 月,他已不能起床,使熟悉他的人都惊惶不安。入冬后,他略有起色。但从 4 月起,他又患了伤寒。4 月 28 日,他把代理代牧的职权移交给了鄂尔璧神父,并领了终傅圣事。他在最后一次训话时,还嘱咐众人要彼此相爱。5 月 3 日星期日,他寻获十字架瞻礼,傍晚六时过一些,他把灵魂交付给了天主。<sup>②</sup>

---

① 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225、234 页起。

② 鄂尔璧、柏立德、翁寿祺、南志恒 1863 年 5 月 12 日至 16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38 页起。

这位循循善诱而又胸襟宽阔的伟人，在当时的上海处于什么地位，<sup>①</sup>只要看看徐家汇、董家渡和洋泾浜教堂为他奉行追悼礼时的情况就可知道。只见法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军官、领事、中国的大小官员以及地方上不奉教的绅士们，都与中  
国教友挤在一起，恭与弥撒，肃穆致哀。对亡者生前种种美德，例如对慈善事业的热心，对修德事主的虔诚，对他出奇的才能的评价，我只选择了两个文件，我认为比其他文件更能使人认识梅德尔神父的为人。法国杰出的外交官爱棠先生，他在上海领事馆任职期间<sup>②</sup>常常表示，要做江南教区事业的保护人及施恩者。1863年5月22日，他在天津当领事，曾写信给洋泾浜天主堂帐房兼本堂的杜若兰神父说：

“梅德尔会长神父的逝世，不仅对你们、对你们的教区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对众人，尤其特别对那些关心中国的所有的人，都是巨大的损失。让我忘却这位举世闻名、全国一致哀悼的可敬亡者所有的种种尊敬的称号，而仅以个人关系来痛哭他。我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好友，一位亲密的合作者，使我悲痛得如同失去我的同胞兄弟一样。

亲爱的若兰神父，或许你不明了，在你来中国之前我和梅神父之间的关系。你不知道，在我担任上海领事两年之久，除了梅神父外，我没有其他译员；思想上的一致，使我俩接近得

---

<sup>①</sup> 按柏立德记载：洋泾浜追悼会上，英国人为了不肯给法国军官和外交人员走在前面，没有团体参加，基于同样理由追悼会上也没有致悼词。因为法国军队和爱尔兰部队的两位随军司铎，原准备致悼词的，也为了谁先谁后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此作罢。见《通讯》，第5卷第45页。

<sup>②</sup> 爱棠1853年6月15日起为法国驻沪署理领事，1859年6月28日起为驻沪正任领事。——译者

亲密如兄弟，这正是天主的圣意。我们不分职业，不论地位，他是修士，是传教士，而我是领事，我们却能同心同德努力于共同的目的，即法国与宗教的事业。我信任他的忠诚，他也信任我。我们之间从未想过要强迫对方作一些微小的牺牲，来保持我俩之间的友谊。我俩关系的建立是在叛乱分子控制上海之时，那时我的风险很大，他的风险更大；这风雨同舟的艰险成为我俩密切联系的纽带，这条纽带也联系了勇敢的辣厄尔海军上将。他对梅德尔神父的热情尊敬一直保持到他最后的时刻。

梅德尔神父曾获得，更好地说曾迫使中国官员们对他表示器重和尊敬，乐于听取他的教益。梅神父常用他不可比拟的明智，考虑人间的和天上的事物，他沉思之后，即发表公正的想法。基督精神使古老的中国和年轻的欧洲，使闪和雅弗<sup>①</sup>的子孙之间，形成一种调和合作的局面。

梅德尔神父具有朴素而又光明的思想，他谦逊，并充满着爱心和公正精神；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最适合于中国的一位真正有活力的政治家。

尊敬的神父，请恕我太偏重于我和这位真诚的知心朋友之间宝贵的合作，我象其他认识他的众人一般崇拜他的天才，也了解他传教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我知道，他率直公正的思想源泉正是从他在中国的和西欧的两个不同世界的经验中吸取得来的，从那些和外国侨民联系最深，同时又和中国官方往来最频繁的众位神父中吸取得来的。大家都在哀悼这一个巨大

---

<sup>①</sup> 《新旧约全书·创世纪》人物故事。据传挪亚(又译诺厄)生三子：闪、含、雅弗，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由于造巴别城和通天塔未成而分散，因此传说这三子便是亚洲、非洲、欧洲人的最早的祖先。——译者

的损失。对我来说,是损失了一位可爱的同伴,一位知心的朋友,真使我悲痛万分。

亲爱的梅神父,我多么希望再能找到你,在这充满不幸的地区,在我们施行仁惠的外交中,你再来给我启发,给我指引。尤其在此世,你我曾患难与共,希望在未来的彼岸世界中,你还是我的好友和良伴。

亲爱的若兰神父,请把我哀痛的深情转告给众位神父。无论在远在近,我以同样的心情分担他们的悲伤,我的哀思同他们的悼念别无二致,只有承行全能上主的圣意,加上他们圣召的圣宠与牺牲,彼此节哀忍痛。我以我泪哭我的亡友,祝愿生存者彼此负重相慰。我的夫人与我同感,对亡者同样表示悼惜与尊敬。请向鄂尔璧会长神父转致我友好的敬礼。爱棠签名。”<sup>①</sup>

从梅德尔交卸会长职务到他逝世后的教区信件中,耶稣会总会长特别指出梅德尔神父有两点是值得表扬的。第一点,梅德尔神父任会长期间,在他如此频繁地同军官们、外交人员、中国官员们接触、协商、研究种种困难而又敏感的事务中,始终能完全保持他修会会士的品德。由于环境的需要,梅神父本人对自己承担的责任也感到寒心,因而经常如实地向上级汇报一切经过,同时他要求上级,毫不留情地指出他的错误。<sup>②</sup>教区中也有人担心他这样搞政治,对他的传教士身分似

---

<sup>①</sup> 致耶稣会总会长信,见《中总》,第3卷第4章第12页。

法国驻北京公使右尔布隆普多次逗留上海,对梅神父很熟悉,他也有同样的评价,说:“亡者的崇高品德和他为教会、为法国服务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凡深知并赏识他的人都不会忘掉他。希望他在辛勤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明智和仁爱的精神,能继续成为走他的如此光荣道路的人的一个目标。”

<sup>②</sup> 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55—56页;又《法信》2664、2667。

欠适合。<sup>①</sup>

总会长贝克斯神父经过认真考虑并把梅神父的书信呈报传信部部长枢机主教之后，终于写信给梅神父说：“直到如今，你对中国官员和欧洲军队中主要将领所做的工作，无论怎样都是无可指责的，他（部长枢机）完全赞同，并表示极为满意。”<sup>②</sup>

梅德尔会长同年文思主教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的。代牧主教与会长之间的职权范围还没有全部划清，也没有现成的传统成规可资依据。再说，年文思主教对传教救灵工作可说是第一流的领袖。他勇挑重担，对待别人一如对待自己；但当梅德尔会长发现主教对某某或某传教士的决定有碍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时，常常陈情劝告。<sup>③</sup>

最后，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即对本地神职人员的教育问题，主教与会长之间，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教区两位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紧张。事情后来发展到，年文思主教在1860年竟请求耶稣会总会长把梅德尔神父调往直隶，由李秀芳神父接替他在江南的职务。<sup>④</sup>

这些困难渐渐平息后，耶稣会总会长贝克斯才写信给梅德尔会长，通知他的会长职务由鄂尔璧接替。信上说：“在我们

---

① 戴元英神父1860年10月25日致梅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F16。徐类思主教也曾忧虑过，见本书，第1卷第319页。

② 总会长贝克斯1860年9月15日信，见《徐档》，卷宗 F12；在1859年11月12日的信中也有同样的评价。

③ 薛孔昭：《梅德尔神父小传》，第102页起。对这问题，在《中总》内有许多书信可查，见第3卷第4章第19、23页；第7章第18页；《法信》2664, 2667。

④ 总会长贝克斯1861年3月16日致年文思主教的信，见《徐档》，卷宗 B5。

耶稣会的各传教区，你是第一个在有会士当主教的情况下担任会长职务的人。会长的权限与代牧主教的权限的划分问题，你既找不到传统的成规，也没有任何前任的经验可供你借鉴。你作出了牺牲，由于你的努力，争执还没有发展到我们十分担心的程度。最近，关于双方权力的关系，已有显著的改善。”<sup>①</sup>梅德尔神父的逝世，在总会长神父看来，对教区是一个可怕的打击。<sup>②</sup>当时众人都认为他必定是年文思主教的继任者，<sup>③</sup>因而他的死亡，更加深了人们的哀痛。<sup>④</sup>

梅德尔神父当会长时期，人们对他的责难，主要是在管理教区的永久计划上及日后与传教直接有关的事业上，他在这些方面略有疏忽，关心不够。“与其说他是位良将，更好地说他是个勇兵”，“与其说他是首脑，毋宁说他是助手”，这种类似的评语经常在熟悉梅德尔神父的人们的笔尖下出现。与此同时，大家都十分赏识他那出奇的才能。<sup>⑤</sup>

在梅会长领导教区期间，工作上的疏忽所造成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在这些恐怖的年代里，一切事业、资源、机构都濒临消亡，救亡是当务之急，尽最大可能保存一切，也是为了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梅会长以其乐观的勇气和善于交际的办法发展教区事业，终于得到了不寻常的成就。<sup>⑥</sup>

---

① 总会长贝克斯 1862 年 9 月 6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② 总会长贝克斯 1863 年 8 月 20 日致鄂尔璧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③ 见薛孔昭：《梅德尔神父小传》，第 127 页。

④ 同上，第 121 页。

⑤ 李秀芳 1865 年 12 月 2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39 页；南格禄 1866 年 6 月 24 日、12 月 6 日信，见《法信》2667；薛孔昭：《梅德尔神父小传》，第 133 页。

⑥ 鄂尔璧信，见《通讯》，第 6 卷第 45 页；省会长戴元英信，见《法信》2600。



在局面平静的时期,也需要有一位能顾全大局的治理者;梅德尔神父的几位继任人的态度和作风,都和他有所不同。

鄂尔璧神父继任梅德尔为教区代理兼耶稣会会长,为时一年有余。在江南传教史上,这段时期教区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情。由于戈登部队的努力,地方逐渐平静,教区事业得以复兴。1863年1月30日,法国外交大臣德吕伊斯从中国的赔款中拨出了三十万法郎交给江南教区。这笔数字虽远远不足补偿教区在十年战乱时所遭受的全部损失,但会长鄂尔璧却能深谋远虑,用这笔款子在上海租界内购买了地产;当租界内居民逐渐增多时,就在这些地产上陆续建造了出租房屋;至今房租还是教区的最大收入。<sup>①</sup>

1864年底,人们得知郎怀仁主教从直隶东南教区移驻来江南,杜巴尔主教接替为直隶代牧,顶衔为加拿德主教。<sup>②</sup>

---

① 德吕伊斯致耶稣会省会长戴元英信,见《法信》2500;《徐档》,卷宗B3。

② 见薛孔昭:《梅德尔神父小传》,第28页起。教宗的盖有渔人玉玺的调动指令是1864年9月9日颁布的,见《徐档》,卷宗B1;又巴尔纳博1864年12月14日致鄂尔璧信,见《徐档》,卷宗B1。

## 第二章

### 教务细节

#### 一、上海

难民来上海；援助教友；向教外人传教 徐类思  
主教视察教务 董家渡；教友突增；节日礼仪；潘奥  
定修士的施诊所；徐家汇孤儿到上海避难；修道院  
洋泾浜堂口的发展；杜若兰神父的传教；创办公济  
医院；规划女青年教育事业

在前面一章我已经提到，上海各堂口和徐家汇住院的创建都同英法远征军与叛乱战争的历史有关。剩下的，还得看  
在这些恐怖的年代里，传教士怎样想方设法继续并扩大他们的  
日常传教工作。

在年文思主教任期内，上海各堂口的主要传教工作由于  
受到太平军的侵扰，成千上万的教友被迫逃离家乡，来到英法  
大炮保护下的上海。神父们就得对这些逃难教友进行物质上  
和精神上的援助。1857年，长毛向江阴、无锡挺进之时，第一  
批难民涌来上海避难；<sup>①</sup>在神父们的关怀之下，南京、镇江、常  
州各府的教友被分别安插在上海、徐家汇以及近上海的浦东  
各个会口里。

1860年，苏州府和松江府附近为数更多的人群也涌来了

上海。1861年与1862年间，浦南和浦东也遭了殃，于是出现了大批逃亡者。黄浦江、洋泾浜和苏州河内塞满了他们的船只；城内及城厢的空地上盖满了他们的茅屋竹棚。<sup>②</sup>

金式玉修士和其他一些读书修士尽力照顾这些不幸的遭难者，他们对这些难民所作了生动的叙述。1862年初，太平军入侵浦南与浦东后，有两万多教友逃来了上海。“一到上海，他们首先要寻找圣堂顶上的十字架。一旦找到了神父，一切痛苦好似都忘掉了。这种悲惨的情况，我见得很多；他们挑着两只筐筐，背后一只装着日用家具，前面一只装着可怜的小小孩，其他许多孩子则前呼后应，紧紧拉住他们父母的衣服，同筐筐里的小小孩一齐啼哭。当这些孩子走近我们时，我看见他们都天真地笑了。然而，他们需要有个住宿之处，需要米饭；作为父亲，对孩子们的急需怎能忍心不管呢？……于是转眼之间，董家渡<sup>③</sup>、洋泾浜、徐家汇圣堂四周，长长的里弄住屋、船棚、帐篷都搭了起来。但由于地面搭建住房的速度慢，一下子应付不了众多难民的到来。于是我们为他们申请，要求得到几座空庙……避难教友就依次住了进去。上面提到的董家渡及其周围收了一万二千个难民，洋泾浜收了五千个难民，最后，徐家汇收了三千个难民。其中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伙食由教区负担，其他三分之二，按各人的急需，教区多少也给予一些补助。教区还给董家渡一地的避难者每日施发四万

---

① 见本卷第16页。

② 见《通讯》，第4卷第6、178—306页；第5卷第57页起。

③ 海军上尉日意格在1864年6月15日的《两个世界评论》，第989页上写了文章，证实了上述的情况。文章说：“耶稣会神父在董家渡教堂所属土地上，为一万以上的逃难者设立了难民收容所。”

碗饭。”<sup>①</sup>

被侵扰地区的传教士们也跟着他们的“羊群”到上海来避难了，他们就得两地往返生活，既要照顾在上海的避难者，又要与不能逃出来的教友同患难、共烦恼。离了上海去乡间作危险的奔波，离了乡间到上海，在难民中干紧张的传教工作，这便是这时期中许多信札给我们提供的总的情况。人们利用大批教友集中在上海的大好机会，巩固他们的宗教教养。平时传教士巡视堂口的次数很少，往往难以持久进行。目前，早上、晚上，教友经常是挤得满满的，共同举行神业功课。听神工的神父更是忙得团团转。神父们、耶稣会读书修士和修道院修士们则整日走遍各街道，劝慰临终者，并给他们付洗。孩子们则集中在教会学校，读经言、学教理。这些来上海避难的教友家庭，绝大多数备受痛苦，处境困难，这正是整顿他们内修生活的大好时机。<sup>②</sup>

这些教友们能吃苦耐劳，使传教士感到欣慰。他们中不少人原是富商或富裕农民，目前已全部破产了。金式玉修士还记叙道<sup>③</sup>：“尽管教友们感到前途渺茫，又有很多人死亡，但我们这些可怜教友的忍耐之德实在惊人。这种出奇的忍受，来自他们坚强的信德。他们说：‘尽管死亡还威胁着我们和亲人们，但我们有神父在，神父会赋予我们天主的圣宠；就算神父无法拯救我们的肉体，却能帮助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还有

---

① 金式玉 1862 年 5 月 29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24 页起。

② 叶春荣 1862 年 4 月 25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24 页起。

③ 金式玉 1862 年 5 月 29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45 页；1861 年 4 月 4 日，梅德尔会长也写道：“我简直无法表达，我对他们的忍耐之心是如何地佩服。”见《通讯》，第 4 卷第 34 页。

什么可抱怨的呢?’然而,当他们回忆起不幸的遭遇而叹息、掉眼泪时,他们立即手持念珠,注视圣像,不久便心神安定,从而又产生了希望。”

谁都知道,要维持数千名饥饿者的生活,对传教士来说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幸好有人慷慨地援助,才解决了问题。南京、镇江、苏州各地的灾难反造成了上海的繁荣。那时,只有上海独保太平,一切买卖都发展起来了。对欧洲人、上海的做生意人,这是个大投机、大发财的时机。很快,他们便创基立业了。<sup>①</sup>

黄浦江从吴淞口起都由外国军舰保卫着,因此上海同欧美的贸易就飞跃地发展了。梅神父记述道:“上海日趋重要,如此发展下去,十年之后,我不知将会变得怎样。假如我们救得的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灵魂同帐册上几百万法郎同样的多,我想我们将是传教士中最富有的人了。非经亲自考察的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资金在上海会运转得这样的快;以若干小商店来说,他们的资金只近一万法郎,而每日的营业额能做到一千甚至两千法郎之多。我们有一个工友辞职离开我们后,和几个朋友合股经商。他对我说,他到年底,扣除一切开支及利息外,他们还可净赚十万法郎。有某教友,太平军一来,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靠一位亲戚的帮助在上海开设了一间小店。他办事既勤劳又机智,服务诚实又细致,到了年底,他竟赚得四、五万法郎。”<sup>②</sup>

于布内男爵到上海后,认识了许多亲身经历过叛乱之战

---

① 梅德尔 1861 年 5 月 15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68 页。

② 同上,第 67 页。

的人,他写道:“这次战争既有艰难曲折的一面,又有欢乐与激动的一面……是世界史上一次独特的、难以置信的插曲……试想,在这满是艰难危险的四年之中,正是投机商猖獗之时,也是赢利惊人、奢侈无度的时期……上海正似遍地黄金。而在泥城浜以外,死亡枕藉、白骨累累;数百万生灵流离颠沛、家破人亡;而这一边的黄浦江上,沙船成千、桅樯成林;很多庞大的欧洲军舰屹立江边,雄厚的海军实力戒备森严;上海外滩面对着深重苦难,在侨民的公馆里,暴发户们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两相对照,实令人难以忍受。”<sup>①</sup>

年文思主教、梅德尔会长以及杜若兰、兰廷玉、葛必达等几位神父,由于他们的职守以及他们的善于交际,在居留上海的欧洲侨民中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便为难民们劝募捐献。他们在当时的书信里,对那些响应呼吁而慷慨解囊的大善士们表示了感谢。<sup>②</sup>

中国教友和教外人士都深知,捐款交给神父最为妥善,决不会落空。于是他们齐来请神父作他们慷慨施舍的中间人。传教士在通信中提到,施主中有一位名叫张五官,洋人们称他为买办张保禄的,原是赵方济主教的船老大。神父们见他聪明正直,把他介绍给上海好几家洋行当中间人。他在物资买卖、货币交换等经营管理上,获得很大利润,终于立起了大家业。<sup>③</sup>

在这些痛苦的岁月里,张保禄把家产大量施舍、大开善

---

① 于布内:《周游世界记》,第2卷第260页起;见麦克莱伦:《上海史话》,第80页。

② 见《通讯》,第4卷第36、237页;第5卷第16页;梅德尔会长对恩人们十分感激,他请人转呈教宗,给奉教的恩人颁赐宗座大赦,给教外恩人赐以宗教礼品。见《通讯》,第5卷第30页。

③ 见康治泰:《天主教在浦东》,《神学院》,1885年,第354页。

门。叶春荣神父记叙道：“保禄不惜花五百至一千银元(合计二千五百至五千法郎),在他家中还供养着一百五十至两百名逃难教友。此外,他还带头救济、分发哀矜……他常对他的家人和职工们说:‘孩子们,今后你们对买卖不必过于操心,只要你们好好照顾我们这些流亡贫苦弟兄就是了。’”<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天主上智也直接来过问了。在前封信里,<sup>②</sup>叶春荣神父叙述道:“人们原想把好几百名避难者安置在洋泾浜圣堂附近的一所大厂棚内。这所厂棚原由一位财主教友承租了去的,这位教友,也是以慷慨闻名的。尽管大雪纷飞,而这位教友却坚决拒绝把厂棚作为难民所,神父无法说明他何以竟会如此硬心。这天夜间,突然一声巨响,震醒了众人,厂棚棚顶由于积雪过重而倒塌了。次日清早,我们的这位教友满面笑容地来见神父说:‘神父,如今你明白我昨夜的硬心了吧!这是好天主要我如此硬心顽固的,那时,我自己也无法解释呢!’”

尽管有这么些慷慨解囊的捐助,但要维持这么多避难教友的生活,教区仍要负担很大一部分开支。梅德尔会长给耶稣会总会长和给巴黎帐房神父的报告,给我们列出了有关1861年至1862年的收支数字:“支出十六万五千零六十三法郎,收入哀矜为四万四千三百十二法郎,其中不足的十二万零七百五十一法郎则由教区补足。”<sup>③</sup>这对一个新生的、财源尚

---

① 叶春荣1862年4月2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25页。教外人士中慷慨救济难民的,梅会长曾提到姚、王、沈三家,同时还呼吁为他们的归化作祈祷。见《通讯》,第5卷第38页。

② 见《通讯》,第4卷第223页。

③ 同上,第5卷第16、28页。

未稳定的教区来说,挑起这些过重的担子是欠明智的。因此,总会长向梅德尔会长提出了慈父般的劝告。可是梅会长,这里值得一提,他答复说:“我必须向父台呈报,我恢复健康后,天主上智怎样十倍地增加了我们上海的财源;再说,只要我还活着,上海教区也将站立下去,请父台释念宽怀。教区如有急需,我能向教友和教外人募化求助,赤字即可弥补。”<sup>①</sup>

“开支虽然越来越大,可是天主已为我们准备了一切,使我们还能拯救穷人而不负债务,并继续进行其他事业。幸免灾祸的教友为了表示他们的感恩之心,大力援助了遭难的弟兄们,许多教外人士也自动参加,联合教友们一起,共同搞好慈善事业。因此,当我们周围还有饥民时,我们还能继续施粥施饭。”<sup>②</sup>

在同一封信里,会长神父对“在天主预定的安排下,教区的财源以十倍地增长”作了说明。1847年,中国官方让与教区的洋泾浜、董家渡及上海城内的三块地皮,当时并不那么值钱。<sup>③</sup>当避难者涌来上海时,他们中有许多在灾难中还保存了部分资金的教友和教外人就想利用地皮来经商牟利。他们就在教区的地皮上建造了出租房屋和店铺。承租者成群而来,从此,直到如今,这些不动产的租金,还是教区最可靠的财源。<sup>④</sup>

人们很关心的,是对逃来上海的教外人的传教工作,神父

---

① 梅德尔1862年9月18日致法国参赞神父信,见《通讯》,第4卷第305页。

② 梅德尔1863年3月6日致耶稣会总会长信,见《通讯》,第5卷第28页。

③ 见本书,第1卷第97页。

④ 梅德尔1863年3月6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30页。



们对此事的关心并不亚于对教友们的照顾。当时城内及郊区的居民已近三百万，可大部分都是一无所有的穷人。<sup>①</sup>

当然传教士对自己的教友有特殊的义务，首先必须给以优先资助的。传信部及圣婴善会总部不久也同意传教士们扩大救济的范围。<sup>②</sup>

经常追随传教士外出施舍、行善的金式玉修士记叙道：“天主对待许多贫穷教外人的仁慈，真是宽大无比。多年来，因神父们备有良药，几乎天天都有人来向我们哀求施药。最近，在救死扶伤的工作中，我们知道，受伤者第一个要求，是要人们把他们抬到神父那里；有的受伤者不认识我们，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样会被送到这里来的。讲解要理的传教先生们也来和我们作传教竞争，使他们享受成为教友的幸福。一旦受伤者有生命危险，我们就通知他们，他们就立即要求领洗。当我们教他们学习要理或高声背诵祈祷经文时，先是近邻，继而远邻也跟在他们后面来接受洗礼，至少有些人成了望教者；总之，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得不到领洗比死都难受……由于人口过于集中，死亡率也与日俱增；我们好心的上级就责成我们修士和神父中若干人去探望病人……我们到处受到欢迎，收获很大。首先是病危的儿童，由他们的父母亲自抱来，要求领

---

① 梅德尔 1863 年 3 月 6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30 页。

② 1861 年圣婴善会总会资助了教区十二万法郎（其中五万法郎为特殊救济），又十一万法郎专赠与耶稣会事业（其中八万为特殊救济）。这个消息传来时附有圣婴善会总会主任德吉拉尔丹主教致梅德尔会长的信，信上说：“慷慨的施舍是义不容辞的，你们的事业是圣婴善会的钻石；在我们资助的中国和世界所有的教区中，我们必须承认，贵教区的成绩是最美又最出色的；因此面临江南巨大的灾难，总会对你们既同情又感动。”（1861 年 5 月 25 日致梅德尔信。）见《徐档》，卷宗 B12。此后数年，还继续有人慷慨地施舍。

洗；有些感到医治已经无效的人，施诊给药已是次要的事，付洗却变成主要的了，从儿童到成人，更好地说是两者同时进行……傍晚，神父们归来时，终是人手一张新领洗者的名单。”<sup>①</sup>

1861年至1862年，上海和徐家汇的神父给两千四百四十二名成年人付了洗，又给一万五千五百十七名有死亡危险的教外儿童付了洗。修道院修士、初学院修士、公学学生、传教先生、堂口办事人等，都以极大的热忱参加了这项有益的工作。<sup>②</sup>

然而，付洗工作也带来了危险，因传染病在这批既不卫生又不清洁的人群中流传开了。起先是伤寒，继而是霍乱，数以千计的人因此死亡；许多传教先生和修道院修士在救援他人时，自己也丧了生。<sup>③</sup>以后，我们还将见到许多传教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在如此艰险丛集、疲于奔命的环境中，教会高级人士前来巡阅察访，对传教士们是一种鼓舞。前任南京署理主教，今湖北省代牧徐类思主教，1859年被召去罗马，教宗庇护九世钦命他为全中国天主教各教区的教务巡阅使，特来江南视察。<sup>④</sup>

徐主教的工作报告，将使传信部了解中国传教区的一连串重要问题。其中主要的一点，是1849年六位主教集会讨论，要求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的问题。<sup>⑤</sup>1859年6月，徐主教去

---

① 金式王1862年5月29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43页起。

② 梅德尔信，见《通讯》，第5卷第29页。

③ 翁寿祺1862年6月13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54页。

④ 1860年1月24日的罗马指令。见《徐档》，卷宗B1。

⑤ 见本书，第1卷第17页。

罗马呈请指示，路过上海时，在徐家汇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还在那里欢度了耶稣升天瞻礼。<sup>①</sup>

1859年底，徐类思主教到了罗马，同耶稣会总会长神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总会长对徐主教给江南教区的种种帮助表示感谢，并祝贺耶稣会在慈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sup>②</sup>

传信部曾同意徐主教在巡阅中国各教区时，由他自己选择一位同伴，照理被选者是不该推辞的。徐主教选定梅德尔会长作伴。但他这个打算，罗马耶稣会上级以及梅神父本人都不同意；他们担心，各省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会反对巡阅使在巡视他们的教区时带来一名耶稣会会士当顾问。<sup>③</sup>

毫无疑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阻止了徐主教的计划的实现。<sup>④</sup>就象数年前，为了避免属下教士的反对，没有把大修院的管理权托付给耶稣会一样。<sup>⑤</sup>

这次的选择至少证明，这位前任南京署理主教已完全消除了过去对耶稣会的疑虑，现在他对江南教区的耶稣会会长已经完全信任了。

徐类思主教是在1860年7月底到上海的，当时英法远征军正进攻北京，而太平军掀起的内战还在发展，因此要在江南

---

① 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59页。

② 吕比荣1860年2月17日信，见《徐档》，卷宗F13。

③ 吕比荣1860年9月14日致梅德尔信，见《徐档》，卷宗F13。总会长贝克斯1860年9月15日致年文思主教和梅德尔神父信，见《徐档》，卷宗B5、F11。

④ 梅德尔1860年7月31日信，年文思1860年12月5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4章第24、28页。

⑤ 徐类思1858年2月23日致耶稣会总会长信，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43页。

内地进行任何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圣依纳爵瞻礼日，他在徐家汇受到合乎他使命荣誉的接待，接着他只局限于巡视察访上海以及上海附近的各个堂口。<sup>①</sup>

徐类思主教还收到年文思主教的一份教务工作现状报告。9月，他巡视了浙江，也察访了江西、河南、湖南的教务。1862年1月，他回到了自己的湖北代牧区。当他正准备巡回其他省份的教务时，突然呕血病倒了，他只得放弃了宗座巡回使的职务。这年9月，他逝世了。<sup>②</sup>

他上传信部的报告书是由他的继任人明希圣主教寄到罗马的。在这份报告里，他高度赞扬了江南教区，同时，他也指出了年文思主教同若干传教士之间存在的矛盾，梅德尔神父也是其中之一。巡回使建议的唯一重要改革，即小修院同徐汇公学应分开设立。<sup>③</sup>他认为，代牧主教同修会会长最好由同一人担任，也希望安徽省脱离江南代牧区，成立一个宗座特别监牧区。年文思主教在这份备忘录上<sup>④</sup>附加了一条简短的意见，认为按照目前情况，在中国成立圣统制还不可能。

了解了动乱时期上海各堂口的种种慈善事业以及传教士热心传教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应着重介绍一下各堂口各自的特殊细节。当时，主教公署所在的董家渡本堂区发展极为迅速。避难在主教大堂周围的一万两千名教友，其中数千名已

---

①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86页；又《中总》，第3卷第3章第24—30页。

② 见《传全》，1847年；《中国关系概述》，第211页；又1860年信件，见《传录》，第18卷。

③ 巡回使在取消小修院一事上，认为耶稣会会士对培植本地神职人员并不那么热心。

④ 见《传全》，1874年；《中国关系概述》，第307页。

在上海找到了工作。由于贸易经商方便，即使在和平恢复之后，他们也定居在那里不再迁走了。<sup>①</sup>

1861年与1862年，数千名本地教友和驻扎在董家渡地区的法国部队在主教大堂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欢度宗教节日。请大家读一读叶春荣神父叙述的1862年复活节主教大礼弥撒的盛况：“在举扬圣体时，<sup>②</sup>好天主备受百般赞颂，声调虽不甚和谐，却是异口同声。举扬圣体的铃声一响，成千上万的中国教友俯伏在地，敬拜至圣圣体，口中嗡嗡低声诵念他们美妙的经文。与此同时，我们士兵们的铜鼓喇叭霍然而起，中国保卫团的炮兵鸣放礼炮二十一响，<sup>③</sup>数以千计的中国鞭炮同时燃放，似欲与空间大炮声相媲美……在如此雄伟的轰隆声中，我们中国儿童唱经班悦耳清脆的高音开始歌唱‘称颂赞扬达味之子万岁’……复活节的弥撒结束后，我们的士兵万分激动地说：‘神父，我从未参加过如此伟大的弥撒’，另一个说：‘我在整台弥撒时流着眼泪，听到圣堂里唱的圣歌，使我回忆起我幼年时在本乡本堂内初领圣体时的情形。’”<sup>④</sup>

于此同时，董家渡主教大堂另一件吸引人的是兰廷玉神父组织的唱经班内伴奏唱经的管风琴，它是兰廷玉神父的杰作。人们原来打算从欧洲运一架管风琴来，但由于经济太困

---

① 和平恢复后，1864年至1865年的“教务一览表”上，董家渡记有两千一百七十五名教友，其中六百二十名原籍上海，九百五十五名原籍诸巷，六百名系外地移来。诸巷有钱教友的加入是1860年开始的。

② 举扬圣体：天主教在举行弥撒中，主祭者把祝圣成为耶稣的圣体、圣血高举，让望弥撒的教友叩拜颂扬，故称“举扬圣体”。——译者

③ 应上海道台之请，兰廷玉神父在董家渡组织了一支由法国兵训练指挥的中国保卫队，用以维持地方秩序（梅德尔1862年2月19日信，《法信》2667）。

④ 叶春荣1862年4月2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26页。

难,他就同娄良才修士和几名中国木匠,自己动手创始用竹管替代金属琴管。兰廷玉记述道:“事实上,老实说,管风琴的竹管音真悦耳动听。键簧的音偏高,低音部及中音部的音色甚觉圆润优美。”<sup>①</sup>另一架复制的小型竹制管风琴,曾运往法国,进献给帝国王室。<sup>②</sup>

1857年,满清皇帝收复上海后,原来战时为伤兵开办的伤兵医院关闭了。<sup>③</sup>潘奥定修士的施诊所还保留着。潘修士是神父住院主管医务室的助理修士,他是个谦谦君子,平易近人。不久,法国兵便常来就诊,成了他的病家。<sup>④</sup>潘修士对避难来上海的教外人进行传教工作,颇有成效,并救活了不少人。从1864年开始,这施诊所即按时开放,有五位中国医师协助诊疗。<sup>⑤</sup>

马理师神父惨遭杀害之后,蔡家湾不少孤儿曾到徐家汇避难,并由徐家汇转辗到上海。<sup>⑥</sup>

梅会长把孤儿们开始安插在董家渡不久前被取消的小修院内,继而又把他们迁到住院东南面的一些余屋内,最后终于安顿他们在近南门的一所空关着的当铺里,一直到太平军战事结束。在当铺这种庭院狭小、空气不流通、又缺乏饮水的高墙深院内,这些幼小的难民在四年之中死亡率高得惊人。1864年4月,伤寒症在那里传开了。马理师神父牺牲后,孤儿院真

---

① 兰廷玉 1856 年 11 月 29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431 页。

② 敬房苏念滋 1869 年 8 月 24 日信,见《徐档》,卷宗 F20。

③ 见本书,第 1 卷第 287 页。

④ 兰廷玉 1861 年 3 月 3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6 页。

⑤ 潘奥定 1864 年 7 月 15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149 页。

⑥ 见本卷第 23 页。

正的组织者夏显德神父又重来接管孤儿院，他勤勤恳恳、无私地一心献身于孤儿事业。那时，他也传染到了伤寒，被抬到董家渡后，于4月30日逝世了。

靠戈登“常胜军”的战功，上海恢复太平后，孤儿们被送到徐家汇，先安置在耶稣会神父住院附近靠肇嘉浜两边的中国式房子内。目前的土山湾孤儿院是1864年7月由鄂尔璧会长命令开始建造的。<sup>①</sup>

当时隶属于董家渡的主要事业是修道院。我们已经看到，年文思开始接管教区时，就实行赵方济主教和众神父商量后作出的规定，即中国青年神职人员不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验，不得授以神品。<sup>②</sup>

因此，1856年读完神学的修士，被分派到本堂区充当传教先生或去徐汇公学当教员，这措施成效极好。1857年9月29日，梅德尔在信上说：“大修院共有二十八名修士，其中几名已读完神学，被派去当教员或传教先生，等待晋级升品；三名被评为成绩优良的已晋升为六品，他们已是培养成功，堪称模范的人。可惜在我们修道院的修士中，有一名最优秀的却不能继续为修院效劳。当他已经成为耶稣会的一名初学修士时不幸病逝了，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可是他给修道院留下了极美好的品德。”<sup>③</sup>

---

① 见柏立德：《土山湾孤儿院回忆录》；又《夏显德神父小传》，《婴年》，第17卷第92页。

② 见本书，第1卷第323页。神职人员的考验时期一般称“出试”。神品即赋予施行圣事之神权。神品分七级，按级晋升，一至四为小品，五品以上为大品，到七品为司铎级，才成神父。——译者

③ 见《通讯》，第3卷第29页。我在前一卷曾叙述过有关冯若望修士临死时进耶稣会之事，见本书，第1卷第282页。

1858年，董家渡大修院成立后的第十五年，输送到教区的首批三位神父都是1843年第一批进修道院的。当时江南主教正缺席，梅德尔会长亲自率领他们到宁波。9月19日，由遣使会会士田类思主教授给他们以司铎之品。9月29日，他们返回董家渡，举行了他们的第一台弥撒。<sup>①</sup>

三位新神父即：娄县顾雅各(斯恭)<sup>②</sup>和南汇曹弥格(廷桂)原籍均属松江府，都是二十九岁；另一位熊泉波莫(臣尧)，原籍江苏海门，三十四岁。1859年9月8日，其他两位修士在董家渡大堂由孟振生主教晋升为司铎。这两个人是：吴安德(达孚)，松江府华亭县人，二十八岁，江南修院第二届修生；蔡西尔(文生)，崇明人，三十二岁，江南修院第一届修生。<sup>③</sup>

即便在法国，也有人认为这首批神父晋升司铎拖得太久了。梅德尔会长答复说：几名山东籍的青年数年来同我们的青年修士同窗共学，进步也不突出，可是在两、三年前他们已晋升为司铎了。我们这里却不，但我们并不后悔，这样可以让我们们的修士们多读些书，多受些教育。我们的三位新神父也毫不抱怨他们晋升司铎太晚了；可是相反，他们认为遗憾的却是他们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来进修他们的本国文学，研究他们的经书以及他们的历史。<sup>④</sup>

果然，这些年轻司铎在战争恐怖的环境中，开始执行他们

① 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65页。梅德尔1858年10月2日信，见《神学院》，1859年，第40页。

② 按教区惯例，对修道者都以教名称之，括号内的倒是正式名字。——译者

③ 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第12页；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65页。

④ 见《神学院》，1859年，第40页。



的传教工作。他们热心地传教，敢于攀登任何险峰，成了外籍传教神父最赏识、最得力的助手。上级领导及咨议神父们在致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书信中以及徐类思主教上传信部的察访报告中都一致高度赞扬这些新司铎们。<sup>①</sup>

1858年和1859年，耶稣会读书修士范德先、南志恒和施宜三三位随同大修院修士一起攻读神学，这就是耶稣会神学院的正式开始。<sup>②</sup>

在这初创阶段，值得我们缅怀的是，人们对江南教区的友爱和关怀。其中有一件十分动人的事，即拉瓦尔有一名普通女佣人叫维吉妮·弗勒隆小姐的，托人转赠梅德尔会长一万六千法郎，这是她多年忠心侍奉主人、主人留赠给她的一笔小小遗产；弗勒隆小姐便把这笔遗产赠给梅会长，指定作为江南耶稣会读书修士的助学金。梅会长的许多有趣的报道，就是寄给这位弗勒隆小姐的。<sup>③</sup>另有一笔施舍，即董家渡大堂前大街南面的一块土地，那是当时姓王的一家教外人因感激梅神父而赠送的。这块地皮上的收入，被指定专为修道院之用。<sup>④</sup>

当时贝来德神父任江南大小修院的理院兼教授，曾撰写了有关修道院修士们的品德与学业的若干笔录寄到法国。如果把这些笔录同数年前翁毅阁和南格禄两神父所观察到的对

---

① “我们的新司铎热心传教、诚实得出奇。”（摘自梅德尔1859年5月26日信，《传特》，第3卷第3章第61、62页。）“这些年轻的司铎热心、明智、端庄、接近群众，真是外国传教士的好助手。”（摘自徐类思1862年报告，《传全》，1874年，第307页起。）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58、162页。和马再新神父一起来中国的读书修士或多或少是在江南修道院读神学的（见本书，第1卷第229页）。

③ 见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26页。

④ 同上。

照一下，那是很有趣味的：①

“神修方面：他们的精神修养比起我们那里也许稍事外露，但决不稍欠稳固；他们并不只热情而却常以理智与真诚作准则……因此对他们神修的培养就比较缓慢，但却是安步徐进、稳定可靠而又持之以恒的。学习方面：他们学习很用功，对神学、哲学都能认真研究，并有成就。他们的知识不仅掌握得多而且十分巩固；但我们的哲学系统，他们很少注意，而更侧重于原理的探讨；他们不满足于模糊的答辩，而拼命攻克难题，直到认为理论清晰、证据确凿、并有可靠的理论权威作根据时为止。学习研究神的启示，在这些正直人的思想里，却开展了一种真正的革命。因他们向来只以中国哲学家们，他们的古圣先贤的言论论断一切。传教热忱方面：当我们这些青年明确一件善事，并知道应该付诸实施时，人们可看到他们会稳扎稳打地去努力，虽则有时进行得缓慢些，可是十分认真而又持久，非进行到底不可。他们屡次在最大的困难和最艰苦的情况下，仍保持镇静与满不在乎的态度，真使我们感到惊奇。”②

从1858年至1864年，大修院和耶稣会修士们的学业经常受到上述种种悲剧的骚扰，而这些骚扰的中心地点就是上海。修士们曾努力帮助逃难来上海的贫苦教友，他们竭力关心患病者与临终者。神父们在书信中，高度赞扬了这批青年合作者的不辞辛劳的高贵品质。③当时董家渡大修院的修士

---

① 见本卷第233页。

② 梅德尔1857年9月29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49页。

③ “我们修院多名修士与会上一样，在艰苦的工作中牺牲了。”见梅德尔1863年3月6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9页。

同法国翁热的耶稣会的初学修士彼此通信，在他们用拉丁文或法文写的书信里，对他们在初步传教时所遇到的有趣的事情作了详细的描述。<sup>①</sup>

1853年开始设在张家楼的小修院，在年文思主教上任后就撤销了；小修院内年龄最长的修生进董家渡大修院，才开始读拉丁文的则归并入徐汇公学。梅德尔会长采取这个措施，原是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既然小修院同徐汇公学的中文课程完全相同，那么设立这种双重机构和聘请双重教师，看来是多余的；只要在公学内附设一个拉丁语学生的特别分院就行了。<sup>②</sup>

再者，会长神父认为，由于中国人的习性，在教区神职人员中，公学学生与小修院修生之间会产生令人沮丧的隔阂。<sup>③</sup>

徐类思主教巡访教区时，对这个措施表示遗憾，并强调必须重新另设小修道院。<sup>④</sup>年文思主教原和徐类思主教有同样的看法，便欣然答应了徐主教的要求，所以1860年底，小修院又在董家渡大修院附近恢复了。<sup>⑤</sup>

由于上述理由，梅德尔会长始终反对这种措施，教区代牧和教区会长之间常常为这个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sup>⑥</sup>

郎怀仁主教又采取梅德尔会长的计划，从此，小修院的拉

① 1858年6月20日和1859年2月7日的信，见《通讯》，第3卷第79页起。

② 梅德尔1857年9月29日信。

③ 梅德尔1861年3月1日致耶稣会总会长信，见《中总》，第3卷第7章第18页。

④ 徐类思报告，见《传全》，1874年，第307页。

⑤ 同上。

⑥ 见本卷第68页，咨议员们同意会长的意见。见1861年1月31日和2月22日的会议摘要，3月1日由梅德尔会长寄出，《中总》，第3卷第7章第13页。

拉丁语学生又并入了徐汇公学。徐类思主教在致传信部的备忘录中认为，拉丁语学生混在徐汇公学将有损于本地神职人员的发展。<sup>①</sup>但这种顾虑并不现实，因为任何时期，拉丁语学生在徐汇公学内的人数都是很多的。而且教区的大多数中国神父都出自徐汇公学，这为梅德尔竭力推行的计划作了最有力的辩解。<sup>②</sup>

洋泾浜的教务在开始时象董家渡那样不太繁忙，在英法联军远征和太平军战事之后，才有了重大的发展。这个本堂区也由于许多避难教友的增加而得到了充实。由于在租界谋生便利，这些教友人家就定居下来。1857年，教区帐房杜若兰神父从董家渡迁到洋泾浜，成了租界上的第一任本堂神父。1858年，这所小圣堂周围只有外籍教友九十二名、中国教友一百八十名。<sup>③</sup>

军队不断地往来调动，他们的军官以及士兵们常来小圣堂参与弥撒；1858年至1862年，从外地又迁来了许多教友，因此，教区迫切需要建造一座较大的圣堂。我们知道，1860年4月，孟斗班将军曾参加了这座新圣堂的奠基礼，1861年

---

① 见本卷第68页。

② 董家渡负责人员名单(神父住院及修道院)：

1856—1857年	年文思会长	罗礼思	陶飞罗	贝来德	笄良仁	杜若兰
1857—1858年	年文思会长	李秀芳	笄良仁			
1858—1859年	年文思会长	梅德尔	兰廷玉	贝来德	笄良仁	
1859—1860年	年文思主教	梅德尔会长	兰廷玉	贝来德	杜若兰	
1860—1861年	年文思主教	兰廷玉	贝来德	笄良仁	夏显德(孤儿院)	
1861—1862年	年文思主教	兰廷玉	贝来德	笄良仁	夏显德(孤儿院)	
1862—1863年	梅德尔会长	平乃公	贝来德	笄良仁	夏显德(孤儿院)	
1863—1864年	利甫乐	贝来德	笄良仁			

③ 见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676页。

6月29日,举行了开堂弥撒。<sup>①</sup>

徐家汇与董家渡二座大堂的建筑师罗礼思神父又负责建造洋泾浜圣若瑟大堂。<sup>②</sup>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上的水兵们,曾给罗神父以大力的支援。据说,该大堂钟楼的主梁是由“强力”号军舰上的海军们安装起来的。“强力”号正是海军少将卜罗德将军的旗舰。<sup>③</sup>

杜若兰神父曾传教于美洲,他的英语、法语讲得同样流利,叫他去洋泾浜,可说是人地两宜了。有一名新来的传教士目睹了他的工作情况,记述道:“杜神父可说是一位真正的天主教会的本堂神父,各个国籍的人都到他身边去办神工;上海商埠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可是我从未见到有来访者讲的语言难倒过杜神父;同样,神父说的语言,来访者也都能听懂,因此杜神父受到人人喜爱,就是耶稣教教徒也不例外。他们公然对他表示爱戴和尊敬,胜于敬爱他们的牧师。”<sup>④</sup>

为了使我们对杜若兰神父的工作量有个概念,我这里抄录他在1860年8月15日写给他胞弟信中的一段话:“我早上三时半起身;五时做弥撒;五时半至八时在大礼弥撒时听神工;八时半动身赴董家渡,主教召我去接待英国公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领事,总之去接待不操法语的来宾;九时半唱‘谢主颂’,那里有四位主教、两位公使、六位领事,还有军舰舰长

---

① 见本卷第15、44页。

② 吉玉隆修士1861年4月8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36页起。

③ 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848页;据《耶稣会会士录》记载,1864年至1865年,在洋泾浜有教友三千零九十六名(其中常住户口六百九十六名,入迁户口四百名,外侨一千名,流动教友一千名)。

④ 吉玉隆1861年4月8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36页起。

和军官、行政人员等等……你可怜的大哥还得给他们排席位，并负责他们的安全；十时半在会客厅接待这些先生们；十一时，大部分人离去了；十二时我和四十位来宾共进午餐，我感到极度疲乏，不想吃；午后二时，一名重病外侨请我去，离这里半里远；三时半，我回来了，有人交给我五张来访者的名片，其中有欧洲籍的志愿兵的头头；四时，有一批对叛军作战败退归来的马尼拉兵请我做几台‘救援之母’的弥撒；四时半，许多中国群众听说叛乱分子迫近上海了，纷纷把所有的财物拿到堂里来寄存，搞得人心惶惶；五时晚餐，我无法进餐，因为每分钟有外国人和中国人来访问；六时，圣体降福<sup>①</sup>；六时半，回访给我留下名片的那些客人，那个美国上校送我六百法郎，助我造堂之用；七时半，出门探访一名病人；九时回堂，见了一位等我已有一小时的舰长，他同我也没有什么谈的，只是来探听消息；十时，念‘申正经’和‘夜祷经’<sup>②</sup>；接着省察和预备明日的默想<sup>③</sup>，入寝。”<sup>④</sup>

在这动荡时期，教区还设立了一所仁爱慈善的机构。爱柴先生从1856年当上海署理领事时，他看到上海的洋人和各商船上的水手们在患病期间几乎被人遗弃，于是就计划要在租界上为他们建造一座医院。法国政府负责派遣一位医师或至少派一位保健的军医官，耶稣会则派一位辅理修士，专为指

---

① 圣体降福：天主教神父捧圣体祝福教友群众的一种仪式，其隆重仅次于弥撒。——译者

② “申正经”和“夜祷经”：天主教神父每日必念的“日课经”中最后的部分。——译者

③ 默想：天主教一种精神修养的方式，也称“默祷”或“心祷”，一般在清晨举行。——译者

④ 杜若兰1860年8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212页。

导本地的助理护士们；于是还准备在洋泾浜小堂附近造几间中国式的房间。<sup>①</sup>

此后，中国同英法两国爆发了战争，建造这座医院的计划就此搁置起来。1856年至1862年，在上海，只有洋泾浜圣若瑟堂对面的一所法国军人医院为欧洲人服务。这所医院坐落在今日拯亡会修女院的地方；<sup>②</sup>医院有自己的随军司铎，传教士把照顾病人之事托给了他们。这所医院在外国军队离开后即关闭了。<sup>③</sup>

在这个时期，建造一所为欧洲人的医院，较之1856年更为迫切需要了。杜若兰神父凭他的毅力和能力，即着手进行了这项建筑工程。

上海的主要洋商几乎都是耶稣教教徒，杜神父从他们那儿获得了五万两银子（当时合法郎三十余万）的资金。他还从这些洋商处又争取到那座医院的管理权，并委托给天主教的修女们，这是他特别关心的事。那时，上海的中国人似已被西方思想所征服，对修女进驻医院不表示有什么反感了。<sup>④</sup>

当时仁爱会修女已在宁波，她们的服务精神曾博得中外人士的高度赞扬。<sup>⑤</sup>人们曾一度打算请法国夏尔特尔的圣保禄会修女来华，当时，她们正同传信部的帐房神父昂布罗齐发

---

① 见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902页起。

② 今为市六中学所在地。——译者

③ 见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903页。神父们在信中常常提到这所军人医院。在洋泾浜举行卜罗德少将的追悼会时，遗体曾安放在这所军人医院里（见本卷第58页）。当时上海有两座耶稣教办的医院，但几乎只限收中国病人（见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903页）。

④ 同上。

⑤ 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156、158页。

生了争执，所以也宁愿放弃在香港的一切设施而来上海。<sup>①</sup> 夏尔特尔的主教勒尼奥对此也曾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但这项计划因被传信部否定而没有实现。<sup>②</sup>

在克里米亚战事中，英国人对仁爱会修女在战场上的光荣服务精神都记忆犹新，对她们的印象很好；因此，江南的耶稣会上级就邀请了仁爱会修女。<sup>③</sup>

1863年4月18日，梅德尔会长写信给遣使会总会长，报告他这个计划说：“法国、英国、美国的公司洋行竭力资助在上海设立一座共同的医院。商人们、船长们都敦促天主教来办理这件慈善事业。但如果没有修女，我们不能管理医院。总会长神父，请你怜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幸者吧，请你派遣贵会修女来照顾他们的肉体，并援助他们的灵魂吧！”<sup>④</sup>

这是梅德尔会长患了不治之症后，在病重期间写的最后几封书信中的一封，也是他在上海办的不少善举后的又一桩新的善举。1863年6月18日，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神父回信说：“我们完全懂得圣教会必须在上海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在那里设立各种各样的救灵事业，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已准备作出种种必要的牺牲。”<sup>⑤</sup>

1863年11月8日，医院的董事和理事们同遣使会的领导人订立了合同和细则。

---

① 吕比荣1860年3月17日信，见《徐档》，卷宗F13。

② 勒尼奥主教1859年11月24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4章第11页；吕比荣1860年8月11日信，《徐档》，卷宗F13。

③ 吕比荣1863年1月20日致梅德尔信，见《徐档》，卷宗F19。

④ 见《徐档》，卷宗B17。

⑤ 同上。



这年年底，在若丽娅修女的率领下，仁爱会修女到了上海。<sup>①</sup>若丽娅修女从此就终生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服务。1900年，北京北堂被围时期，她的行动堪称一位女英雄。1864年1月，医院正式成立，在法租界外滩高尔朋路转角处的一座大楼里开始门诊了；以后，又迁到苏州河以北。<sup>②</sup>

从此，仁爱会修女的传教工作也归到江南教区来了。以后有机会我将再详细叙述。

这个时期，人们也想到了上海外侨的女孩和中国上层阶层女孩的教育问题，因而必须号召并聘请专事女子教育的修女来上海。1853年，翁毅阁会长在法国逗留时，和他一起旅行的监会铎伏伯禄神父就提出要聘请圣心会修女来华，她们的会祖母真福<sup>③</sup>玛大肋纳也曾热情地接受过这些建议。<sup>④</sup>

但是，当她们了解到，去江南的修女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又必须兼顾传教事业，这与圣心会修会的会章显然不合，<sup>⑤</sup>因此她们只得放弃原定计划。<sup>⑥</sup>

## 二、徐家汇

建筑与变迁 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徐汇公学的  
进展 本期的亡者

在这几年的骚扰动乱中，根据那时期传教士们的信件，徐家汇的神父住院以及徐汇公学的情况却是很别致的。1860年至1864年，除偶有数日中断外，法国兵的一个哨所和买武勒先生的中法混合队的一个部队几乎每天在附近田野里练习炮战；当时，各国外交官与官兵们接连不断地前来参观神父住院

及徐汇公学,因此,神父住院经常很不宁静。但在战争连绵之年,教区的制度仍一如和平时期那样,神父们每年两次集合避静与歇夏。但有时由于时局的突变,避静与歇夏不得不被迫中断。<sup>①</sup>

传教士骇人听闻的死亡率迫使上级认真考虑总院的卫生条件;因总院是患病的传教士前来治疗、休养和恢复健康的场所。

1853年,当敏体尼先生在罗马旅游时,曾同耶稣会总会长贝克斯神父以及法国省参赞吕比荣神父作了长时间的会谈。他热情地强调了两点:在中国的神父必须保重自己的身体,改善饮食、衣着等生活条件。罗马的上级对这些意见非常

---

① 见马佐:《北堂女英雄》,第149页;又梅德尔1862年12月6日、1863年4月18日信,4月18日这一封信是梅德尔致省会长神父的最后一封,《法信》2667。

② 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409页起;1863年的信件中曾引用了当时英文《字林西报》登载的《公济医院简介》,见《神学院》,1863年10月,第27页。

③ “真福”:天主教会中的圣贤,死后经过教会严格调查审核后,由教宗诏令敕封列品。品分二级:一为真福品,二为圣品;列入真福品的称真福,列入圣品的称圣人。——译者

④ 玛大肋纳1854年6月21日致伏伯禄信,见《徐档》,卷宗F24。

⑤ 吕比荣1864年1月23日、9月29日及1868年5月信,见《徐档》,卷宗F13。

⑥ 洋泾浜负责人员名单:

1856—1857年	杜若兰	
1857—1858年	杜若兰	柏理师
1858—1859年	杜若兰	薛孔昭
1859—1860年	杜若兰	薛孔昭
1860—1861年	杜若兰	
1861—1862年	禄理格	杜若兰
1862—1863年	马义谷	杜若兰
1863—1864年	伊宗尹	杜若兰

⑦ 见本书,第1卷第320页。

重视,因此经常提请教区注意,并查问实行情况。<sup>①</sup>

第一项改善工作,即在徐家汇建造一所得体的神父住院,因为直到那时,神父们的住院建筑都还采用中国式;然而1848年,却还有一位咨议神父向罗马控告,说他们过于奢侈了。<sup>②</sup>

1863年,神父们住进了西式的新住院,<sup>③</sup>数月来,不卫生的最大根源是徐家汇的一条河。原来神父住院太靠近肇嘉浜,空气极潮湿,河里还经常发出有害于健康的臭气。<sup>④</sup>

在徐家汇的一些法国军官们请求上海道台允准,把肇嘉浜河床迁移向东,因为训练部队,尤其训练炮兵部队需要有更宽广的练兵场。请求批准后,迁河工作立即进行了。河床留下的空地就舍给了教区,因此教区的地盘也扩大了。<sup>⑤</sup>

1861年2月,英国人和法国人从徐家汇到上海开筑了两条马路,使防守上海的部队与徐家汇驻军之间的联系更为便利了。<sup>⑥</sup>

---

① 总会长贝克斯1856年8月6日、1858年11月16日致年文思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5;又1858年4月20日致会长信,《徐档》,卷宗F11;1861年3月14日,亨利·莱新皮奥医师对传教士作了健康检查后,写了一本详细的《江南教士健康须知》,后来调整了会士们的生活惯例(《徐档》)。

② 总会长罗当1848年12月3日信,《徐档》,卷宗F13、F10;薛孔昭:《卜亦奥神父传》,第44页。

③ 柏立德1863年9月23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97页。

④ 贝克斯1878年4月20日的信上提到敏体尼的备忘录,见《徐档》,卷宗F11。

⑤ 见薛孔昭:《梅德尔神父小传》,第21页;另见1862年7月14日一位读书修士的信,《神学院》,1862年11月,第29页。

⑥ 梅德尔1861年2月6日、1862年12月30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6、316页;又薛孔昭:《梅德尔神父小传》,第121页。(英国人筑海格路,即今华山路;法国人筑徐家汇路。——译者)

动乱期间教区办的一桩大事，是久已渴望的耶稣会初学院，由于南京教区几位署理主教的迟疑不决，一拖再拖，现在终于开办了。<sup>①</sup> 1862年5月19日，耶稣升天瞻礼，在晁德莅神父领导下，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的大门向十一名初学修士开放了。十一名中九位来自徐汇公学，两名来自修道院，他俩事先得到了传信部豁免誓言的约束。<sup>②</sup> 徐家汇住院的医务室主任翁寿祺修士触景生情，赞叹道：“这些都是真正活着的小圣人。”<sup>③</sup>

三年前，耶稣会总会长贝克斯神父在公布圣父恩准两位修道院修士黄伯禄（斐默）及龙玛弟（在田）进耶稣会时，曾这样祝贺中国初学院：“祈望吾主赐福于本会在中国初学院的最初的初学者，给他们充满本会的精神，并按我们应该期望的，使他们为在基督旗帜指引下投奔到我们修会的人广传榜样。”<sup>④</sup>

中国的初学修士立即经受了最艰苦的“考验”。他们奉命去照顾病人，给病危临终者讲解要理。由于战争及瘟疫，死亡的人很多，但我们的初学修士都能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梅德尔会长记述道：“我们善良的初学小修士严峻地经受了考验……在六、七、八三个月的盛夏瘟疫流行时期，他们探访病人，直到自己体力不能支持时才停止工作。除瞿若瑟（光焕）修

---

① 见本书，第1卷第103、231页。

② 见薛孔昭：《梅德尔神父小传》，第123页；翁寿祺1863年6月13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56页。总会长贝克斯在1859年1月29日致梅德尔神父的信中，通知最先的豁免，《徐档》，卷宗F11。

③ 同上。

④ 总会长贝克斯1859年1月29日信，见《徐档》，卷宗F11。我不知为了什么，这两位修士进耶稣会没有成功，而仍留在本地神职界，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第112页。

士逝世升天,李伯禄(玉亭)修士染上了霍乱外,其余在上月又开始到上海各区去探访病人了……清早,他们先打扫董家渡的走廊,使他们原来的职工与外人深受感动。走廊打扫以后,他们就去探望病人。除了几名需要充实教理学习外,他们已付洗了一百五十名重病者,外教归化进教者也日见增多。可是,三名初学修士就此患了伤寒,其余也或多或少感到不舒服。”<sup>①</sup>

徐汇公学创办时的形势虽不如意,可是仍有了一定的发展。据校长晁德莅神父1857年的报告,公学有八十二名住宿生,分为三院;九名中国教师多数是教外人,因为教友中有科举学位的不多,不能弥补教师的空缺。中文一个学科几乎占去了青年学生绝大部分时间;只有进步最快的学生才加上其他学科,例如法文、唱歌、音乐、图画等等;学生们对这些学科的兴趣与吸收能力,使教师们感到惊奇。晁德莅神父记述道:“尤可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儿童对一切都能一蹴而就;尽管他们学习的时间不多,而且我们教师们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工具也不能尽如人意。可是我们已看到,他们定是大有前途的。”<sup>②</sup>

救灵事业为公学争光,尤其学生中的圣母会会员,他们经常以给病危者付洗和给心地善良的外教人讲解要理为乐事。<sup>③</sup>

---

<sup>①</sup> 梅德尔1863年2月7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15页;又1863年3月6日信,《耶稣会会士录》,第29页。徐家汇医务室修士翁寿祺在谈到瞿若瑟修士的死(1862年10月3日)时写道:“我们可爱的学习修钟表的初学修士瞿若瑟,真象小达尼老那样,把自己的灵魂交付于天主,他在忍耐、承行主旨、安命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见《通讯》,第4卷第308页。

<sup>②</sup> 见《通讯》,第3卷第51页起。

<sup>③</sup> 同上。

人们原指望徐汇公学的老学生一朝回归老家，或当传教先生或做学校老师，能在会口里树立表率，成为会口的办事人或地方董事。铎品圣召并不少，但人们还须给这些学生们以严格的考验。晁德莅神父记述道：“经过长期与严肃的考验之后，我们才敢确认他们的圣召；暂且我们使他们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好的地位，使人明白，进入修道院并非为了谋求别处不能谋得的职位，而是相反，是要牺牲早已获得的稳妥地位。为了教区的前途，物色征募神职人员，最重要的是必须从热心传教和忠心服务精神方面去考虑。对于教育我们的青年，我们已有相当多的经验，保证会有足够数字的圣召；更何况他们的动机只是荣主教灵，而没有其他的目的。”<sup>①</sup>

五年之后，鄂尔璧会长告诉我们，准备安排即将离开徐汇公学的学生去学习中医，使他们日后便于打入教外人家，讲解要理与付洗，做好传教工作。<sup>②</sup>1859年，徐汇公学开始设拉丁文课，这是为了适应进修院的与求进耶稣会的学生们的需要。<sup>③</sup>

葛罗男爵路经上海时，有意重新采取爱棠先生过去的计划，<sup>④</sup>即在徐家汇，在神父们的指导下，开创一所译员学校。学生一半是法国青年，一半是中国青年，由各自的政府负责派遣并供给生活费。神父们都表示愿意承担这项工作。可是，由于英法联军之战的爆发，外加当时法国政府对远东事务的漠

---

① 晁德莅信，见《通讯》，第3卷第58页起。

② 鄂尔璧1863年8月14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81页。

③ 见本卷第81页；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46、169页。

④ 见本书，第1卷第346页。

不关心,因此和其他许多有益的计划一样告吹了。<sup>①</sup>

1864年7月13日至14日夜,一股强台风把一所宿舍吹倒了,里面正睡着二十二名学生,结果从瓦砾中找到了一名死者;另一所宿舍同样也睡着二十二名学生,房屋虽然受震动,幸而还能顶住。神父们看到儿童们幸免于难,实是一个真正的奇迹。<sup>②</sup>

徐家汇和上海的许多神父死去了,其中绝大部分神父都死在年文思主教任期内。可惜,死者的名单太长了,不能一一写明。<sup>③</sup>教区总共有二十二位神父或修士被夺去了生命,仅在1862年就有九位。在1863年2月5日这一天中,就有十一具灵柩运到上海耶稣会公墓(即南门外圣墓堂),其中九位死者系耶稣会神父和修士,两位是教区神父。曾参加葬礼的南志恒神父记述道:“这真令人伤心,眼看十一具灵柩推进墓穴,毫无疑问,我想不止我一人会这样认为,假如倒霉的1862年再继续数年,那么剩下的只有几个专为向欧洲同会弟兄报

---

① 法国参赞吕比荣1859年2月11日、省会长戴元英1859年3月8日信,见《徐档》,卷宗F13、F15;又梅德尔1859年11月17日致葛罗便条,见《法使馆》。

② 兰廷玉1863年7月16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159页起;1859年此屋重新修建,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68页。

③ 死者名单及死亡日期:马奥定神父1856年8月15日;高慎思神父1856年11月3日;范廷佐辅理修士1856年12月31日;冯书田初学修士1857年6月23日;陶飞罗神父1860年4月5日;马理师神父1860年8月17日;丁恭思神父1861年7月12日;文尔梅神父1862年1月5日;柏理师神父1862年2月9日;费都尔神父1862年3月4日;杨恒离辅理修士1862年4月1日;葛必达神父1862年6月15日;年文思主教1862年7月31日;范德先神父1862年8月19日;郁诵周读书修士1862年9月10日;瞿光焕初学修士1862年10月3日;梅德尔神父1863年5月3日;安于仁神父1863年6月13日;葛喻义神父1863年8月2日;平乃公神父1863年9月8日;夏显德神父1864年4月20日;毕允升神父1864年5月4日;笕良仁神父1864年5月29日。

告死亡消息的活人了。”<sup>①</sup>上面我曾提及，马理师、费多尔两位神父惨遭杀害；最近，又有夏显德、梅德尔两位神父以及年文思主教逝世。

在这恐怖时期的许多逝世者中，对教区有特殊贡献而值得人们特别追念的还有葛必达神父。葛神父由于他属下的许多教友逃难来上海，因此，1860年至1862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上海逗留。他竭尽全力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照顾这些不幸的避难者。一方面，他与英法联军的军官们以及外交官们保持着联系，同他们中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大批大批的往来书信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们之间的深情厚意。<sup>②</sup>1862年初，葛必达神父被派去苏州、江阴，帮助并救援住在该地区的教友。<sup>③</sup>

这项艰巨的、常常要冒生命危险的传教工作，终于使葛必达神父精疲力尽，最后结束了生命。桑理爵神父曾被派遣前往协助，因中途发生情况，因此不能到达，这事以后我再叙述。

葛必达神父接到回上海休养的命令。回沪两个月后，1862年6月8日，他开始发烧，八天后，1862年6月15日，即安逝于洋泾浜。由于他的死亡而引起的悲哀，足以证明他当时在教区内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鄂尔壁神父写信给圣婴善会的

---

① 南志恒1863年2月16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17页。

② 见本卷第75页。这些信件还保存在《法信》2566、2765中，我曾多次翻阅。爱棠先生在得知葛必达逝世的消息后，写信给梅德尔会长说：“在上海，有谁不认识葛必达神父呢？谁不爱他这副给人好感的面容、这副和蔼的微笑呢？在这个智慧、光明与仁爱的灵魂前，难道还有谁不肯把隐秘的悲哀向他吐露吗？”（1862年6月15日信，见《法信》2566。）

③ 梅德尔1862年2月7日信，见《法信》2667。



领导说：“葛必达神父曾在教区的几乎各个地区工作过，所以，在我们中要算他最最熟悉教区；由于他的仁爱、坦率、得体的交接以及与人为善的态度，赢得了众教友的尊敬与爱戴；因而他在教友中享有极大的威信，对教友有极大的影响。葛神父尤能微妙地利用教友们对他的好感，推动传教工作，尤其发展他心爱的育婴事业。那时，由于商业上的利益以及一些政治事件，曾吸引了不少我们法国同胞到中国来，其中不少是在外交界或军界中享有高级地位的人。葛必达神父只要接触过一次，就能了解他的为人。不必费多大的劲，他就能和这些高级人物的大多数人结成良好的友谊……人们争先恐后地向他请教，尤其从他那里了解我们教区的处境以及对劝化教外人和对发展育婴事业所产生的种种忧虑和种种希望。葛必达神父对人、对事都作了公正的答复和正确的评价，排除并解决了种种疑问，即使还有忧虑，也很快会烟消云散。<sup>①</sup>葛神父曾亲自或请人给三万五千多名教外儿童付洗，其中数千名寄养在教友人家。好多年，他的本堂区的付洗数字常占全教区半数以上。”<sup>②</sup>

徐家汇附近各堂口仍属于耶稣会神父住院，直到1862年，这些堂口才划归松江总铎区；在叙述松江总铎区历史时，

---

<sup>①</sup> 葛必达神父曾编写了一篇有关中国育婴事业的目的与起源的说明书，可以算得上是最好的一篇（《圣婴善会档案》，江南案卷，1856年12月20日）。葛神父曾把这篇说明给许多法国军官和外交官员们传阅，他们中许多人要把它亲手抄录，并说读了这篇文章后，先前反对育婴事业的偏见全部消除了（省会长神父1862年6月15日收到一封不署名的信，《法信》2566）。

<sup>②</sup> 葛必达1862年8月18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79页起。

我们再一起进行研究。<sup>①</sup>

### 三、松 江

马义谷神父与太平军 诸巷会教友 余山

动乱期间,神父们的传教工作遭到种种阻碍,人们是可想而知的。即便1861年,太平军在安徽作战时,他们的零星部队仍留驻在松江府内,他们霸占着几个哨所,而且依旧不断四出骚扰和掳掠。1860年与1862年,当太平军把上海四周作为主要战场时,混乱更达到了极点。负责驱逐太平军的清兵,他们的凶暴残酷及不守纪律,比他们应该歼灭的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1861年4月14日,施宣三修士记述道:“清兵在破坏和纵火方面比太平军更厉害。抢、砸、焚烧似乎就是这次内战的主要特征。事实上,叛军撤离了张朴桥后,几个清兵立即进村,侵入我们的公所,这座在教区中算得上最美、最大的圣堂之一的建筑,立刻火焰熊熊,成了灰烬;负责公所的神父说,损失达八万法郎。在鄂尔璧神父负责的本堂区,即徐家

---

① 徐家汇会院负责人员名单(神父住院及徐汇公学):

1857—1858年 贝米德 晁德莅 利庸乐

1858—1859年 晁德莅 利庸乐

1859—1860年 晁德莅 利庸乐

1860—1861年 晁德莅 利庸乐

1861—1862年 晁德莅 兰廷玉 石可楨

1862—1863年 晁德莅 兰廷玉 石可楨

1863—1864年 晁德莅 兰廷玉 石可楨

1864—1865年 晁德莅 兰廷玉 石可楨

1864—1865年,上海近郊安定后,徐家汇有教友七百五十二名。

汇四周约三十户人家的房屋及财产全部被毁；薛孔昭神父的本堂区，包括蔡家湾、横塘在内，就有一百十八户人家被烧掉。”<sup>①</sup>翌年，南志恒修士叙述青浦、嘉定县所遭受的破坏时说：“清兵好象在同叛军竞争，到底谁更凶残。打仗如果只采取远攻方式，是绝不会伤害到对方的；但他们每到一地便洗劫一空，无耻地、毫不留情地对待可怜的民众；叛军一来，他们立即逃散，再到别处去抢劫、捣乱。还有许多地方，往往是长毛先来破坏，而接着由清兵来继续破坏；你们随时可以看到，清兵拆房毁屋，再把拆下的建筑材料卖给原来的主人。”<sup>②</sup>

教友们被骚扰得恐怖万状，甚至哀求神父们不要再去走访。因为盗贼一见有外国人来访，总认为是带来了救济金，因此常常发生拦路抢劫事。<sup>③</sup>

可是，一些善良的教友们迫切地想领受圣事，甚至不畏艰险，远行十里路，专程来上海找寻他们的传教士。1861年的复活节，有二十七条渔船结队来上海。叛军袭击了船队，杀害了十来名乘客，抢走了十九条船只，其他船只也被洗劫一空；当这些逃亡者来到董家渡时，已是一无所有了。<sup>④</sup>

这时，人们常常谈及松江府的教友们勇敢抗拒太平军的情况。前面我已经谈到，诸巷镇上原有许多富裕教友家庭拥有出海的大沙船，这些海船是去北方海口及辽东半岛运货经商的。<sup>⑤</sup>

---

① 见《通讯》，第4卷第44页起。

② 南志恒1862年5月17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36页。

③ 梅德尔1861年4月4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34页。

④ 同上。

⑤ 见本书，第1卷第357页。

1860年8月，叛军被英法联军赶出上海后，便向苏州方向进军。其中有一团太平军，坐着抢来的许多小船，企图袭击并抢劫这个巨大的教友镇。当时，有七艘海船正集合在新落成的圣堂前的河港中，船上拥有两、三百名教友，这些人都有同海盗作战的经验，他们彼此议定，坚决进行自卫。当第一批太平军船只出现时，立即遭到了海船的炮轰。一连三天，长毛强渡不成，终于失败后退。当教友们顽强地进行自卫时，妇女、儿童们都聚集在圣堂内，高声诵念玫瑰经及拜苦路；上千名教外人也赶来教友村避难。第四天早上，太平军感到已无办法通过这些沙船的封锁线，于是就派了代表前来协商，提出只求让路通行而决不停留。提议得到了同意，教友们并指出如来船试行靠岸，那么即将被击沉。就这样，太平军的船队在七艘教友大沙船的严阵监视、并准备随时开火的情况下，鱼贯而过，既无敌对行动，也无辱骂之声；不久，这些侵略者便向苏州方向消失了。由梅德尔神父派来指挥防御的十二名马尼拉兵到达诸巷时，太平军的船只已经过去了，他们向胜利者表示祝贺。<sup>①</sup>

可是，诸巷的这些教友们认为，再冒第二次危险是太不明智了。于是决定移往董家渡，作为他们常驻的码头。从1860年年底开始，他们的沙船就泊在黄浦江，他们的家庭就安顿在主教大堂的周围。<sup>②</sup>这些为富且仁、宗徒精神又深厚的教友家庭使这座圣方济各大堂成为今日教区中的模范。

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中，要在松江府附近开展传教工作

---

① 见高龙肇：《江南传教史》，第826页。

② 见《耶稣会会士录》，第80页。

必定是困难重重的。1860年7月,青浦传教士马义谷神父的被劫持就是证明。太平军侵入青浦县时,马神父正在离县城很近的泰来桥。一天傍晚,一群盗匪冲进他的房间,把他和他的传教先生一起逮捕了去。在殴打中,神父的颈项及手臂受到好几处刀伤,幸刀锋并不锐利,尚无大碍;此后,盗匪把他拖到县里向首领报功。路上,一个暴徒提议,要用大刀把神父开膛剖腹,看看这个洋鬼子魔术师的肚内是否藏有珍宝;其他人认为,神父年老体弱,拖去也无用处,于是,就把他半路抛下了。几名教友出于仁爱之心,用一顶轿子把神父抬到了徐家汇。<sup>①</sup>

数月之后,浦南的传教士卜理奥神父在叙述他的传教工作时说:“我还能下会开四规,在圣母月内,也能巡访各会口,但常常要冒很大的危险,尤其担心遇到那些靠抢劫为生的官兵们。一次,我在我存放文稿纸张的帐箱里,发现一件火棉之类的东西,这是官兵给我放进去的礼品。他们借口说因我是个法国人,所以是朋友,面子上说是来和我交谈,事实上想陷害我;幸亏潮气已使火棉失效,只有一小缕轻烟。有两次,我的小船被这些兵老爷拦住,并被抢了去,同时,他们还用大刀与短剑恐吓我。但感谢天主,他们没有伤及我一根毫毛。由于我的神父船太露眼,常常要遭受那些密布在浦南各小河里的官兵们的搜抄及抢劫,我就改乘一只小小的木船,人们称之为鱼鹰小船(俗称摸鱼公公船),因为我们的渔民中有许多是养鱼鹰(鸬鹚的一种)捕鱼的。这种木船小得可以把它背在肩

---

<sup>①</sup> 见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149页;鲍恒理1860年7月29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84页。

上。船上，只能容纳一个渔民两只鸟，如再要加上些重量，就很困难的了。因此我坐在这种小船上不敢呼吸、不敢挪动、连头也不敢转一转，唯恐翻了船。我完全信任渔民巧妙的撑篙技术，更仗赖天主的保护。小船在经过兵站哨卡时，渔民用篙一撑，我的小船便象飞箭一般地过去了；假如他们离船很近要注视我时，我就想法掩面而过；再说在我这只穷小船里，也没有什么可引起他们注意的。我就用这种办法到处跑，没有遇到新的不幸事故。”仅在这一年，卜神父曾付洗了一百二十名成年人，收养并付洗了教外儿童一千六百十一人，听神工九千九百六十四人次。<sup>①</sup>

1863年，当太平军从松江附近撤退后，鄂尔璧会长实现了南格禄神父的遗愿，<sup>②</sup>设法在佘山买进了一块地皮，不久便成为江南教区的一个教友生活的中心。原来离上海九十里地，在松江青浦的广阔平原里，有几座小山孤零零地屹立着，其中一座名佘山。南格禄打算在那里办一个教区休养所，那时还未想到其他事项。于是，鄂尔璧就在山的南坡买了一大块山地，在山腰造了一所房子。柏立德神父记述道：“此屋专为劳累疲乏的传教士作休养之所，使患病神父能在这里疗养、恢复体力。这里空气新鲜，比上海徐家汇更适合于疗养。”<sup>③</sup>

佘山四周曾遭受战争的破坏，但那时，被破坏的房屋已在修建，农民们又在田野里辛勤耕作。佘山小村子原来一名教友也没有，但一两公里外的张朴桥却是一个兴旺发达的会口。

---

① 卜理奥1861年7月1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55页。这时期，长毛尚未侵入浦南。

② 见本书，第1卷第113页。

③ 柏立德1863年9月25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94页。

本书已不止一次提到，佘山的寺庙、尼庵和各地一样，均遭到太平军的毁坏。佘山破庙里只有一个和尚留在他的小屋内，供了一尊佛像，也只是一尊小小的菩萨像，接受乡民们的膜拜。这是佘山四周仅有的一个拜佛之处。最初被派来佘山的神父们心中常悲哀地想道：“希望当地的菩萨老爷，不久会失去他的信徒，而我们的主耶稣将逐步获得他应有的权利。”<sup>①</sup>

卫德宣神父由于身体极度虚弱，不能进行传教工作，就被派去佘山，负责布置神父住院。他以诺曼底人的纯朴和善于交际，不久就赢得附近教外人的友情。因为这些教外人中有许多人在动乱期间曾逃来上海，亲眼看到神父们领导的慈善事业和天主堂内优美隆重的教会礼仪，所以他们对新来的神父极有好感。他们公开表示，希望在佘山山顶上也能建造起一座如同他们在上海看到的那样壮丽的天主教教堂。柏立德神父写道：“一天，有人询问会长神父，是否不久的将来佘山也会造起一座圣堂？神父回答说：‘既然你们都是教外人，叫我怎样造圣堂呢？假如你们愿意进教的话，我可保证给你们造一座。’张朴桥教友很喜欢到佘山神父住院的小堂里来望弥撒，当然常有许多教外人站在窗口或拥在门口，围观注视这种他们从未见过的莫名其妙的宗教礼仪。在整个江南教区内，这个天主特别祝福的圣地，就这样开始铺路了。”<sup>②</sup>

不久，卫德宣神父处来了一位出名而又可爱的邻居——戈登将军。“常胜军”被解散后，戈登将军受李鸿章的委托，负责开办一所军官学校，专门训练陆军、炮兵军官。戈登选了佘

---

① 柏立德 1863 年 9 月 25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95 页。

② 见《通讯》，第 5 卷第 96 页。

山紧邻的一个小山，<sup>①</sup> 山麓的宽阔广场辟为练兵场，营部即设在该山山腰。作为睦邻之谊，戈登将军特来拜访了卫德宣神父。<sup>②</sup> 在戈登整个逗留时期，他和卫神父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的关系。<sup>③</sup>

#### 四、浦 东

我们已经看到，浦东的许多美好堂口直到 1861 年都尚未遭到太平军战争的灾难。可此后却遭受了比其他堂口更深重的灾祸。然而其所以能免于全部毁灭，应当归功于卜罗德将军及其海军的大力干预。在太平军入侵之前，天主教的教育事业可算在浦东的办得最好。在张家楼由小修院让出的几所

① 此山名凤凰山。——译者

② 柏立德神父 1864 年 3 月 17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128 页；康治泰神父 8 月 13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158 页。

③ 松江总铎区负责神父名单（1857—1862 年，这个总铎区的几个本铎区都属于徐家汇总院。从 1862 年起，这些本堂区分成两个总铎区，人事历年有变动。）：

1857—1858 年	鄂尔璧	李	夏显德	马理师	丁恭思	陆我春	卜理奥
	胡国治	马义谷	殷	张	沈玛竇		
1858—1859 年	鄂尔璧	熊	李	夏显德	马理师	丁恭思	陆我春
	胡国治	卜理奥	顾	张	殷	沈玛竇	
1859—1860 年	鄂尔璧	熊	李	马义谷	马理师	陆我春	胡国治
	卜理奥	顾	张	殷	沈玛竇		
1860—1861 年	鄂尔璧	薛孔昭	陆我春	胡国治	马义谷	马理师	
	卜理奥	顾	张	沈玛竇			
1861—1862 年	鄂尔璧	薛孔昭	陆我春	胡国治	艾尔梅	余	顾
	沈玛竇						张
1862—1863 年	鄂尔璧	叶春荣	熊	薛孔昭	陆我春	胡国治	余
	沈玛竇						张
1863—1864 年	陆我春	帅维则	余	罗礼思	熊	沈玛竇	
1864—1865 年	熊	陆我春	宋永普	罗礼思	沈玛竇	卫德宣	利庸乐
	康治泰	南志恒					



空屋内，在1857年，就办起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学校，这年年底已有五、六十名儿童来该校上学，其中还有几名住宿生。<sup>①</sup>

1859年，年文思会长指出，<sup>②</sup>在浦东办了三十一所男校、十四所女校，共有三百五十九名男生，一百三十二名女生，特别值得表扬的是唐墓桥的孤儿院，该孤儿院那年曾收养女孩一百十六名。

1861年和1862年，太平军一来，一切都遭到了破坏。当时兰廷玉神父记述道：“教友们那时日夜提心吊胆，一有情况立刻逃跑转移，然后再偷偷地回来，再逃跑，翌日再回来。”<sup>③</sup>

所以，在这期间，神父们除了向避难来上海的浦东教友进行传教工作外，其他传教工作开展得极少。有人惨痛地记述道：“我们许多美丽的圣堂几乎全部遭到中国汪达尔<sup>④</sup>人的疯狂破坏。二十年来，神父们在江南含辛茹苦经营的珍奇果实，只有三个月的工夫就全部被毁灭了。”<sup>⑤</sup>

唐墓桥的女孤儿院自然应当撤走，这些小居民就迁到了上海。年文思主教在董家渡附近为她们找了一所房屋作避难所。在那里，她们同蔡家湾逃来的男孤儿几乎遭受同样的苦难。<sup>⑥</sup>

时局稍定，女孤儿们即搬到张家楼，住进原来的小修道

---

① 梅德尔1857年9月8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60页。

② 年文思1859年3月2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3页。

③ 兰廷玉1861年10月24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26页起。

④ “汪达尔”系十八世纪初日耳曼少数民族，以摧毁罗马帝国为目的，捣毁了许多文物、艺术珍品。这里指破坏文物、破坏艺术的人。——译者

⑤ 南志恒1862年5月17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94页起。

⑥ 禄理格1864年9月15日致圣婴善会总会的信，见《通讯》，第5卷第159页。

院。以前容纳四十名修士面积尚感不足的屋子，如今却要容纳三百八十八个女孩子。当地的本堂神父禄理格在一封既悲哀又生动的信中，在住房的安排方面写得极为详细。由于地方太挤，不论卫生条件、清洁工作、劳动纪律，就是连神业工夫等等都受到了限制。为了修复太平军造成的破坏，足足需要数个月的努力。<sup>①</sup>

1864年，这批女孤儿们迁到了邻近徐家汇的王家堂小村。她们就定居在那里，直到徐家汇圣母院成立。<sup>②</sup>

和平恢复后，浦东教友重返家园，但许多人的家已成了一片废墟。几个考虑周密的教友就留在上海，参加了洋人的工商企业；不久，上海城对岸的大市镇又迅速恢复了繁荣景象。<sup>③</sup>

---

① 见本卷第83页。耶稣会总会长1864年4月5日对本修会各教区的报告，见《神学院》，1864年10月，第33页。

② 浦东总铎区负责神父名单：

1857—1858年 禄理格 吴 谷振声 费都尔 顾安德(明安)

1858—1859年 禄理格 吴 谷振声 罗礼思 顾安德

1859—1860年 禄理格 吴 谷振声 罗礼思 费都尔 顾安德

1860—1861年 禄理格 吴 谷振声 费都尔 姚继白

1861—1862年 马义谷 吴 谷振声 费都尔 罗礼思 姚继白

1862—1863年 禄理格 伊宗尹 顾安德 谷振声 姚继白 罗礼思

1863—1864年 薛孔昭 伏日章 谷振声 禄理格 金式玉 顾安德

1864—1865年 谷振声 杜若兰 薛孔昭 伊宗尹 伏日章 顾安德

1862—1863年以前，张家楼属董家渡。从1862—1863年起，张家楼同川沙组成一个总铎区。唐墓桥同南汇组成另一个总铎区。

③ 见本卷第83页。

## 五、教区西部

### 葛必达和桑理爵神父在太平军占领区

我们已经看到，在太平军战争时期，教区西部是受到最残酷抢掠的主要场所，它遭受的考验也最为严峻。再加上它距离上海比较远，洋人也无法支援，因此有五年之久，它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1857年，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葛必达神父被派往苏州负责教务。这座大城内的教友会口，一向由几户富裕的教友人家把持着。从耶稣会被取缔后，只有中国神父到这个会口里来过。教友们敌视外国人，尤其仇视耶稣会会士的心理还没有完全改变。

我曾提到，在罗伯济主教时期，曾经起着重要作用的沈西满神父死后，代理主教年文思为了消除教友们的这种敌对情绪，任命葛必达神父去负责这个艰巨的岗位。开始时，葛神父感到痛苦难受，几家主要教友对他闭门不纳，也拒绝向他领受圣事。当时，苏州城里除私宅小堂外，别无其他举行宗教礼仪之处，因此使这位法籍神父毫无办法。幸亏城内有诸、庄两家教友拒绝抗拒神父，为葛神父提供了栖身之所。葛必达神父为了争取这些抗拒者，费尽了心机，但争取工作却进展甚微。1860年，这座江苏省省城被太平军侵入后，经受了种种考验与灾难。<sup>①</sup>

---

<sup>①</sup> 薛孔昭：《葛必达神父传》，第26页起。

不久,教友们的心理完全改变了。当省城陷落时,葛神父正在邻近一所小会口里。是他接待了遭难教友;①是他指领他们迁居上海;是他,为他们解决了生活必需品,并利用他同英法当局的关系,使许多家庭重创家业。他的慈爱赢得了对他一直紧闭着的心,从此他成为人人信任的老师,人人爱戴的慈父。我这里转录教区里有名的汉学家黄伯禄神父的几句动人的证词,黄神父是在葛神父逝世数年后,接替葛神父在苏州的教务工作的。他说:“这位葛神父在这里开始传教时,由于苏州城内几家教友的排外思想,曾遇到过许多困难。但太平军叛乱时,他以极大的仁爱与忠诚为教友们服务,把他们重新引上了公教精神。他是那样地深得人心,以至在他死后,众教友家家户户悲痛万分。在他周年忌日,许多人还为他的亡灵献弥撒、求安息。”②

由葛神父悉心培训的苏州总铎区的传教先生及贞女们,是令人值得注意的传教得力助手。③在我们叙述的这些艰难的岁月里,许多贞女表现得非常勇敢。葛神父特别叙述了江阴的一位勇敢、高贵的钱加大利纳贞女的事迹。④

1860年2月,钱贞女曾给几百名望教者培训讲道,使她们能领洗入教。她公开辩道,制胜了一些怀有恶意的教外人。这些教外人为了报复,就去勾结一个强盗头子,一个鱼肉人民的恶霸。⑤他把正在进行传教工作的贞女和好几名教友抓了

---

① 葛必达1861年9月8日和16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00、113页起。

② 《论苏州城内天主堂》,《徐档》,卷宗G1、G6;《苏州总铎区档案》;薛孔昭:《葛必达神父传》,第27页。

③ 见本书,第1卷第141页。

④ 葛必达1861年9月1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09页起。

⑤ 此人名蔡秀金,见高龙鏊:《江南传教史》,第803页。——译者

去。钱加大利纳的腿上已被火枪和大刀刀背砍伤了多处，他们终于把她拖到一座寺庙里，强迫她向菩萨赔礼，因为她经常讥讽菩萨。可是她不断反复念：“耶稣玛利亚救我。”人们把针尖刺她的嘴唇，并打她的耳光；而钱加大利纳却对刽子手说：“你们能杀害我，但休想阻止我念这经文。”指挥迫害钱加大利纳的强盗头子一时兽性发作，认为她的威武不屈是得力于她的贞操，于是想奸污她。一名同这强盗头子公开有非法关系的坏女人，因贞女拒绝接收她为望教者，便唆使她的奸夫杀害贞女，挖开她的心脏，找出其坚贞不拔的根由。有人则主张把贞女及其他两个同伴的教友一起投入扬子江淹死。这个残忍的决定遭到了教外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她救了出来，把这位打得半死的贞女扶到了邻近的一个公所里。教友们看到钱加大利纳已是奄奄一息，再没有几天好活，只等待来给她收尸了。然而第二天，出乎意料，他们竟发现贞女已经痊愈，伤口也全部愈合。钱加大利纳又重新开始她的传教工作。天主曾不止一次地使她的伤口出奇地痊愈，还常常为她驱除邪魔，以此来酬报她的救灵神火。<sup>①</sup>

天主很快地对迫害者进行了报复。四个月之后，太平军入侵该地区时，迫害钱加大利纳的凶手集合了喽啰，拟利用时机进行几次袭击，最先袭击的目标便是教友们的公所和小堂。人们无法确知强盗之间火拼的经过，只知道喽啰们后来起来造了他们头目的反，把他枪击在地，用大刀长枪把他结果了。<sup>②</sup>

葛神父还给我们留下另一位贞女的形象，即丹阳的陈玛

---

① 梅德尔 1860 年 4 月信，见《神学院》，1860 年 7 月，第 29 页。

② 葛必达 1861 年 9 月 15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112 页起。

利亚，她也是一位热心的、能干的教理宣讲员。城市遭洗劫时，一个太平军冲进她同她老母亲居住的一座小堂内，他强求贞女答允满足他的兽欲。贞女严辞斥责他的无耻，并声明宁死不愿受辱。这个暴徒便冲向贞女，用大刀向她乱砍，直看到她在老母怀中断了气。就这样，陈玛利亚口中不断念着耶稣玛利亚圣名而死去。<sup>①</sup>

尽管有叛军骚扰，但是葛必达、桑理爵两位神父仍冒着生命危险去巡访。他们不忍心让自己的教友毫无援助地留守家园。每年他俩总有好几个星期在进行传教，而且又常来上海照顾避难的教友。他们的书信使我们了解到他们常常遇到危险，因为他俩是法国人，而法国人就是叛军的敌人；信中也看出了他俩又是如何镇静、勇毅与乐观。<sup>②</sup> 1860年，桑理爵神父从苏州到无锡，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巡访了他的本堂区。他按叛乱者的样式，乔装长毛，蓄留长发，他的传教先生和船夫也照样留起了长发，这样，他不仅侥幸地探访并鼓励了数百名教友，还给四十名左右的望教者付了洗。回来时，他们再剪去了头发，以防附近官员错把他们当真长毛来对待。<sup>③</sup>

1861年葛、桑两位神父又启程作他们的新的巡访。葛神父收集到北方会口的情况，那里已有两、三年没有神父去巡访了。五河城在一次地方动乱中被烧毁了，圣堂被拆毁，教友四

---

① 葛必达 1861 年 9 月 13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105 页。

② 相反，耶稣教牧师们作为太平军的友好人士却能自由通行。闻名的罗孝全牧师在南京住过几个月，曾请神父们去同他联系，神父们不相信他会成功，因此没有去。他的可悲的下场（见本卷第 47 页）证明了神父们的预见是正确的。葛必达 1861 年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103 页。

③ 施宣三 1861 年 1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7 页。

散；淮安、扬州还处于原来状态，太平军还不能全部控制江北地区。无锡渔民因为在水上过流动生活，能逃避叛军的袭击，因此他们热情地招待了传教士。当时，望教者还不少，“尽管我们多么疲劳，可是看到新教友、老教友的心灵纳上了正轨，又有许多人领了洗，许多教外儿童写上了领洗录，许多新望教者上了保守名册，我们感到十分高兴”。<sup>①</sup>桑神父在这次巡访中，就给五十名望教者付了洗，来听道学习教理的竟达二千人。<sup>②</sup>

神父对巡访堂口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他向我们叙述了从这个堂口到那个堂口的旅行经过，坐在小船上在大小河浜通行遇到官兵及长毛战船时的恐怖情形，也使我们看到了教友们的信德以及望教者们的良好情况而感到心安神慰。<sup>③</sup>

1862年2月，桑理爵又去常熟附近帮助葛必达，葛神父自去年的9月起，就单独留在那里。几个星期之前，那里遭到了长毛的洗劫，葛神父仅以身免。<sup>④</sup>桑理爵在他去察访江阴的一座离城约五十里的公所时，被长毛扣留了。“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来宣传耶稣基督的宗教的。”“不谈这些，你们外国人在上海无情地杀害了我们的许多弟兄，你跟我们同去城里。”当抢劫者正搜抄洗劫公所的一点少得可怜的财物，并互相争夺分赃时，神父在屋内兜转，如踱方步，可他内心却在祈求天主托庇于童贞圣母和大圣若瑟，他走到门口，便乘

---

① 葛必达1861年8月、9月的信，见《通讯》，第4卷第101、104、108页。

② 梅德尔1861年10月5日、22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21、124页。

③ 葛必达1862年7月15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66页起。

④ 葛必达1862年1月16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64页。

人不备而潜逃。他逃到长江边，幸亏在江边找到了一只小船，因此保全了性命。<sup>①</sup>桑神父的此行目的没有达到，葛神父仍单独留下，一直工作到回上海，后来，他因操劳过度而寿终正寝。<sup>②</sup>

1863年，桑理爵照样勇气十足地重新登上传教路程，一位最近升为司铎的中国青年神父张若翰（星伯）和他作伴同行。他俩溯长江西上直至镇江，同沿大运河的扬州、淮安的教友取得了联系。桑神父原想直趋五河，但作为一个外国人，那简直是发疯。所以最后由张神父单独前往，终于使放弃了五年之久的教区最前哨的教友们得到了种种援助。<sup>③</sup>

戈登部队收复了苏州附近以后，桑神父立刻设法回到他原来的会口，准备使教友们重归家园。他紧跟“常胜军”收复昆山之后，便去见戈登，要求收回城内原有的公所。戈登深识并赞赏天主教传教士的事业，热情地接待了桑神父，叫人把教区原有产业全部归还，并发给桑神父一张特别通行证，使他顺利地回到常熟。<sup>④</sup>

然而，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要人，即拥有大权的江苏抚台李鸿章。在他长期任职期间，对天主教采取了阴险的敌对态度。李鸿章看到清兵无力遏止太平军的叛乱，官员们又向洋兵求援，感到十分气愤。一俟他自信已占优势，不再需要洋人时，就想尽一切办法，在上海四周牵制、阻碍英法联军的行

---

① 葛必达 1862 年 1 月 16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164 页。

② 见本卷第 101 页。

③ 鄂尔璧 1863 年 10 月 18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98 页。

④ 柏立德 1863 年 9 月 25 日信，见《通讯》，第 6 卷第 98 页。



动，<sup>①</sup>常常为“常胜军”的美国军官及英法军官制造麻烦。苏州收复后，他便把“常胜军”解散了。<sup>②</sup>

他坚持他的计划，即用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手段，把外国人逐出帝国内地，退到允许洋人存在的几个通商口岸。天主教教会成了他的这种政策的牺牲者达三十年之久。这种政策大大地损害了中国：一味因循守旧，不图革新，对内腐败不振，对外软弱无能。

桑神父第一个冒犯了这位大权在握的抚台。李鸿章一知道戈登将军曾给了他特别通行证，立刻下令，禁止一切外国神父逗留内地。桑神父偏不遵命，就被扣押、受虐待，竟有人想把他处死，只因怕法国出面交涉，才令人把他释放。于是，桑神父就回到了上海。<sup>③</sup>

法国领事对这样明显地违反天津条约的作法，提出了强硬的抗议。由于当前处境困难，中国官员们被迫作了道歉，但在背后，他们仍阴险地继续阻止神父们回到原来的教堂。<sup>④</sup>

桑神父不是一个一遭困厄就被吓倒的人。1864年1月，他和两名教友又同去苏州。正当他设法调查教区的教产情况时，又被衙役们押到衙门去。衙役们强迫他下跪，杖以大板。那个官员一见神父的护照，大吃一惊，立即停止用刑，并把神父释放了，只命令他马上离开苏州城。<sup>⑤</sup>因此，要重新收回那些因太平军战事而被迫放弃的许多传教岗位，还该等待多少

---

① 梅德尔 1863 年 7 月 18 日信，见《通讯》，第 4 卷第 273 页。

② 柏立德 1863 年 9 月 25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89—90 页。

③ 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 895 页。

④ 同上。

⑤ 鄂尔璧 1864 年 1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118 页。

年啊!①

## 六、崇明与海门

### 一起反年文思主教的骚扰事件 传教事业

这个总铎区由于地方贫瘠,又远离大城市,所以没有遭到太平军的覬覦和入侵。自1857年至1865年,神父们几乎都能正常地进行传教工作。

但当清政府同欧洲人发生纠纷,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开始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时,地方上谣言四起,有人说皇上又重新下令禁止天主教了。梅德尔神父对这个总铎区怀有特殊的感情,因崇明、海门原是他最初的传教活动场所。②他打算偕同复任为上海领事的敏体尼先生,同去拜访海门的官员,从他们那里获得一张保护天主教的告示。我们杰出的领事,他随时准备为教区效劳,便欣然接受了梅神父的建议。这次探访是在1858年10月,梅神父给我们记下了这次探访的详情。三名上海青年自愿伴随领事同往。通州的地方官正好是梅神父

---

① 苏州总铎区负责神父名单:

1857—1858年	葛必达	费都尔	桑理爵	陶飞罗
1858—1859年	葛必达	费都尔	桑理爵	陶飞罗
1859—1860年	葛必达	夏显德	丁恭思	陶飞罗 桑理爵
1860—1861年	葛必达	桑理爵	丁恭思	
1861—1862年	葛必达	桑理爵		
1862—1863年	桑理爵			
1863—1864年	桑理爵			
1864—1865年	桑理爵	张若翰		

② 见本书,第1卷第179页。

的旧相识，他亲自到领事坐的大沙船上，先拜访了敏体尼先生，两万多个群众奔来围观。领事也隆重地到州衙门回访了这位地方官。数不清的群众怀着好奇和尊敬的心情围观着。地方官在讲话中对法国表示友好，对天主教表示尊重，并表示愿出告示保护教堂。他说到做到，出了一张很起作用的告示。海门的地方长官是常驻茅家镇的，他也极隆重地接待了我们的领事，并满足领事的要求，张贴了保教的告示。归途中，敏体尼先生在崇明停船靠岸，又受到了崇明地方官的热情接待。

两年之后，当英法联军远征北京时，教难谣言又开始流传了。1860年7月，雷邇骏神父离海门来上海歇夏时，他的住院竟被抢掠一空。<sup>①</sup>侮辱、伤害，甚至杀害教友以及烧屋之事层出不穷，而地方官只听之任之。人人担心多年来发展良好的开教运动会被迫中途夭折。<sup>②</sup>

但是，年文思主教认为，不该放弃巡访这总铎区施行坚振的计划。1861年12月7日，他到达六埭镇<sup>③</sup>会口，准备翌日祝圣新堂。按惯例常有一大批外教人来围观宗教礼仪。8日早上，虽然主教预感到将有事情发生，而伴主教的雷邇骏和卫德宣两位神父仍要求主教举行大礼弥撒，接着再举行圣体降福。宗教礼仪刚结束，一群被地方绅士用两百块银元（合一千法郎）收买了的无赖即涌来骚扰。他们冲进围墙，并拟强行进入圣堂。年文思主教出堂想缓和一下，却遭到砖石的掷击，额部受了伤。主教屹立不动，“深信此时此地如退让或逃跑，都

① 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813页。

② 年文思1861年12月8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39页。

③ 原文 Lo Pe zen，与海门的六埭镇发音有些近似，但姑且存疑。——译者

是有损于牧者的称号，牧者在羊群遭到危险时，原该为羊群舍命的”。

神父们强把主教拉开，摆脱了暴徒。主教神父们离去后，圣堂和住屋遭到洗劫和烧毁；三个小孤女惨遭杀害，一位主教的传教先生被打伤。年主教立即回上海，告诉了法国领事，并要求赔偿损失。<sup>①</sup>

谁都知道作案和幕后煽动者是哪些人。当时爱棠先生正当署理领事，他立即向避难在上海的江苏抚台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抚台派了一名专差到海门，负责处理这一事端，而案犯们却贿赂了地方官，因此，案情就长期拖延不决。年文思主教急着要去海门，领事乃派上海的两名法国警察伴随同行。雷通骏神父说服主教在崇明逗留，他自己先去铺平道路。他拜访了海门长官，但得到的只是些空头诺言。于是梅德尔会长乃向法国海军求援。海军上尉德瓦拉姆自愿伴随梅神父同去海门。茅家镇的大小官员吓坏了，立刻前去拜访了梅会长和法国军官，尽力劝阻他们上岸。德瓦拉姆提出地方官必须隆重地接待他们。于是，德瓦拉姆制服盛装，由法国国旗前导，在自己的部队护送下直达衙门。中国官员还想拖延时间，可是梅神父揭穿了他们的花招，法国军官又对他们进行威胁，地方官不得不照办执行。最后作出了决定：规定在月底前交给神父一笔可靠的赔款；一名地方官必须降级；明确承认教友们应有的权利；彻底清算仇教者的罪行（1862年1月5日）<sup>②</sup>；以上决定立下文书，由在场官员签名画押。一切诺言几乎全

<sup>①</sup> 年文思1861年12月8日、1862年1月16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142、165页。

<sup>②</sup> 叶春荣1862年1—3月信，见《通讯》，第4卷第168页起。

部履行了。

1863年7月，又出现了紧急情况；通州附近的许多吃素教徒同控制长江对岸江阴的太平军商定，准备偷渡长江，与北方部队会合，这样海门总铎区就又要遭受上海附近地区同样的灾祸了。幸而这个阴谋被一名地方官揭破，吃素人受到了残酷的惩罚。海门总铎区的各会口幸免于难，因为抢劫烧杀总是从教友会口开始的。<sup>①</sup>

尽管常有危急情况出现，但自1857年至1865年，崇明与海门仍享有相对的安定。天主教传教工作，特别是圣婴善会的育婴事业，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1863年底，鄂尔璧会长巡访该总铎区后，曾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真使我深感欣慰。这里的人民多么好啊！天主教在这里享有崇高的荣誉，即使在教外人中也是同样。救灵成果是多么的丰盛，因此，我们对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信心；望教者大批涌来，尤其在崇明，圣婴善会育婴事业总是这些会口的光荣，而且经常是传教士们最现实、最大的安慰。”<sup>②</sup>

传教士对这些成绩并不存幻想。他们观察到，吸引许多望教者来堂的纯粹出于利害关系，所以对新来的保守教友必须认真地加以查考。当时，崇明本堂卜理奥神父在一封书信中就记载了负责有大量望教者会口的本堂神父们发表的感想。<sup>③</sup>

“噢！对于只追求金钱和活命的中国人来说，圣教会的相信天主、仰望天主、热爱天主的中心思想，是多么不可理解啊！”

---

① 柏立德1863年9月25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87页起。

② 鄂尔璧1863年10月18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99页；又鄂神父1864年1月15日有关崇明的信，见《通讯》，第5卷第118页。

③ 卜理奥1864年6月16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147页。

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教外人，怀着最可笑、最不相称的动机拥来我处：有的看到我们行慈善事业，因而要求进教；有的是为了可以不劳动而有穿、有住、有吃，或认为至少可以分享一些哀矜而要求进教；有的人犯了法，也要求进教，为的是希望在打官司时，得到救援与解脱。事实上也如此，尽管时局不靖，人们也不敢和教友打官司，因为只要神父一句话，往往就能解脱无辜的被告者。如发生家庭纠纷、析产分家、买卖不公等这些烦琐小事，那些崇明人就会被人带到我们堂里来，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传教士在办事人的协助下，处理教友之间的琐屑纠纷时十分公平而且分文不取；可是碰到由教外人调解，那些区区小事会滚成大雪球，往往两败俱伤……可怜的教外人，只知道沉浸于事务堆中，把人生唯一的救灵大事视作无关紧要的小事。”<sup>①</sup>

## 七、小结 太平军之战后期的江南教区

耶稣会江南教区《耶稣会会士录》<sup>②</sup>以及教区《教务记

① 年文思主教时期崇明总铎区负责神父名单：

	崇 明			海 门	
1857—1858 年	平乃公	卫德宣	赵神父	雷适骏	兰廷玉
1858—1859 年	平乃公	赵神父		雷适骏	卫德宣
1859—1860 年	平乃公	艾尔梅		雷适骏	卫德宣
1860—1861 年	平乃公			雷适骏	卫德宣
1861—1862 年	卜理奥	石可桢	赵神父	雷适骏	卫德宣
1862—1863 年	卜理奥	安于仁	赵神父	雷适骏	
1863—1864 年	卜理奥	赵神父	顾神父	雷适骏	
1864—1865 年	卜理奥	步天衢		雷适骏	帅维则

② 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附录4第104页；又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914页，引证教区教务工作报告。

录》，使我们对刚熬过恐怖、艰险年代的教区有了一个总的概念。1856年至1857年，教区内有三十五名外籍神父和六名中国神父；1864年至1865年，有四十二名外籍神父和十二名中国神父。教友的数字则略有减少：从1856年至1857年的七万四千二百八十六名、1860年至1861年的七万七千四百十八名，下降到1864年至1865年的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名。其所以减少，是许多教友惨遭杀害，以及饥荒、瘟疫等等原因……尽管传教士想尽方法努力救济，但还是失去了数千名教友。但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事实上，成年人的领洗却从来没有这么多，每年总有二千至三千名，这个数字是以往从未有过的。

教外儿童的领洗，也有可喜的进展。最恐怖的1861年至1862年，也是垂死儿童领洗最多的一年，计有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七名。和平恢复后，总数就较少了。1863年至1864年及1864年至1865年两年的总数是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三和一万零五百五十四名。

教区遭受的灾难越深重，圣婴善会的捐助就越多。<sup>①</sup>它每年供给教区的钱足以供养四千至六千名教外人家的已领洗儿童。江南教区传教事业的巨大发展还得从这个时期算起。每年的四规神工、四规圣体与平日恩工、恩体的数字，几乎稳定不变；到上海避难的教友比较勤领圣事，而在太平军霸占的会口里的教友，则很长时期没有神父去巡访了。自教区成立以来，圣事帐上最可观的数字记录是在大难来临前的1859年至1860年；那时，常年四规神工为五万七千零九十七人次，恩

---

<sup>①</sup> 见本卷第77页。

工为七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人次，四规圣体为四万五千四百八十二人次，恩体为六万九千二百人次。

学校是年文思主教特别关心的一项事业。在他治理教区的初期，我们的教会学校大大地发展了。1855年至1856年以及1859年至1860年，学校的数字几乎增加了一倍，即从一百五十八所男校增加到二百八十二所，女校由五十五所增加到八十九所。男生由一千六百三十六人增加到二千九百二十四人；女生由七百四十八人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六人。

许多教外学生，尤其是男生，开始到我们的学校来上学了；1859年至1860年，男生有一千零二十二名，女生一百零九人。1860年至1864年的动乱期间，则没有记录，其理由不言而喻。1864年至1865年，和平恢复后，各地学校重新开办了，但要恢复到太平军入侵前的原状，那还需要好多年哩。

教区的物质损失无法估计。1860年至1864年的损失更不用说了。巴黎省会长戴元英神父在给法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损失至少值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两银子（合六十万六千二百十法郎）。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在中国政府的赔款中，一部分划归天主堂作传教之用，尤其上海教区从最值钱的地产上的收入，比较迅速地弥补了一部分损失。<sup>①</sup>

面对叛乱战争引起的灾难，对江南教区来说，也有坏事变成好事的一面。

太平军所到之处，庙宇、寺院均遭破坏，寺庙珍宝抢劫一空，佛教、道教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僧侣们也无影无踪了。在许多地区，这反而为天主教的宣传福音扫清了障碍。

<sup>①</sup> 见本卷第70页。



尽管李鸿章和许多高级官员对信教列强忘恩负义，而上海的大商业家并没有忘掉因靠了英法联军的保护才保全了性命并免于破产，使他们的商业得到出乎意料的发展。因此，上层阶级和几个思想开朗的官员对“欧洲人”的思想与文化都表示尊敬。上海有几家教外大家庭目光更远，对教区的慈善事业更诚心，极愿效劳。

1862年，应直隶东南教区代牧郎怀仁主教的要求，法国驻北京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和恭亲王谈判后，获得皇帝颁发上谕，正式废除先前的一切禁止天主教的措施。该上谕在4月15日宣布张贴，这是从康熙以来获得的最好的诏谕。<sup>①</sup>

上谕重新提到了这位大皇帝对天主教的恩准；废除自康熙以来各位皇帝所有一切禁教的规定；并命令，以后如修改条例，不再增刊此等禁止明文，并将旧例所载全行删去，木刻版本全部销毁。两位法国海军军官，舰长布尔热瓦和海军上尉特雷夫那时正在北京公使馆，都参加了这次富有成效的谈判。在特雷夫先生的报告中，他认为这次总理衙门各官员之所以重视我们，是因为卜罗德将军此时正在大力支持着上海的官员；法国的大公无私和英国的唯利是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sup>②</sup>

当时，总理衙门的官员还表扬了上海的神父们举办有组织的慈善事业。<sup>③</sup>

---

① 郎怀仁1862年4月26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4卷第215页；上谕由公使馆秘书兼译员丰大业先生译成，并附原文，见《通讯》，第4卷第218页起。特雷夫写了一篇很有趣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里叙述了三十五天谈判时的种种波折，他曾寄来多份石印的原稿，至今还保存在我们的档案里。见《法信》2570。

② 《在北京的一次外交使命的报道》，第20、35、62页。

③ 同上，第23、38页。

内战期间，江南教友受尽痛苦；痛苦中，他们唯一的真正有效的援助却来自法国：是法国外交官在北京为教友们争得了信仰自由权；是法国的海陆军军官在上海给人们树立了虔诚奉教和基督仁爱的好榜样；是法国的突击队和步兵们的慷慨大方、爽直和气、平易近人给上海人民留下了磨灭不掉的深刻印象；是法国的妇女每年以二十万、三十万法郎的施舍，减轻了灾民们的痛苦，数千名被弃的儿童得到教育，许多被毁坏的堂口得以复兴。从此，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面向澳门而转向法国了。我们已经看到，在太平军战乱之前，尤其那些有财有势的教友人家，曾一度反对过欧洲神父。各会口各公所的业主虽然承认神父们的管理权，但不同意传教士干预会口中的物质事务。<sup>①</sup>

可是由于太平军之战，教区原有的公所会口大部分被毁灭了。地方平静之后，许多公所都靠传教士处分来的施舍得以恢复、得以维持。于是传教士就树立了威望。在战乱期间，大部分有权势的教友人家由于损失惨重，来上海避难，身受外国神父的仁爱照顾。其中好几家因年文思主教、葛必达、梅德、兰廷玉几位神父的介绍，同外国大商行进行了获利甚丰的交易，象买办张保禄那种情况并非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教友对神父们感激不尽。从此，本地教友同为他们而背井离乡的神父团结一致了，这原是应有的现象。

最后，尽管灾难深重，由于忍受、虔诚和热心，江南教友的圣宠与功劳是难以估量的。毫无疑问，这便是郎怀仁主教时期，教区所以得有美好发展的秘诀。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95、138 页。

直到那时,我们看到,传教士的工作只侧重于对老教友的培训和提高他们的宗教道德教养。二十五年来,他们造就了上海四周的七万多名教友的一个热心教友群,每年神工与圣体数字的记录,是无法否认的凭证。由于新主教派遣的传教士逐年增加,今后将是征服教外群众的时代,是发展教育事业与慈善事业,用以保证天主教的尊敬与好影响的时代。总之,艰巨的播种时期已结束,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欢乐的丰收季节。

## 第二部分

郎怀仁主教时期  
(1864年至1878年)



# 第一章

## 教区概况

### 一、1869年的教难

郎主教到上海 戴元英监会铎的巡阅 柏尔德密协定和无形取消的秘密文件 南京、安庆创建住院 金式玉神父西区探险 镇江、扬州、苏州教会的建立 郎主教欧洲之行 召请圣衣院与拯亡会修女来华 郎主教与江苏官员

1864年9月22日，在教宗庇护九世亲自主持的一次主教会议上，宣布直隶东南区的郎怀仁主教调移江南。提升杜巴尔神父顶衔卡纳特主教，实授直隶东南区的宗座代牧。

宗座诏书于1865年2月2日到达直隶。2月19日，郎主教祝圣了他的继任人。2月23日，主教赶往天津，以便及早坐轮船到上海。<sup>①</sup>

那时白河尚未开冻，主教还得等待一个月。他便乘此机会同清政府驻天津的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sup>②</sup>交了朋友。那时，崇厚诚心表示愿同教士们保持联系。<sup>③</sup>几年之后，只能说是由于他的软弱无能，致使发生了1870年令人发指的惨案。<sup>④</sup>

3月22日的早上，这位江南教区的代牧主教到了上海，

他不等人们去迎接，就出现在洋泾浜若瑟堂内，而且还在那里举行了弥撒。消息立刻传遍全城。郎主教调回一事在数月之前早为人所知，<sup>⑤</sup>并得众人欢心。神父与教友对这位曾是徐家汇神父住院院长，赵方济主教的副主教，都留有极好的印象。郎主教在直隶的八年正是江南教区内部失和难堪的八年，他幸亏置身于局外，<sup>⑥</sup>故能抚慰众心，成为众人之父。<sup>⑦</sup>

盛大的欢迎会开始了。主教坐着大轿，在马队护送下从洋泾浜到了董家渡。两座教堂前搭起了得胜彩牌楼，行列所经之处人山人海，群众夹道欢迎。<sup>⑧</sup>

郎主教一生过着修会的纯朴和神贫的生活，但凡是教会礼仪规定所许可的种种庄严隆重仪式，他都爱接受；他常说，教会代表的荣誉，就是圣教会的光荣。<sup>⑨</sup>

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亲自同省里的高级官员交往，使条约付诸实施，使纠纷得到和平解决。他在直隶时，曾拜访教区内的各府府台；他一到上海，首先关心的就是同城里的官员打交道，并且，如属可能，尽早和南京总督沟通关系。<sup>⑩</sup>

---

① 郎怀仁 1865 年 3 月 9 日致苏念澄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195 页。教宗盖有渔人玉玺的诏谕于 1846 年 9 月 9 日到徐家汇，见《徐档》，卷宗 B1。

② 三口指牛庄、天津、登州三个通商口岸。——译者

③ 见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347 页起。

④ 郎怀仁 1865 年 3 月 9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196 页起。

⑤ 贝克斯 1864 年 9 月 17 日的传达报告，见《徐档》，卷宗 F11。

⑥ 见本卷第 68 页。

⑦ 贝克斯 1864 年 9 月 17 日致鄂尔崑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⑧ 董家渡的神父名册（1864—1865 年），见董家渡档案。

⑨ 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 30 页。

⑩ 同上，第 28—29 页；又郎怀仁 1864 年 9 月 10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168 页。

新主教到任几个月后，耶稣会总会采纳了郎主教久已想望的一个措施，<sup>①</sup>即派遣一位监会铎来巡访中国的各个教区；刚卸任的耶稣会巴黎省省会长戴元英神父膺此重任。多年来，他同教区保持着积极的通信关系。他巡访的目的同十年前的伏伯禄神父一样，首先是安慰遭受如此严重考验的传教士们。正如总会长贝克斯神父所写的：“他将使上级得到鼓舞，众人身心愉快……证明欧洲的上级并没有遗弃传教士们，而相反，他们正特别关心着传教士们。”<sup>②</sup>

戴元英神父接到总会长于1865年6月23日耶稣圣心瞻礼那天写的任命信。<sup>③</sup>他先到罗马，向巴尔纳博枢机和总会长贝克斯神父请示。事实上，他和过去伏伯禄神父的使命有所不同；<sup>④</sup>因新监会铎除行使传信部的职权外，同时也必须行使总会长的职权，他既能规定传教士的传教准则，也能规定会士们的神修条例。<sup>⑤</sup>

1865年10月19日，监会铎在马赛登上“老虎”号舰，该舰正运送新任交趾支那总督德拉格朗迪埃尔海军上将及其全家，12月16日舰艇到了上海；戴元英神父趁航行的机会，结识了这些高贵的旅伴，使江南教区后来在这些高贵的朋友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sup>⑥</sup>

---

① “许多原因使我预感到，你将及时来华，不仅是巡阅教区，更是为了组织教区。”（郎主教1863年10月3日致戴元英省会长信。）见潘如汉：《戴元英神父传》，第189页。

② 贝克斯1865年10月2日致鄂尔璧信，见《徐档》，卷宗F11。

③ 见潘如汉：《戴元英神父传》，第192页。

④ 见本书，第1卷第314页。

⑤ 见潘如汉：《戴元英神父传》，第198页。

⑥ 监会铎在华的旅行日记，包括他巡视期间同各位神父来往的信件和有关他巡访的文章，都是很有启发的。这些资料还保存在《法信》2752中。潘如汉写《戴元英神父传》时，可惜没有尽量采用。



巡视察访共进行了五个月(从1865年12月10日至1866年5月18日),其中从3月中旬至4月中旬在直隶东南。戴元英神父抽空访问了全体传教士,并在1月底,亲自领导了有三十多位神父参加的避静神工。他为了要亲自认识上海四周的堂口,参加了郎主教在春节举行的接待中国官员的仪式,视察了学校与孤儿院。最后几个月,他专同上海的神长和有经验的神父们举行了重要会议。<sup>①</sup>不用说,郎主教和戴元英神父必然也进行了频繁的会谈。

巡视察访后,接着就进行几项改革。董家渡和徐家汇神父的西式住院也决定马上动工建造。监会铎特别注意到,二十年来传教士死亡率高得惊人,于是决定,一年两次传教士在上海与徐家汇逗留期间,采取法国式的食谱来调剂体力。为了尊重徐类思主教的意见,1860年曾同徐汇公学分开的小修院<sup>②</sup>现在又重新并了进去;修生和其他学生同时上课,但另外遵循一套修院规章。堂口里在行政管理上有困难的几所小型住宿学校停办取消,避免和徐汇公学发生麻烦。他又决定创立一个类似法国教师修会的传教修士会,会址定在城内老天主堂。1854年,由薛孔昭神父创立在横塘的圣母院献堂会,<sup>③</sup>在太平军战争时期曾一度被毁,<sup>④</sup>1864年,在徐家汇附近的王家堂会口重新恢复。为训练这批中国献堂会修女的神

---

① 这些会议记录保存在《徐档》卷宗 E6 中。薛孔昭神父是与会者之一,他曾写了一篇有趣的总结。潘如汉写的《戴元英神父传》曾一再提及引用。见《戴元英神父传》,第 238 页起。

② 见本卷第 82、83 页。

③ 见本书,第 1 卷第 354 页。

④ 同上,第 319 页。

修与传教生活，很需要请法国修女来主持，但监会铎认为这个计划必须由教区代牧主教去完成。参加会议的人几乎一致反对派遣初学修士和年龄太轻的修士来华；但对派遣神父和读完哲学的修士来华，则一致表示赞成。与会者还殷切希望有研究科学以及汉学的人才前来，但因人手缺乏，一时还不可能。监会铎还录取了七名读书修士与五名辅理修士进耶稣会。

监会铎的种种措施深得人心，因此传教士们人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他回去后，郎主教写道：“我认为，我们敬爱的监会铎在整个巡视中有洞察人心、如何量才录用和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的天赋本领。”<sup>①</sup>

多年之后，人们对戴元英神父的巡访还萦怀不忘；当1896年潘如汉神父为他写小传时，许多曾身受其教诲的传教士，还提供了感人肺腑的事实。<sup>②</sup>

监会铎在执行巡阅任务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修会使者与宗座代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和谐的。他们的处境是微妙的，而在具体利益问题上又往往各自对立。薛孔昭神父引述自己目睹的一件微小事情，证明这两位天主的忠仆知道怎样彼此调和取得一致。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冗长的会谈中，在谈到开办一所学校就是为了对徐汇公学相抗衡这个问题时，两人的意见不一致。监会铎向郎主教说：“主教，你的意见是好的，我想我的意见也不坏。我们同到圣体台前去，祈祷后再

---

<sup>①</sup> 郎怀仁1866年5月15日致参赞神父信，见潘如汉：《戴元英神父传》，第236页起。

<sup>②</sup> 同上，第238页起，这些传教士是薛孔昭神父、晁德兹神父和翁寿祺修士。

作决定吧!”两人果真同进小堂，在圣体龛前作了久长的祈祷后，回到主教办公室时，两人意见一致了，便作出了最后的决定。<sup>①</sup>

工作整顿好了以后，郎主教便着手于最关心的大事，即神父和教友因内战被迫放弃的传教岗位如何得以恢复以及如何向辽阔的从未受过传教士探访的地区传布福音。当时的形势是有利的。另外，1863年，因法国公使之请而获得的皇帝上谕，郎主教也参加了其对初稿的拟订工作。<sup>②</sup>

1865年，法国驻北京的新任公使柏尔德密先生为各教区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可贵的便利。2月20日，总理衙门函告：“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买置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sup>③</sup>

这证明了天主教各教区，在全国有买置不动产的权利，从而能在各地认为适宜之所建立传教岗位。这条条文只登在1860年的中文条约上，在作为正式条约的法文原文上是没的。<sup>④</sup>

柏尔德密协定如果被遵守的话，天主教各教区定能大事发展。但是不久传教士看出，根据地方官惯用的手法，这个北京协定会变为一纸空文。起初传教士只是疑虑，不久终于成为事实。这个协定下达到各省大官员的同时另附有密令，

---

① 见潘如汉：《戴元英神父传》，第241页起。

② 见本卷第126页。

③ 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70页。此函原文见《正教率传》，第120页。——译者

④ 见本卷第20页。

暗示“必须调查地方民众对这买卖是赞成或是反对”。很显然，官员们一表态，民众就不敢提出异议，买卖也就做不成了。<sup>①</sup>

三十年内，每逢要创建一所新堂，传教士常常要同官员们为购买田地问题引起激烈的争执，其成功与否，要看官员权力大小以及传教士能力的高低而定。这种到处碰到的、千篇一律的麻烦事情暂且不说，等下面谈到几桩重大而特殊的事情时再行记述。

郎主教拟根据 1860 年的条约，并利用柏尔德密的协定发展传教事业时，一开始偏逢着这位三十多年来对教会和列强有不解之仇的李鸿章。自从太平军失败后，他一跃成为两江的署理总督（1865 年至 1867 年）。<sup>②</sup> 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戈登军队协助下打进苏州后，就解散了欧美将官，独占战功。<sup>③</sup> 他的一贯政策是顽固地反对西方的一切进步，宁可使国家受害而只要自己不丢掉乌纱帽。<sup>④</sup>

就是由于他暗地里下了密令，使柏尔德密协定成为一纸空文。我江南教区却最先遭到他既狡猾又顽强的反对。

---

① 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7 页起。使柏尔德密协定成为一纸空文的秘密指示于 1884 年被发觉，是由于几个官员的疏忽，在他们的布告中泄露了这个阴谋。在黄伯禄神父的《南京总督 1891 年的通函》中可找到译文。见《徐档》，卷宗 F。

秘密指示中还有“卖业之人亦须于卖前报明地方官，应否准其卖出，由官方酌定”等语。见《正教奉传》，第 121 页。——译者

② 见方殿华：《南京今昔》，第 450 页。

③ 见本卷第 117 页。

④ 关于李鸿章的为人及其性格，见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219 页起。从 1862 年起，李鸿章已是江苏省的巡抚，他出一张布告：“任何中国人，没有地方官的许可，不得出卖任何土地、房屋给法国人。”（南志恒 1865 年 9 月 9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248 页。）

1864年7月19日，清兵一进南京，<sup>①</sup>一贯抱着大无畏精神，在战争年代中经常奔走在战区的桑理爵神父，<sup>②</sup>受鄂尔璧代牧主教之托，担负起重新整顿苏州、常熟两地区的教务和在镇江设立堂口的责任；另有两位神父，一位派驻苏州，另一位作为他的助手而驻常熟；桑理爵本人直接管理无锡、丹阳及镇江。一位中国神父张星伯被派去抚慰遥远的扬州、淮安及五河的教友。另一位中国神父熊臣尧，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到安徽省省城安庆创立新的会所。熊神父乔装商人，用他私人名义买了一座房屋作为他经商之用；他还冒险到安徽省边境的徽州府探访教友，直到那时，徽州还是由江西省的遣使会神父经心管理着。<sup>③</sup>

另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留给被吕比荣神父称之为“勇士中的勇士”的雷通骏神父。他负责长江与运河流域的大城市，如安庆、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区，创立永久巩固的教会事业。<sup>④</sup>为此，在1864年底，他从海门被调走。

雷神父第一次远行是在1864年11月，他先到南京，鄂尔璧神父为了要亲自调查南京城里的老堂情况，和他作伴同行。他俩知道，南京教友都已逃散，因此，一切都得从头做起。<sup>⑤</sup>

数星期后，两位神父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良好机会，为他们作第二次勘探以及同地方官员进行商榷提供了方便。原

---

① 见本卷第64页记。

② 见本卷第115页记。

③ 南志恒1865年9月9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49页。

④ 雷神父的书信、计划、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保存在南京总铎区的常年报告里。见《徐档》，卷宗C1、C5。

⑤ 雷通骏1865年1月15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182页。

来当时上海的法国海军司令是海军上尉帕吕先生，他对教区事业很为忠诚，他准备让“布尔代”号炮舰溯长江而上直至汉口，调查法国在通商口岸事业的成就。他请雷神父登上他的炮舰，和他同去见地方长官。雷神父接受了他的邀请。1864年12月，雷神父参加了这次探险式的旅行。这位英雄人物给我们留下了生动的叙述。<sup>①</sup>

炮舰首次停泊在通州，雷神父即去拜访该城新任知州，请他根据1860年的条约，由地方官协助在城内购买土地，作为建造教堂与神父住院之用。知州答称老百姓还没有作好准备，一俟时机成熟他即出安民告示，并答应提供条件，使计划得以实现。在镇江，地方官除讲了不少讨神父欢心的好话外，还为他们的探访提供了方便。镇江是向洋人开放的商埠，英国人已在那里划定了他们的租界，地方官员也已听任“洋鬼子”的侵占。他们不仅对神父表示好感，而且还殷勤地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深知教会提议要建立的慈善事业对那些可怜的受尽十五年战祸的人民来说是多么的需要啊！只是当前有个特殊困难，即有很多土地找不到业主，这些业主或早已死去，或因战争而逃难在外，人们不知应同谁商谈购买土地之事。为解决这个难题，镇江知府建议把购买土地的银子暂存府署，等业主回来，由他负责偿付。于是，负责镇江区的桑理爵神父立即购买了一块合适的地皮。

在大运河的入口处，旅行者离了炮舰，另雇一艘中国船到扬州。帕吕司令与另一名军官以及四名海军带了长枪、装上

---

<sup>①</sup> 桑理爵1865年1月15日致省会长神父信，见《通讯》，第5卷第182页起。

刺刀，陪同传教士相继拜访了知府、知县和盐运使。传教士由于有军队护送，地方官比较重视。官员们当即表示定要保护城里的几家教友，凡南京承认的有关传教的条例，这里也必将同样接受。

很明显，省里各地知府和知县都以南京为榜样，所以必须在这座大城市中收回教产，以影响其他地方。远行者又回到了镇江，登上“布尔代”号，于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到达了南京。雷通骏神父离舰登陆后，直趋城内教友们的旧公所。只见公所被几户无家可归的教外人居住着，房屋已破烂不堪。神父立即雇了泥水木匠，买了必需的修建材料，赶快修了几间房间，预备次日可接待几个军官。他写信给帕吕司令，请他叫人把祭箱带来，以便翌日在这所新收回的屋子内举行圣诞弥撒。好心的司令为了不使神父疲乏和防止神父可能遇到危险，便亲自带了两个水兵为神父送行李；可惜时间太晚了，他们到城门时，城门已经关闭，当夜只得睡在乡间一所草棚内。翌日黎明，司令官同两个水兵一起进了城。雷神父就在法国司令官与两个水兵以及十多名得到通知的中国教友面前，举行了他的三台圣诞弥撒。他记叙道：“一座临时祭台简陋得象白冷马槽一样。那是一扇板门，墙上挂了一条旅行时包衣被用的毡毯；墙上用大头针钉着日课经里的一张圣像，一块绿被单作为台帏……算不算是圣诞呢？但今天早上，救世主的确三次降临到我这座简陋的祭台上来了，他祝福着南京的广大废墟；我相信，一座新的圣堂总有一天会在这片废墟上矗立起来的。”<sup>①</sup>

---

<sup>①</sup> 见《通讯》，第5卷第188页。

使雷神父大为欣慰的是，就在这一天，他还能给两名成年人付了洗礼，给另外两名成年人行了补礼。这些新教友是由一名姓陆的教友劝化的。南京被围时，这位教友留在城内，劝化了百余人进教，但他不幸在清兵收复该城时惨遭杀害。

下午，雷神父与帕吕司令同去察看了公所隔壁的谷仓，这仓库原是十八世纪旧耶稣会的神父住院。<sup>①</sup>帕吕司令就写条子给“布尔代”号的代理舰长，请他次日带两位军官和十二名武装海军进城。他打算设法会见城里官员，要从他们手里收回旧时的住院，这是符合天津条约的规定的。雷神父还把条约的原文夹在他的护照里。<sup>②</sup>

为使中国官员见到既成事实，他们还在谷仓的墙上开了一扇通向公所的门。12月26日，法国炮舰的一行代表队，入城住进了旧时的神父住院。午后一时，神父、军官和海军们同去拜访了南京府台，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帕吕司令与雷透骏神父向府台说明来意，希望他按照条约和皇帝的上谕，归还往年的神父住院。知府察看了神父附有条约原文的护照，叫人抄录了以便报告上级；次日，府台同他们进行会谈，劝他们先报告上海领事，由领事向南京总督提出要求，并答应从中加以支持。在回来的路上，这队法国人的行列大受尊敬，带路的人领他们东转西弯，走过了好多条热闹的大街，数以千计应考举人的秀才们好奇地欣赏着洋兵的整齐的步伐与漂亮的制服，没有半句侮辱的语言和不良的举动。不久，“布尔代”号炮舰回到了上海。雷透骏神父向

---

① 见本书，第1卷第234页。

② 同上，第20页。



法领事作了汇报，并附上证据，写明南京教区旧有不动产的方位和面积。神父对归还已改为谷仓的旧住院表示满意；至于其他产业，倘若南京官员认为归还有严重困难，那么也可用其他方式来调换。<sup>①</sup>

雷遁骏神父满心喜悦。他写信给省会长神父说：“希望‘贺撒纳’<sup>②</sup>呼声之后，接着而来的不是教难，使今日开创的事业能持久地继续下去；依我看来，大规模宣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来临了。”

可惜人们很快就知道，李鸿章和他的属下对写得清清楚楚的条约原文避而不谈。总督急忙命令把现已改作公家仓库的神父住院的门窗全部砌没，说是为了防止盗贼。当上海法国领事要求将归还原住院的申请书按例由上海道台转呈南京时，却受到极不友好的接待。李鸿章还宣称，在南京城内一概不归还往年的旧教产或教士的住院，他表示可以划出城外的一方土地作为抵偿。神父们认为这些条件无法接受，于是北京的法国公使馆就插手干预了。<sup>③</sup>

正当其时，郎主教调来移驻江南；他才到上海，就决定要拜访教区所在地的苏皖两省的高级官员，一如他在献县时做的那样。<sup>④</sup>

帕吕司令正准备坐“唐克雷德”号重溯长江，于是他请主教坐他的舰艇航行，由鄂尔璧会长和雷遁骏神父伴随。驻上

---

① 见《通讯》，第5卷第190页。

② “贺撒纳”是希伯来语，系快乐欢呼之意。——译者

③ 郎怀仁1865年7月12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20页；又《法使馆》，柏尔德密公使1865年2月12日致恭亲王信。

④ 见本卷第131页。

海的法领事自来尼先生认为此行不妥。他生怕郎主教靠了法国海军军官的势力，硬要去索还总督执拗地至今不肯归还的教会旧产，这样将对驻北京的使馆现在正向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带来妨碍。而主教断言，他绝无此意，只要省里的大官承认他是天主教的领袖。

1865年5月1日，“唐克雷德”号驶离上海，经过南京时未停泊而直上安徽省城安庆，郎主教与帕吕司令提出要拜访地方官。接着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谁也不肯接待洋人，抚台不在家，藩台外调，臬台有事见阻，府台应召公出。经过四次拒绝后，帕吕司令不耐烦了，于是强行进入府台衙门，同主教及其随从就在第一个大厅里坐了下来。一个钟点过去了，还不见知府出来，司令终于忍不住威胁要派一小队水兵到府台私邸上访，不论府台愿不愿意，非把他请出来不可。<sup>①</sup>

形势变得紧迫了，不但府台亲自出面，连臬台与藩台都被府台请来帮忙，友好地会见了主教与法国军官们。他们宣称，他们只能按照南京总督的指示来处理教会事务。神父们也未提及数星期之前一位中国神父熊臣尧已到达安庆这件事，熊神父还在安庆买了一所当铺，开始作布匹买卖；可能官员们已知道他的真正身分，但他们也眼开眼闭，装作不知而已。<sup>②</sup>

“唐克雷德”号上行至九江，继而到了汉口；在那里，湖北代牧明主教、驻汉口法国领事达伯理很愉快地接待了远行者，并设法使他们会见了湖广总督，这是个可喜的前奏，可以预见这位盛气凌人的南京总督最终将被迫会见神父们。

---

① 郎主教1865年7月12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20页。

② 见本卷第138页。

在南京，开始了决定性的一场交涉。假如李鸿章肯友好地接待主教，或至少允许让一位神父居住城内，接下来就能按照条约和上谕的精神商谈归还教会旧产之事。大无畏的雷通骏神父曾奉命先到南京修复教友们的旧公所，准备接待主教和法国军官。南京一些官员们为了阻止雷神父执行使命，唆使民众起来暴动，并说他们不能保证神父的生命安全。雷神父回答说：“我是奉南京主教之命而来的。几天后，他亲自要来，还有法国舰队同来……我奉命来传布福音，你们的恐吓不能叫我后退，我不怕死。你们已造成不少殉教者，再加我一个，也不会费你们多少劲；但你们应当考虑，我的血不会白流，我一定会找你们算帐的。”听了这番话，官员衙役们目瞪口呆地走了，他们叫来的一群无赖也散了；于是修建工作便进行得很顺利。6月17日，“唐克雷德”号与炮舰“香港”号从汉口驶到了南京江面，郎主教与帕吕司令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都住进了刚修好的教友公所，他们要求总督、府台和知县同他们会谈。总督、府台和知县一见法国兵便大为震动，都不知道军舰偕主教同来有何目的。郎主教和帕吕司令申明了法国的和平愿望，表示海军军官们是奉命来拜访当地官宪，并建立两大帝国之间的友谊的。府台和知县听后心神稍稍镇定了些，接着便按礼仪接受了拜访，并到教友公所作了回访。结果6月21日，即郎主教等人在南京逗留了四天之后，总督宣告亲自接见主教与法国军官。接待仪式极为隆重，城内大小官员一百五十人都环绕在李鸿章周围。总督起初对法国人很不信任，直至郎主教谈到法国人对总督大力平定太平军的叛乱表示敬佩，并述及梅德尔神父曾为大清帝国以及上海人民效劳的种种事实后，总督的态度变得易于接近了。李鸿章拟亲自

解决这里的悬案,重申他向上海领事提出的建议,天主教可以在城外得到一块相当的土地作为抵偿,并放弃城内的旧教产。郎主教说他不是来谈判的,北京的法国公使已着手办理此事。他的目的仅仅提请注意,排除传教士于大清第二京城之外是不公正的,是对传教士的侮蔑;既然条约已给传教士在各地居住的权利,北京、济南府和别的大城市都已接受了,为什么南京要例外?李鸿章回答说:“其他地区人民善良,这里的百姓不好,他们不要你们,我担心他们会伤害你们,这是我应当负责的呀。”主教说:“按照中国名言,你是人民的父母官,父亲要的,儿子不会不要。怎么你这位平定叛乱的大人,竟害怕爱戴敬佩你的人民了呢?”李鸿章又说城里没有适当的场所。于是郎主教乃说出教友公所早已存在,而且业已修缮,以及一位传教士已经住了几天的事;府台经李鸿章询问,证明实有其事;总督表示非常不满,重弹老调说:“百姓不好,他们不要你们。”郎主教认为已受总督接见,传教士进驻南京也被确认,也就不再坚持了。“唐克雷德”号把主教送回上海时,南京会见的消息已传了出去,而且完全走了样。中国官员们谣传郎主教这次会见受到总督的侮辱和冷淡,但要弄清真相并非难事,因为参加会见的还大有人在。总之,教区神父和教友看到自己的主教在如此艰难棘手的环境中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都感到庆幸与自豪。<sup>①</sup>

这次重要的远行还伴随着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不出所料,李鸿章果然向驻上海的法领事提出了抗议,抗议主教靠了法

---

<sup>①</sup> 我只总撮郎主教 1865 年致吕比荣神父的一封长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218 页起。

国海军军官的力量提出了传教士居住南京的要求。自来尼领事原不赞成“唐克雷德”号的这次出征，便把总督的抗议书附上他不怀好意的报告一并寄到北京法国公使馆。<sup>①</sup>

于是，负责这事的伯洛内先生给郎主教写来了一封强硬的信，说李鸿章抗议法国军官的武力威胁抗议得有道理；公使也斥责海军军官们为了希望“得到教宗的奖章而过度热情，用他们无知的军刀去支持传教士”。<sup>②</sup>

郎主教从南京回到上海之后，写一份详细的汇报寄到北京公使馆，<sup>③</sup>事实真相很快弄清了。<sup>④</sup>我们将看到，以后直到谈判结束，伯洛内先生始终是保卫南京教区利益的最坚决的一位。

事实上，正如神父们预料的，“唐克雷德”号启航后，李鸿章不断想法要把坚持留下来的雷遥骏神父赶到城外去，但南京公所的修缮工作还在进行。金式玉神父起初担任雷神父的助手，之后继任了雷神父的西部教区之职；7月15日，他从上海调到西部教区的最前线。雷神父虽然遭受许多麻烦，但还坚持留在城内，巩固他既得的阵地。既然李鸿章有话在先，雷神父就又在城外忙于买进一块土地，这是总督曾答应过的。由长江水流积土而成的下关城厢区，战事后有许多无主土地。下关因地处江边，将来商业必定发展，地价也肯定大涨，于是雷神父就买进了一块地；正当契约签订时，官员知道了这件事，他命令退还银价，废除契约。一名协助神父买地的教友被

① 自来尼 1865 年 9 月 20 日致伯洛内先生信，见《徐档》，卷宗 B8。

② 伯洛内 1865 年 10 月 20 日致郎主教信，见《徐档》，卷宗 B8。

③ 郎怀仁 1865 年 9 月 21 日信，见《法使馆》。

④ 郎怀仁 1866 年 3 月 9 日、5 月 6 日信，见《法使馆》。

捕下狱，并遭毒打。城内又贴满了布告，禁止任何人把土地卖给传教士。<sup>①</sup>

总督李鸿章就是这样阳奉阴违地遵守条约与皇上谕旨的。

几星期之后，雷通骏神父在安徽的省城安庆遇到袭击，几乎丧了性命。原来熊臣尧神父把他在城内买进的那所房屋让给了教区，文契悉照规章缮写，并向县里注册登记。<sup>②</sup>

有一位医师住进了那所房屋，给邻近贫病者看病。不久消息传出，说这人是传教士的代理人，为给神父们进城作准备工作的。立刻从绅士与文人方面又招来了不少麻烦事。看守房屋的人深知留守在这里，生命和财产都无保障，即通知雷神父，并求他快来援助。<sup>③</sup>

神父得到消息立刻动身，登上“圣玛利亚”号船。这条船原是一艘官方的旧炮舰，雷神父买下后把它改成了小堂和住房。船上有五个驾驶员。桅杆上挂着白底红十字旗，船尾还飘扬着三色旗。多年来，神父们就靠了这条船走遍了长江和运河两岸。<sup>④</sup>

9月24日，主日清晨，“圣玛利亚”号到达安庆。雷神父不敢从城门进城，怕遭暴徒袭击。他利用炮眼攀登着爬上城墙，城墙那边已有一顶轿子等候着，神父即坐进轿子，直趋医师住屋。弥撒完毕，神父即向知府、知县投递名片，报告他已到达并将前来拜访。次日神父进衙门会谈，谈判进行得非常

① 见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62页。

② 涂昕波1867年2月20日信，见《通讯》，第6卷第99页。

③ 雷通骏1865年10月9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55页。

④ 见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63页。

激烈。神父拿出护照,说明来意,提出要按所得权利在安庆建立教堂。官员们则说,近得北京指示,教士权利业已取消。神父反驳说:“我不信,两国之间的条约,没有对方同意,不能单独取消。我从没有接到法国当局任何报告,我必须去通知他们。”同时他要官员们对他和他属下人的安全负责。此后他回到住所,很多好奇者齐来围观,看上去这些人并没有什么恶意。晚上九时三十分,突然来了一个眉目清秀的教外青年,他轻轻塞给神父一张纸条,告知官员们正准备来一次暴动。神父就静待着。子夜一时,一群无赖由绅士们率领着,集合在神父屋前。那个医师和神父的传教先生硬把神父拖出通向田野的小门,并把他藏入田间丛密的草堆里,接着医师便回屋,准备勇敢地顶住暴乱。

屋门被打开了,人们到处搜寻神父;绅士们虽竭力阻止抢掠,但神父的部分行李在骚乱中不见了。经过两小时徒劳的搜寻,人群散去了。神父不顾属下多次劝告,还是回到屋内,度过这个可怕的一夜。次日,9月26日,他向知县送去了一份报告,叙述了暴乱的详细情况,并要求保护并主持公道。知县的答复送来了。一位低级官员来到神父住所,那时雷神父正在抵御再次来骚扰的捣乱分子,神父被请上轿子,抬到城外江边,等候坐洋商轮船返回上海。神父动身后,无赖之徒更无法无天地把屋子抢劫一空。雷神父一到上海,就向主教和领事作了汇报。<sup>①</sup>

当时,李鸿章曾用尽各种方法阻止租界洋商与内地发生联系,以致许多欧美洋行大受损失。当他们一得知雷神父在

<sup>①</sup> 雷通骏 1865 年 10 月 9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255 页。

安庆遭受侮辱，而安庆官方又拒绝主持公道时，便激起了公愤。耶稣教的教牧人员、商人、银行界人士同郎主教一起，一致要求立刻采取有力的补救措施。<sup>①</sup>

自来尼先生虽对教会事情感到厌烦，而对这件事却非常关心。在北京的伯洛内先生表现得更坚强。人们预料，安庆的这个事件反而使天主教事业不仅在安庆而且在南京都将稳固地发展起来。<sup>②</sup>

李鸿章的一桩新的暴力行为促使法国公使馆不得不插手干预了。1866年初，雷神父正在上海做常年避静，南京府台竟派兵冲进神父历尽艰辛而重新修建的公所里。雷神父立刻回南京，入侵者只好退了回去。总督与地方绅士联名上书给自来尼先生，而且把绅士们的名字排列在先，说他们坚决不能容忍任何洋人留在南京城。雷神父将计就计，把这个奸谋戳穿了。原来绅士们曾在雷神父特设的一次宴会上，明白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天主教在南京建立教会，相反，还欢迎教会来南京举办慈善事业，如同他们中许多人在上海亲眼见到的那样。<sup>③</sup>

法国公使馆在多次向总理衙门澄清了事实真相之后，总理衙门的态度如何呢？该衙门只是向李鸿章提了些建议并劝告了一番。<sup>④</sup>伯洛内先生十分气愤，决定用强硬手段来对付。1866年3月10日，伯洛内通知郎主教，说他已经照会总理衙

---

① 南志恒 1865 年 9 月 9 日信，见《通讯》，第 5 卷第 249 页。

② 自来尼 1865 年 10 月 10 日致伯洛内信，见《法使馆》。

③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 2 卷第 215 页；方殿华：《南京今昔》，第 240 页起。

④ 总理衙门 1865 年 10 月 27 日致伯洛内信，见《法使馆》。



门，“安庆事件假如三个月之内不予解决，我将用武力占领城内一块土地”。尽管如此，法国公使还是想用公正的态度，要求郎主教尽一切努力，让传教士进入南京，尽量不再引起其他风波。因为假如法国海军示威，迫使李鸿章让步，那么英国人必将在巴黎象老鹰那样鸣叫发怨言，而法国政府本已极端厌烦这些教会事件，这样一来很可能从此它就会干脆不管，拒绝一切类似的要求。对掌握南方诸省军政实权的李鸿章，北京政府对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传教士靠一艘法国战舰进入南京，当然会使中国官员怀恨在心，以至他们要想法进行报复。<sup>①</sup>

郎主教对这些观点完全同意。他了解中国官员们的性格，也深信一次军事威胁虽能迫使他们让步，但“中国官员们会说，主教是靠武力威胁而夺回教产的。这样的舆论对主教是不利的”。<sup>②</sup>

郎主教的预见得到了证实。李鸿章接到伯洛内的最后照会后，就照复他已准备承认南京公所的所有权，而且准许加以扩充，对已改为公家仓库的神父住院，则不能发还，但可在城内给以其他补偿。这些条件看来令人满意。雷神父乃重回南京去负责处理教产事务。那时他正身患重病，既发高烧，又患痢疾，他经常卧床办公。南京官员们趁教会这次退让，进一步要求教会放弃城内的一切旧教产。因此，要官员们收回这个不合理的苛求，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1866年11月17日，经过一个月的既讨厌而又频繁的谈判之后，上海法领事提出的条件被全部接受而且还注了册。教友们的老公所也得到了

<sup>①</sup> 伯洛内先生 1866 年 3 月 10 日致郎主教信，见《徐档》，卷宗 B8。

<sup>②</sup> 郎怀仁 1866 年 4 月 5、8 日致伯洛内信，见《法使馆》。

官方的确认；教区又买进邻近的土地，公所遂得以扩大；最后，在邻近小山上<sup>①</sup>又得到了一所大花园，作为补偿被公家占用改为谷仓的神父旧住院。获得的土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人们希望能创办大规模的教会事业了。<sup>②</sup>

剩下的还有安庆那次伏击事件应当赔罪道歉，教区不能因城内拥有产业所有权而就算把此事了结了。然而李鸿章阻止传教士进入安庆比阻止进入南京更激烈。因安徽是他的出生地，他认为在他任职期内，洋人侵入他的家乡，对他真是莫大的耻辱。1866年9月，他照会驻上海的领事，指出熊臣尧神父在安庆买的房屋是未经官方许可的，所以无效。法国外交官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公文往来不绝，打扰了这位满怀仇恨的总督。1866年12月，他终于答允向上一年遭受迫害的雷通骏神父赔罪道歉。雷神父那时正病得厉害，不能视事。直隶东南教区的一位来上海举行卒试的徐听波神父，他擅长和官方打交道，因此被派到安庆；不久杜若兰神父也紧接着而来，但他俩谁也没有在城内得到一所房屋或一块土地；按南京总督的先例，安庆官员只准传教士住在安庆城外，杜若兰枉费心机地拟请李鸿章对安庆官员们下令，他殊不知李鸿章本人就希望传教士远离安徽。<sup>③</sup>

幸而这位署理总督，洋人的死仇李鸿章在1867年满任

---

① 这个小山称“清凉山”，实际上只是一个高泥墩。——译者

② 潘奥定1866年11月8日致戴元英神父信，见《通讯》，第6卷第69页起。潘修士曾伴随重病的雷通骏神父，写了不少日记，给我们留下了同那些忠于李鸿章观点的官员们进行会谈的情况。黄伯禄神父也伴随过雷神父。见方殿华：《南京今昔》，第240页起。

③ 见《神学院》，1867年12月，第39页；徐听波1867年2月16日信，见《通讯》，第6卷第85页起。

了。接替他的是平定太平之乱的清军统帅曾国藩。他不象李鸿章那样拼命反对传教士住进安庆城。1867年9月，他提议请雷神父前来商谈。天主把在安徽建立第一所神父住院的喜乐留给这位大无畏的传教士，他的身体刚觉得有些好转，便同作为翻译的蒋神父到了南京；10月4日拜访了新任总督，并要求归还安庆城内的神父住院，还提出要一块靠江边的土地，作为他前年受辱的赔偿。曾国藩一一答允；他属下的官员们虽不怀诚意，但还是执行了他的命令；10月21日，官员们让出了一所新住院，24日，又在江边拨给了一块土地。25日，雷透骏神父在“圣玛利亚”号船上与安庆的官员们作最后的友好会谈后，非常得意地重返南京。

可惜他未能久享胜利的喜悦，四年来的辛勤劳苦耗尽了他的毕生精力，1867年的年底与1868年的年初，他还在南京，那时顾培原修士正在督造华丽的神父住院。7月，雷神父痢疾复发，重返徐家汇；7月17日病逝，年仅四十八岁，在华工作十二年半。<sup>①</sup>

南京、安庆两座住院的建成，是郎主教就职初期的重要事件。同时期还创办了其他一些事业，也值得提一下。

1865年6月，<sup>②</sup>郎主教乘“唐克雷德”号去汉口时，得知湖北与安徽的边境建成了几所新会口，从湖北来的好几户人家向方济各会神父要求加入望教。郎主教决定立即派一位神父前往，既可给这些新教友传布福音，又可渡江南下，管理徽州府的东门老会口。金式玉被指定担负此项艰巨的使命。但

---

① 叶春荣 1868年8月18日信，见《通讯》，第6卷第273页。

② 郎怀仁 1865年7月12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22页。

地方上群盗出没，危险很大。1866年3月6日，金式玉到了汉口，明主教与管理湖北边区的方济各会会士米神父热情地招待了他，米神父还答应作金神父的向导。法国驻汉口的领事达伯理给了金式玉一张护照，以便使湖北的官员们信任。1866年3月11日，他俩离汉口向毗邻安徽的黄州府进发。他们行路十五天，历尽了艰辛；农民们因怕盗患，都避入山中，村庄几乎成了旷野，他们求食无门，只好忍饥忍渴；挑夫又极胆小，常怕有盗而不肯再向前走，一听说强盗来了，他们就马上混入乱窜的人群中。3月25日，他们终于到了湖北和安徽边境最后一所会口，米神父便离开了他的旅伴。领路人把金神父领到了六安州，那里已有好多家望教者，他们很愉快地接待了神父；不久，一批一批的人群拥来围观这第一个闯来内地的洋人；英山县知县生怕人众滋事，派兵来要捉拿神父。

洋人有洋枪，士兵们怕神父也有枪，不敢动手；金式玉告诉士兵们，自己要到县里去出示护照，并向民众宣布，说传扬天主教是经过皇上批准的。到了县衙门，人们却不准他进门，连他的卡片也不肯送给县官看。望教者受了惊吓，便躲藏起来，因怕受株连，再也不敢接待神父。在这种情况下，金神父自觉无能为力，只有离去。临行前，他写了一封抗议书给英山县知县，并警告说要向上级报告。传教士一离开这个地方，保守教友就遭受了真正的迫害；官员们指使绅士们带头部署抢劫，并采用多种多样手段虐待那些“把洋教头子请来”的人们，对待他们象对待叛乱分子那样，许多人只好逃入山中。他们中还有人到镇江，请求金式玉神父保护。这时，南京、安庆之案尚未了结，法国外交官对这些违反条约的新事件不便再

提,只有暂且等待时机。<sup>①</sup>

金式玉神父经过这次饱受艰险而又一无成果的远行后,乃到安徽南部,去执行他的第二个使命。路过江西时,安若望主教和遣使会神父给他提供了一切他所需要知道的情况。4月21日,他到了徽州府的大镇东门,旧耶稣会的神父曾在那里建有兴旺的会口;太平军严重地破坏了这个地方,烧毁了少数教友人家的房屋,他们还想烧毁圣堂但没有成功。教友们还述说曾多次见到圣母在光辉中显圣,她手持宝剑,驱走了进犯者。那时,这个会口只剩下三十三名教友了。金式玉神父在他们那里住了四天,给他们讲道理行圣事,并给来围观的教外人宣传福音。以后,他乘长江轮船重回九江。途经安庆时,他又访问了杜若兰神父。杜神父正在努力设法定居城内,可是还没有成功。5月初,金神父回到了镇江。<sup>②</sup>

镇江,是金神父多年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从事一切事业的中心。实际上,他还奉有复兴运河两旁,十七、十八世纪很兴旺发达的老会口的使命;这些会口因长期没有神父,又遭到太平军战事的破坏,几乎已全部毁灭了。耶稣会会士重来江南的头几年里,未能在这些遭难深重而又遥远的地区建立稳定的住所;每年教区只派一位神父去巡访一次而已,但神父又不知要付出多少辛劳和冒多少危险,我们在上面已不止一次地提及这类事情。<sup>③</sup>目前镇江正是建立固定住院,举办整套教育事业与慈善事业的时候了。

使镇江成为事业中心,条件是具备的;镇江是府城,居民

---

① 金式玉 1867 年 9 月 25 日信,见《通讯》,第 6 卷第 136 页起。

② 见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 86 页起。

③ 见本书,第 1 卷第 251、369 页起。

众多,且地处长江与大运河的汇合处,又是开放的商埠,汽船都能停靠;城外已有洋人的租界,驻有英美两国领事,保护他们的侨民。教区的机构和事业比任何地方都办得更稳妥。另外在太平军战事后,很多土地已无业主,地价又很便宜。1865年夏,金式玉被南京雷邈骏神父请去帮了一阵子忙之后,就定居在镇江,买了一块土地,继而又逐渐扩大;今日教区的机构和事业就建立在这些土地之上。<sup>①</sup>

在丹阳,要建设教区机构就比较困难。旧时的教友公所在战争中毁坏了。金式玉神父在城内买了一块土地准备造圣堂和住院。知县根据李鸿章的秘密指示,把卖主关押起来,并贴出侮辱洋人的告示,还想废除买契。金神父把这份官方的明显违犯条约的告示交给了镇江的领事。领事就向城里的道台交涉,道台斥责丹阳知县,说他不合时宜。于是金神父就获得了那块土地的使用权;看到知县完全让步了,他又提出开释一名因拒绝摊派出资修庙而被拘的新教友,知县也答应了。教友们因此勇气大振,又重新公开祈祷,举行教会仪式,金神父也经常从镇江来探访他们。<sup>②</sup>

在离镇江不远,地处运河之畔的繁华的扬州府城内,金神父先租用后买进了一座小屋,作为过路神父的临时歇脚之处。<sup>③</sup>

为使这些新创的事业得到群众的欢迎,金神父认为传教最有效的方法是办慈善事业。他要求在董家渡天主堂的护

<sup>①</sup> 见高龙鑿:《江南传教史》,第88页。

<sup>②</sup> 金式玉1867年9月25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140页;高龙鑿:《江南传教史》,第88页。

<sup>③</sup> 见高龙鑿:《江南传教史》,第89页。

士，有圣德的潘奥定修士去帮忙。他在镇江、扬州，又在别的城市设立了施诊所，同时由潘修士培训本地的医务人员，并免费施诊给药。此外，在生活腐化的扬州，溺婴的惨事特别多，金神父就在1866年的圣诞瞻礼开办了一所育婴堂，救活了成千上万个婴孩。徐家汇圣母院派了一位热心、精明能干的贞女去主持育婴堂，有几名扬州的女教友协助她的工作。神父要求地方官加以保护，地方官也一致赞赏神父的慈善事业，并诚心诚意地作神父的后盾。另一所育婴堂则设在镇江。<sup>①</sup>

由于雷通骏和金式玉两位神父的努力，江南传教区在安徽和长江右岸获得了重要的基地，从此创办了新的教会事业。与此同时，江苏省城中因1860年被太平军占领而放弃的苏州，又成为教区教务事业的中心。1864年，当戈登的军队收复苏州后，桑理爵神父就想进城，因那时苏州巡抚李鸿章的恶意阻挠而未能成功。<sup>②</sup>

为挽救这次失败，1866年终，苏州总铎伊宗尹神父用教区经费在城内买得一座房屋，这样便解决了教友们为供应神父食宿与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问题。同时伊神父由郎主教授权，向江苏巡抚要求发还两座旧耶稣会十八世纪教难前还拥有的圣堂。<sup>③</sup>

地方官不仅不商谈归还圣堂问题，认为更现实的还是拆掉神父新买的房屋。省里最高军官提台派了百余名士兵闯入房屋并准备动手拆除。那时伊宗尹神父正在城外传教，一得

---

① 潘奥定1867年3月、金式玉1868年7月22日信，见《通讯》，第6卷第167、266页起。

② 见本卷第115页。

③ 伊宗尹1867年1月信，见《神学院》，1867年6月，第23页；见《通讯》，第6卷第79页；叶春荣1867年1月20日信，见《通讯》，第6卷第81页。

知此消息，立即进城直趋巡抚衙门。教友虽竭力劝阻，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但伊神父仍勇敢地前去衙门。他终于见到了巡抚大人。他自我介绍是主教的代表，专为谈判归还两座老教堂问题的。巡抚回答这事还须慢慢来，须待北京解决。“必须等待？我可有急不可待的事；目前士兵们正在拆我的教堂，谅必大人不会不知道吧……倘若大人不立即阻止拆堂，那只有请大人向主教打交道”。巡抚起初伪装不知，后经神父一再肯定，就不得不承认予以保护。伊宗尹神父回来时，教友们看到情况好转，都成了什么也不怕的小狮子……他们便簇拥着神父回堂。拆屋的士兵们也退走了。就这样，新屋的所有权受到了省里最高官员的正式承认。

数天之后，曾因平定太平军叛乱有功，朝廷赏了一个高级顶子的直隶东南教区的徐听波神父来上海做他的第三年卒试。郎主教就派他到苏州，协助伊宗尹神父完成初期的工作，两位神父同到省府拜访抚台，受到了款待；次日，抚台带领全城高级官员，到神父住院回访。徐听波神父总结道：“苏州从此为传教士开放了，传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并可以在那里居住了。”<sup>①</sup>

又过了数天，郎主教启程去欧洲。1866年12月8日，圣职部部长枢机以教宗庇护九世的名义，邀请全世界的主教到罗马庆祝圣伯多禄、圣保禄两位宗徒殉教一千八百周年纪念。郎主教在1867年3月7日接到邀请书，决定应邀前往。这次旅行满怀欣慰，自不待言，他还打算去法国征召些得力的助

---

<sup>①</sup> 徐听波1876年2月16日、叶春荣1867年1月20日信，见《通讯》，第6卷第83—85页；又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220页起。



手，以完成他肩负的大业。3月22日他向罗马进发，5月初抵达。我们的江南代牧就在盛大的庆祝中度过了三个月。那时在教宗庇护九世周围团聚有五百多位主教和一万五千至两万多位神父。当众主教讨论编写祝词，承认教宗为耶稣基督的代表、普世教会的元首时，按照佛罗伦萨公会联合决议宣布“尘世的产业为教会自由所不可缺的”，<sup>①</sup>郎主教荣幸地被选为远东代表，成为世界各国三十个教区长的起草委员会成员，共同磋商撰写祝词。<sup>②</sup>5月18日，庇护九世特别召见了郎主教，给我们留下了特别令人感动的回忆。<sup>③</sup>

“你们可知道，敬爱的教宗一见了我，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吗？他说：‘瞧，我的南京人，’他微笑着，重复了三遍，不禁使我在跪拜教宗时也面露微笑；但与此同时，我也不禁热泪盈眶了。我正要用口亲他的双足，他却伸手给我，我握了他的手，并亲吻了一下，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圣父便紧握我的手，和我一起以坚定而又有力的声调念完这节圣经：‘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地狱之门决不能战胜它。’以抒发他对神圣使命的充满信心，在重念主耶稣这段神谕时，我感觉到庇护九世是在大发信德。”接着，江南主教用四十五分钟时间向教宗汇报了他的辽阔教区的事业、所遭受的考验以及目前的状况。他惊奇教宗竟“对遥远教区的近况了如指掌，对一些将作为传教中心的大城市，熟悉得如数家珍，谈到已办与将办的事业，他的论断又极其精辟、正确”。郎主教向教宗奏明旧耶稣会会士与今日继承者的传教方式的差别，“首批到中国

---

① 《公会议记录与谕旨》（拉沃西斯集丛，第7卷第1094集）。

② 高龙璧：《江南传教史》，第128页。

③ 见《宗教研究》，第13卷（1867年）第282页。

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开始是向王公大人宣传福音；而我们今日，在新形势下，却先向贫穷弱小者宣传了”。庇护九世说：“你们这样作只会使你们的基础更牢靠。因一切建筑都奠基在低微之上。”接着，主教代表慷慨的董家渡教友转呈教宗一大笔捐献，作为伯多禄宗座的库金；同时转呈祝词，词文表示江南教友确认庇护九世为“智王善牧，圣教元首”，并祝教宗世权永世长存。圣父乃赐郎主教以宗座侍卫的荣衔。<sup>①</sup>

江南主教离罗马回法国，在他出生的夏龙教区逗留数天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sup>②</sup>他访问了几所本修会的主要会院，向他们介绍了南京教区的情况，激发了大批来华圣召。<sup>③</sup>这次旅行对教区来说收获很大；因为主教召来了女修会，从此，修女们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传教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她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耶稣会神父一到江南，就感到需要有法国修女来培训中国本地贞女。这些贞女都是老教友家庭的荣耀。由于局势还不稳定，当时中国人是反对女子成为象欧洲那样的修女的。<sup>④</sup>

幸而仁爱会修女已在上海普遍受到尊敬，<sup>⑤</sup>这些阻力就解除了；中国人对女修会的生活和女修会创办的重要性的事业的重要性也已认识了。戴元英监会铎在巡访教区时，已看到有必要邀请法国修女，但他认为这件事还是应当由教区主教去着手办理。<sup>⑥</sup>

① 见《宗教研究》，第13卷(1867年)第284页。

②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300、307页。

③ 同上，第305、307页。

④ 见本书，第1卷第66页；本卷第92页。

⑤ 见本卷第93页起。

⑥ 见本卷第134页。

郎主教常对人说，圣女德肋撒老是跟着他，要他在上海建立一座女圣衣院。<sup>①</sup>为了使神职人员和教友们保证得到上主的援助，一座为传教士持续不断地祈祷的本地隐修院是少不了的。在他进行传教时，也遇到不少圣善的女子，在他看来这些人似乎能被召度隐修生活。<sup>②</sup>

此外，为造就本地修女的精神修养、管理女孤儿院、掌握好女子教育事业以及在上海开办住宿女校，接收中外上层家庭的女生，授以应有的训练和教育，更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女修会。在法国寻找一个这样的、肯在中国设立分院的女修会，也是郎主教此次长途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从罗马回到巴黎后，郎主教探访了两位圣衣院的院长和另一座不愿说出名字的圣衣院。<sup>③</sup>

这三座隐修院，<sup>④</sup>没有一座响应他的来华号召。1867年9月，郎主教到拉瓦尔，给该地神学院的读书修士领避静，并给好多名修士授予圣品。拉瓦尔城的圣衣院创建于1856年，历年隐修圣召，修女源源而来，大有人满之忧，人们正在考虑设分院。上级起初考虑把分院设到巴勒斯坦，1865年，拉瓦尔的维卡尔主教去罗马时，曾同巴尔纳博枢机磋商过这个计划。由于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瓦莱加提出的条件难于接受，因此该计划未能实现。人们回想起，数年之前耶稣会巴黎省省

---

① 高龙璧：《江南传教史》，第180页起。

圣女德肋撒(1616—1682)，男、女圣衣院修会的重整者。她一生曾建立女圣衣院十七座，男圣衣院十五座。——译者

② 郎主教1862年4月26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17页。

③ 我从《圣衣院在中国建院史》一文中摘录1897年1月17日的一段回忆，稿存徐家汇圣衣院档案。

④ 圣衣院与外界全部隔离，故称隐修院。——译者

会长戴元英神父曾来访问拉瓦尔圣衣院，谈及巴勒斯坦的分院难于成功的问题时，戴元英认为在中国也许可能得到补偿。

郎主教来到拉瓦尔圣衣院做弥撒。弥撒中，他感到他的愿望定将成功。弥撒后，他和神学院院长施蒂德神父同去会客室，征询院长姆姆是否愿在上海设立一所分院。这个建议立即被愉快地接受了；接着许多修女自荐报名。主教转身微笑着向其中一位名叫埃莱奥诺·德马蒂尔的修女（她是殉教者马赖神父的堂妹）说：“你一定得来中国。”分院之事还得由郎主教与维卡尔主教从长计议。南京主教在动身之前，原则上一切都已商妥。但修女们的出发还得等到明年，因为必须待中国一切筹备布置就绪后，第一批派往江南的修女才能离开拉瓦尔。此事我在后面再叙述。

至于挑选从事直接传教工作的修女，其选定经过似乎更配称是天主圣意的安排。<sup>①</sup>

拯救炼狱亡灵的女修会，简称拯亡会，是欧仁·斯梅女士（上智玛利亚姆姆<sup>②</sup>）于1856年创立的，目的是致力于传教工作和慈善事业，并奉献此功于上主，拯救在炼狱中受苦的亡灵。1857年，上智姆姆向耶稣会巴黎住院院长奥利万神父要求派遣一位给新生修会作指导司铎的神父。苏念澄神父当选

---

<sup>①</sup> 摘自《拯亡会创立史》（未出版，见徐家汇圣母院档案，第2卷第105页起）；在《上智姆姆小传》中，人们还能找到更简明的叙述。

<sup>②</sup> 上智姆姆是该修女的会名。天主教男女修会的修女有各自的会名，仿佛佛教僧尼的法名。修女中也有级别，其名称各修会、各地区都不同。在上海一带，对高级的一般称“姆姆”即姑母的昵称，次级的称阿姨；对修女中的掌权者如会长、院长等，则混称为大姆姆。——译者

了。他在指导管理巴黎第一座会院时，就看出这是天主降福的事业；因此八年中，他在给新修会订立会规时，大部分会规便借用耶稣会的。苏念澄是耶稣会中国教区在巴黎的帐房神父。1865年他向总会长自荐，要求去中国实地研究教区的需求，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于是他就伴同监会铎戴元英神父一起奔走于江南和直隶东南教区，以后就留在上海当帐房兼洋泾浜院长。他原定来华只逗留几年，但没想到竟一直留到他逝世。

苏念澄神父的动身远离对新生的拯亡会却是个艰巨的考验。上智姆姆虽多次向总会长贝克斯神父要求召回苏神父，然而终是徒劳。总会长神父“在天主台前经过长久的考虑之后”，还是坚持了他的裁定。<sup>①</sup>

苏念澄神父同拯亡会当然保持着经常的通信；他不止一次地有意召唤几位修女来到中国，他早在巴黎时就对她们的的工作十分赏识。但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使他迟疑不决了。江南教区有求于法国修女的主要工作是要在上海开办学堂，办教育事业；可那时拯亡会对教育工作还是陌生的；苏念澄神父在中国逗留数月之后，写信说：“既然你们能为教育幼儿服务，就象为贫病者服务那样，我就请你们来中国发展你们的传教热忱。这种热忱在这多难的中国是极其需要的。天主就在你们所在之地替你们定位……倘你们愿意学习中国语言，我请会长姆姆派你们到这里住上几年，在中华帝国建立起一座拯亡会住院……倘若我们这里有了修女会，要求进会的圣召是不会少的。中国人民很可怜，但善良谦逊的女子到处都有。在

---

<sup>①</sup> 总会长贝克斯 1865 年 3 月 19 日致上智姆姆信。

修会神修的道路上，她们是能够接受教育的，进会修道也是她们求之不得的。”<sup>①</sup>

郎主教一回到巴黎，上智姆姆就到塞弗尔路的神父住院去答访他，并探问苏念澄神父的近况。她还从未考虑到让她的年轻的修会到远地传教区去。她要求南京主教于次日即8月4日到巴鲁耶尔路小堂举行弥撒。主教在作圣祭中，那种拯亡会正是他教区所需要的女修会的思想老是萦绕着他。弥撒后主教即向全体修女介绍了南京教区的情况，并告诉她们，教区十分需要她们。分别前，主教又问上智姆姆：“姆姆，你不会不知道我献祭的目的吧！我是到拯亡会来寻找拯救者的。”姆姆答称主教的计划她并非一无所知。主教就说：“那么，你们是否仅仅只愿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里做拯救者？”“噢，不，主教大人。”上智姆姆热情地回答说：“我们愿在全世界……”主教说：“我们会看到这个事实。”当人们介绍一名听了主教的话感到特别动心的初学修女时，主教对这位久已希望去传教区的初学修女说：“努力吧！孩子，把你的意志仰合天主的圣意，并多多祈祷吧。”

这天下午，上智姆姆惊奇地见到郎主教又来回访；同来的还有十八个月来没有到过巴鲁耶尔路的巴黎省省会长德蓬尔瓦神父。省会长自述，今天早上在自己室内踱步念他的日课经时，还不知道那时郎主教正在这里访问拯亡会，但拯亡会必须到中国传教区的打算，他已经想到了。“主教应当在拯亡会里找寻增援者。”姆姆很受感动，重新召集修女们。德蓬尔瓦神父请郎主教用中文念一遍“亚物玛利亚”后问全体修女：

<sup>①</sup> 苏念澄致圣心玛利亚姆姆信，见《拯亡会创立史》，第2卷第203页起。

这种语言是否悦耳好听……这里是否真有到中国去的圣召？看到听众中间骚动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谁愿意去中国的请举手。”立刻，有很多修女举了手。总会长姆姆很感动，坚定地说：“孩子们，谁在天主台前自信真有蒙召到中国去的，请起立。”同样多的人数站了起来。省会长神父以赞赏的口气说：“愿天主受赞扬。”同时，他自己也立了起来。

上智姆姆办事一贯审慎，她要每位报名者各写一份书面申请，她还把8月4日那天的一切经过写了详细报告交给了他的指导司铎奥利万神父，同时附寄一份按照圣依纳爵的精神对教区的计划提出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书。奥利万神父非常赞成，安慰修女“放心地去中国，把去里昂的事暂且放一放”（曾准备在里昂建立分院）。修女们和神父开玩笑说：“神父，你难道不怕魔鬼也会装成光明的天神么？”“魔鬼乔装郎主教了！真是异想天开，好吧，孩子，放弃这些幻想吧！”8月27日，总会长姆姆写信给郎主教，当时郎主教不在巴黎，信上通知拯亡会决定接受主教提出的使命。有几位修女、姆姆和阿姊将随郎主教同舟共航，其他修女不久之后再陆续来华。郎主教离巴黎时，经当地主教批准，在巴鲁耶尔路会院的来宾留名册上写道：“愿这一天受到赞颂，这天是天主上智引导我来到这座神圣的屋子，为亡者炼灵奉献圣祭……我相信，对敬礼亡灵几乎偶像化的中国，它不久将基督化。拯亡会的主要目的不仅使教友满意，也会使教外人满意，他们不能再责怪教友不孝敬祖先了。”

南特分院的院长圣心玛利亚姆姆得知去中国传教的计划后，立即献身自荐，她就被指派为新创女修院的院长；她先同一名女伴随郎主教乘一艘邮轮动身，准备到中国后，专为安

排接待下月陆续到来的修女们。庇护九世应总会长姆姆之请，特颁赐远行者以宗座遐福：“望辣法厄尔天神一路上偕同你们，天主降福于你们，引导你们。”<sup>①</sup>

郎主教于10月20日，同计雅三、费赖之<sup>②</sup>两神父以及两位派往中国的第一批拯亡会修女上了船。在整个航程中，主教每天都要谈到教区及教区事业。印度马德拉斯总督的夫人纳皮埃太太对法国修女非常友好，经常领她们到她官舱里给她们补习英语。<sup>③</sup>

12月6日早上，“梅利斯”号邮船到了吴淞，比预计提前了两三天。这天，没有人去迎接。一位邮政工作者请主教登上他的邮车，把主教送到了洋泾浜。时值中午，神父们正在用午餐，都惊奇主教怎么会突如其来。教友们当场开了一次热闹的欢迎会，使人想起了两年前欢迎新主教时的盛况。主教感到特别快慰的是，这天在董家渡主教大堂竟有一千二百名教友为教宗领圣体，弥撒后主教颁发了宗座降福和全大赦。<sup>④</sup>

苏念澄神父到“梅利斯”号邮船接引圣心玛利亚姆姆和她的同伴，领她们到了领事白来尼先生官邸。这两位修女在那里住了三天，受到了他们诚挚的招待。9日，领事用专车把她们送到了徐家汇，圣母院的贞女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她们热情地把她俩迎进了王家堂，第一夜共享了一席中国式的盛宴。1868年1月8日，方济各类日斯姆姆和三位辅理修女也到来

---

① 见《拯亡会创立史》，第2卷第198页起。

② 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

③ 见《圣心玛利亚姆姆传》。

④ 郎主教1867年12月21日信；又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311页起；计雅三1867年12月14日信，见《通讯》，第6卷第166页。



了，即同她们会聚在王家堂。

修女初到上海时的情况、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她们日常作出的牺牲，神父们都生动地记叙了下来。<sup>①</sup>

王家堂圣母院是当时中国贞女们聚居的场所，她们的领袖施姆姆早在 1855 年就第一个被薛孔昭神父称作为好姆姆的。<sup>②</sup>

施姆姆带领着三十二名献堂会修女、六十六名孤儿和女学生；总共九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懂法语，也没有一点点欧洲生活习惯的常识。修女们在开始时真是困难重重，毫无办法。新来的修女只会讲苏念澄神父教她们经常用得着的三句上海话：“迭(这)个叫啥？”“好哉”(够了)，“齷齪”。这末了一句是用来对付那个大胖女炊事员的。例如她要知道咖啡的冷热，就把她粗粗的手指浸入杯内测温，用抹布揩牛奶罐。抹布如能说话，也要埋怨为什么一切都要它来干。修女们还得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才习惯于中国妇女们的令人厌烦的好奇心，她们老是来探听西洋姆姆们的所作所为，形影不离地跟着她们。进餐时，修女们关上房门想安静一会儿，就有人爬上凳子，从窗帘上端窥视她们。这就是姆姆们称之为“好天主的糖衣药丸”。最初几天，修女们感到最痛苦的就是小堂内不供圣体。由于王家堂没有神父常住，郎主教认为这所小堂不能供圣体；几星期后，徐家汇院长利庸乐神父解除了主教的疑惧，从此不再拒绝供圣体，使那些为中国妇女作出如此重大牺牲的修女们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sup>①</sup> 《拯亡会创立史》，第 2 卷第 250 页起；又《圣心玛利亚姆姆传》，第 141 页起。

<sup>②</sup> 见本书，第 1 卷第 355 页起。

圣母院的中国妇女们很服从命令，她们谦虚、诚朴，使法国修女们大受鼓励。特别是那位姓施的好姆姆，她只求自己成为这个集体中的最低微的一员。贞女与女生们尽管看到新来的洋修女出了洋相，不免哈哈大笑，却又说不出怎样表达她们的知恩之心，只说：“她们很聪明，得法得‘要死’（上海话，最高级形容词）。”又对修女们说：“你们不再是西洋修女，而是中国姆姆了。”

数天后，新来的修女也学会了一点上海话。1868年1月，圣母院接待两百多名来自各堂的贞女做避静。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圣心玛利亚姆姆已能开始讲解要理问答了。当时，徐家汇神父住院的河浜东面，正在建造大批宽大的房屋，准备安排给请来的拯亡会修女创办种种事业。1869年2月1日，圣母院就从王家堂迁到了徐家汇；从此它成为江南教区最光荣的事业之一，后面我将详细叙述。

王家堂圣母院迁走后，房屋并没有空闲多久。1869年2月，人们得到通知，首批圣衣院修女即将从拉瓦尔动身来到江南。1868年12月11日，拉瓦尔主教维卡尔给五位自荐献身于中国的修女一封准许设立分院的通知。通知说：“南京主教来拉瓦尔向我提出，圣衣院也向本主教要求派遣几位圣衣院修女去上海建立分院……本主教在天主台前郑重考虑之后，毫不踌躇地答应了可敬的主教的要求。因为本主教知道在耶稣基督内，我可爱的修女们是遵守会规的模范……尤其是本主教看到，去遥远的国家设立分院的建议是天主上智奇妙的计划。”维卡尔主教任命耶稣玛利亚姆姆为院长，埃莱奥诺修女为副院长，并为赴中国圣衣院的开创者谋得“听命圣功”，命令她们及早到达新院，在南京主教的领导下，做一个恪守圣衣

会会规以及保持修会良好惯例的修女。<sup>①</sup>

圣衣院修女于12月12日离开了拉瓦尔，本城的两位太太伴送她们到马赛。19日登上轮船，同往的有几个小队的传教士，都由倪怀纶神父率领，这位倪神父就是十年后接任郎主教的倪主教。1869年2月3日，“佩吕兹”号邮船到达上海；圣衣院修女即到洋泾浜略事休息，几小时后，她们便坐轿子到了徐家汇；她们在圣母院作客约半个月。<sup>②</sup>

2月19日，圣衣院的修女们迁进草草装饰成的王家堂隐修院。开始时，圣衣院开放三天，让中国女教友任意参观。24日，郎主教宣布封门。从此，大日课按常规公念了；主日及大瞻礼日，申正经和夜课经还得公唱。那时有三位修女害着病，所谓公唱，也只剩两个人了。而两位健者也先后得了病。圣衣院的编年史修女记述道：“因为健康关系，我们唱夜课经的人太少了。我们请天神们来代替我们中的缺席者，请天神们帮助我们歌颂赞美天主吧，我们真的感到了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觉得我们的声音变得更有力量、更响亮了。”开始时，每星期内我们只能望到三台弥撒，没有弥撒的日子我们也打钟，代之以公拜苦路。

一排木格子栅栏<sup>③</sup>把弥撒间与教友们的小堂分隔了开来。王家堂的热心教友们常来小堂，静听法国修女们的咏唱

---

①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372页。

② 见《中国圣衣院创建史》。

③ 圣衣院是隐修会，也是苦修会，它与外界是绝对隔离的，望弥撒时也一样。所以在神父做弥撒的弥撒间一侧，装有黑纱的木格子，格子内的人透过黑纱可以望见弥撒，栅栏以外的人却看不到里面。转筒是圣衣院修女授受弥撒间用品，如祭服、祭器等特制可以旋转的容器。——译者

祈祷。马历耀修士按教会法典规定，为圣衣院修女们安装了一排领圣体的木格子和一个转筒。1869年圣神降临瞻礼，来了第一个要求进圣衣院的修女，但她的身体承受不了圣衣院的艰苦生活。1869年7月31日圣依纳爵瞻礼，来了第一个兜白纱的修女<sup>①</sup>玛尔大。她持之以恒地努力地为隐修院效劳。要求进圣衣院修会的人不断前来，修女们提出，进圣衣院修会的人，在初学之前必须先学习一点法文，并能读拉丁经文，这需要长时期的培训。于是好多女子只得灰心地退出了。

圣衣院一开始就使上海及其近郊的教友们认识到，这座新建的祈祷和牺牲的中心给江南带来了多大的神益。于是他们就慷慨地施舍了大量的东西。不少良好的教友人家遇有重大事情，就惯于要求圣衣院修女们为他们祈祷。郎主教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的预言证实了。

宗座代牧回来后，愉快地得知在安庆已美满地创立了教堂，金式玉神父在镇江、丹阳、扬州等地的工作也有进展。他写信到法国说：“一片广阔的田野给福音开放了。但愿天主保存我们的工作人员，并给我派遣大批工作人员来。”<sup>②</sup>

1868年，郎主教致力于他艰苦但也慰人的教务巡访，看到教区因叛军内战而造成的创伤已迅速恢复了。他写信去法国说：“我从欧洲回来后，下访出巡是我的首要任务。想到不久我又可以远行，<sup>③</sup>这对我确是个有力的鼓励。在巡访的奔波中，我简直分不清是疲劳还是快慰，到处熙熙攘攘，人山人

---

① 兜白纱修女：圣衣院初学修女和修女中专在厨房、田园干活的修女兜白纱，上海一带称之为阿姊，其余的修女都兜黑纱。——译者

②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312页。

③ 指去梵蒂冈开公会议。

海；成千上万个教友和非教友赶在我的过路上，集在我的终点站。为使围观的人群见到我，听到我的声音，我必须登上高处。我到处受到官员们的欢迎，有的还是大官，其中有旧相识、有老朋友；这使我的圣职更为突出，消除了人们的偏见，也稳定了群众的情绪。自从我从罗马回来后，那儿的好气氛一直滋润着我的整个心灵。圣父的接见不仅使我欣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影响了这里的教友和非教友。”<sup>①</sup>

从罗马回来后，郎主教常穿西式主教服装，认为这样更能在中国人面前显示出尊严；没想到就是在这一次巡访中，竟能因此而使他避免了一次严重的灾祸。1868年10月，正当他从海门去崇明时，一艘躲在江心小岛后的结实的海盗船向主教船急驶而来，主教船即将被追上了。主教向大圣若瑟许愿，并请教友水手们热心祈祷之后，命令把船靠小岛上岸。海盗船越追越近了。主教穿着紫色披风，头戴镶红四角帽，胸佩闪闪发光的金十字架，迎面朝向海盗那边走去。这时一个教友大声呼喊：“这是主教船，当心，不许碰！”海盗们迟疑了一会儿，没有靠岸，却掉头重返他们的江心小岛。<sup>②</sup>

这年年终，上海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宗教礼仪，使上海及其近郊的居民们回忆起在叛乱战争中所受到的痛苦以及法国给予灾民们的慷慨援助。我们还记得1862年，为了纪念费都尔神父与卜罗德海军上将，<sup>③</sup>皇上曾敕令在浦东钱家与浦南南桥建造两座圣堂。钱家教友钱景楠原是梅德尔神父的传教先

---

① 郎怀仁1868年7月16日信；又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375页。

② 同上，第380页起。

③ 见本卷第59页。

生，因平乱有贡献，获得宝蓝顶子。他竭力募捐并敦促地方官提高捐税，提供造堂费用。<sup>①</sup>

1864年12月8日，钱家天主堂举行了奠基礼。罗礼思神父设计了一张罗马式大殿样式图，钱景楠和他的朋友们按照他们的思想作了修改，造出一座具有中法合璧、别具一格的教堂建筑。<sup>②</sup>

开堂与祝圣大礼定于1868年12月8日举行。郎主教在八位神父的环绕下，按教会庄严隆重的大礼，祝圣了新堂。法国驻沪领事白来尼先生和代表法国海军的“阿斯皮克”号的德内尔西亚司令，都从上海赶来参加。上海道台也派来一位代表，九位当地文武官员也出席了。圣堂原只有一千五百个座位，而这天拥来的教友却有两千名以上，真是济济一堂。一座漂亮的追思台设立在圣堂正中。新堂祝圣礼成，郎主教即行大礼追思弥撒，之后又作了大礼追思。法国领事向在场的中国人士作了简短的讲话，追念传教神父和法国海军在上海附近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功劳，表示希望他们为中国而流的鲜血换来两国之间的永久和平。郎主教也斟字酌句地作了得体的谢词，感谢光临的来宾以及这次盛会的组织者。之后，中国神父蒋邑虚宣读皇帝敕建教堂谕，上谕也提到了法国给中国的帮助，并祝愿两个“姊妹国家之间”的和平永存。接着，在场的全体中国官员同法国领事握手言好。最后，一席丰盛的筵席结束了这次盛会。教外人对这次盛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钱家的新圣堂很快便成为宗教生活的中心。

---

<sup>①</sup> 据在浦东传教的康治泰神父的回忆录，得知增加捐税也是困难的，因教外人早已忘掉法国海军的功劳了，见《我的自传》，《徐档》，卷宗H。

<sup>②</sup> 康治泰1869年8月10日信，见《神学院》，1867年12月，第21页。

数月之后，郎主教照他的计划到南京正式拜访总督。<sup>①</sup>那时，顾培原修士营造的南京新住院刚刚落成。这座新住院可容纳十八至二十位神父。底层正中是一大间中式大厅，以后，就在这里接待总督、法国海军上将和法国外交官员。<sup>②</sup>人们“希望这所住院成为安徽和大半个讲普通话的江苏省的中心，就象上海是讲上海方言的中心那样”。人们还想在南京造一座主教大堂与一座小修道院。<sup>③</sup>

马新贻接任曾国藩当了南京总督。1869年4月7日，马总督在极体面和极友好的气氛中接受了郎主教的拜访。总督对主教说：“希望主教常驻这里，我们彼此来往越多，我们只会感到越高兴。”次日，马新贻来天主堂回访，对新住院很为赞赏；接着，四年前曾竭力反对城内造堂、造住院的若干大员也竞相向主教道贺，并表示友好。郎主教只相信他们说的一半话，但仍满怀希望圣教广扬。他写信给省会长报告南京之行说：“传教活动已在全省展开，在西区，我们也象巨人一般在阔步迈进着，我们急需人手。”<sup>④</sup>

假如我们相信当时在座的高龙鞞神父所说的是真的话，郎主教同总督马新贻会谈后，似曾对南京的神父们宣布了一件大事。他已认出这位新总督原来是1853年至1854年在清军反攻小刀会战役中，因英雄善战而出名的那位青年军官。<sup>⑤</sup>

---

① 康治泰 1869年8月10日信；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384页。

② 高龙鞞 1869年5月2日信，见《神学院》，1869年12月，第3页。

③ 高龙鞞 1869年5月2日信。

④ 郎怀仁 1869年4月19日信。

⑤ 见本书，第1卷第271页起。

他当年受了重伤之后，被抬到董家渡医院，石怀德修士曾给他精心治疗。郎怀仁神父多次探访病人时，对这个伤员特别关心，他欣赏他的聪明爽直，曾给他讲解过教理。一天，他病情加重，正在医院的罗礼思神父问他是否愿意领洗，他表示同意，于是神父就给他付了洗。马新贻在病愈离院后，在曾国藩率领的反攻太平军的战役中又立了大功，他先在浙江担任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在江苏那样。1869年，当郎主教重新见到他时，他已被提升为帝国的重要官员了。主教对南京的神父们说：“正象一般人们能辨认出一个人来那样，我肯定这位官员就是我们的总督大人。”高龙攀神父肯定有这回事。而且数年后他向郎主教叙述时，“主教要他重新把这件事详细地记下来”。<sup>①</sup>

如此耸听的插曲，我却从未在同时代的来往信件中见到过。1910年，我曾问过当时和郎主教一起工作过的帅维则和康治泰二位神父，他们也回答从未听到郎主教提及过此事，而高龙攀神父曾多次给他俩讲述他在《南京新会口的初期》的回忆录里叙述的种种情况。方殿华神父在他的佳作《南京今昔》里，却对此表示怀疑。<sup>②</sup>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新贻在浙江同太平军作战时，他和德克碑与买忒勒的中法联军相处得比较好，不象他许多同僚们那样有较严重的排外思想。他同传教士和法国政界人士交往时，也比较正直友好，这在中国当时的官场中是很难得的。确认传教士正当权利的大好机会，似乎

---

<sup>①</sup> 高龙攀：《南京新会口的初期》，《神学院》，1867年，第158页起；高神父还把这段叙述扼要地写进他的《江南传教史》，见该书第149页起。

<sup>②</sup> “包括郎主教在内有好多传教士肯定地说，马新贻在上海战地区医院里曾要求领洗而进教”，见方殿华：《南京今昔》，第248页起。



很快就会到来了。可是，郎主教和他的神父们的希望还得再一次落空；官员们和文人学士们还不止一次地对教会和教会事业流露出刻骨的仇恨。

## 二、从 1869 年至 1875 年的教难

部署安庆 宁国府教友会口的创建 1869 年  
安庆和建德的暴动 罗淑亚先生长江之行 得到的  
赔偿 马新貽阻止南京暴动 天津屠杀后的恐怖  
谷振声神父余山许愿 建造圣母进教之佑大堂 马  
新貽被刺 郎主教参加梵蒂冈公会议 1871 年的咨  
议会 天津屠杀的赔偿 若干洋人反对天主教 中  
国方面的记录 创立徐家汇天文台与博物院 创立  
若瑟学校 创立上智母院 创立圣方济学校 创立  
虹口圣心堂 部署苏州堂口 余山开堂 宁国府开  
教初期的辉煌成就

我们已经看到，金式玉神父于 1866 年 4 月远行传教到安徽接近湖北的六安州，那边已有几家望教者。地方官很恶劣，硬说望教者把“洋鬼子”召来了，于是采取种种手法欺压望教者。因此，金式玉的第一次远行也失败了。<sup>①</sup>

金式玉神父不是甘心于失败的人，只因安庆和南京的事情尚未解决，所以六安对金神父的拒不接纳只得暂且不提。1868 年底，上海的法领事把一份强硬的照会送给了这个遥远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53 页起。

地区的官员。<sup>①</sup>

1869年5月，韩伯禄神父作了一次大胆的远行，他去拜访了六安州州官与英山和霍山两县的知县，并从这些地方官那里获得对天主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安民告示。虽有教难，而望教的保守教友还是坚贞不屈。<sup>②</sup>韩神父在探访他们后写道：“这些都是真正的望教者，可惜他们胆小如鼠，又缺乏教理知识。但只要有一位神父或传教先生常驻在那里至少一个月，他们的胆小与无知是可以纠正过来的。群众已完全准备好，渴望有人来给他们讲解教理。在地方上造一座神父住院，为老百姓施诊送药、访问居民，我相信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sup>③</sup>

由于人手缺乏，教区上级实现不了这个计划。就是在安徽南部的东门老会口也同样如此，只能由一位路过神父顺路去探访他们。<sup>④</sup>这种情况还得延续好多年。

即使在安徽省的中心安庆省城，韩神父也只能住进雷邈骏神父用智谋与毅力斗争得来的那所小屋子里。<sup>⑤</sup>1868年12月底，他写道：“我们总算取得了这几间小板房的所有权。圣诞之夜，我便宿在这陋室里，举行了子时弥撒。我们有两间房间，每间各拦出一间小小的工作间，还有第三间房可作为接待来客之用。”<sup>⑥</sup>

最后，由于天主上智的安排，为我们引来了一群湖北、河

---

① 金式玉 1869 年 7 月 25 日信，见《神学院》，1869 年 12 月，第 17 页起。

② 韩伯禄 1869 年 6 月 29 日信，见《神学院》，1869 年 12 月，第 19 页起。

③ 见韩伯禄 1869 年 6 月 29 日信。

④ 见本卷第 154 页。

⑤ 见本卷第 131 页起。

⑥ 见皮埃尔：《郎怀二主教传》，第 2 卷第 243 页。

南、江西籍的老教友，他们在安徽省各地定居，形成了若干个望教者集中的旺盛的中心点。原来在太平军战事之后，在安徽省最肥沃的若干府和县中，居民或死亡或逃走，因此农田劳动力奇缺。省里的大官们只得向受战祸较少的邻近地区号召移民。<sup>①</sup>

应召而来的有许多是老教友家庭。他们定居在宁国府与池州府(今称贵池)。1868年2月，这些入迁来的教友中有几名来到南京，教请神父去看看他们的村子；虽然他们愿意在异乡常住下去，但是认为必须在宗教生活上得到满足。金式玉与韩伯禄就在这年春天，乘上“圣玛利亚”号到了宁国府；他们发现在水东附近的许村到了五十多个湖北籍的病贫交迫的教友；在他们七十多个移民中，已有十一人死去。1869年，叶春荣神父曾多次到宁国府，他除给教友们施行圣事外，还给了他们以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些受苦人真把他当作救命恩人。<sup>②</sup>尤其今日这个地方家禽家畜所以特别美好，是由于叶神父给他们引进了优良品种。教友们得到神父们的支持，向官家租了些田维持生活，后来又召来了许多至亲好友；这样，到1869年底，约有三百名教友聚居在许村、芦村、水东三个相邻的村子里。<sup>③</sup>

末了，江西代牧安若望主教指示金式玉神父去江西边界的建德县<sup>④</sup>，因为那儿有许多曾到遣使会神父处要求学习教

---

① 郎主教1869年4月12日信，见《神学院》，1869年8月，第22页。

② 巴黎省省会长德蓬尔瓦神父给了叶春荣神父大量的救济金，使叶春荣得以放手施舍(《法信》2609)。

③ 戎慎之1867年7月31日信，见《神学院》，1869年12月，第56页。

④ 建德县今名秋浦县。——译者

理的望教者。这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于1868年10月远行到了建德。不久他写信说：“这些望教者都很能干，他们组成了两个中心点，联系了不少附属的小会口，只要有可能会，我们就可经常去探望他们；今年秋天，我们预备去开办几处公所，让传教士们歇歇脚。”<sup>①</sup>

因此，当时安徽成了传教的中心，直到江南教区的边缘都发现有教友的集团。郎主教于1869年4月12日，愉快地写信给巴黎省省会长神父说：“安徽省的传教活动广泛地进行着，甚至发展到省的西边。官员们贴出告示，号召别省居民来该省定居，以增加人口，并许诺给以无主的空地、空屋。迫于饥荒而远离家园的邻教区的教友就移居到我们这里来了。而且，他们迫切希望要有神父，这样便形成了许多中心会口。我们怎能迟迟不理睬他们的呼声呢……教区在前进，象巨人一般地阔步前进……我们急需要人手！……”<sup>②</sup>

可是这些新会口，不久便遭受了教难的考验。

教难从省城安庆开始。是传教士又是自然科学家的韩伯禄神父住在那座简朴的住院里，他把时间全花在传教工作和科学研究上。1869年11月3日，他有事要去上海，在自己的小船上等轮船过来。突然留守看家的一个工人急冲冲地跑来报告，说集结在省城应试的一群考生在神父动身后，立刻冲进了住院，目前正在抢掠。韩神父毫不犹豫，立即回城；路上遇到了一批青年考生，他们正背着从神父住院抢来的东西；一见神父，他们便丢下赃物逃散了。神父回到屋里，他认为自己仍

<sup>①</sup> 韩伯禄1869年7月25日信。

<sup>②</sup> 兰廷玉著有宁国府开教的详细记录，题目是：“中国新教区的一个插曲”，刊登在《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8卷第2、14、26页起。

是这屋的主人。但他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当夜，考生们聚集得越来越多，他们高喊着：“杀啊！烧啊！”砖瓦、石块冰雹似的投来。韩神父感到要抵御实无能为力，而且有性命的危险，他马上从后门出走到江边，潜进原在等他的小船，乘了从上游来的第一艘轮船到了上海。神父走了，屋子被彻底洗劫了。地方官仅在作案结束后，才姗姗而来。他拿走了一串住院钥匙，缴存府台处作为备案。<sup>①</sup>

那时安徽总铎金式玉神父正在下访六安州的新开会口，并准备择地造一所神父住院。听到报信者报告了上述事件后，就在11月10日返回安庆，直奔存放住院钥匙的府台衙门，但未被接见，而且又极困难地才找到了一家肯接受他的客店。道台、抚台都拒不接见他，只传给他一些空头诺言与无力的声明。金式玉向他们声明要向法国当局控告，于是就回到了上海。那时，韩伯禄神父已在上海详细汇报了此事。<sup>②</sup>

几天后，神父们得到了更严重的消息。我们知道，在安庆对面长江右岸的建德县已有几处望教者的中心点。<sup>③</sup>当地官员看到本地区与邻省江西的归化运动日见突出，深感不安。他们听到安庆的神父住院已被洗劫，便认为洋教士已被驱逐出安徽了，乃煽动教外无知愚民袭击望教者的村子。地方上的旧恨宿怨加上各派反洋教的偏见联合一气，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原来许多望教人家是因为同邻居不和，为了得到洋教士的庇护才保守进教的；可是，传教士也只在事后才知道了其中

① 《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25页起；又金式玉1869年11月30日信。

② 金式玉1869年11月30日信。

③ 同上。

底细。<sup>①</sup>

这样，一连十五天，建德县内发生了真正的内战。12月8日，一帮家伙冲进教友住房，大肆抢劫；他们烧掉了十一所房屋，杀死二十二名；有两个女孩，一个六岁，一个仅仅两个月，也都被投入火中活活烧死。

有一名在江西领洗的教友，是神父们在地方上传教最得力的助手。人们已警告他，假如他被捕的话定将被处死，所以劝他逃跑。可是他拒绝了，当乱民冲进他的屋内时，他正跪在圣像前祈祷。暴徒一见他，逼他烧掉圣像，并对他说：“你有祖宗的牌位可以敬拜，为什么偏要信奉洋鬼子的洋教？”他回答说：“不，决不。”头目一声令下，这个教友立刻首级落地，躯体被投入火中。假如没有早被金式玉神父争取得来的一位武官的果断行动，那场灾祸还要大得多哩。这位武官带领村民赶走了暴徒，才挽救了靠近他宅子的那所教友中心会口。<sup>②</sup>

在江西也出现了类似的惨剧。此外，不久前在四川，一次真正的教难爆发了；外方传教会的马神父和李神父同许多教友都在这次教难中惨遭杀害。<sup>③</sup>假如不迅速地加以制止，那么一场普遍的宗教迫害肯定将在全国猖獗起来。

当时，法国驻北京负责外交事务的是罗淑亚伯爵，他是伯爵蒙塔朗贝尔的内兄，是公使馆的一等秘书；1868年11月，兰盟公使回国后，罗淑亚伯爵当上了法国驻华公使。<sup>④</sup>

---

① 见高龙辇：《江南传教史》，第147页。

② 高龙辇1870年1月4日信，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91页起；金式玉1869年12月、1870年1月信，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265页。

③ 《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2卷第113页。

④ 见方震华：《南京今昔》附录，法国驻中国公使名录。

他对教会的事情非常关心,他知道,教会正是法国在华势力的最好的支持。<sup>①</sup>于是,他决定组织一支舰队,溯长江而上,如有必要,直进四川,要求四川省当局予以必要的赔偿。他在上海准备这次远征时,先遇到韩伯禄与金式玉两神父,后又接见了从建德县来的教友代表,了解了上述的惨剧。这些惨剧促使舰队从速启航。舰队由“维纳斯”号、“迪普莱克斯”号、“科特洛贡”号、“蝎子”号几艘军舰组成,司令是莫代先生;还有从日本驶回来的“阿斯皮克”号和“火焰”号两艘军舰,不久也将同舰队汇合。<sup>②</sup>

统率这支舰队的海军上将科尔尼利埃-吕西尼埃应召赴交趾支那,但他表示至少去南京,参加法国公使同马新贻总督的会谈。

舰队于1869年12月24日到了南京城外的下关。总督给公使和法国军官们提供了一座专为高级大官下南京时住的宾馆作为招待所。罗淑亚先生表示宁愿住在教士住院,并在那里接见总督。事情就这样办了。12月24日晚上,法国公使、法国海军上将、法国总领事拜访了马新贻。25日圣诞节,马新贻由盛大的仪仗队陪同,来天主堂答访。这次纯属礼节性的会见,没有神父在场。正式的会谈仅在26日开始。法国方面提出,为赔偿安庆传教士所受的损失,要求在城内拨给一块宽广的无主土地,并依法惩办祸首;至于建德县教友与望

---

① 见罗淑亚:《北京》,第287页。

② 有关这次远征事,见高龙攀与费赖之1870年1月4日、6日的信,刊登在《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9页;罗淑亚:《北京》,第333页起;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337页起。

教者所受的灾祸与所牺牲的人，“必须以罪行轻重按法惩办，以命抵命；使于坏事的人有所恐惧，加强双方友谊，公开执行条约”。合理的赔偿都一一兑现了。

由于中国官员们惯常的狡猾欺诈，文件编写了三天后，人们看到重要的文句被遗漏了，有的含义模棱两可，所以应当重写。<sup>①</sup>但马新贻比较诚心地遵守条约，并愿同法国人和好下去，何况舰队在场，使众人多少收敛了些。<sup>②</sup>

12月29日，总督接受了罗淑亚先生的全部要求；一位神父去安庆接收赔偿的土地；马新贻又派了一位代表去建德查办作案的罪犯，并监督执行。法国公使则密切注意处理这事的全过程。

总督还发出告示，张贴在江南省的各府各县；每位神父也各得一份原稿。告示对天主教会极表好感，它盛赞教会的纯洁正直，奉旨恩准全国信奉；承认法国传教士们有权“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严斥安庆、建德的闹事者；规定如果有人敢重犯“定即按律严惩不贷”。安徽抚台也发出类似的告示。费赖之神父写道：“照我看来，法国对远东的天主教已好久没有作出如此漂亮、如此有力的表示。除非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才能找到类似的情形……倘若以后人们要继续保持这种以舰队作后盾的姿态，使人遵守和约，那么必能收到更值得庆幸的成就和更多、更大的成果。”<sup>③</sup>

---

① 高龙攀神父信件，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93页起。

② 一名中国官员问上海法领事的译员狄龙先生：“你们要开炮么？”“为什么你如此急于要知道？”“我知道了，我可托故请假远远躲开。”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94页。

③ 《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94页。



结果，困难又来了。12月31日，罗淑亚离南京去安庆、九江和汉口。他从满怀仇恨的两江总督李鸿章和四川抚台那里都获得了与马新贻类似的让步与诺言，罗淑亚就认为任务完成了，便不再进入四川，遂由陆路回到北京。<sup>①</sup>

总督们同法国公使签订的协定，下级官员们又将怎样去贯彻执行呢？马新贻的诚意似乎无可否认，<sup>②</sup>可是他的属下丝毫没有他那样的诚意，这一点，人们不久便见分晓。1870年1月，金式玉神父到了安庆。按照南京协定，教士指定土地，由官家买进，再赠予教区作为赔礼。金式玉同抚台、府台、知县们反复讨论第一块土地历时达四个月之久。他们都说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尚未确定，所以不能出售。“起初说，这块土地分属四个业主，不久竟说有三十多个真假业主。这些所谓业主，又分散在东、西、南、北四方，离安庆都有一、两百里，怎能同他们接洽呢？还有个老寡妇赖在那里，说这块土地是她丈夫的坟地。她啼哭叫喊，说决不能和她的恩爱丈夫分离。这简直是在演戏！神父放弃了这块土地，人们领他去看距离不远的另一块，面积与前一块相等。但又遇到新的同样的刁难”。<sup>③</sup>

幸亏金式玉神父具有与逆境作战的顽强的毅力。5月5日，他终于宣布一切都办妥了，他得到了一块美好的土地。今

---

① 罗淑亚：《北京》，第334页起。

② 高龙攀：《江南传教史》，第164页记有一件人们罕见的细节，证明总督的诚意。马新贻在寄给罗淑亚先生的三份布告上，按中国的习惯，法国皇帝与中国皇帝的名字，应当分写顶格，而天主两字，则写得比皇帝的名字还要高一格。可是在“邸报”的复稿上，却没有这样突出（据他个人可靠的回忆）。

③ 南志恒1870年3月16日信，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170页。

日,已在这块土地上造起了圣堂、学校和住院。<sup>①</sup>

在建德县则演的是另一幕戏剧。<sup>②</sup>当地官员硬要人们相信,上次12月暴动的罪魁祸首就是教友;衙役假装四出捉拿仇教者,却又故意不逮捕他们。1870年初,建德县又发生了凶杀案,于是监禁在牢里的教友再次尝到了狱吏的酷刑;金式玉神父好不容易派了传教先生前去探监,给被囚教友以援助。为了伸张正义,必须由城里的绅士出面证明教友们是无罪的;为了逮捕真正的凶手,又得让驻上海的法国领事梅让先生出来干预。3月,军舰“科特洛贡”号又出现在安庆江面,最后罗淑亚又威胁性地扬言说:“要亲赴南京,敦促协定的执行。”<sup>③</sup>

5月,教友被宣布无罪释放。迫害他们的主犯被判遣回原地,他们的住屋让给了流亡与逃跑的教友。教友们重返建德,真似凯旋一样,“船上扯起画着十字的三色旗。他们一路盛赞法国的胜利,盛赞他们的信仰战胜了教外人”。他们所受的损失,几乎全部得到了赔偿。<sup>④</sup>

新教友也经受了考验。他们在流亡或监禁时,始终坚持信仰,忠贞不屈。只有少数望教者为了避免虐待,自称“没有领过圣水”(洗礼),这也是事实。其他人则拒绝一切威胁利诱,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信仰。这个新会口基础打得好,以至于后来发展得很快。

数月之后,在南京教区又遇到了很大危险;倘若敌人的计

---

① 金式玉1870年5月6日信,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245页。

② 金式玉详细记录,见1870年1月至5月信,同上,第263、274页起。

③ 罗淑亚1870年4月30日致马新贻总督信,见《法使馆》。

④ 金式玉1870年5月6日信,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276页。

划得逞，那么教区在内地的一切事业将全部被毁，大多数的传教士将被杀害。

几个月来，控告、诬蔑外国传教士的各种罪行的肮脏小册子已散遍了长江流域。小册子中特别诬蔑当时早已建立、为各教区特别关切的育婴事业。小册子胡说传教士及其本地助手们是偷小孩的拐子。他们所以如此热心收养舍弃的孩子，为的是杀害孩子，挖出他们的眼睛、心、脑子，用以施行邪术。<sup>①</sup>

这些荒谬无稽之谈，连广为散布的文人们自己也未必相信，可是盲目的群众却信以为真，因此激起了公愤，造成了暴乱，使中国各教区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罪责应由一批文人承担。在安庆对金式玉与韩伯禄两位神父的攻击，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出于这些卑鄙的小册子。由于教区常常能胜利地抵制那些文人们的挑衅，因此更增长了许多考生和低级官员的复仇狂。在南京，就出现了一个反传教士运动的头面人物——陈国瑞。<sup>②</sup>

陈国瑞的家庭出身不明，只知他年青时就当兵。他追随鞑鞑名将僧格林沁，不久成了他的螟蛉子。僧格林沁是1860年大沽和八里桥战役的败将。陈国瑞当然也继承了他继父对洋人的一切旧怨宿恨。他住在扬州与淮安之间的大运河畔，他的高级武官头衔使他能豢养一支独特的、由他的旧部下和凶悍的盗匪组成的卫队。1870年4月，陈国瑞来到南京，不遗余力地策划攻击洋人。他和藩台梅启照很友好；当梅担任

<sup>①</sup> 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273页起。

<sup>②</sup> 费赖之1870年6月16日信，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291页；又《南京新会口的初期》，见《神学院》，1887年，第155页。

通州知州时，因虐待属下教友，梅德尔神父与敏体尼领事乘了法国炮舰前往通州逼他订了城下之盟<sup>①</sup>，此举梅启照当然不会忘掉。于是每天从藩台衙门发出大批小册子，其内容即传教士杀小孩的骇人新闻。小册子大批散发，廉价出售，令人痛恨传教士。陈国瑞雇用的士兵还手擎木牌，牌上贴有红纸，写着煽动仇恨洋人的招贴。纸角上还贴有鸡毛，表示十万火急。这些士兵满街满巷的穿梭往来，照中国习俗，这就是说“大家快快把这些新闻传开，象风吹鸡毛那样”。<sup>②</sup>

在小店里、茶馆里，木牌招贴的擎持者向人们诵读、讲解木板上这些煽动性的标语。时间选得极好，因当时正值报考举人，足有五万多名秀才集结在南京。这批考生们最恨洋人，他们成群结队地经常准备闹事。和尚和算命先生们乘机出售抵制洋人邪法的符咒，使民众更加慌乱；家家户户的门上、墙上以及路头屋顶，都用石灰浆涂上大十字，说是可以制止偷拐孩子的贼匪。

这些排外行动终于使负责保护洋人安全的外事衙门的某个大官局促不安了。这位大官原是前上海会审公堂的法官，他向来尊敬神父们，但害怕遭受牵连。他苦苦规劝神父们暂离南京，静待风暴过去。南京只有天主教神父和几位耶稣教牧师，牧师们听从了这位官员的要求，由官家承担路费，回到了上海。天主教的神父们则认为舍弃羊群出走，只会使羊群遭难更深。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神父们便把发生的一切情况报告南京府台，并邀请府台来天主堂察看，而且任凭他带多

---

① 见本卷第 119 页。

② 这些贴有鸡毛的招贴，叫做“鸡毛报”，专为传播重要紧急的消息。

少随行人员，这样便可证实，对传教士的一切控告都是捏造的（1870年6月10日）。

新上任的南京知府是个正直坚强、不避艰险的人，所以他被马新贻总督选中去视察天主堂。他也象总督那样，立志要给传教士以应得的保护。南京知府既受邀请，于是6月11日清晨，在好多位官员的陪同下，来到神父住院。住院所有的门窗全部敞开，任凭检查；官员们一致证明绝无婴孩尸体迹象。弄清了事实真相后，他马上赶去报告总督，共同商讨果断的决策。马新贻即宣布全城戒严，派遣百余名士兵设防在住院四周，同时派人到处张贴告示，证明教士无罪，严禁散布谣言。当夜，狱中处决了五名罪犯，并宣告前几天作案盗拐孩子的就是这些人；这完全是中国式的安定民心的办法。<sup>①</sup>

陈国瑞见马新贻机智果断，感到阴谋失败，当天就逃出南京去扬州，又从扬州窜到山东，结集了旧部数百人，然后到了天津。6月21日早上，在他的煽动下，激怒而狂热的群众冲进遣使会神父住院，又冲进仁爱会修女住院和邻近的法国领事馆。<sup>②</sup>两名神父、十名修女、法国领事以及多名法国、俄国的外交官，都在这一天惨遭了杀害。天津的高级官员中竟没有一个人具备象马新贻那样的正直、勇毅的品德。数天后，南京的神父得知天津惨案的详情，才认识到陈国瑞为他们安排的是怎样的命运，也许还要祸及内地各堂口的众弟兄。

危机并没有过去，在长江流域的扬州、苏州、松江等大城

---

<sup>①</sup> 见黄炳之、高龙繁两神父约信，他俩当时都在南京，所述的都是耳闻目睹的实情。

<sup>②</sup> 见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347页起；又于布内：《周游世界记》，第2卷第391页。

镇,一些文人和考生对天津所发生的惨杀洋人事件感到高兴,并表示准备仿效天津同僚们的做法。就是连上海道台也贴出了一张特殊的告示,要民众谨防“那些专事挖婴孩眼睛、剖取婴孩心肝的人”。谁都知道这明明是暗指洋人。<sup>①</sup>更糟的是,那时在长江连一条战舰也没有。

由于租界当局作出的这次决定,以至在多次类似的情况下,面临危险的租界中的洋人得到了拯救。上海公共租界组织了一支由百人组成的商团,每天当众作军事演习;每晚息灯后禁止本地人进入租界。法国人也武装了七十名志愿军,拥有三尊大炮。夜间由武装部队维持治安,他们中的骑兵队一直巡逻到徐家汇。

面临这共同的危机,政治上和教派上的对立情绪消除了。美国领事密妥士先生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一篇为中国官员们辩护的文章,即遭到普遍的反対。

相反,上海的耶稣教各派的教牧人员,于7月5日却给洋泾浜苏念澄神父、遣使会帐房神父和外方传教会的帐房神父写了慰问信,信上保证“在目前情况下致以最深切和诚挚的同情”。他们引证耶稣基督的话,“他许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直至世界终穷”,“圣教历史的教训”,“殉道致命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种子”。最后在信中祝愿说:“我们祈祷,我们痛哭的事件能得到全部的补偿;在将来,中华帝国终将得到宣传宗教的可靠保障。”<sup>②</sup>

信上签名者共十二人。翌日,苏念澄神父、遣使会帐房

---

<sup>①</sup> 谷振声、苏念澄、韩伯禄、顾福格几位神父的信及上海、香港各报的摘录,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308、314页起;又《佘山圣母朝圣记》,第68页。

<sup>②</sup> 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290页。

埃梅里神父和外方传教会帐房勒莫尼埃神父联合写了一封回信，对他们给予的同情表示深切感谢，而“对某些公开的与事实不符的通讯，以及含沙射影的歪曲报道，表示遗憾和痛心”。

7月8日，在洋泾浜圣若瑟堂，为天津大屠杀中牺牲者举行大礼追思礼仪。英、俄、德、意、西、葡、中、法等国人士、天主教教友与基督教信徒聚合一起，悲痛地为亡者祈祷。参加葬礼的有各国领事、各国海军官佐以及耶稣教牧师十来人。

教区会长谷振声在郎主教缺席期间单独承担教区重任，乃决心向圣母许愿，恳求保护教区及其一切事业。他象江南的老教士那样回忆起1853年因进教之佑圣母的保护使董家渡主教大堂，在小刀会与清兵炮火的交织之下，化险为夷的真正奇迹。<sup>①</sup>

这次危险更大，所以更需要有圣母的保护。7月4日，谷会长赶到松江附近的佘山。我们知道，在1844年，鄂尔璧神父已设想要在那里造“一座极华丽的特敬圣母小堂”，好让圣母居高临下，俯视全教区。<sup>②</sup>

1863年，鄂神父当了教区会长，买进了整个山顶与山的南坡，在半山造了一座小小住院；教友们经常来住院的小经堂作集体祈祷。1867年，松江总铎杜若兰神父在山顶造了“一只六角亭，每边长八尺，高二丈”；从此，佘山就成为山下教友们热爱的朝圣地。1868年3月1日，郎主教祝圣了小堂，并祝圣了进教之佑圣母像。这尊像是由一位中国辅理修士<sup>③</sup>摹

---

① 见本书，第1卷第285页。

② 见葛光被：《鄂尔璧神父传》，第17页。

③ 指刘必振修士，教名西默盎，字德斋，范廷佐修士的得意门生，常熟古里村人。——译者

仿巴黎胜利母后的圣母像绘制的。1868年5月24日以及两年后的这一天，即圣母进教之佑瞻礼日，佘山来了数百名教友，小堂容纳不下，只好搭起帐幕举行弥撒，看来建造一座大堂已是迫在眉睫的了。<sup>①</sup>

倘若教区能摆脱正在威胁的灾难，谷会长许愿建造的就是这座大圣堂。谷会长的愿是秘密许下的，只有几位咨议神父知道。会长从佘山回到上海，顿觉有了靠山，勇气倍增。次日，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他的祈祷没有落空。江苏的臬台代表南京总督亲来董家渡，向神父们保证采取有力并有效的措施；几天后，一支中国军队被派来保护主教大堂和徐家汇住院。<sup>②</sup>

最后，又一个危机来临了。7月24日，教外群众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竟集结有一万、五万甚至十万民众在上海四郊游行。面对这批狂热的群众，官员们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只要少数人带头，队伍就会冲向教堂，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幸亏这是一场虚惊，游行队伍逐渐散乱了，狂呼乱叫声也逐渐消失了；租界巡捕和商团都严阵以待，致使闹事者不敢肇事。另外，7月底，外国军舰又在长江出现，一切危险都消失了。

在这危难期间，教区的日常工作从未中止过。但神父们也明智地采取了几项预防措施。董家渡主教大堂边和徐家汇河浜里常备有几条船，一发生紧急情况，处境最危险的教会机构团体即可上船驰往租界。圣母院的寄宿生和献堂会的初学生则先已遣散回家。拯亡会修女退避到上海公济医院仁爱会修女那里，孤儿们托付给献堂会修女和施姆姆；圣衣会修女原

---

① 见柏立德：《佘山圣母明圣记》，第1页起。

② 同上，第70页起。



准备在最危急时离院，结果，她们始终留在她们隐修院的高墙之内。<sup>①</sup>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法国修女们处处受到同情，令人十分感动：上海的许多名门太太与几位耶稣教牧师的夫人很愿意在危急时接待她们。圣母院拯亡会修女在公济医院逗留期间，常有徐家汇教友勇敢地冒险前往报告消息，并送去鸡鸭等家禽。这次在公济医院的逗留，真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好多位城里的太太前来拜访会晤，这样，修女们就同她们的家庭取得了联系，其中也有信耶稣教的<sup>②</sup>家庭。这些联系为几个月之后创办若瑟院提供了方便。

谷会长向进教之佑圣母的祈祷，既已全部得到垂允，那么现正是还愿的时候了。9月，谷会长乃向各位本堂神父发出公告，请他们把许愿的经过，偿愿的事迹告知教友，并请他们慷慨资助，使还愿大堂早日建成。这公告在全教区成了发扬信德的<sup>③</sup>动力。董家渡的富裕教友们奉献白银多得以千两计算，令人更感动的却是许多贫苦教友，他们节衣缩食而献出几个小钱。

朝圣史料里记述了许多表示热爱圣母的典型事迹<sup>④</sup>：有人把祖传的珍宝投入圣堂献仪箱；一名贫苦老人把一生的积

---

① 见圣衣院档案中有关圣衣院在中国的创立史；《圣心玛利亚姆姆传》，第195页。

② 这里说的“若瑟院”，即是徐家汇拯亡会圣母院的分院，在那甲除妇女传教工作外，开始就办了外侨孤女院及其附属学校，之后，又专为中国教友办有女子小学（潜德）和女子中学（晓明）。上海教友一般评称这座若瑟院为“洋泾浜圣母院”，地址在现在的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的转角处。——译者

玛利亚·埃马纽埃尔的笔记被柏立德神父整理编入《天津屠杀后的圣母院现状》一文，见《行档》，卷宗E41。

③ 见柏立德：《余山圣母朝圣记》，第85页。

蓄高高兴兴地全部捐献了出来；一名船主定期奉献他常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直到大堂落成为止；一名小女孩把她仅有的一只小山羊变卖了，把钱捐献了出来。1871年1月，大堂第一步建筑工程开始了。

在1870年的严重事变中，江南却有两位大员勇于职守而牺牲了。他俩挽救了教区也挽救了教会事业。总督马新贻并不以善尽职守、驱逐陈国瑞一伙暴徒为满足，他在上皇帝的奏折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sup>①</sup>斥责天津的官员们的严重失职，放任暴徒们横行霸道。

他总结说：“我在南京能做的，为什么人们在别处不能做呢？为什么不惩办这次肇事者，而放任他们逍遥法外？我真不能理解。”<sup>②</sup>

当然，那些被严厉斥责的人是决不会放过他的。8月26日，马新贻在回衙门时被刺。当天，负责守卫神父住院的一名官员把目睹的情况报告了神父们。在那天早上，总督在检阅兵士演习后，由仪仗队护送回衙门；他正出轿走进堂屋，在狭窄过道处忽然窜出一名青年，他跪在总督脚下呈上一份诉状。总督双手接过诉状正要捧读，这时，那个呈状人突然把锐利的长刀刺进总督胯下后随即逃跑……可怜的总督于两、三天后就逝世了。<sup>③</sup>

几天后，南京的公正刚直的府台在衙门里悬梁自尽了。追查凶手的任务落在藩台梅启照和陈国瑞的好友身上。他只在

<sup>①</sup> 总理衙门1870年7月13日寄给法使馆的马总督奏折原文，见《法使馆》。

<sup>②</sup> 这消息由英驻北京公使威妥玛获得，他寄了一份原稿的译文给镇江税务司诺维翁先生，由诺维翁告知南京神父。见高龙攀：《江南传教史》，第171页。

<sup>③</sup> 高龙攀：《南京新会口的初期》；《神学院》，1887年，第168页。

表面调查了一番，断定府台是因为属下对他不满而气愤自杀的。因此他处罚了一些人，案子就此了结。刺死马新贻总督的凶手逃到江边，正要跳上接应他的小船时，他被捕了。事后如何，谁也不得而知。只在几个月之后，从牢狱里拖出一具醉汉的尸体；据说是被处死刑的，尸体已割成数块；人们说他就是刺死总督的凶手。果真是他么？这实在是个谜！<sup>①</sup>

马新贻死后，朝廷对死者及其家属重加恩恤，备极哀荣。但一年之后，有御史揭发死者犯有一系列渎职罪，指控竟得批准；死者被革职，其家属从此湮没无闻。<sup>②</sup>

南京总督和南京知府之死，是因为他俩曾阻止陷害教会而与要人结下了怨仇，我们虽找不到其他不容置辩的证据，但当时南京、上海的人们都是这样认为的。<sup>③</sup>

在发生上述严重事变时，郎主教不在教区。他响应教宗庇护九世向全世界天主教发出的号召，出席了梵蒂冈公会议。1869年9月4日，他偕同他的神学顾问薛孔昭神父启程去罗马，住在耶稣会总院。

南京代牧在公会议中的职务虽然微小，但他却是积极认真的。他虽不参加会议讨论，但他在委员会中却有很多工作要做。薛孔昭神父告诉我们，郎主教在罗马的九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也很少探访别人，就是与出席会议的主教们也很少接触；他认真、负责，忠于由传递员传送给他的的一切通知；凡主教们被邀请参加的会议以及有关礼仪及其他问题的讨论

---

① 高龙攀：《南京新会口的初期》，见《神学院》，1887年，第168页。

② 高龙攀：《江南传教史》，第173页。

③ 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371页；方殿华：《南京今昔》，第248页起；《江南教区消息报》，第3卷第325页；鲁塞：《中国纪行》，第407页。

会，他从不缺席。他剩下的时间就在房内专心祈祷和研究。他把交议的草案悉心研究之后，就按照良心的指示郑重投票。他虽在大会上没有发过言，但他在口头上、在谈话中及通信中，多次维护他以后在公会议中投票决定的意见。<sup>①</sup>

不用说，郎主教同其他耶稣会代牧主教一样，要求将教宗在宝座上的决定享有不能谬误的特性，从速明确定为信条。郎主教远在他进耶稣会之前，就已有了这种想法。他在读神学时，因热衷于今日公会议的提案，曾带头同法国教会自主派的教授们进行过剧烈的争辩，而几乎被开除出夏龙修院。<sup>②</sup>

1870年1月28日、3月3日、4月22日，在各主教的各项申请书上，他的名字都签在大部分主教的后面。这份申请书就是大部分出席会议的主教们的请求书，“教宗的不能谬误定为信条当先于一切，不能再拖延了……因这关系到教会的组织。”<sup>③</sup>

1870年4月，部分传教区主教“读了锡兰塔富纳代牧邦让主教致奥尔良主教的书信之后，他们表示非常愉快并完全同意。”他们就联名写信给环球日报社，郎主教在这信上也签了名。<sup>④</sup>

1870年7月13日，在公会议第八十五次全体大会上，全体主教表决教宗无谬误条文。出席主教六百零一位，投无

---

① 见薛孔明：《郎怀仁主教小传》，第35页；反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395页起。

②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1卷第128页起。

③ 《公会议记录与谕旨》（拉庆西斯集丛，第7卷第927、969、978、985集）。

④ 同上，第1356集。

条件赞成票的四百五十一位，投赞成票附带文字修整条件的六十二位；后者提请大会拟订措词更确切明晰，使法国教会自主派一无遁辞或有空子可钻。郎主教即是提请人之一。薛孔昭神父告诉我们，主教平时沉默寡言，而此番为要求把条文写得更完美，却慷慨激昂，引经据典，极其活跃。<sup>①</sup>

六十二位提请者胜利了；法典新版中指出，教宗诏谕之所以无谬误，“是由于教宗的本职而不是由于教会的承认”。<sup>②</sup>

郎主教述说，此后，有少数法国教会自主派的几位主教试图把他拉过去，说什么由于教宗干预中国教区，致使造成了不少困难。法国梅斯教区杜邦主教对郎主教说：“怎么，你南京主教竟也支持教宗无谬误？你可记得教宗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定断？”郎主教回答说：“教宗的定断，即使没有其他例子证明天主圣神的特别护佑，就这一例子，对我来说也足够了。解答如此困难和非常复杂的问题，就需要教宗贤明的无谬误的定断。”<sup>③</sup>

公会议除了审议有关整个教会的问题外，对远东代牧主教们也另外安排了特别会议。从1849年以来，传信部给传教区的教区长们交议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从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教会获得清政府许多优待之后，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了。巴尔纳博枢机乘全中国代牧主教几乎全数汇集在罗马之机，向他们提议，商讨如何在这辽阔的帝国中进行传教活动。在公会议期间，就有好多次集会在传信部官邸举行。1879

---

① 见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35页。

②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396页。

③ 见高友肇：《江南传教史》，第218页；作者是根据郎主教的讲话而记述下来的。作者感到主教所用的词句都值得注意。

年7月14日的讨论纲要，至今还保存在徐家汇档案室。<sup>①</sup>

会议中，大家一致赞成把全国分为五大教区，教区委员每五年集会一次；关于建立圣统制问题，争论很热烈，赞成与不赞成的几乎各占半数。在谈到任命一位宗座代表常驻北京时，几乎全体主教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人们不会接受，因为看到在中国还缺乏传教必需的独立和自由”。另外，中国政府也不会对宗座代表表示尊重。谈到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与会者大多表示悲观；他们认为在长时期里，本地神职人员还是未能满足教友们的需要；他们请求传信部的上级在信札往来中勿过于夸奖本地神职神父；还请传信部相信“在欧洲培养的中国神职人员，反不如在中国本地培养的好”。本地神职人员的学习课程、各级学校内中西修女的共存共管、全国统一的瞻礼单与大小斋期的规定、传教士的服装式样、传教士的生活经费、有关各件圣事，特别是有关婚配圣事的种种良心问题的研究与解答、借贷利息的轻重等等，都是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代牧们一致同意用集体名义写信给传信善会与圣婴善会，感谢他们对传教区的慷慨援助。<sup>②</sup>

另一封信写给拿破仑三世，感谢法国保护了远东传教区，并请皇帝在1860年条约修约换约时，向中国政府要求新的权

---

<sup>①</sup> 7月14日，在传信部官邸讨论的中国传教区各区的种种问题的纲要保存在徐家汇档案室。在这些稿件中，关于郎主教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态度，我没有找到。他的神学顾问薛孔昭却拒绝透露任何细节。我这里总撮的是从中国代牧主教团的秘书胡主教的记录中摘录出来的，只包括1869年12月至1870年3月的几次会议。后由济内神父发表在《中国贵州教区史》，第598页起。

<sup>②</sup> 《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3卷第42页。

利。关于这一点，与会教长们意见分歧，多数主教认为不应当向法国皇帝明显地陈请我们想在条约中增添的条目，<sup>①</sup>但要坚持中国官员必须普遍遵守所订条约而不是避不执行。郎主教负责编写这份由中国各教区代牧主教呈拿破仑三世的请愿书。<sup>②</sup>

他们谨慎地总括多数人的意见，写道：“1860年的条约为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开辟了新纪元。现在我们能自由地深入久闭的中国内地，在那里可以讲道、造堂、建设慈善机构，取得这个自由应当归功于陛下的大力保护，归功于北京的密切注视条约执行的公使……由于陛下明智规定，条约必须定期复查，这就为条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良机……我们的教友已知道爱戴使他们得到信仰自由的法国了……”<sup>③</sup>

几天后，拿破仑三世回信给中国的主教和教士们：“诸位在中国传教的主教先生：看到在华的主教和教士们深切领会1860年远征的意义，我感到欣慰。他们如此努力献身于传教事业，使我们在宗教信仰上和欧洲文化上结出了硕果，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也将努力使他们的事业得到顺利地发展。”<sup>④</sup>

7月18日，公会议第四次会议决定教宗不能谬误为信条。之后，教宗庇护九世同意出席大会人员离开罗马；郎主教乘机回到法国。可惜那时已不允许再象上次那样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了。普鲁士与法国之间已经宣战，我们战场上的失败

---

① 1859年12月28日的会议，见洛内：《中国贵州教区史》，第599页。

② 胡主教记录片段。同上，第607页。

③ 1870年3月10日的会上通过。同上。

④ 同上。

刺伤了始终热爱祖国的南京主教的心。他在凡尔赛与拉瓦尔晋升了几位神父之后,就退居到布卢瓦修道院,我们前任监会议戴元英神父正在那里当院长。不久又传闻皮埃蒙特人已进入罗马,无疑公会议将无限期地推迟下去。但郎主教认为教宗没有正式宣布公会议休会之前,仍应留在法国,只让他的神学顾问薛孔昭神父伴同直隶东南区的杜巴尔主教先回中国。在马赛,两人连同其他神父被国民卫队逮捕了,在他们被批准上“老虎”号邮船前,已在伯多禄监狱关了八天;他们是10月4日启程东航的。<sup>①</sup>

他们的行李被彻底抢光;薛孔昭对自己在罗马为教区征集得来的许多祭器圣物等被抢,常常感到痛心难忍。当人们观察到教区缺少祭服、圣器、圣书等时,他常常怨声叹息说:“这些都在马赛我箱子里被抢去了。”<sup>②</sup>

10月26日,教宗诏谕公会议无限期地推迟,郎主教认为再没有逗留在法国的必要了。11月27日,他在马赛上了船,有一批去中国的传教士和他作伴同行,1871年1月13日回到了上海。考虑到教会和法国双方都在遭难,上岸时,他禁止教友们举行早已为他准备的一切欢迎仪式。<sup>③</sup>

郎主教在罗马和在法国期间,曾同本会的上级对教区将办必办的事业,作了长时间的详尽的商讨。他准备一回到教区就积极付诸实施。为此,1871年4月17日至5月3日,在徐家汇召开了三十二次与此有关的咨询会议,除咨议神父外,

---

① 见徐昕波:《杜巴尔主教传》,第316页起。

② 薛孔昭:《自传》,见《徐祐》,卷宗H3;又薛孔昭1870年10月10日信,见《法信》2668。

③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401页。



还另选了六位富有经验的传教士参加会议。<sup>①</sup>

教育问题当然是首要问题。会议决定，修道院的修生在专读拉丁文之前，必须具有应试秀才的中文程度；又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欧洲人的公学；徐汇公学的教学课程也作了调整；招收和培养专为管理学校和跟随神父的传教先生，应作为教区的一件大事来抓；戴元英神父巡访时<sup>②</sup>创办的若瑟修会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会规应当修改；会士不必发愿，但在会时应当守贞不婚，成婚的传教先生，不能算作该会成员，但能获得该会的若干特惠；原则上，决定发行一份中文日报；批准教区划成五个分区，每分区有一名会长；<sup>③</sup>分区下再分总铎区，原总铎区的总本堂依旧保留；宗座代牧的主教府暂不迁往南京；在长江以北和安徽省，必须想尽一切方法为建立新教区打下基础。

会议认为，劝化教外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教友传教”，可惜对这项工作至今没有充分注意；另外，必须继续培养医师，向老百姓施诊给药；分发教理图像和教理讲解；由于诋毁育婴堂的种种谣言曾使长江流域的教会遭受极大的危害，为此，必须力求改善育婴事业，在育婴堂和孤儿院的管理方面必须审慎和明智；<sup>④</sup>对教外病孩付洗，只能由训练有素的传教先生和贞女们暗中举行；由教友家庭过继孤儿为子，虽有弊病，但很多儿童群集易于引起谣言，所以还是可取的；然而，土山湾和圣

---

<sup>①</sup> 咨议会议举行了十六天，每天集会讨论两次，在徐家汇举行，见《徐档》，卷宗E6。

<sup>②</sup> 见本卷第132页。

<sup>③</sup> 南京（三位总本堂）、苏州、松江、浦东、海门和崇明。

<sup>④</sup> 见本卷第186页。

母院的二处孤儿院的组织,既已博得中外参观者的一致好评,还值得鼓励和发展下去;此外,还应当认真考虑这些教友学徒们满师离院后的前途。

《教士准则》的出版,为郎主教增光不少,这是他全部心血的结晶。这本手册原先是由罗伯济主教发起写的,后来年文思主教公开颁布过。但最初几版只編集些教区方面经常遇到的良心问题解答和礼仪经文。郎主教于1871年6月16日<sup>①</sup>耶稣圣心瞻礼日为新版本作序,从此,这本手册才真正成为在华传教士的服务大纲。手册共分二十二章,内容有:论教区主保;论特兰托公会议和梵蒂冈公会议颁布的信德誓言;论有关中国礼仪的誓言;论教区行政;论保持审慎明智,避免引起官方猜疑;论常年开四规的方法;论办学校和训练传教先生的方法;论中国的几种主要迷信;论关于行圣事;论贞女;论教友们的各种善会等等。最后附有教宗和主教的二十七篇公文以及神父们经常用的若干主要的祝福的礼仪经文。

这本汇编的手册由《奉献教区于耶稣圣心颂》开始,1871年6月16日,郎主教曾在董家渡主教大堂恭诵这篇奉献颂。从此,在教区各教堂都反复恭诵了。<sup>②</sup>

郎主教刚回教区,就面临天津惨案引起的困难处境。中国政府特派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到巴黎致歉,并讨论赔偿由于他本人的怯懦失职而造成的天津惨案的损失;崇厚到法国时,法国也正处于灾难深重之时,他没有受到临时政府的接待。因此,他没法完成使命,即赴美国,后回到中国,直到1871年11

---

① 上海,德卡尔瓦格出版社出版,1871年。

② 见《教士准则》,附录三。

月 23 日才正式向法国赔礼道歉。<sup>①</sup>

这位中国的钦差大臣是战胜国德国给法国造成重重灾难的见证人；但奇怪的是，普法战事一结束，法国马上复兴了，公社的取缔、赔款的迅速交付比其他一切更使他惊奇。他回上海后，郎主教亲自去拜访了他。他对郎主教说：“假如中国遭到同样的灾难，也许就要一蹶不振了。”<sup>②</sup>

虽然如此，崇厚的工作报告不能使北京政府转变对战败法国法国的态度；此外，就在北京，也有不少妒嫉我们的人，他们煽动总理衙门取消我们外交官为传教区的利益争取得来的种种优待与照顾。

多年来，代表英国的是阿礼国先生，他原是徐家汇神父们的老朋友。<sup>③</sup> 这位外交官对各国政府保护他们的传教士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看法使中国人认为很满意。1857 年，他写了一篇古怪的文章，名为《对基督教的容忍》。他指责传教士们的过度热忱，特别斥责天主教的传教士。虽然他同时也指责耶稣教的牧师们，但严峻程度却大不相同。他说，传教士一听说教徒或自称为教徒的受到官员虐待，就起来保护教徒，这种做法只能激起中国上层分子对教会的愤恨，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公开指责“一个列强执拗地保教，同中国政府订立有保护优待传教士的条约”。接着他竟这样说：“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最大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教者的西方强国。”<sup>④</sup>

---

① 高田：《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410 页起。

② 《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 4 卷第 276 页。

③ 见本书，第 1 卷第 223 页。

④ 见《英国议会文件》，5271 号（1859 年），第 56 页起。

阿礼国先生对 1868 年的扬州事件,就是按照他这种原则办理的。<sup>①</sup> 1869 年,他也是这样劝告克拉兰敦伯爵的。<sup>②</sup>

天津大屠杀时,阿礼国已不当英国驻北京的公使了,但他的思想和主张都影响着使馆的部分人员。北京代牧主教田类思于 1871 年 9 月 29 日,向郎主教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说:“在法国遭受极大灾难时,一位英国的重要人物向总理衙门的大臣说:‘你们在教士问题上要和法国商谈,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不可错过良机。’这就是那份《备忘录》的由来。”人们在总理衙门相当秘密地编写这份《备忘录》,他们后来又去英国公使馆去商谈。商谈的次日,英国代公使在午前赴总理衙门提出修改意见时,人们告诉他说:“太迟了,你回官邸时,就可见到文件了。”他回去果然找到了这份《备忘录》。<sup>③</sup>

田类思主教暗示的这篇东西,在中国传教史上是很有名的。1871 年 6 月 8 日,这份《备忘录》还曾向各基督教国家的代表们推荐过。名义上是防止民众暴动,使天津那样的牺牲不再重演,而实质上,总理衙门的人员根据他们的意见,还指出了民众仇恨各教区的原因。虽在这份有名的《备忘录》里,没有特别点出江南教区,但根据总理衙门一贯反对天主教传教士的原则,不必细加分析也可一望而知它的目的之所在。<sup>④</sup>

<sup>①</sup> 见本书,第 1 卷第 224、361 页。

<sup>②</sup> 见《英国议会文件》,1870 年,第 3、59 页。1869 年,克拉兰敦伯爵根据阿礼国的主张,把这些意见上呈英国上议院。阿礼国离任后仍坚持主张,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他还援引恭亲王在他假期中的一次谈话说:“倘若英国能把我们从鸦片和传教士中解救出来,我们同英国就不会再有什么困难了。”(见方叔华:《南京今昔》,第 179 页。)

<sup>③</sup> 见《徐档》,卷宗 B2。

<sup>④</sup> 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 4 卷第 45 页起;又高田:《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486 页起。

《备忘录》指责传教士的种种事,没有一件不涉及江南教区的。

《备忘录》的第一条，要求取消教会办的育婴堂，至少让中国官员有前往视察之权，实际上就是要关闭育婴堂。这要求，在以后几年里又提出过好几次。第二条，攻击男女教友同堂举行瞻礼，致使蜚语横生，所以要求外国修女返回欧洲去。以后五条，首先是指责主教们和神父们夸大或捏造妄用职权的种种罪名，企图要求传教士不再支持教友去反对官员们的欺压，即使在宗教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就是取消条约和教士护照上写的在全国传教的权利；还指出各地教堂要接受地方官的检查。最后一条——第八条，正式提出修改柏尔德密协定，这是李鸿章早想修改的；还提出，此后，传教士非经地方官的调查、审定、批准、认可，不能再买进田地、房屋。

文件的结论更是少有的蛮横。“《备忘录》提出的仅仅是几个例子，还有很多事实足以证明教士们的所作所为自有许多不合法之处。因此，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不可能融洽共处……倘若传教士们认为这些规定侵犯了他们的自由或违反了他们的教规教仪，他们尽可放弃在中国传他们的教。”<sup>①</sup>

各国外交官一致拒绝接受总理衙门的妄言。特别是罗淑亚伯爵雄辩的反驳，更使他们哑口无言。<sup>②</sup>

可是，《备忘录》中提出的原则，常常影响着各省官员们的行动。我们将看到直至1895年左右，传教士们常被迫不断地要同官员们作斗争。

北京代牧主教田类思曾拟写一份中国主教团对总理衙门

---

① 《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4卷第48页。

② 见高田：《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432页起；作者叫人注意，有几名传教士办事真不明智，被总理衙门人员抓住了把柄。同上，第429页起。

诬蔑的答辩书,但传信部没有批准。<sup>①</sup>为了这一点,巴尔纳博枢机写信给中国传教区的各教区长,询问对《备忘录》的意见并请作书面呈报。郎主教也被垂询,他细心研究之后,把答复寄呈罗马,受到了枢机的称赞。<sup>②</sup>

毫无疑问,这些资料很有助于1872年罗马的那本不具名的小册子的出版;作者是一位曾来华传教的老传教士热纳瓦兹神父,书名:《中国的备忘录——北京条约的背叛》,书中作者逐字逐句地驳斥了中国总理衙门官员们的诽谤。<sup>③</sup>

教士们看到不单有英国人和耶稣教人,而且还有法国人和同教人支持或至少部分支持总理衙门的论调,感到十分痛心。例如:福州船政局局长日意格先生,于1872年5月1日在《两个世界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同年又在《1858年和1860年订约后法国的对华政策》一文中,认为再版中国《备忘录》,对巴黎公民是有益的,并表示他对其中某些原则很赞同。<sup>④</sup>

鲁塞先生在他的《中国纪行》一书中,盲目地附和中国人民的偏见,袒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原来他和日意格两人都是中国雇用的公务人员。”<sup>⑤</sup>

---

<sup>①</sup> 川英忌1871年9月15、29日、1873年5月24日致郎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2。

<sup>②</sup> 巴尔纳博1871年11月26日、1872年4月10日致郎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1。

<sup>③</sup> 序文署名只简写F.G.,关于作者,见高田:《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444页。

<sup>④</sup> 见方殿华:《漫话中国》,载《学术杂志》,第65卷(1896年),第108页起;日意格:《1858年和1860年订约后法国的对华政策》,第26页起;沃尔费斯唐:《在华天主教会》,第332页起。

<sup>⑤</sup> 见方殿华:《南京今昔》,第196页。

相反,忠勇的海军战士安野先生,法属东京的创业者,却竭力为传教士辩护。他高度评价说,保护传教区正是我国影响力最大的源泉之一。<sup>①</sup>

《备忘录》使中国官场中出现了令人忧虑不安的局面,但阻止不了郎主教在年轻的同治皇帝大婚与亲政的庆日(1872年和1873年)举行盛大的庆祝。主教事前发出通告,嘱令全体教友为中国皇帝和自己祖国祈祷。1873年2月26日,郎主教在董家渡主教大堂举行大礼主教弥撒,接着唱“吾侪赞颂天主……”的谢主颂。<sup>②</sup>

在松江,这次庆祝仪式特别隆重。松江是管辖上海县的府城,旧耶稣会的神父住院几经交涉,才归还给了教区,此事另述于后。这次,人们在堂场上搭起了一座宽大无比的露天帐幕,装饰得华丽异常。由一位中国神父讲道,十二名奉教绅士身穿礼服,高声领念“求为皇帝诵”,接着由在场众教友应声共诵;教外人大批地拥来,文人学士们争相阅读主教的通告,表示非常赞赏。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教友对于君国的忠诚是无可指责的。这些类似的庆祝,是针对《备忘录》某些武断的最好答复。上海道台在董家渡庆祝大礼的后一日,特派一位官员来堂向主教表示感谢。

---

① 见《法国在远东的任务》(《法国国内科学杂志》,1875年10月9日;《从巴黎到西藏》,附录第378页起)。作者用精辟的论断,驳斥了日意格的论点。请允许我用作者的话来回答对公教教士们的种种指责。“很难设想,一个有宗教观念的人,看到主教们为了本地教徒的利益向地方官干预交涉,认为是一桩罪行。在中国,任何集体或组织之间的团结一致是合法的,应予保护的。这对官吏的贪污腐化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抵制力量,团结一致可有力地保障公共治安,抵御违法乱纪。在这样的环境中,假如一名神父对自己属下的教徒拒绝象教师对待学生,老板对待工人那样,那只能是一种失职。”

②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420页起。

就在这时，郎主教全力赞助创办一个决定性的科学机构，既为江南教区获得盛名，又使中西人士共受其惠，从而使徐家汇闻名于天下。人们还记得，耶稣会的上级一开始就想继承北京老教区的传统，由博学多才的会士办一个收效很大的科学与传教相结合的机构。为此目的，给中国派来了象南格禄、杜惠伯，罗礼思等几位学者神父。由于江南缺少神父有八十多年之久，教友几乎全部领不到圣事，因而迫使这个科学计划长期推延未能实现。<sup>①</sup>

1865年，刘德耀神父在斯通赫斯特天文台学习了一个时期的气象学之后，带了紧要仪器来到中国。戴元英监会铎巡阅时，罗礼思、伊宗尹、刘德耀三位神父写了一份报告，陈述根据目前情况，开展科学工作似已可能。戴元英即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认为，教区设立科学机构为时尚早，但私人从事个别研究是应当鼓励的。会议任命刘德耀神父为董家渡修道院的科学教授。从此，他就开始用带来的仪器观察气象。郎主教在1867年和1870年的两次回欧时，曾恳切要求罗马大学天文台的帅基神父派遣他的一个助手来上海。费拉里神父被指定担任这项任务，<sup>②</sup>但这计划也搁浅了。<sup>③</sup>

1869年1月2日，高龙肇神父来到中国。他也是斯通赫斯特天文台著名的佩里神父的学生。他到中国后和刘德耀神父一起被派去南京，准备在那里建立一座天文台。由于南京

---

① 见本书，第1卷第39、60页。

② 吕比荣1875年8月27日信，见《徐档》，卷宗F13。

③ 有关这些科学机构开创时期的资料，人们可从以下两书中找到许多完整的记录和报告。见1842—1874年的《江南教区对科学工作的探索》（《法信》2600）；又蔡尚质的《天文台台史》（天文台档案）。本书我只记述些摘要。



发生了上述的种种事件，说明在南京创办科学机构条件还不成熟；<sup>①</sup> 加上在这新教友地区，由于行圣事的需要，常常要使这些学者们的科学工作被迫中断。因此，1870年，高龙肇、刘德耀两神父就重新回到了上海。

1868年，从事研究自然科学的韩伯禄神父来到江南，他的使命是研究中国的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他开办博物院，并编写有价值的文章。他被派到教区的前哨，他在安庆、宁国等地坚持搞科研和传教工作。<sup>②</sup> 他收集的丰富多采的标本至今还吸引着很多人，他们纷纷前来徐家汇参观。<sup>③</sup> 从韩伯禄的信中可以设想，他关闭在中国木船中作长途旅行时，经受了多少的艰难困苦；试想他这个喜欢冒险、好动、健谈爽直的人，常年独坐船舱，该是多么的苦闷啊；他宁愿在广阔天地里奔走，却怕在斗室内作研究；只是在多年奔走之后，他才同意在徐家汇闭户埋首，编写他的学术论文和编排他找到的动植物标本。<sup>④</sup>

1867年，费赖之神父来到教区，他开始对自利玛窦以来在华传教的事业作大量的研究。

1872年8月，在郎主教和谷会长主持下，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了在江南教区进行科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案。“江南科学委员会”分四部分：（一）在高龙肇神父领导下成立气象台和出版科学杂志，在徐家汇建造一座“与耶稣

---

① 见本卷第143页起。

② 见本卷第175—176页。

③ 博物院开始设在徐家汇，今西区车站地点。1930年才迁至震旦大学，今重庆南路，第二医学院附近。——译者

④ 他给巴黎教区帐房塔扬神父写了好多生动活泼、富有启发的信（《法信》2668、2669）。

会相称”的天文台，将气象记录和观察所得编成杂志，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二)在韩伯禄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他陆续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将其主要记录、论文编辑成册，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三)在费赖之神父领导下研究中国的史地工作，其中包括江南新教区的历史概况、老传教士们的传记；继续收集感人的信件，重印教区的常年报告书，编写出版与欧洲及各堂口通讯的双月刊，确定绘制江南教区的详细地图。(四)用中文出版一本讲科学的与护教的杂志。高龙馨神父还负责培养科学观察的人才。两位耶稣会读书修士，马氏两兄弟，马若瑟和马玛弟<sup>①</sup>预备将来负责管理这个部门；可惜他俩没有恒心，终于还俗出了修会，后又进入政界，并担任了重要的职务。<sup>②</sup>

1873年，能恩斯到了上海，他也是斯通赫斯特天文台佩里神父的学生。1873年2月，开始建造天文台，7月神父们已能搬进去住了。天文台建筑面积并不大，“有三个厅，西厅分成两间，神父们的卧室，中厅雅致得体，东厅作图书室，中厅上面加一层平面屋顶。”仪器很不完备，“几支寒暑表，一两支气压表，还有以前南格禄带来的仪器。”次年，罗马寄来一架由帅基神父制成的气象记录机，它与1867年在展览会上得奖的那架相仿；在这之前，由高龙馨神父自制的一架简单实用的测验风向风速的风车装在屋顶平台上，这风车从1873年10月18日开始使用，一直运转到1893年。<sup>③</sup>

---

① 马若瑟即马相伯，马玛弟即马胃叔又名马建忠，《马氏文通》的编著者。——译者

② 见高田：《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史》，第2卷第499页。

③ 见蔡尚质：《天文台台史》。

工作进展得很慢。主教和会长认为，不能把仅够维持传教事业的经费优先用于科学事业。<sup>①</sup>

由于法国神长们的慷慨大量，教区帐房塔扬神父的多方筹措，才为天文台逐渐提供了一切急需的费用。数年之后，一位天文台台长写道：“今天天主召回他那善良和忠诚的仆人，我庆幸能在这里向他表示，我们对他的恩情感激不尽。”<sup>②</sup>

关于天文台及其仪器的详情，这里恕不记述，人们可以从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天文杂志上找到；柏立德神父曾在他的1874年至1875年的通讯上转载过。

最初几期的《天文月刊》出版于1873年，这应当归功于高龙擎神父。从1874年起，上海英文报纸开始每天刊登徐家汇天文台隔日发出的气象观察报告。同年，高龙擎神父让位于专管磁力的能恩斯神父；气象观察则委托刘德耀神父负责。<sup>③</sup>

刘德耀负责天文台的工作直到1876年，接着，他又去外地传教了。接任他的是庞超神父。庞超神父不久也放下了科学工作而去传教了。从1877年起，能恩斯神父就单独留在天文台，只有几位中国工作人员协助他工作。<sup>④</sup>

郎主教非常关心这项艰巨的开创事业。在他留下的最后信件中，有一封由他的秘书柏立德神父缮写，经他颤动的手亲笔签字的信，信尾结束说：“我把科学委员会托付给耶稣会，要

---

① 关于这问题，法国的省会长神父和塔扬神父都有许多饶有兴味的通讯（《法信》2669）。

② 见蔡尚质：《天文台台史》。

③ 能恩斯：《徐家汇天文台》，见《宗教研究》，第43卷（1888年），第262页起。

④ 见蔡尚质：《天文台台史》。

求耶稣会坚持办下去,采取它认为合适有效的措施,保证其成功。”<sup>①</sup>

蔡尚质神父在他《天文台台史》的手稿中,把上述大部分细节都写了进去,很能说明郎主教和耶稣会上级给教区规定这项和过去大不相同的新的工作时的意愿。“忆及过去北京老天文台曾为中华帝国的宣传福音事业起过很大的作用,立过很大的功勋,激励人们希望利用科学来传教,以便引起中国学者们的尊敬和信任,引导他们归向耶稣基督;使我们的传教工作为许多欧洲侨民中大多数耶稣教教徒所欢迎,他们已越来越多地涌向上海;更重要的还是不让没有信仰的人垄断自然科学阵地,以免他们能轻而易举、肆无忌惮地滥用科学来愚弄迷惑无知的人,这便是郎主教和耶稣会上级办科学机构的指导思想。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愈显天主的光荣,拯救人们的灵魂,为宗徒事业服务,这是创办科学机构的真正目的。”<sup>②</sup>

开头几年就已经看得出,这个目的必定会达到。神父们记载,1875年来参观天文台的有许多海军军官、许多旅游者和外国知名人士。上海道台冯燧光于是年8月3日也来台参观,他是中国人中很有学识的一位,他曾阅读过南怀仁神父的著作,有赏识新创事业的能力。几天后,他给会长神父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引用了许多典故,表示了他的钦佩。<sup>③</sup>

与此同时,教区还建立了两个与传教有直接关系的机构。长期以来,居留在上海的外侨早就要求开办外侨男女儿童读书的学校。第一所学校是拯亡会修女办的。徐家汇拯亡会修

① 郎怀仁 1875 年 12 月 17 日致省会长信,见《法信》2669。

② 见蔡尚质:《天文台台史》。

③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4—1875 年,第 66 页起。

女曾在1870年的紧急时期避难到上海租界稍微住了几天，因此认识了几位外侨的夫人，并且与她们有联系，其中有几位是牧师的太太。很明显，由法国修女办理教育事业，是会受到欢迎的，就是在非天主教的社团中也同样会受到欢迎。唯一困难的是，对于拯亡会的组织来说，教育青年是她们的份外事；她们接受徐家汇的工作，只是作为例外，以弥补中国学校的不足；现在要去负责教育外侨的富家女儿，这更是件崭新的大事，因此，她们在法国的上级也迟迟不敢作出决定。<sup>①</sup>

此外，郎主教和他的咨议神父对另请一个专门办儿童教育的女修会来江南一向是反对的。

主教同拯亡会总会长上智姆姆商谈了几次之后，她认清这一项新工作对江南教区大有好处，于是就同意了。1871年5月1日，两位拯亡会修女从徐家汇圣母院住进了洋泾浜的前法国军人医院。这是一所红头占领上海时建造的军人医院，地处天主堂对面，基地是属教区的。医院由几间中式房间和一层楼组成。法国军队撤走后，马车商人曾把它租下，底层改作马棚，楼上做了仓库。修女们把马棚改成一排教室和一所小圣堂，楼上的仓库作为修女宿舍。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女生前来报名，学生全部走读，不久信耶稣教的学生也跟着来上学了。<sup>②</sup>

1873年至1874年，开学时学生只有十八名，学期结束时

---

<sup>①</sup> 见耶稣会法国参赞和巴黎省会长神父及在中国的耶稣会神父来往的信件，《徐档》，卷宗F13、F16；《中总》，第2卷第4章第5、20页；《圣心玛利亚姆姆传》。

<sup>②</sup>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4年，第73页；又1875年，第229页起。

增至四十名。孩子们的来源很复杂：有的是常住上海的富裕人家的女儿，有的则是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可怜孤女。1875年10月，学校把她们分成两类。在若瑟院旁边，开办了“上智学校”，专为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校舍和布置是按法国式的。那些欧侨的，或是中外混血的孤女，只授以简单的足以在将来独立谋生的教育。此后，我们将看到，这两种形式的学校发展速度很惊人。<sup>①</sup>

另外，也应该尽快为外侨男孩子开办一所类似的学校；若瑟院的成功，促使男校迅速开办起来。几年前，洋泾浜的本堂神父杜若兰已召集过一些外国男孩，教他们一些功课，特别向他们讲授了教理，这便是1874年9月21日宣布开学的圣方济学堂；该校那时只有两小间房间，地点在公馆马路和近圣堂的一个广场旁边。第一天报名的学生只有四名，年长的十岁，其次八岁，还有两名都是六岁。该校由戴尔第神父负责，学期结束时，计有学生十七名，因此必须迁进到一所更宽广的校舍去。这校舍也在公馆马路和圣堂之间，有一间老堆栈作为操场和游戏室，孩子们还可在靠近圣堂的一方庭院内自由奔跑。<sup>②</sup>

那时教授的课程非常简单，只是念念写写，再读些语法、英语、法语、历史、地理以及算术……信奉天主教的孩子还多一门教理课，那便是圣方济学校的全部课程；最幼小的学生从A、B、C、D开始学，较大一些的也还不能流利地诵

---

<sup>①</sup> 《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8卷第76页；《耶稣会法国省历年函牍》，1877—1878年，第367页。

<sup>②</sup> 高龙鞑：《江南传教史》，第281页；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5年，第46页起。

读，<sup>①</sup>但我们认为该校的进展还算是快的。

与此同时，虹口地区的美租界由于商业发达，澳门教友和本地教友都纷纷涌来，因此，那里正在造一座新圣堂。起初上海一位富商赖地先生拨出一所宽大的房屋给神父，权充圣堂。以后该屋换了主人，小堂就迁到临近的一所小屋内。这小屋的地基是一位葡萄牙大商人西尔韦拉先生献给堂里的。1874年11月29日，教区会长高若天神父为虹口耶稣圣心堂这座新堂<sup>②</sup>举行奠基礼。十位神父、徐家汇的读书修士和董家渡修道院的修士们都参加了典礼。<sup>③</sup>

新堂的建造“与其说是为了目前，不如说是着眼于将来”。在当时看来是太大了。堂的北面造了一所神父住院；南面造了一所男校、两间会客室以及传教先生的房间。

为了整个教区的利益，在上海的另一地段又兴办了两个属于城内老天主堂的事业。1865年至1866年，我们已经看到，监会铎戴元英神父巡阅教区之后，决定要创立一个传教修士的修会，并指定富有历史纪念性的县城内的老天主堂作为会址。<sup>④</sup>老天主堂里已有比徐家汇公学规模略小的住宿学校，校名为“伯尔各满公学”，无疑该校会给该修会提供圣召的。可惜不久，人们就看到，要在中国创立一个不升为司铎的修会总是十分困难的。青年蒙受天主圣召去修道，总希望能晋升司铎；教友家庭也认为，子弟进一个修会修道而永久处于低级的

---

①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5年，第47页。

② 虹口是圣心堂，本书原文作在方济各堂，是作者的笔误。——译者

③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5年，第50页起。

④ 见本卷第134页。

神职,是“有损体面”的。<sup>①</sup>因此,招募若瑟会修士的圣召非常困难;1874年,仅有十八名,到1875年也只有二十二名。<sup>②</sup>

另一项设在老天主堂的机构收获就比较大,以后发展得也很美好,这就是老人堂。叛军战事平定后,伏日章神父当老天主堂本堂。他对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深表同情。经验告诉他,对这些可怜的人,如能用爱去争取他们的心,他们必然很快并很容易接受信仰而要求领洗。1867年,他把要建造男女老人堂的计划告诉了当地的几家富裕教友,他们一致高兴地赞成。不久,就在老天主堂附近买进了一所房屋。教友们并认定每月捐款维持老人们的生活,伏神父也把他得自欧洲的捐款献给了老人堂。1873年至1874年,老人堂收了三十七名老头和三十五名老太;他们大多数是教外人,但未经领洗而死去的极少。<sup>③</sup>

1870年至1871年,在老堂附近又造了一所医院。这医院是专为生活没有着落的病人而设立的。他们大都是从外地来上海谋生的,可是由于感染了高烧或霍乱而陷入了困境。<sup>④</sup>另一所专收乞丐的医院造在南门外教士公墓圣墓堂附近。这些可怜的病人,有的在病中领了圣洗,并能持之以恒地尽教友之责;那些尚未领洗的乞丐,当他们病危将死时,几乎全都要求领洗,并在很热心虔诚的气氛中结束了生命。<sup>⑤</sup>

---

① 许多信件证明,关于这问题,罗马与法国的教会上级很感兴趣,见1871年与以后几年的徐家汇会长私人档案。

②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4年,第54页;1875年,第23页。

③ 见黄伯禄:《上海老天主堂记》;又《徐档》,卷宗H。

④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4年,第42页;1875年第54页。

⑤ 见《耶稣会法国省历年汇报》中《伏日章神父小传》;1874—1879年,第103页;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266页起;《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4卷第492页。



郎主教从梵蒂冈公会议一回来,就又重新巡视教区各堂,我在下面专写教务细节的章节里将另行记述。这里我只叙述几个对于教区总的历史有关的几件大事。

我们已经看到,在江苏省省城苏州建立一个稳固的岗位非常重要。伊宗尹、徐听波两位神父在上述情况下,特地赶到苏州,去接收桑理爵神父在1862年买进的一座宽大的房屋。<sup>①</sup>另外还要解决十八世纪苏州教难中被充公的教产。依据1860年条约规定,应当归还或赔偿这笔教产。由于苏州城内文人们的强烈反对,中国官员就不敢照条约办了。那座富有纪念性的老教堂,起初曾改为孔庙,以后又被拆毁了,因此,神父们原不想要回这块基地,只要求官员们把桑理爵神父在1862年买进的那座大房子折价偿还。结果双方议定,“官方偿还桑理爵神父买的那座房屋,作为神父们的住院”,另外赔出白银四千五百两(合三万一千五百法郎)作为营造新堂的建筑费。道台应宝时先生还将商谈的详细经过记文刻石,石碑即砌在神父住院客厅外的墙上。这次谈判很有成果,这应当归功于苏州总铎伊宗尹和上海领事自来尼先生的灵活能干和节制稳重。1869年3月谈判结束,郎主教呈报了总会长,把这次谈判作为以后谈判的楷模。<sup>②</sup>

为了巩固已获得的成果,谈判结束数月以后,郎主教亲赴苏州,象以往一样他带着大队行列去拜访了巡抚和省里的重要官员,受到了极隆重的接待。<sup>③</sup>

---

① 见本卷第156页。

② 罗以礼:《苏州总铎十年大事记》的序文,见《徐档》,卷宗H4;黄伯禄:《苏州城内教友记》,见《徐档》,卷宗C1、C6;又郎主教1869年3月20日信,见《中总》,第4卷第2章第21页。

③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229页。

看到苏州的成功，人们希望上海的府城松江及其四周兴旺的会口也能同样如此。十七世纪的教区大恩人甘第大许太夫人曾在那里生活，并在那里去世的。老圣堂的残墟遗址还存在，按 1860 年的条约，这也应该归还给传教士。但是松江府台不准在他任期内在松江城内建造任何教堂，由于他多方阻挠和百般挑剔，归还一事一直拖延到 1871 年。最后由于法国领事的帮忙，这堆老堂废墟归还给了松江总铎利庸乐神父。郎主教未来的继任人倪怀纶神父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情。人们把已不能再用的老堂的断墙残壁拆掉，在原有的基地上，马历耀修士设计造起了一座漂亮的哥特式的十字形新堂。<sup>①</sup>

新教堂落成之前，1873 年 2 月 23 日，为庆祝同治皇帝大婚与亲政，在临时小堂前搭起了一个大帐幕，举行了大礼弥撒。<sup>②</sup>这件事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1874 年 4 月 9 日，高若天会长神父代表得病的郎怀仁主教祝圣了这座新堂。<sup>③</sup>有十一位神父和十二名耶稣会读书修士参加了盛典。

离松江几公里的佘山山顶上的那座为感谢圣母 1870 年保护之恩的圣母进教之佑大堂，虽因教友们的捐献而得以兴工，但建造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把建筑材料从平地运到山顶已是很艰巨的了。此外，地方上教外人对造堂工程造了许多谣言，说什么：新堂的每根柱子底下需要活埋一个儿童，大堂下面躲着一条巨龙，只等大堂完工就要把堂冲毁；土地菩萨和水神菩萨都被大堂压得不能动弹，因此将要降灾于邻近地区……这一切都没有动摇马修士与工人们。1871 年 5 月 24

①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4 年，第 27、121 页。

② 见本卷第 204 页。

③ 高若天神父报告，见《神学院》，1875 年 4 月，第 33 页。

日,举行了大堂奠基礼。郎主教在露天帐篷下,面对六千名教友,主持了大礼弥撒。1873年4月15日,郎主教祝圣了这座多利安柱式的希腊式十字形的新堂,并在列队迎圣母的山坡之字形路上立了十四处苦路像。5月1日和24日,主教又重临佘山,主持大礼。交趾支那的助理主教高龙贝那时正路过上海,次日也来佘山会访了郎主教。整个圣母月,来佘山朝圣的人络绎不绝。从此,佘山圣母就成为教区的特别主保。开头几年,5月1日和24日的瞻礼日,就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次的朝圣者。整个圣母月,约有八千至一万多人领圣体。1874年,庇护九世应郎主教的申请,恩赐5月来佘山朝圣者可得一次全大赦。1875年,大堂还装置了几架宏伟的大钟。<sup>①</sup>

旧耶稣会旧教产、旧堂口的逐渐收回,上海四郊虔诚热心的老教友的与日俱增以及安徽省若干地区的教务进展迅速,这种种美好的景象使南京主教欣喜异常。

我们已经看到,1868年至1869年,金式玉、韩伯禄、叶春荣三位神父曾多次从南京去宁国府广德州等地,探访从河南、湖北迁移来的许多教友。他们带去了大量哀矜,使他们中的许多家庭渡过了初到异乡创业时的难关,这使他们对神父非常感激。<sup>②</sup>

此外,教区在安庆和建德的成功,罗淑亚轰动一时的长江远征,<sup>③</sup>给民众印象很深。使他们深信,西洋神父们的保护能有效地抵制官员及衙役们的非法勒索。在这时期,从河南、湖

<sup>①</sup> 柏立德:《佘山圣母朝圣记》,第4、5章。

<sup>②</sup> 见本卷第176页。

<sup>③</sup> 见本卷第180页。

北迁来的教友经常与毗邻的本地人发生纠纷。毫无疑问，这些移民是响应地方官员们的号召而<sup>①</sup>来此肥沃的长江流域落户的。这地区因遭受叛军战祸，已变为荒无人烟的田野了。但他们刚来到这地方时，在占领无主土地这问题上，官方没有什么明确布置，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无主产业，谁先占就属于谁，于是人们互相争夺土地，地方上大不安宁。湖北人不能独占这方土地，因为极少数几个本地人早已住在这里了。还有别处来的人，长江以北的几户人家也先后来到这里。谁都要保住或攫取那最好的一份。从此，彼此相骂、打架，甚至正式动武。大多数地方官看不起移来的外地人，“因为他们更穷，而本地人又比较容易找到进衙门的铺路费，于是‘有钱即有理’了。因此，不知多少移民人家在夜间遭到了凶残地抢劫，被几个手持长枪短刀的人逐出住处。到衙门去诉苦吧，也是徒然，因为他们没有钱”。<sup>②</sup>

---

<sup>①</sup> 宁国府的传教士们一致肯定，这次移民号召是安徽的高级官员发出的。但有没有正式的官方文件证明？兰廷玉神父述说：通过北京朝廷批准，南京总督与安徽巡抚发文到河南、湖北、陕西，高级官员还重提了叛军在这两个府里造成的灾难。文告说：“你们离开你们贫瘠之土，到这里肥沃之地来吧！让这些田地、这些房屋成为你们的不动产吧！头几年，你们可免交公粮，到了规定时期，你们再和其他人民同样向朝廷纳税，共享同样利益。只要你们奉公守法，我们一致保护你们。”兰神父承认，“可惜这篇如此重要通告在民间竟没有保存下来。传教士也无从得到这篇以后显得特别重要的通告的原文……在数千名的移民中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它抄一份下来……对这个问题教士们曾问了许多人，问过教友，也问过教外人。这些人人都知道有这个通告，很多人还亲眼看到或读到过，他们的答复是相同的。”见兰廷玉：《中国新传教区的一支插曲》，第72页。这篇值得注意的稿子是由当时宁国府的一名传教最积极的神父抄录下来，保存在《法信》2570中，后节录刊登在1876年的《天主教传教区杂志》中，作为“专栏”文章，题目是：《宁国地区》（第2、14、26页）。

<sup>②</sup> 见兰廷玉：《中国新传教区的一支插曲》，第75页；《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8卷第159页。

人们不难理解，而对有钱即有理的衙门，移民们要抵抗又没有靠山，外国神父如能予以帮助，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了，这也是许多移民自称为望教者的原因。在每次大动乱发生时，纯本性的归化把大批教外人引进到天主教来。圣方济各沙勿略本人，尽管他发过灵迹，也免不了要向葡萄牙国王的从属官员要求保护和支持新奉教的教友<sup>①</sup>。

由于神父在经济上援助贫穷的人，当他们被欺压时，神父又出来保护他们，因此教外的下层质朴的人都愿归顺神父；宗教的教育、圣事的恩宠会逐渐提高他们，转化他们；第一代教友还很不完善，但他们的后代通过学校的培养，可逐步成为真正的教友子民。<sup>②</sup>

为了这些目标，从1869年至1872年，一个大规模认真的归化运动在宁国府和广德州展开了。目击上述情况的传教士，大声疾呼要求援助，增加传教经费；他们多次抱怨谷会长没有对他们的呼声给予应有的重视。那时执掌教区各重要职位的几乎尽是意籍神父，他们关心的只是上海及其四周的老教友会口。<sup>③</sup>

---

<sup>①</sup> 兰廷玉的这个记述和1874年教区西区会长倪怀纶神父的两个文件符合。倪会长是郎主教的继任者，他同柏立德神父说过：“信教对这些新教友来说仅仅是次要的事。他们信教只是为了求得帮助和保护。”柏立德曾把此话记在他的日记上（《徐档》，卷宗H1）。在圣婴善会总会的大会记录上，教区会长高若天神父也评价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倪怀纶神父1873年11月2日声明：“归化的原因，原则上还缺少超性因素，今日我们大部分望教者还是如此。”（圣婴善会档案江南案卷。）圣方济各沙勿略书信上也讲过类似的事。见布鲁：《圣方济各沙勿略传》，第1卷第273、283、303页；第2卷第9、16页。

<sup>②</sup> 倪怀纶还说过：“事业中最重要的是办学校，哪个村子有学校，哪里就有真教友。”

<sup>③</sup> 1870年3月26日，郎主教对这些神父们提出了抗议（《法信》2668）。

1869年，罗淑亚先生在巡视期间也有同感。为此，他回到法国后，便向巴黎的耶稣会上级提出了同样的意见。<sup>①</sup> 尽管如此，但在高若天神父任会长期间（1872年），宁国府和广德州的传教事业还是以新的面貌积极地展开着。1873年，成立总铎特区，区内有六位外籍神父和两位中国神父施行圣事；教友一千六百五十多名，分属于二十七只小堂。自动要求来望教者两万名以上，前途大有希望。宁国府一位传教士写道：“到处有人召唤我们，到处有人献给我们房屋充作圣堂……我们毫无困难地就拥有了四十至五十个距离适当的公所，每个公所拥有一千至几千名望教者。”<sup>②</sup>

另有一位神父曾对倪怀纶会长说：“这地区是我们的，他们教外人不能不到我们这里来；十年之后，我们能有八万名教友。”<sup>③</sup> 倪怀纶认为，他这种说法有些夸张。

1873年，有两件要事促进了归化运动。在广德州城内，好几个官员反对教会，他们阻止人们接待神父或出卖土地给神父，甚至撕毁契约，并粗暴地对待看守教堂的人员。安庆总铎金式玉神父获准同抚台派出的两位代表对以上情况进行实地调查。3月初，两位特派代表和神父在一支军队的护送下开始进行调查。3月19日，即大圣若瑟瞻礼日那天，调查工作胜利完成。全府各地都张贴了保护教会的告示。该告示驳斥了诬蔑教会的流言蜚语，肯定了教会的权利，许多有争执的

---

<sup>①</sup> 塔扬在1873年3月12日、6月4日信中引用了这些会谈的内容，见《徐档》，卷宗F20。

<sup>②</sup> 卞良弼1872年6月25日致郑主教信，见《神学院》，1872年11月，第65页。

<sup>③</sup> 倪怀纶神父给圣婴善会总会援引的回忆录。

教产全部归还给金式玉；另外又获准在建平城内建造神父住院，并赔偿数百两银子，补偿教友人家或会口小堂所受的损失。<sup>①</sup>

在广德州与宁国府各地也取得了类似的成绩。5月，金式玉胜利地回到了安庆。

在这以后，宁国府便显得十分安定，使郎主教得以顺利地巡访各堂。主教的巡防从1873年11月8日开始，直至20日止，由西区会长倪怀纶神父伴随同行。府里的大官员们用盛大的仪式接待并回访了主教，县长派了十八名轿夫专供神父们使唤；每到一个村镇，教内教外的绅士们都前来欢迎主教并致颂词。因此，这次巡访使主教感到莫大的欣慰。郎主教说：“这是一次凯旋的远行。”<sup>②</sup>

可惜，这些快速获得的成就几乎成了泡影。这些新教友们皈依圣教的目的十分复杂，其中一部分人只是为了物质上的利益。很明显，只有经过长期认真的教育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教友。于是，在这种长期认真的教育完成之前，教难终于发生了，人们很担心这些教友能否经得起考验。<sup>③</sup>

就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年代，一个大风暴的预兆已经开始显露了。本地人和移民们之间的仇恨越结越深。本地人几乎全部是教外人，移民中却有成千上万的望教者。由于根深蒂

---

<sup>①</sup> 金式玉神父1873年5月8日的日记，见《神学院》，1873年6月，第39页起；金式玉神父路过芜湖时，乘机考察了芜湖的良好地理位置，为教区选择了将来需用之地。

<sup>②</sup> 高若天：《江南的报道》，见《神学院》，1875年4月，第27页。

<sup>③</sup> 倪怀纶神父比他属下的多数传教士更有远见。早在1873年，他已表示为新教友担忧。

固的仇恨，教难一触即发。另外多年来下级官员和地方上的读书人已多次遭受屈辱，被迫向神父和教友们赔款认错，他们只等待时机进行报复。1875年至1876年，这个机会果真来到了，而且都是由于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引起的。

### 三、从1875年的教难到郎主教逝世

长江下游地区对育婴事业的诬蔑 南京的危险  
宁国府教难 黄神父被害 自来尼先生到南京  
长江下游与沿运河一带的教难 南京的诉讼 恢复  
宁国府的事业 水东的朝圣 郎主教病危期间 郎  
主教的逝世与哀荣

1870年的恐怖行动，几乎把扬子江下游的教堂会口全部破坏了。其开始时只是进行一些恶毒的宣传，在小册子、标语与漫画中捏造种种罪名，集中攻击育婴堂。另有一种类似的但更荒谬更恶毒的宣传，先从南京开始，1875年头几个月已蔓延到长江下游各地。

兰廷玉神父当时住在南京，他记述道：“这时，南京有一种特殊的恐慌折磨着全城百姓。近南门，昔日被叛军毁坏的一座大桥，一年以来人们正在重新修理。在这个地区，尤其在迷信深重的南京，认为造大桥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桥桩，必须有一定数字的灵魂支撑桥面石头的重量；于是就要处死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本城的男孩，否则护桥神就不能保证大桥的牢固。从此家家户户诚惶诚恐起来，其根源就是由和尚或地方上的骗子们引起的。去年11月，我很惊奇地看到，我们的走读学生中



有半数以上的教外学生，在小帽上或背上用黑线缝着一片红布条。人们向我解释，这是和尚们串通了骗子发明的护身布，每片布条售价十五至二十个制钱。说是谁戴着这布条谁就不会有当新桥桥桩的危险。人们争先恐后地买，和尚们因此得了大笔钱。”<sup>①</sup>

这座大石桥建工完成了，人却一个也没有死去。于是，利用民众的愚昧无知，又一个谣言出来了。1876年初，南京城又布满令人不安的骚扰，说有恶鬼拿着剪刀飞驰天空，专剪行人发辫；剪掉辫子是反抗满清的表现，要被当场判处死刑的。妇女们不梳辫子也不能豁免，恶鬼会剪去她们旗袍的下摆或鞋子的扣带。这些恶鬼附在纸人上，由行妖术者抛向天空，危害人民。<sup>②</sup>

事实上是否有恶鬼在作祟，是否存在传教士初来江南教区时常常提及的闹“鬼病”呢？兰廷玉神父却相信是有的。他说：“关于剪辫子的事，我亲自遇到四个例子，无法解释，有魔鬼参与其事。”<sup>③</sup> 其中一个例子是，一天，有男女两孩，忽觉一阵狂风从头上吹过，伸手一摸，辫子没有了，但一参加了迷信活动，被剪去的辫子便会在屋角里找到。

民众人心惶惶，官员一查再查。一般人认为，这种剪辫子是抗清的秘密党人干的，目的是要激起人民反对满清政府；人们深知辫子是失败的汉族向胜利的满族投降臣服的标志；标志消失，就预示要改朝换代。在南京还出现了歌颂太平军德

---

<sup>①</sup> 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5月1日；又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173页。

<sup>②</sup> 见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177页。

<sup>③</sup> 见本书，第1卷第138页。

政的标语,因此人们这般解释,似乎是有依据的。<sup>①</sup>

这些邪术掀起的恐怖,结果却追根到教友身上,说是由于教友放纸人上天,因而剪人发辮。原来往昔江南教区的老传教士曾有一个习惯,即每年圣枝主日要分发由棕榈枝或柏树枝做成的圣枝,圣枝上饰有彩色纸条,贴有各式圣人像或展着双翼的天神像,教友们领圣枝回家,便供奉在客堂或经堂内。这种风俗在欧洲某些地区至今还流行着;教外人不明究竟,便认为像上的这些天神便是飞空剪辮子的妖魔。<sup>②</sup>

这些可怜荒谬的诬控,竟使一位神父和好几名教友在1876年惨遭杀害,教区好多座兴旺的会口遭到破坏。

1876年年初,又开始流传着种种恶毒谣言,使南京的神父们很感不安。是否又会发生1870年那样的骚乱呢?是否还会有象马新贻那样正直勇毅的官员来加以镇压呢?

人们对现任总督沈葆楨的为人更是忧虑重重,因为他的家庭历来是排外仇外的。他是1839年焚烧英商两万箱鸦片的<sup>③</sup>林则徐的女婿,又是1858年被英人俘虏到加尔各答<sup>④</sup>并死在那里的前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外甥。他对外来教会和西洋文化是不表同情的。他在福建当制造局局长时,曾和日意格及其同事们有过多次数交往。他认识好多洋人,其中也有若干法国人,这些洋人对教会并不同情,他们还极希望法国放弃保教权。<sup>⑤</sup>

---

① 见上海英文报刊,1876年4月;又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177页。

② 1876年教难之后,江南教区曾一度禁止分发圣枝。

③ 见本书,第1卷第44页。

④ 见本卷第5页。

⑤ 文成章1877年信,见《法信》2769。

最后,由于法国在普法之战中惨遭失败,外交官对教会事件置若罔闻,不敢要求严格执行 1858 年至 1860 年远征胜利时签订的条约了。<sup>①</sup>

但南京本城中秩序尚好,圣神降临瞻礼还过得非常热闹,并有好多名成人领洗,教友们又重新振作起精神。<sup>②</sup>

9 月,许多反对天主教的小册子又出笼了。城内各团体、各单位都收到这种小册子,神父们立即向专司外事的道台报告。这位道台很尽职,马上严厉地制止了这危险的苗子。

但在长江下游地区就大不相同了。宁国府、镇江、无锡、苏州,甚至上海四周,竟发生了真正的攻击天主堂及其机构的骚乱事件。我将按事件发生的先后分别来叙述。

首先是在宁国府发生了最激烈的骚乱。从 1875 年起,已有若干令人担心的迹象,使望教者和新奉教者局促不安。这年年初,许多考生会聚在府城等待考试,他们对住在府城的倪怀纶神父纠缠不清,而且十分粗暴无礼;并且乘神父不在家时,强行进门肆意抢劫。

同时期,在较远的地方,本地的教外人欺侮外地迁来的教友,把他们家里的宗教用品圣像圣物等抢走。在广德州,到处传播着诬蔑育婴事业的谣言,神父和教友也受到了攻击,使望教者害怕得只好躲藏起来,教外人也不敢再和神父接触往来。<sup>③</sup>

地方官不是装聋作哑便是有气无力地敷衍一下。1875 年 11 月,建平的士兵抢劫了望教者的家,又烧掉了他们的房屋。金式玉神父闻讯赶来,进行多方交涉,才得到相应的赔

---

① 金式玉 1876 年 11 月 6 日信,见《法信》2669。

② 见本书,第 1 卷第 46 页。

③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6 年,第 182 页。

偿。<sup>①</sup>

1876年2月，在宁国府发生了更严重的事件。肇事者仍是聚集在府里等候考试的考生。那时神父们正在南京做避静。2月22日，一群青年考生会集在神父住院前，他们大声辱骂了守门的传教先生后，冲进大门，毁坏家具，抢走了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不便拿走的就放火烧掉。邻居因怕自己房屋受灾而竭力劝阻，神父住院才没有被烧掉。地方官派来的几名衙役姗姗来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sup>②</sup>

这件事实在太气人了，于是，勇敢的金式玉神父同宁国府总铎乔迁于立刻到府署去交涉。知府见他俩义正辞严，十分害怕，即许下四千块银元作为赔偿，又拨给城里一块良地，还张贴告示，表扬天主教。<sup>③</sup>这是教区久未赢得的成功。不久，一个具有恶势力而又狂妄自信的人参与其事，致使全区混乱，新奉教的教友更大受迫害。

在宁国府有一名顶统领军衔的武官，名义上指挥着一支防止叛乱的军队。那人姓方，直属南京总督，他不受地方上任何官员的节制；对有叛乱嫌疑者，他可直接下令逮捕，并由他亲自审判与判决。他的士兵也只执行他的命令。这位方统领极端仇视天主教，他负责监视洋教，发誓要把洋教连根拔掉，作为他的一项使命。从1876年起，发生的种种暴乱和抢劫都和他有关。为了更正确地识别教友并加以陷害，他热衷于宣

---

① 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5年12月15日；又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155页。

② 金式玉和乔迁于3月15日、4月1日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

③ 乔迁于1876年5月1、15日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56页。

传孔子之道,把“圣人”的牌位和格言刻在木板上,大量发到四乡。只要哪家不愿意高挂这富有迷信色彩的牌位,就被认为是叛乱的嫌疑犯。他用“地主教”(皇帝)来替代天主教。他公开注释从康熙以来历朝皇帝反对外来教派的上谕,还宣布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天主教。<sup>①</sup>

一批一知半解的读书人是方统领的得力助手,他们拿着牌位到处分送,凡接受牌位的便认为已背教驯服了;不接受的,便认为是坚持反抗,并按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判决。<sup>②</sup>

金式玉神父想接近这位可怕的大官,并同他说理,但结果徒然。方统领认为“教会的事由地方官办理,他本人只管搜查和惩办叛乱者”。<sup>③</sup>

在方统领四周有许多仇教的人:一些本地人觊觎外地移来的教友耕种的良田;读书人向来最恨洋教;盗匪之流觉得有利可图,正跃跃欲试;<sup>④</sup>简直组成了一个阴谋的同盟会。有一次,一个村子办筵席,竟集结了四五十人,席上决定要毁灭天主堂。望教者吓得有的逃进深山,有的只得接受作为背教的迷信牌位。<sup>⑤</sup>

1875年年底,已有好几名教友因被诬打架或盗窃而被逮捕,并长期关押在狱;金式玉神父想尽办法,才从宁国县知县那里,把他们保了出来。<sup>⑥</sup>

同时期,在宁国县又爆发了一次骚动。原因是由于官方

---

① 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49页。

② 同上,第151页。

③ 《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5月1日。

④ 同上,1876年4月15日。

⑤ 同上,1876年4月15日;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152页。

⑥ 同上,1875年2月15日。

对湖北移民收租过多而引起移民的不满，县里的士兵竟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不少人，其中有三名教友。<sup>①</sup>

方统领认为这是泄恨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宣布这次暴动是由教友们组织发起的。一个名叫程明德的望教者被诬控为首领，其实他完全是无辜的。方统领的士兵把他关押起来。金式玉与项德来两神父多方设法，营救无效。原来程明德曾触犯过方统领部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这个人曾想侮辱一个女教友，被程明德阻止了没有成功，因此他怀恨在心。所以此番程必死无疑。虽经本地绅士们证明程无罪，地方官也称控告不实，但结果毫无用处；这位新教友被当作叛乱首领，由士兵们牵着游街示众，游了广德、宁国两县后斩首。项德来神父写道：“在我看来，这位教友真算得上是殉教致命者，他的死仅仅是因为仇教者的憎恨。”事实也是如此，就连方统领和他的士兵们也说：“假如他不是教友，我们也不会把他处死。”<sup>②</sup>

为了使望教者和教友们完全泄气，方统领认为还应该采取更狠毒的手段，于是他想杀死一个传教士来达到他的目的。不幸，教区司铎黄方济（廷彰）神父被他视为杀害的目标。黄神父出生于海门的书香之家，1854年由赵方济主教派往那不勒斯圣家修院，他曾乘“贾西义”号军舰旅游过法国，当时还是德柏拉舰长把他送到洛里昂港口的。<sup>③</sup>

他在圣家修院毕业后，曾去湖北传教多年。此后，他要求回到江南本教区，在那里他的胞兄黄斐理（之缓）神父已传教

---

① 项德来、金式玉来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4月15日、5月1日、6月1日。

② 见《江南教区消息报》，4月29日、6月1日。

③ 谭维翰：《亚历格来传》，第348页。

多年了。郎怀仁主教愉快地接受了他的申请，派他到了宁国府，因那里有不少由湖北移来的教友。他熟谙湖北方言，对那些从湖北移来的教友正可发挥他宝贵的作用。当时神父们在来往书信中都一致称赞黄神父的虔诚、勇敢、传教的成绩以及他高尚的人格。<sup>①</sup>

可怜的神父死后，仇人们还拼命要消除人们对他的怀念。会长文成章神父写信给驻北京的法国公使，要求为黄神父恢复名誉，信上说：“我们知道，这位神父品德高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本省主教器重他，教内教外的人都尊敬他。他崇高的感情和道德风范，都可同外来的传教士相媲美。”<sup>②</sup>

此外，文会长同西区会长倪怀纶根据有关的种种汇报，都说这位神父的审慎与自我制约没有达到传教神火的高度。有人指责他的官场气派太浓，因此得罪了当地的绅士；他频繁地干预、支持湖北移民反对本地人的诉讼，使本地人怀恨在心；他的传教热情违背了地方官的意志；他创设了许多新会口，这又使地方官对他十分不满；他为教区买进土地，付款时往往不按契约条文办理，他的传教先生和手下办事人员又往往曲解他的本意而办事过火。因此，人们把一切愤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sup>③</sup>

---

① 郎怀仁主教，高若天会长都写过类似的信，详见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191页。

② 文成章1876年11月4日致法国驻北京公使自来尼的信，见《法使馆》。

③ 黄神父的传教同伴倪怀纶、金式玉、项德来等神父给郎主教和会长神父的信中，如实地反映了以上各点，见《徐档》，卷宗C2、C16；柏立德的日记，《徐档》，卷宗H1、H81。柏立德还记叙了1877年他与倪怀纶的一次重要谈话，文成章还把这些谈话记录于1877年4月29日报告给耶稣会省会长，《法信》2669。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黄神父已经树敌不少。其中最凶恶的敌人是绅士何渚，他是方统领手下最凶狠最得力的干将。他出生河南，对来自湖北的移民十分憎恨，特别是其中的教友。他在征募移民时，凡是教友他几乎一律不收。

从1876年年初起，黄神父已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威胁要把他置于死地。6月，他按例到上海过司铎们的歇夏，他曾向会长神父汇报了他的处境，并提议把他调开，也许这样可转危为安。当时，金式玉神父已妥善处理了宁国府教堂的被抢劫事件，因此还以为黄神父也能平安无事，<sup>①</sup>但没想到危机早已迫近。

人们劝他安心偕同卞良弼与沈二<sup>②</sup>神父重回原地。他们在7月9日到了宁国府。坏消息早已等候着他们，望教的与新奉教的教友都奔来求救，原来方统领与他的部下在黄神父管理的各堂口，抢掠房屋并勒索敲诈新教友。黄神父的传教先生早被逮捕，他属下的各小堂口都有被抢劫的危险。黄神父毫不迟疑地给建平县知县写了一封请求保护的信，接着就回到广德南面的坐堂芦村。12日，他从芦村写信到上海，在汇报方统领部下的种种暴行后，他说：“何渚发誓要我的命。”<sup>③</sup>果然，一天不到，他的预感竟成了事实。

7月13日早上六时，黄神父正在念日课经，准备举行弥撒。突然一位会口的办事人急奔前来，冲进神父房间，报告有一群发疯似的群众已逼近村子。神父首先想到的，是和神父

---

① 见本卷第225页。

② 沈二，即沈则宽神父。他的胞兄沈则恭和胞弟沈则信都是耶稣会神父。当时教内人就以他们出生的顺序称之为沈大、沈二、沈三。——译者

③ 秦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195页。



住院同一围墙里的一所兴旺的<sup>①</sup>女校，当时女校是由一位姓宋的孤孀负责管理的。神父命令女生们急速避往邻居人家，可惜已太迟了。七八百个拿刀带枪的人已把村子团团围住，他们首先冲进神父住院，黄神父当场被抓住。据当时在场的人报告：这次攻击是由何渚亲自指挥的。神父对他说：“为什么要侵犯我，你要什么，我可凭公道给你。”

“跪下，求我饶命！”何渚挥舞着大刀说。

“我的命在天主手中。假如我为天主失去生命，我可上天堂，希望你也有这一天随我而来。我在这里是为救我和我兄弟们的灵魂，你要砍我，砍吧！”

“那么，脱去你的衣服！”

“我不脱。”队里人上来强行剥去了神父的长衫和短衫，神父身上只剩下了一件衬衣。

“这件，你自己脱！”

“这件，我更不脱。”

何渚朝着神父面部，就是一刀；第二刀砍在神父左肋。

“耶稣救我！”神父喊着，就死去了。神父尸体上一丝不挂，遭受了难以描述的侮辱；何渚的儿子还剖开了神父的肚子，拉出内脏，割下四肢，躯体当场被焚毁。<sup>②</sup>

此后，经过深入调查，因证人的说法不一，未能证实黄神父究竟是不是被河南绅士何渚亲手杀死的；教区为这个案件

---

<sup>①</sup> 这种安排极不明智，是违反教区规定的；教区原命令神父住院必须与女校绝对分开，诬陷黄神父的人，就利用这一点大肆诽谤。见安主教给帅维则神父提示的注意点。《徐档》，卷宗 E3。

<sup>②</sup> 我看了7、8月间寄到徐家汇的信件，终于在1876年9月1日的《江南教区消息报》上发现了。

开了一次会议后，就不再继续追究凶手了。<sup>①</sup>总之，众人看来事情很清楚，杀人犯总是他们这一伙对天主教深恶痛绝的人。

神父死了，神父的一名传教先生，名叫杨士孝的，暴徒们也特别仇恨他，所以也同样遭到了惨杀。暴徒们在他的老母亲面前焚烧他的尸体，他老母亲苦苦哀求，也得不到丝毫怜悯。一个两岁的孩子，因母亲无力抚养而被天主堂出于仁爱之心而收养了的，也遭到了惨杀。小小尸体被斩成肉块投入生石灰中，这些别出心裁的杀人手段，足见这些杀人犯的心肠何其狠毒。<sup>②</sup>

另一名传教先生也被关押，然而因为他与何渚相识，何渚就把他释放了。

女校内的女生与女教师被分配给了几个参加残杀的小头目，她们悲惨的遭遇自然不难设想。最后，暴徒们搜查神父住院，在黄神父房内搜出了一箱天神像，他们马上联想到剪辫子一事上去。不久，地方上都相信剪辫子的妖魔已在黄神父那里捉住了。于是，天主堂和神父住院被全部拆掉。<sup>③</sup>

烧存的神父尸骨被抛弃在那里达数月之久；1877年5月5日，才有人把找到的黄神父的几根骸骨从芦村带到上海，葬在南门圣墓堂。<sup>④</sup>

许多人想给这位如此勇敢尽职而牺牲的神父作为殉教致命者来崇敬，可是教区上级不赞成这样做，因为黄神父生前举

---

① 1877年7月10日会议，见徐家汇教区会长私人档案。

② 《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日。

③ 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187页。

④ 柏立德：《日记》，1877年5月26日。

止不够审慎,所以引起了教外人的仇恨,至少也是他所以被害的部分原因。<sup>①</sup>但我们可以深信,天主对如此热心救灵、明知自己必死无疑而仍勇往直前的神父,不会拒绝赐给他以殉道致命者之得胜枝的。

黄神父被害的当天,就有教友赶到水东总堂报告这个噩耗。那时沈二、沈薰良、卞良弼及项德来四位神父正会聚在那里,得知何渚及其一伙计划准备来冲总堂,四人便马上分散。项德来去宁国府,拟请府里官员给以保护,但官员不予接见;很明显,方统领及其部下都能为所欲为,他们对地方官的权力早已毫无顾忌。<sup>②</sup>

满怀恐怖的教友抛弃了房屋田地,避入深山。神父们则各回本堂,沈二留在水东四周,项德来到河沥溪,卞良弼到广德州。沈薰良神父原该往上海歇夏,遂由芜湖回上海,7月17日,便带来了上述惨闻。那时,正在徐家汇歇夏的宁国总本堂乔迁于立刻同李问渔神父动身西往,到了镇江,会同有难必助的金式玉神父,于7月21日,一起到了芜湖;乔迁于总铎单独留在芜湖,为能对遭难的神父们有所帮助;金式玉则同李问渔神父去了安庆,希望能在抚台处得到有效的保护。

这时候,地方上普遍传说,芦村事件中杀人犯保证不会受罚而且还得到保护;方统领各处贴出告示,劝教友们挂起他分发的写有孔子格言的迷信牌位,回到国教上来。湖北的老教友显得非常坚强,他们没有丝毫背教的言行,令人感到欣慰。<sup>③</sup>

---

① 1877年2月22日会议,见徐家汇教区会长私人档案。

② 《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日。

③ 文成章1877年4月29日致省会长神父信,见《法信》2669。

可惜很多新教友与望教者并不象老教友，有很多家庭把作为背教标志的牌位高高挂起，并放弃了一切天主教的宗教生活。许多可怜人还向官方揭发坚持信仰的好教友，诬告他们得到贿赂发放剪辫子的妖魔。这种可笑的捏造更激起了教外人对教友的仇恨。<sup>①</sup>

7月15日至23日，四十处小堂学校或神父住院被拆掉或烧毁，八名教友被处死。河南来的移民和本地人结成一帮，拿起武器攻击湖北迁来的教友村子，他们又抢又烧。路上他们见有佩带圣牌或念珠的，就不准通行并百般侮辱。妇女与女青年被虏去作奴隶或押送出卖到客省。有的教友去求地方官保护，地方官回答说：“去寻西洋神父吧，他们应该保护你们。”这些可怜人只得被迫背井离乡，有的逃到了芜湖；乔迁于神父尽力帮助救济了他们。

7月24日，何渚一伙突击包围了水东总堂。房屋建筑都被拆毁，图书室、更衣所、小圣堂、衣服间及一切家具都被洗劫；最近死亡的伏日章神父，尸体尚未埋葬，便被他们从棺柩内拖出来喂了狗。

金式玉神父仍留在南京，不屈不挠地工作着。7月23日和24日，负责外事工作的道台答应，特派三名全权代表前往实地调查，料理宁国府事件。金神父就同他们一起动身。因为金神父的性命特别有危险，于是暂留芜湖等待护送队到来，让三位代表单独前往。代表们会晤了方统领和地方官，但毫无收获。方统领还扬言，倘若巡抚敢于偏护教友，他本人将煽动民众起来造反；知府与知县吓得只好推说自己无能为力

---

<sup>①</sup> 《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日。

了。<sup>①</sup>

代表们的唯一成就,是救出了卞良弼与项德来两位神父。他们已返回自己的堂口,走访扶助遭难的教友。当时,项德来神父的处境比较危险。因方统领曾出重价悬赏要他的首级;他避入深山,躲在一家正直而又与教友相好的外教人的独家村里达十五天之久。这户人家是冒着生命危险把神父藏起来的。那时是火热的七八月天气,他躲在那家的锅灶上的形似“空中墓穴”的阁楼里;一天三次炊烟上升,神父便笼罩在浓烟之下;从7月24日至8月7日,神父常处于紧张、害怕的状态中,又常被烟熏得涕泪直流,真是度日如年;这家正直勇敢的人家,不为几百元赏金所诱惑,始终掩护着神父。8月7日,神父的救命恩人听说安庆派来的代表正在四处找寻神父,准备把他接送到芜湖去,于是去报告代表。代表立即派来了一支护送队与一顶坐轿,并重赏了这位敢于收留神父的勇敢乡民;8月14日,项德来终于到了上海,一连病了好几个星期。<sup>②</sup>

回到广德去的卞良弼神父,一路鼓励和安慰那些没有逃入深山的教友;十天后,知县生怕方统领会来,便请神父暂避到他的县衙门内。神父自思对教友们已无能为力,再三考虑之后,接受了邀请。神父避在衙门内的气楼上,即衙内佣仆们的宿舍内,一住就达一月之久。在那里他还能同遭难教友互通消息,并在县官前为他们辩护。他逐日写的日记,全是些痛心的消息。8月27日,安庆来的代表得到神父同意,由人领他回了上海。到上海时,卞良弼神父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

---

① 《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日,刊有乔迁于对当时环境的详细回忆录。

② 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29页起转载了项德来神父的日记。

迎。<sup>①</sup>

沈二神父是中国人，因此他便于躲藏。他起初在水东四周慰问和鼓励可怜的教友们，他说：“教友们见了他都泣不成声，宛如死了亲娘一样。”几个比新教友更勇敢的教友，要起来用武力自卫，神父阻止了他们，怕的是人们会诬陷教友们起来造反。水东被劫后，神父看到教友们既已逃散，乃决定撤离；他乔装为书贩子，由教友结队护送，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进入浙江边境。因陆路设有关卡，严禁神父通行，他就雇了一条小船，由水路绕道来上海。他到达上海时正是7月31日，圣依纳爵瞻礼的晚上。<sup>②</sup>

他们动身之后，整个宁国府就一个神父也没有了。乔迁于总铎和其他几位神父留在芜湖。在安庆的代表们的请求之下，这几位神父就担负起恢复秩序、安定地方的责任。除了宁国府府城里的一座圣堂幸存之外，地区内别的圣堂和神父住院全被摧毁。教友们逃散了，不少新教友背教了，这是1876年7月和8月的情况总结。每天传到徐家汇的只是令人悲痛的消息，使歌夏的神父们人心惶惶，愁云密布。<sup>③</sup>

黄神父的死讯正式到达后，会长高若天神父就报告法国驻沪总领事葛笃先生，总领事立刻向上海道台，再由道台转南京总督，提出了强烈的抗议。<sup>④</sup>

---

① 癸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4页起转载了卞良弼神父的日记和柏立德神父9月4日的日记。

② 沈二神父日记，见《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13页。

③ 黄神父被惨杀的消息在7月17日到达徐家汇之后，几乎天天有不幸的消息传来。柏立德神父曾实地作了撮录，记在他的《日记》上。

④ 葛笃先生7月31日信，见《徐档》，卷宗B8。

法国驻北京的罗淑亚公使回国之后，在新公使到任之前，罗凯特先生担任着署理公使。他一得到消息，即上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总理衙门当场答应有效地保护宁国府的神父和教友；事实上，南京总督也曾接到过这样的指示。<sup>①</sup>

假如法国的代表们始终保持这种坚强的态度，也许黄神父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惨案会得到昭雪。可惜事情的进展完全不是这样。

江南的神父们对罗淑亚公使的离任回国，深感遗憾；当他回法国途经上海时（1876年4月），徐家汇的神父们把他当作一位真正的恩人来接待；<sup>②</sup>人们在巴黎进行了许多活动，想把这位勇敢的公使能在北京留任下来，可惜徒然。<sup>③</sup>

继任罗淑亚伯爵的，是子爵自来尼先生，他于1876年7月30日到了上海。江南神父们对这位新任公使并不陌生。1864年至1869年，他曾担任驻上海的领事，他在建立或收回南京、安庆、镇江、苏州各会口的教产的重要交涉中曾出过力。那时，他常表示很关心教会利益，和有些神父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尤其对洋泾浜院长苏念澄神父特别友好。

那时期，法国在中国的威望还很大，而自来尼先生对“教区事务”却不那么热心了。他对那些特别仇教的官员，却常常

---

① 柏立德：《日记》，9月2日，记有罗凯特先生致苏念澄神父一封信的摘要。

② 柏立德：《日记》，1876年4月3日，见《徐档》，卷宗H1。

③ 柏立德：《日记》，1875年6月1日，记有：“德弗莱什主教写信给高若天会长，请他在巴黎活动，要求罗淑亚公使留在北京。”关于这问题，我找不到江南的上级有什么活动的迹象。但在教区驻法帐房塔扬神父1875年10月21日的信上写道：“统帅只听德卡兹先生的话，而德卡兹先生却拒绝统帅夫人与子爵夫人德莫对挽留罗淑亚在北京的要求。”（《徐档》，卷宗F20）

是退让的：特别是他不支持南京的神父们，以致结果完全按李鸿章的本意行事。他们被驱逐出南京城，而住到了城墙之外。<sup>①</sup>

自来尼给郎怀仁主教与会长神父的信中，在北京公使馆的报道中，他经常指责我们中几位称职的传教士“热心过火”，他经常叮咛“要有礼有节，要有分寸，要谨慎明智”。这些词汇经常出现在他的笔尖之下。<sup>②</sup>

更令人不安的，是自来尼先生逗留上海时，结交了好多名江南的高级大官，特别是现任南京总督沈葆楨。他还深信这些大官都是正直可靠的，并认为为珍惜他们间的友谊，也值得做一些牺牲。<sup>③</sup>

法国在普法之战中惨遭失败，公使们的态度怎样呢？法国人说话当然不能象 1867 年胜利时代那样趾高气扬了。德卡兹公爵曾指示，要尽可能避免一切引起政治纠纷的外交事件。<sup>④</sup>

神父们的命运一开始就被决定了。自来尼先生到达上海之日，正逢宁国事件发生之时。高若天会长立即把事件经过告诉了他，并把徐家汇每天收到的来信给他过目。新公使乃停止北上，坐“塔利斯芒”号军舰先上南京，拟与总督沈葆楨亲

---

① 见本卷第 180 页。

② 1876 年 4 月《英文日报》；又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 177 页。

③ 自来尼 1877 年 8 月 14 日致文咸章神父信上说：“我准备在这些总督大人而又是我的老朋友面前不滥用我的威信和影响。”见《徐档》，卷宗 B8。

④ 罗叔亚公使在 1874 年 11 月 1 日，曾亲自写信给在中国的主教们说：“你们大概都知道法国目前的形势，我不用再三突出讲审慎明智了，但你们也要加倍小心，避免发生新的困难事件，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徐档》，卷宗 B8。



自商讨并解决宁国悬案；他认为凭他和沈葆楨的老交情，事情不会那么难办。<sup>①</sup>

金式玉神父在芜湖恭候着，安徽的省代表已给他拟好去宁国的路线。<sup>②</sup>但金式玉却先上南京，面见白米尼公使；他将宁国事件用中法文写了一份备忘录，清清楚楚叙述了事件的始末，并说明这严重事件如何可耻地违反了法中两国过去订立的条约。<sup>③</sup>几天后，金式玉给教区会长写了报告，在谈到他对法国新任公使的看法时，感到悲观失望。<sup>④</sup>

金式玉神父和公使经过几次极短促的会谈后，他对公使的态度深感痛心。<sup>⑤</sup>公使认为教士们的诉苦是言过其实；公使对那时教难正在掀起的四川省的外方传教会神父们向他告急求救的信，特别感到厌烦。<sup>⑥</sup>为了使他觉醒，金式玉神父认为有必要在书面报告的开端，写上“我以我司铎神品的荣誉”呈报作证。

当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使法国方面的谈判者很不愉快。“塔利斯芒”号一到南京，白米尼公使即写信给南京的本堂兰廷玉神父，准备在与总督会谈之前，请他先去商谈一下。由于送信的中国人大意，要函迟到了，使兰廷玉神父未能前往；因此，兰廷玉给白米尼公使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而且

---

① 柏立德：《日记》，1876年7月8日；《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日。

② 见本卷第282页。

③ 《法使馆》，1876年8月10日；《徐档》，卷宗C2、C16。

④ 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68页起；《徐档》，卷宗C2、C16。

⑤ 公使的一个随员是著名公使刺萼尼先生的儿子，刺公使久为江南传教士所敬仰，他是第一个为教区争得传教自由的人。见本书，第1卷第74页。

⑥ 见《天主教教区杂志》，第8卷第303页。

久久消除不了。<sup>①</sup>

沈葆楨与法国公使会谈了三次，两次在总督府，一次在“塔利斯芒”号军舰上。传教士没有参加，但却有一名中国教友在场，他就是上海道台的秘书张翰卿先生，每次会谈他都参加了。他把会谈的经过提供给金式玉神父。金神父在他呈报公使的备忘录中，曾要求把方统领召来南京公审，因他的暴行曾扰乱了宁国府整个地区；另外还要求惩办惨杀黄神父的凶手，并赔偿教区一切损失，而自来尼公使的要求只局限于救出尚在险境中的卞良弼与项德来两位神父，总督答允下令“去找寻并负责把他们带领出来”。<sup>②</sup>

沈葆楨很有手腕，他认清自来尼先生的弱点，坚决强调宁国府事件是纯政治问题，竭力回避与掩盖方统领及其部下企图强迫新教友与望教者背教的事情。他把一切归结为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土地之争，黄神父和他的教友去插手干涉是错误的，其间毫无宗教问题存在。金式玉沉痛地说：“公使先生一点不作答辩。”他总结说：“自来尼先生与总督谈话时象一个好好先生，他们只谈些天晴天雨之类的客套话，偶尔也插进一两句有关我们的重要案件，但也只当作小事扯扯而已……衙门里的中国人看到后，彼此嬉笑着说：‘老了，不中用了。’这句话正可作这次会谈的总结。他比起前任公使来，真不可同日而语，他连罗淑亚的影子也没有。”<sup>③</sup>

---

① 兰廷玉8月11日致会长信，见《徐档》，卷宗G2，第16页；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59页。

② 金式玉写道：“这最后一语的背后，是要我们离开宁国府；而我们宁愿听到这位大人能说：‘不论他们在哪里，我都要保护他们。’”

③ 见柏立德：《日记》，1876年8月21日。

自来尼先生这次南京会谈的唯一成果，是沈葆楨总督答应于9月初发出一道布告，张贴在江苏省的几个大城内。布告内容是晓谕民间传说“用纸人剪人发辫事，是行邪术的匪徒妖言惑众，图谋嫁祸于人，这些匪徒系白莲教党羽，与教堂无涉。谁是剪辫的罪犯，应听地方官拿办，民众不得自行判断”。<sup>①</sup>

上海道台在转达上级的告示中，说得更为清楚。告示引用了北京条约第十三款及1863年皇上对天主教的上谕，结论说：“这些谣言实与天主教无关；因此需冷静，勿听信外间谣言。假如以毫无根据之事控告教友，便是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而且还助长了暴乱。在我治下所有各属教堂，相安日久，从不闻有犯法行邪术等事，因此地方官尤宜加以保护；任何人不得疑心诬陷他们为暴乱的发动者。”<sup>②</sup>

首先，这些告示，尤其是总督的那一张，内容一点不伤人；告示又只张贴在江苏省极少数几个大城市内，广大民众几乎全不知道。<sup>③</sup>而自来尼先生却以为是他在南京会谈的极大胜利。他一回到上海，便对神父们说，总督颇有善意，对宁国事件了如指掌；那边并没有什么宗教迫害，仅仅是本地人与湖北移民之间的争吵；总督许诺坚决保护尚在该处的两名法国神父的安全，并出告示保护他俩的教友。<sup>④</sup>数天之后，我们的公

---

① 告示原文可参看：《正教奉传》，第45页。——译者

② 上海道台告示原文见《正教奉传》，第46页。——译者

③ 最需要贴告示的宁国府，却一张也没有贴出；乔迁于1876年9月11日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10月1日。

④ 兰廷玉1876年8月11日信，见《徐档》，卷宗C2，第16页；柏立德：《日记》，8月13日。

使读了总督的告示，从北京写信给郎怀仁主教说：“我相信主教现在应当服帖了吧，我们从中国官衙处为教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利益！”<sup>①</sup>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白来尼公使在南京会谈之后，写给南京总督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是安庆官员在1876年8月底高高兴兴地转给金式玉神父的。信上，法国公使感谢总督救出了项德来神父，还请他再派一位专员去救卞良弼神父。事实上卞神父早已由金式玉设法营救出来了。公使在信上甚至还请沈葆楨向法国使馆提供传教士中的品德不良之处。<sup>②</sup>

与此同时，上海的英文报纸正在大肆攻击天主教，使神父们感到十分难受。1870年，当天津惨案发生时，耶稣教的牧师们曾光荣地被邀请参加天主教的追悼礼。<sup>③</sup>这次，他们却认为必须机灵地把神父们同罗马天主教截然分开，于是也激烈地攻击天主教传教士，说他们“参加政治活动”是引起宁国府惨案的原因。<sup>④</sup>

南京的官员们便利用这一机会，用最丑恶不堪的阴谋诬陷教会，使江南教区遭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痛苦。

杀害黄神父的凶手何渚，为了逃避罪责，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告了黄神父一状；这样，黄神父的被惨杀便可解释为是迫于民愤了。1876年8月初，何渚搜集了种种诬蔑之词，向

---

① 白来尼1876年9月15日信，又9月21日致高若天信，见《徐档》，卷宗B8。

② 见柏立德：《日记》，9月5日；又《徐档》，卷宗C2，第16页。

③ 见本卷第188页。

④ 柏立德：《日记》节录8月9日的上海《字林西报》。

南京总督告了被害的黄神父十大罪状。<sup>①</sup>

何渚为了加强他控告的力量，他亲自到了南京，那正是白来尼先生动身离开南京的后一天。这样一告之后，南京的官员便开始审理对黄神父的诉讼案件了。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官员在自由行动时，是多么巧妙得法。

8月16日，总督府衙门贴出布告。沈葆楨为了表示他的大公无私，严叱何渚超越地方长官的职权，“胆敢聚众领头烧毁教堂一所，杀害两人，且焚尸灭迹。如果教友有罪，也应向地方官报告，听地方官拿办处理”。为此，遂将何渚以及指控黄神父的一伙拘押江宁府监狱，直至该案全部了结。<sup>②</sup>

凡认识中国监狱惯例的人都知道，何渚不用费多大精力自会摆脱困境。当人们得知这件案子交给藩台梅启照处理时，内幕更明显了。梅启照曾在1870年伙同陈国瑞企图谋害南京传教士的生命财产，又是他阻止把刺死马新贻的凶手处死。<sup>③</sup>

8月下旬，开始辩论这件案子，辩论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叙述这件诉讼案之前，先叙述一下长江下游对宁国事件所引起的反响。

在安徽与湖北交界处，有金式玉神父在艰难困苦中创立

---

① 神父们得到一份何渚控告的原文，是由一位南京教友入狱探监后与何渚认识，并得到他的信任后抄录了这份杰作。假如黄神父的案子能公开审讯的话，李问渔神父曾准备好了一份反驳的材料。见《徐档》，卷宗C2，第16页；又柏立德：《日记》，9月8日。

② 见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61页。诉讼的详细情节，在兰廷玉和滕伯禄神父的信上写得很清楚，《徐档》，卷宗C2，第16页；住在南京的神父们曾得到一位对断案不公抱不平的下级官员的报告。柏立德神父曾总结这几位神父的来信，记在他的《日记》上；见《徐档》，卷宗H1。

③ 见本卷第191页。

的六安州一带的新生会口。<sup>①</sup> 这些会口经常受到地方上暴徒的迫害，或多或少被扰得鸡犬不宁。人们预计这里必会出现效法方统领与何渚的人。1876年8月，林福恒神父被派去六安州；9月，他到了任所，只见地方上一片混乱：除从南京传入的有关剪辫子妖魔的谣言外，还有许多不同派别的吃素人的胡作非为，地方官正在清查法办；有人指控，其中也有天主教教友。人们虽多方劝阻，但神父还是前往，后来他安抵沈口埠任所。有个武官，人们称他为彭大人的，是方统领的对手，当神父不在时，他曾派兵占据了小圣堂；地方上教外绅士出来居间调停，幸好只遭到些微小的、不重要的损失。神父一到，逃入山中的教友们便放心地回归了家园。有几个教外人曾扬言要杀外国神父，现在也不敢响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宁国府的盗匪全部落网，并关押在南京监狱；当时人们又思忖，法国又得象过去那样态度强硬地迫令赔偿损失了。可是不久，恐惧与不安都消除了。项德来神父恢复了健康之后，被派给林福恒神父作助手；士兵们也受到了惩罚，神父们得到了相应的赔偿；接受迷信牌位或证实其有过背教言行的教友纷纷前来认罪忏悔。唯一的牺牲，是一个受吃素人影响的教友，同好几个吃素人一起同遭处决。他的被杀，不象是为了教会问题，所以神父们对他的死，也不提出异议。<sup>②</sup>

在镇江与沿运河各堂口，由于南京传来的狂妄无稽的谣言，造成了严重的祸害。好几名因作案被捕入狱的罪犯，硬说曾受传教士的收买和训练，发放过纸人剪辫。镇江、扬州、淮

① 见本卷第153页。

② 林福恒与项德来神父的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10月1、15日，11月15日。

安的地方官出告示严叱这些造谣者，并惩罚了为首者。在淮安，还流传着一件骇人的妇女被杀事件，说教士们杀害妇女后并把她的尸体切成小块；经地方官调查后，立即加以辟谣，恢复了教堂名誉。扬州知府在康治泰神父处，得知天神像的意义并知道用以装饰圣枝之用后，感到满意而去。<sup>①</sup>

9月13日至9月20日，镇江倪怀纶神父的处境十分危险，一群盗匪在邻镇集合，扬言要抢教堂的财产。知府竟声称自己无力维持治安，劝神父避往上海。神父报告了英美两国领事，领事们便给道台发了一封强硬的警告信。9月19日，惊人的消息还纷纷传来。倪神父一清早进堂，穿着白衣，佩上领带，准备收去圣体，但盗匪始终没有出现；可见领事们的警告已发生了效力。<sup>②</sup>

宁国府各堂口遭殃之后，要算无锡、苏州以及松江附近的许多渔民教友的会口受害最深了。这些州府中河道密布。<sup>③</sup>在这些河道里，行驶着数以千计的渔船、客船、运货船。从十七、十八世纪起，这些渔民教友已组织成许多繁盛的教友会口。他们远离城镇，除捕鱼卖鱼外，几乎同城市居民和农村乡民没有交往，一般地来说他们比较纯朴。主日及大瞻礼日，他们集合在专为他们建造的沿河交通便利的圣堂前后，乘集会的良机，他们办理神业、善领圣事，并料理家务。<sup>④</sup>

---

① 倪怀纶、康治泰、邓炳虞神父的信，《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5日，10月1、15日。

② 倪怀纶：《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10月1日。

③ 见本书，第1卷第252页。

④ 至今渔民教友的会口组织还是如此，我在《中国概况》上，叙述了几处会口的情况，见第101页起。

沿河两岸的人，要造谣诬陷这些水上居民原很方便；他们不甚了解渔民生活，渔民们的离群孤居很易被人怀疑。此外，这些船上教友特别喜爱圣像。每条船中央的主舱内，布置着一个经堂，中间供着放有临终大赦的十字苦像、耶稣圣心像、圣母、天神、圣人等像，还有贴着逼真的天神像的圣枝。船上合家老小，一天数次要像前念经祈祷。这一切很容易被混淆到发放纸人、剪人发辫的妖魔上去。

1876年8月，南京放出的谣言很快流传到长江下游各府；教士们在来信中给我们作了生动的描述：那时，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白天，人们聚在茶馆里、客店里，纷纷议论如何驱逐放纸人的邪术者；<sup>①</sup>黑夜则高升鞭炮放得震耳欲聋，再加上锣鼓震天响，目的是要借这些噪音来驱退恶鬼；妇孺们吓得常在梦中惊醒，双手捧着脑后，紧握辫子，生怕辫子被妖魔剪去。长江下游也如宁国府那样，有一位高级将领独自承担地方治安之责，他也不受任何地方官的管辖。这位将领驻在江阴，是长江两岸的军事总指挥，他名叫彭玉麟，是一个极端仇恨洋教的人。他的士兵对敲诈勒索、打砸抢及酷刑残杀，比起方统领的手下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住在城镇的富裕教友大致是友好的，但对贫苦渔民就任意欺压了。当他们看见有船只孤零零地停在河里时，那条船马上会被拖上河滩进行搜查；圣像每条船上都有，在这种无可否认的证据之下，可怜的船主就得被罚款或遭鞭打，有的被绑了手脚吊在树上。从此，渔民们便不敢进城上镇去出卖鱼鲜，生怕逮捕下狱或遭受更大的危险。渔民们只得到有求必应的神父处去求救。8月中旬，无

---

<sup>①</sup> 《江南教区消息报》，9月1日、12月1日。



锡大堂四周会集了三百多条渔船，神父们就连续不断地向地方官呼吁。每年8月15日是圣母升天大瞻礼日，一般有二千至三千个渔民教友参加集会，这年，人特别多。在城内茶馆、客栈等坏人集中之处，到处都在嚷嚷要大杀教友。神父们知道消息后，多次上报地方官，却毫不见效，于是乃派遣一位可靠勇敢、过去曾进过耶稣会初学院的<sup>①</sup>姓陆的传教先生去和官员交涉。这位传教先生坐了扯有白底红十字旗的神父船进城。船一进城，一阵冰雹似的砖屑、石块倾泻而下，把船都打坏了。陆先生上岸，拟步行到衙门，可半路上即被人拳打脚踢，打倒在地，浑身是伤，满脸满胸尽是血迹，一只眼珠被打出眼眶。凶手们以为他已死了，就把他丢弃在路旁，在他身边点上一盏灯笼，就逃散了。无疑尸旁点灯笼是教外人的迷信风俗。这位陆先生就是这样以忠诚和勇敢救了神父以及集聚在圣堂四周的数千名教友。无锡的官员想到自己的职责，生怕发生严重后果，决定派来兵士保护教堂，并把受伤的陆先生抬到衙门去进行治疗。还好他未受致命伤，一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堂工作了。保护无锡的神父和教友最生效的办法是忽然传说天主堂内满藏有许多武器，而且教友们都会使用，致使坏人们大起戒心，不敢再来覬覦；但危险仍然很大，因领导这次暴行的正是无锡地方上最有声望的人，而一心想要保护神父教友的无锡官员，又怕被这些望族指控为受洋人的收买。<sup>②</sup>

江苏省会苏州的渔民也遭受同样的危害。8月下旬，发

---

<sup>①</sup> 陆先生洗名若瑟，名乾坤。见高龙攀：《江南传教史》，第2章第396页。

<sup>②</sup> 潘如汉1876年7月8日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15日；高龙攀：《江南传教史》，第396页。

生了一件极严重的惨案。两个渔民教友<sup>①</sup>进城卖乌龟，给两个无赖抓住了。他们的船一经搜查，当即被查出了不少作为罪证的圣像，即被告到县官处。在审讯中，其中一人的孩子，约十三四岁<sup>②</sup>，看到恐怖的刑讯，就信口胡说他同他的一家人都曾在会口办事人冯阿东处，学会发放纸人的妖术。知县立即下令传冯阿东，冯阿东得知县老爷传他，还以为是去作证人，他便进城，还一心想着去营救两位被捕的弟兄哩。这个可怜的孩子又重复了他荒谬的供词，因此三个无辜者都被判了死刑。原来苏州官员被那些仇教运动的唆使者指控为被洋人收买了的叛徒，这样一来正可证明他的忠贞。于是他使用酷刑威胁，强逼这三个被囚的渔民供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可是他们三人绝不肯说半句假话，在打耳光，抽藤条，鞭打如雨的情况下，他们始终肯定自己是无罪的，并不断呼唤耶稣和玛利亚的圣名。宋永誉神父连连写信给知县，解说圣像的用途，证明三个教友是无罪的；可是知县答复他的总是保证会秉公办理之类的话。1876年9月11日，人们得知，这三个可怜的渔民教友在大队士兵森严监斩之下被砍了头；判决书是经过府台、抚台、制台三人批准的。判决书上绝对不提三人是教友，只说是三名属于白莲教秘密组织的成员。神父们从上海道台的一位秘书那里得到了这份极不公正的判决书的底稿。<sup>③</sup>

---

① 两位渔民教友：赵瑞朕，58岁，江阴人；朱永兴，56岁，昆山小横圻人；见高龙攀：《江南传教史》，第2章第398页。——译者

② 朱永兴的小儿子，名福寿。——译者

③ 宋永誉神父和富守和神父1876年12月8日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2月1日。判决书保存在徐家汇档案，高龙攀曾作了撮要，见《江南传教史》，第409页起。

苏州地区的可怜渔民一得知他们中有三人受了极刑后，都吓得逃到徐家汇和董家渡大堂避难，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星期。渔民的生命虽然安全，但究竟无事可做，生活便艰难了。神父与上海的富裕教友们尽力救济，维持他们的生活。那时在徐家汇大堂和董家渡大堂前面足有二百六十八条渔船。神父们便利用这个机会，给这些渔民们的孩子传授圣教要理，进行牢靠的宗教教育。终于，民间传说的那些荒诞可笑的谣言使上海官员们感到可耻，于是他们派了秘书到徐家汇和神父们协商解决善后问题；他们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再根据神父们汇报的情况，每条渔船发给一张通行证，使渔民们能平安地回去，重操渔业，不再受任何干涉。10月8日，在徐家汇天文台草坪上，三名上海道台和上海知县的特派秘书分发了通行护照。接着，这些善良的渔民兴高采烈地回去了。他们对仁爱接待他们的恩人表示万分感激，他们和真正援救了他们的神父们也团结得更紧密了。<sup>①</sup>

聚在无锡大堂周围的渔民，避过了上述的大难之后，也得到了类似的通行证。<sup>②</sup>

另外，还发生了几件零星的暴行，几条渔船被损坏，几只小堂遭破坏；但从1876年10月平靖之后，神父们终于还得到了一些赔偿。在这些艰难考验之中，没有一名渔民教友背弃信仰。<sup>③</sup>

1876年8、9月中，上海四周也是警报频频；象无锡苏州

---

① 柏立德：《日记》，1876年8、9、10月。

② 潘如汉与叶春荣1876年8、9月、10月15日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7年6月15日；《教区几件要事》（1876年9月—1877年6月）。

③ 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0日。

的渔民那样,上海的渔民教友也遭到了不少的迫害;但地方官对这类诉讼并不那么感兴趣,他一方面拒绝接受诉状,另一方面又把拘捕来的教友放回去。为了抵制妖魔剪辫,教外人找到了再好不过的办法,他们用石灰浆在门上、墙上或路上划个大十字,这真是奇而又奇的事情。当时人们特别担忧的是佘山,佘山各镇贴满了传单,说山上的新教堂激怒了凶神,地方将遭受大难;9月19日,教外人在山下庙里举行迎神赛会。人们都提心吊胆地怕发生暴动;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只有一些群众狂喊乱骂而已。

在这骚乱期间,黄神父的那件出名案子正在南京展开辩论。起诉书有三个要点:第一点,丧尽道德:在芦村和黄神父同日<sup>①</sup>遇害的孩子的尸体被宰割,被焚烧;第二点,残暴不仁:在黄神父被杀害前几天,就有二人被惨杀;第三点,迷信活动<sup>②</sup>:强迫人们悬挂木牌。

在这好几个月里,负责这桩案子的藩台梅启照,并不努力弄清事实真相,面是用尽一切方法支持原告,以便作出使传教士名誉扫地的裁决。

辩论是严禁旁听,秘密地进行的。那时在南京的金式玉、兰廷玉、滕百禄等神父却千方百计得到了辩论中的不少细节,他们靠的是那些出庭的证人,特别是一名勇敢而机灵的卖烧饼的年青小贩。他借口设摊卖烧饼,钻进到各个角落探听案情。还有一位心地正直的下级官员,因无力阻止不公正的讼事,心里愤愤不平,于是把案情进行的各个阶段报告给神父

---

① 见本卷第229页。

② 原稿保存在《徐档》,卷宗C2。

们,让他们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sup>①</sup>

人们先把在神父被杀那天从芦村女校被抓的七名女生和同日被抓的一名女佣传来南京,她们是在9月13日到南京的。这些可怜的女犯已在方统领兵营和何渚一伙人那里过了六个多星期,事后,她们只对她们的父母透露了那时所受的遭遇,和人们怎样教她们必须在南京衙门当众承认些什么,讲些什么。她们的遭遇,这里不必重述,明人自可不言而喻。审讯开始了,她们在刑具前面,已吓得魂不附体,只得完全承认了暴徒们要她们承认的关于黄神父的品德问题。在答讯中,她们偶尔提及了黄神父雇用的、而为何渚特别仇恨的一个还活着的传教先生。这对官员们却大有启发。官员们认为,倘若能从这个人中得到供词,那是最重要的了。于是就传他同黄神父的马夫一起来南京,满心希望他们会完全屈服。金式玉神父却相信这两名教友是坚定可靠的,是能使真理得胜的。因此在南京,金神父还亲自带领他们并移交给总督衙门,不久他就后悔自己太信任人了。同时官员们又传芦村其他女生来南京,希望她们同样能承认她们的同学们所供认的一切;同来的,还有她们的老师,一位姓宋的孀妇。<sup>②</sup>

---

<sup>①</sup> 当时南京神父们来往的信件,仍然保存在《徐档》卷宗 C2中,柏立德神父曾把这些信件总撮在1876年8月《日记》中;又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64页起。

<sup>②</sup> 9月6日,她们到南京时,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神父们派遣了几名教友到江边她们的船上去援助、鼓励、安慰她们。青年烧饼小贩也是其中之一,人们知道,由于他聪明机智,我们已得到不少有用的消息。这些女犯被士兵看守得极严,任何人不得接近。在数次尝试失败后,小青年便想法堕落江中,与江浪搏斗,游到他认定是女犯所在的船旁。士兵们哈哈大笑地把他救了起来。小青年认出船上的女犯们时,就高声唱“信德诵”;可怜的女犯们都流泪哭了;小使者看准了后,即迅速游上岸报告了神父们。(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72页。)

不久，人们知道这些召来的证人受到了真正残酷非刑的拷打：皮鞭抽，棍子打，沸水淋，并且成天地罚跪在铁链或石块上。起初她们否认一切；之后，由于非刑的折磨，使她们精疲力竭，而且又怕受更严峻的酷刑，于是人们叫供认什么她们就供认什么；唯独在宁国一心为教会服务的宋孀妇却始终坚贞顽强，威武不屈。在中诉辩论中，她似乎不止一次地拒绝承认捏造的事实。10月16日，经常把案情通知神父的那名下级官员，报告了如下的情况，这报告立即寄到了上海。报告说：“李鸿章曾指示南京总督，说法国现已降为二等国，所以宁国府案件尽可自由处理，不必有所顾忌，对任何人都不用害怕。案情一开始，总督即呈报北京，说黄神父曾杀死过两个人，生活腐化；他表示要继续干下去，想尽方法取得必要的证据，保证何渚和他手下一伙得到开释，并体面地遣回。芜湖的道台与安徽的巡抚不愿证实何渚的诬告，总督和主持案件的那位藩台便命令他们缄默，说他俩不了解问题。数天后，总督把全部案卷寄往北京。那是法国公使行动的时候了。”<sup>①</sup>

本来尽一切努力应该避免的可耻的、不光彩的定案即将宣判了。江南教区会长高若天神父一听到上述消息后，亲自来南京。临行前，他用那时已抱病的郎主教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请上海道台转呈总督。信上主教对这次侮蔑教区，对惨遭杀害的黄神父的不义诉讼，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表示如诉讼不停止，即将报告法国公使。<sup>②</sup>

---

<sup>①</sup> 李问渔9月16日信，见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77页。这个报告似符合8月23日总理衙门给法国公使馆的照会。他们曾打电报给“南洋商务大臣”，控告黄神父“在一次吵架中，有两个外地人失踪，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因此激起了民愤（《法使馆》）。

<sup>②</sup> 见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31页。

在南京，参加诉讼辩论的上海道台很友好地接待了高若天会长；并把总督的复函交给了他。沈葆楨复函宣称，他给法国公使的许诺业已办到，两位在宁国的法国神父已平安地回去，并且已派兵去安徽省恢复秩序。<sup>①</sup> 复函又称，黄神父事件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人参与插手；对控告黄神父品德的种种事实，其中有的是荒谬的，但有的是查有实据的。高若天神父因金式玉神父的建议，提出要求有一名欧洲籍神父参加辩论，但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

剩下，只有报告法国公使了；高若天会长于1876年10月17日、20日两天，给公使连写了两封公函。<sup>②</sup> 他陈述了南京诉讼案的现状，预料判决书的后果将关系到整个传教士的任务和荣誉，因此恳请公使“选择一位代表，授以全权”，派到南京总督处参加诉讼辩论，对明显的、太不公正的诬陷提出抗议。

白米尼先生非常真诚地关心传教区，特别关心江南教区；当人们阅读他当时写给苏念澄神父的亲密书信时，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sup>③</sup> 当芦村惨案的消息于8月13日通过路透社传到巴黎时，<sup>④</sup> 法国外交部长立即指示“在中国的外交官，对我们的传教士中有一位在宁国府被杀以及乱民捣毁圣堂之事，必须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sup>⑤</sup>

---

① 我们将见到这些勇士们做了些什么。

② 见《法使馆》及《徐档》，卷宗B2。

③ 例如白米尼在1876年10月9日的信上说：“宁国府事件，我已尽力办理了，还得再努力办理下去，我不知阁下是否满意？请把你们的损失详细地告诉我。神父们已经安全地回来了，这是最主要的。”（《徐档》，卷宗B8。）

④ 转载在《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8卷第488页。这份电报把发生暴乱、神父遭惨杀的地点误作为浙江的宁波，见葛笃1876年9月29日致白米尼信，《法使馆》。

⑤ 见《天主教传教区杂志》，第8卷第416页。

白来尼先生接到高若天会长的信后，立即请上海领事葛笃先生代他前往南京<sup>①</sup>。葛笃先生按例先写信照会总督，通知即将来访，并告之来访目的。领事在信上措词非常有礼貌，但很坚决；他通知沈葆楨，他的来访是为传教士要求“辩护权，这个权是属于所有的被告的”。<sup>②</sup>

总督复函马上送了来，措词毫不含糊。总督请我们的领事“不必劳驾，免得风尘仆仆，徒劳往返”。事实上，“这类事件只应由中国官员依法查究，秉公办理。唯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众的不信任。倘阁下定要参与其事，那么阁下将为自己准备了一个令人猜疑、永远仇恨的前途”。总督继续风趣地说，“阁下此行目的只是为了驳斥流传的反宗教的恶意诬蔑；但谁都知道你们的教会是劝人为善，教人修德的；教友们尽管从来没有控告过欧洲籍教士，但阁下能否保证众教徒都是好人？……我敬请阁下奉劝你的全体传教士，专心致力于修德，而不要偏听教徒们的汇报。”<sup>③</sup>

七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罗淑亚先生曾亲率四艘战舰来到南京，四天之内，便从总督马新贻处获得了赔偿，为法国争得了荣誉。<sup>④</sup>可是白来尼先生却宁可采取另一种方式。<sup>⑤</sup>

12月5日，白来尼先生写信给1876年10月接任江南高

---

① 白来尼1876年10月29日致高若天信，见《徐档》，卷宗B8；又葛笃1876年11月14日致白来尼信，见《法使馆》。

② 葛笃1876年11月10日信，见《法使馆》。

③ 葛笃先生11月16日信上的附件，见《法使馆》。

④ 见本卷第180页起。

⑤ 话说，不估计时局处境的不同即下断语，是不公道的。11月16日，会长文成章神父写信给白来尼公使说：“人们大肆宣传我们国家的灾难，使我们在中国政府目前的工作进行得更为困难了。”见《法使馆》。



若天会长的文成章神父说：“我接到葛笃领事的信，知道总督曾谢绝他参与黄神父的诉讼。总督沈葆楨阁下也亲自写给我一封冗长的公函。我复了他一封严厉的信。我强烈地抗议他把对教友有利的证人排斥在外，而对用残酷非刑逼供出来的假见证却信以为真，致使杀人放火抢掠的首犯得到开释，逍遥法外，以至他们还扬言再作新案进行威胁。我请他尊重我们条约中的第十三款，我表示，要象我的几位前任那样，坚决执行这一条款；我呼吁他不应该偏袒，要让他知道，我可以更通融些，但我是坚定不移的。我还不知道我的语气在沈葆楨总督身上将会起什么作用；我希望他能懂得我说话的分量，对他周围的坏顾问们的狂热行为控制一下，他们只会把他推上不义而又危险的道路。尊敬的神父，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你们行事想来不会太谨慎或太周密的。希望你的传教士们应该经过考查，郑重地录收新教友；另外，尤其在教友与非教友之间的任何敌对行动中，传教士应当尽其所能保持冷静。只有留心避免一切能引起刺激的借口，福音的精神才能进入教外人的邦国。”<sup>①</sup> 总督回了信，关于黄案的诉讼问题，还许下了明确的诺言。<sup>②</sup>

人们不必久待即可见到这些诺言的兑现情况。总督不为法国公使理论性的驳斥而有所顾忌，反而听任他的属下为所欲为，黄案的诉讼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在酷刑的威胁之下，可怜的女生与女佣继续控告黄神父施行邪术和行为不端。马夫(陈老么)控告黄神父曾杀死两人，承认他本人是帮凶，还帮

<sup>①</sup> 见桑必夫：《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86页。文成章神父为了鼓励神父们，曾把这信刊登在1877年1月1日的《江南教区消息报》上。

<sup>②</sup> 白米尼先生1877年2月5日致外交部信，见《法使馆》。

助黄神父搬移尸体。传教先生(潘辉清)<sup>①</sup>证明教友们曾发放纸人,他本人却没有放过,并说“在教堂内,人们不知道做这些事情”。不幸,他的女儿,也在被拘押的芦村女生之中,却控告他曾发放纸人,剪人辫子。只有女教师宋孀妇始终不屈,并否认黄神父同她或其他女性有什么犯罪的往来。

末次开庭是在1877年1月31日,由总督亲自主持,仪式极其隆重、庄严。因为堂上不用刑讯,许多女生推翻了先前的供词。人们焦急地等待总督的裁决。2月1日清晨,给黄神父的传教先生送饭的人,奔来报告神父们说:这个可怜的传教先生,作为行邪术、放纸人剪发辫犯而被处决了。还有两名不认识的人,作为毁坏水东圣堂和神父住院的罪犯,也同时被处决。<sup>②</sup>

控告黄神父杀人,又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帮凶的马夫,被判处十年徒刑;后来又被释放了。他做了明补赎<sup>③</sup>,重新为神父们服务。<sup>④</sup>

姓宋的孀妇与女校的女生、女佣都恢复了自由。英雄的女教师曾遭受了连续不断的酷刑:她接连两次,五天五夜罚跪在铁链上;又接连三次,三天三夜罚跪;还把她的双手捆扎后悬空吊起。因此,她释放回家后,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sup>⑤</sup>

令人痛恨的何渚竟凯旋似地荣归宁国府;教外人士连地

---

① 陈老么,潘辉清是根据音译,见高龙攀:《江南传教史》,第419页。——译者

② 见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90页。

③ 明补赎是当众认罪忏悔。——译者

④ 见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234页。

⑤ 同上,第292页。

方官在内都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而且他头上的顶子也高升一级。<sup>①</sup>

虽然黄神父的名字没有写上判决书，而事实上，他的传教先生被判处死刑以及他的马夫判处徒刑，都作为他的同犯而定罪；这是要人们知道，总督是把黄当作首犯来对待的。

还有两名可怜的无声无息的配角，作为抢劫水东神父住院的罪犯而同时斩首；这便是南京总督准备对付法国公使的抗议的答复。

巴黎的神父们一得知南京的讼事转了向，便尽力支援中国的弟兄们；省会长穆利埃神父、教区帐房塔扬神父都为此事多次上访外交部，因为他们在部里有许多朋友。罗淑亚伯爵那时正在巴黎，他严厉地批评了自来尼的态度，并为神父们出主意，还利用他的声望帮助了神父们。<sup>②</sup>

最后，1877年1月9日，巴黎发了一份电报到北京，指令公使要注意事件的严重性。自来尼先生接电后正式要求南京的讼事停止进行。2月9日，总理衙门为此行文南京总督；16日总督答称，黄案已宣判结束。<sup>③</sup>

法国外交部1月9日发的电报，仅仅于2月1日才到达北京；就在这一天，沈葆楨在南京宣判了此案。<sup>④</sup>即使用最快的速度传寄电报，是否还能阻止这不公正的裁决呢？这是令

---

① 南京官员后来声明，这个顶子并非在黄案后所赐，而是他先前早已得到的。（自来尼1877年8月31日致文成章神父信，见《徐档》，卷宗B8。）

② 塔扬1876年12月19、28日，1877年1月11、26日，2月7、19日信，见《徐档》，卷宗F20。

③ 总理衙门1877年2月21日致自来尼信。

④ 自来尼1877年2月5日致外交部信，见《法使馆》。

人怀疑的。

白米尼先生受到公爵德卡兹的指责深感悲痛。2月5日，他经恰克图给外交部寄了一份报告，解释他是怎样处理黄案的。报告摘录如下：“10月、12月，我插手干预了黄的案件，我援引了条约第十三款。我还通知南京总督，我将派葛笃先生前往。总督要求我别采取行动，为的是避免再刺激群众反对教友。所以我没有行动，这也是为了教会的利益。12月1日，我曾给总督写了一封强硬的信，信稿于下班邮船寄上。总督在复函中，正式答允我关于黄案的一切要求。最后，我还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新的上谕。这道上谕曾刊登在2月1日的北京《邸报》上；这为教友们是很有利的，当然，对黄案也不例外。<sup>①</sup>要挟过甚会造成新的失败，对传教区有害无益。耶稣会会士在这桩事件上，没有表现他们的审慎和素有的镇静，而且会长也调任了，也许与他在宁国事件上的作风有关系。现在一切平静下来了，下次邮船便可证实。”<sup>②</sup>

可惜几天之后，葛笃先生以及教区会长文成章神父把事情平息的经过告诉了我们的公使。<sup>③</sup>

白米尼先生在给上海领事的信上重申的几句按语，表达了他对沈葆楨不公正的判决的想法，按语写道：“当一名跟神父的传教先生，既不是一份无罪的证明，也不是一份不受处分的保证。”“葛笃先生成了他的临时翻译的神父们的传声

---

① 白米尼 1877 年 8 月 6 日寄给徐家汇的复稿，见《徐档》，卷宗 B8。

② 白米尼 1877 年 2 月 5 日致外交部信，见《法使馆》；文成章神父接替高若天当会长，这种解说毫无根据。在宁园事件中，两位会长的路线、行动都是一致的。他们在信中对白米尼先生的政治手腕作了同样的评价（《法信》2669）。

③ 葛笃和文成章 1877 年 2 月 24、25 日信，见《法使馆》。

筒,我表示遗憾。”“案件已判决。”这些按语使人看后感到伤心。

不久,附有恭亲王批示的判决书全文由总理衙门转给了自来尼公使。<sup>①</sup>芦村凶杀案结束,何渚宣告无罪。判决书写道,教友们“憎恨神父,听任人们起诉控告;神父们藐视保护他们的地方官;深仇大恨层出不穷”。三名带头攻击教徒的教外人,两名已被处决。被判死刑的传教先生是个“扰乱人心的施行邪术者”。黄神父与他的传教先生一同被杀,因他俩“声名狼藉,他们之所以遭难,并不是因为他们信教,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他们损害了教会利益”。他们最后的冒失行动,是在用武力去援救“一名属于白莲教的行邪术剪辫子的人”。此外,在一次教徒与非教徒的打群架中,两个非教徒失踪了,人们控告是被黄神父和他的传教先生杀害的。这一切激怒了民众,因而把他们两人杀掉了。还有两名唆使煽动暴乱的祸首,也被判处死刑。至于神父住院,教区的教堂学校均在这次骚乱中遭到毁坏,“凡是由传教士按照规定买进和由传教士兴建的,将予以赔偿……在各地凡是被强占的田地房屋,当予以归还原主”。还有两个附加报告,说明反对一般传教士,特别是攻击黄神父所依据的事实:“神父们太听信教徒,教徒中不少是坏人。”黄神父“喜欢参与讼事,以骗取民众的信任”;堂里还私设公堂,“拖人打人,审讯人,这是这次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被杀的传教士道德败坏,是有罪的;总理衙门只提及“五名妇女被黄和传教先生拖进教堂,妇女们由于恐惧,因此而失身……”

---

<sup>①</sup> 1877年6月21日(《法使馆》)。

自来尼先生没有把南京的判决书看作是失败，反认为是胜利。他在致苏念澄神父的机密信件中，以动人的天真，认为他已获得了一切能获得的东西。信上说：“我从葛笃先生处得知，会长文成章神父对南京的判决不满，对此我感到痛心。我已尽我权力之所能，为圣教会也为我们众人争得良好的成果；我把我自己和应当保护的你们各位融化成了一体。我既不惜多次写信给总督，其中有几封是很严厉的，也不辞辛劳奔走于总理衙门，使案件中止进行，讼事得以了结；女生们被释放回家；在原则上赔偿已得到了承认；最后，部分案犯受到惩罚；我对此成果已感到可喜可庆。我知道，绅士何渚和方统领已被开释，没有出庭。一个是靠或真或假的借口不在现场出席；另一个，因他曾是中国的将领。我真抱歉，但叫我怎么办呢？我们的政府不愿生事，禁止我用威胁手段，我只能用说服的方式；我不能更好地办理，真是遗憾。假如我当上海领事的话，就是说就近办理的话，我就能经常会访沈葆楨，每星期和他通信一两次，掌握事情的进展情况，也许我的收获会大一些；可是我现在人在北京，又遇上冬天，我只能两个月同南京交换一次意见。另一方面，你知道，总理衙门只会说好话，假许诺。事实上，对这类事件，总理衙门也不能干涉外省的总督们，难以左右他们。神父阁下，请你公正地批评吧。根据附在会长神父1876年11月26日信里的一份报告，1875年11月发生的安徽的这些教难，到1876年3月又重新爆发了。<sup>①</sup>我认为，假如那时有一位有权力的人用强硬而又公正的话劝告总督，就可能避免好多灾难，而在使馆记录册上，却一点踪迹也没

---

① 见本卷第 224 页起。

有。① 我只有缄默了。”②

我把这封信几乎全部登载出来，既表示法国公使对教会服务的真诚，又暴露他对南京黄案裁决所抱的古怪幻想。在自来尼先生任职期间，这种想法还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外方传教会的一位历史学家公正地评论他说：“凡认识公使的人，一致认为他对传教士们是十分同情的，往往表现在他的明智审慎的劝告上，而不是在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上。”③

最好的证明是自来尼先生一方面既认为南京的判决是颇为不利的，可是他对上海的神父们④一再提出的将南京总督判决正本转给他们的要求始终拒绝；这份判决的副本，他早已收到了。他写信给文成章神父说：“我已把译文寄到凡尔赛去了。会长神父，假如你没有收到的话，那只是由于我出于保留与审慎的态度的缘故。在判决书的开头，提及对传教士言行的感想，我已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我认为没有再生气的必要了。”⑤

稍后，在连续几次的坚决要求下，他回信说：“我郑重考虑之后，⑥认为你们还是不再强求更为合理些。何必把已结束的事件，又旧话重提呢？使用种种尖锐的抨击，既无益处又无必要。即使我把判决书中种种侮蔑之词早通知你，你也不可能使总督推翻他的定案。”

---

① 如上所述，神父们原来并不打算上报法国公使，而由金式玉神父与当地长官公道合理地就地解决。

② 自来尼 1877 年 3 月 12 日致苏念澄神父信。

③ 洛内：《广西传教史》，第 177 页。

④ 文成章 1877 年 5 月 27 日信，见《徐档》，卷宗 B8。

⑤ 自来尼 1877 年 6 月 22 日致文成章信，见《徐档》，卷宗 B8。

⑥ 自来尼 1877 年 8 月 14 日致文成章信，见《徐档》，卷宗 B8。

神父们只在多年之后才知道判决书的原文。约在 1895 年间,出版了一本专为官员和文人们用的上谕和外交文件汇编。其中一篇是南京总督的汇报,题目是《安徽省的民教之争》。与我上面摘录的,1877 年 6 月 21 日交给自来尼先生的原文相比,内容上已略有出入。<sup>①</sup>

教区的上级神长们还有一个悲痛而又严肃的任务,即使法国政府知道法国外交官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此项行为给法国带来的危害。文成章神父因此编写了一篇行文清晰、语气郑重的论文,题目是《就法律观点来谈南京诉讼案几点感想》。托上海领事葛笃先生寄呈德卡兹公爵一份,另一份寄给巴黎耶稣会省会长穆利埃神父。<sup>②</sup>

这个文件对横加于黄神父的不道德、杀人、行邪术的三项罪名,反复进行了驳斥。他指出诉讼的不可靠和不真实,并叙述了审讯中主要的不公正之处。结论说:“总督的判决书始终没有转给我们,法国公使认为给我们一份副本很不适宜,南京的诉讼案便是这样的结局。我们没有得到人间的公道,我们只有想到天主的公义,总有一天会给我们聊以自慰的。”在巴黎,人们未对南京的裁决提出抗议。教区帐房塔扬神父在 1877 年 7 月 27 日,凄然写信说:“我只寄希望于天主,而也不寄希望于人间。让中国大官员的阴谋手法继续玩弄下去,直到天主来阻止他们。”<sup>③</sup>

拖延了很久的诉讼案以可悲的裁决了结,对宁国府的传教事业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我们只看见,在 1876 年 8 月

---

① 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 318 页起。

② 见《徐档》,卷宗 B8;《法信》2660。

③ 见《徐档》,卷宗 B20。



底，整个宁国府地区已连一名传教士也没有了。安徽巡抚的特派代表们曾要求金式玉神父答应，在地方没有平靖之前，传教士不进入该地区。<sup>①</sup>这也是上海法领事的意愿。<sup>②</sup>

但地方上总是安定不下来，可能是由于代表们的工作不努力，也可能是由于方统领及其部下士兵的威胁恐吓。南京总督为实践向白来尼先生许下的诺言，派了一千五百名正规军到宁国府。假使士兵们认真执行任务的话，这个数字已绰绰有余了。但军队的首领们知道沈葆楨的真正用意。军队到了宁国府后，便扎营在府城附近，四周筑起了泥墙，士兵们便紧闭大门，深居简出。<sup>③</sup>

要等地方平靖后再进去，那等于传教士长期被驱逐。这样一来，急需照顾的教友们就会长期得不到援助。<sup>④</sup>

教区会长高若天神父认为，等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月。虽有白来尼与葛笃两先生的反对，8月初，他还是派遣就近的曾目睹死难者的传教士重返原任所。整个教区举行公共祈祷，愿骚乱早日平息。<sup>⑤</sup>

勇敢的沈二神父第一个被指定回宁国总铎区。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他乔装卖布商，企图从浙江边境进入广德州；但到处设有关卡，各个关卡都有认识他的人把守着，初次尝试便落了空。于是，他就决定公开进行，先到芜湖见乔迁于总本

---

① 见本卷第240页起。

② 高若天1876年10月2日致葛笃先生信的抄件，见《徐档》，卷宗B8；又白来尼1876年10月26日致高若天神父信，见《徐档》，卷宗B8。

③ 乔迁于8月信，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9月1日。

④ 神父们离开仅仅数星期，已发生了坏影响，背教者为了替自己的怯懦辩白，借口说是因他们被神父们遗弃了。

⑤ 柏立德：《日记》，1876年8月22、24日。

堂。乔神父马上去拜访道台，正式通知他有位中国神父要回宁国府传教。地方上如加以阻止，那就是承认宁国事件是反宗教性的，这是官员们始终竭力矢口否认的。沈二神父就这样毫无阻碍地进入了宁国府城，安身于神父住院。很多教友齐来探访，也不曾遭到多大的麻烦。<sup>①</sup>

这次尝试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接着，沈二神父又回到芜湖找别的神父。乔迁于神父在正式通知法国官方代表后，和沈二神父同往宁国，10月10日两人安抵府城；数天之后，滕伯禄神父也来同他们汇合。11月12日卞良弼神父到了水东，收拾好破旧住所之后，他深入本堂区的中心广德州；在那里他欣慰地和许多教友一起庆祝过耶稣圣诞瞻礼。教友们见神父来到，勇气就来了，而且还有几名望教者登记上册。

地方官想方设法企图吓退神父们，叫他们退回去。但是看到他们宁冒生命危险，决心留下继续工作，乃逐渐采取必要措施维持地方秩序。乔迁于神父写道：“当我看到了地方上的实际情况后，我不禁要重复说，地方官说地方怎么怎么不太平，这只是在恐吓我们。其实地方上很太平，一点没有什么，只要他们向我们的仇人们说一句‘安静些’，地方就绝对平安无事了。”<sup>②</sup>

1877年3月，当南京案子结束的消息传出去后，人们看到何渚凯旋式地入城，他升了官，帽上的顶子也换了一颗，他

---

<sup>①</sup> 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0年10月1日；欣然冒险回任所的不仅仅是神父们。8月16日，韩伯禄神父在徐家汇遇到两位在宁国府服务的上海贞女，她们曾历尽艰险，方得回到上海老家。韩问她们：“你们还回不回宁国府？”贞女们回答：“当然，我们定要回去的。”（柏立德：《日记》，1876年8月16日。）

<sup>②</sup> 《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11月1日—12月15日。

路过大街小巷时,还召民众列队热烈欢迎他,人们又开始担心可能有新的骚乱发生。然而这个可怜人这次想到了包庇他的大人们的再三叮咛:“我们不能触犯洋人,我们只能在中国人身上泄恨。”果真,何渚回来后,仍有不少教友被骚扰,不少房屋被洗劫、焚烧,但地方上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sup>①</sup>

1877年4月,会长文成章神父决定要亲自仔细巡视教难发生的现场;在新任宁国府总本堂的金式玉伴同下,他巡视了三个星期,也没有遇到严重的麻烦事。<sup>②</sup>

剩下的是赔偿损失问题。教区方面有圣堂、学校、住院被毁坏。可怜的教友遭到了洗劫和敲诈勒索等种种损害……1858年至1860年所签订的条约规定,因属下官员不能阻止暴力而造成的损失,都要赔偿。南京总督在同自来尼的会谈中,曾在原则上接受向教区方面赔偿损失,总理衙门也同样表示接受。<sup>③</sup>

从1876年年底起,江南教区的上级把一份教区和教友们所受损失的估价表寄到北京;教区损失估计达三十万法郎,教友们损失为二十一万法郎。1878年3月,南京总督特派一位道台级的代表桂某与教区代表金式玉神父就赔偿问题进行会谈。毫无结论的厌烦的争论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桂某认为只能赔偿被抢的教产,而神父们提出的是建造时所花的代价,两者相比,往往要超过十倍,桂某认为这不属赔偿之列。金式玉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你们自己去盖造圣堂和住院,恢复暴乱前的原状就够了。”另外,教区曾不止一

① 《江南教区消息报》，4月1日。

② 同上，6月1日。

③ 见本卷第259页。

次买进原主不明的土地,当时也只付出优惠的价格;桂某主张这些契约应作废,土地全部归还给现称为原主的人。

幸亏金式玉神父一开始就经管宁国府的地产,熟悉其中情况,常常能顺利地顶住道台。末了,金神父见他毫无诚意,宣告不愿再和他商谈。问题就上交到南京。于是,总督废去了特派员的调查,接受了金式玉的估价。由于自来尼先生的要求,教区放弃了几块对卖主的所有权似有疑问的土地,虽然当时这些土地也是经地方官批准而买进的。<sup>①</sup>

赔偿拨还教区的总数为三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两白银,约合当时二十五万法郎<sup>②</sup>。这笔钱得之非易,还多亏了法国公使和上海领事多次从中斡旋。

1877年12月4日,自来尼写信给文成章会长说:“希望你向你的传教士们发布命令,叫他们不要参加那些理由不充分,情况不确实,容易引起争论的诉讼。希望他们再一次向我显示耶稣会的高度智慧和正义,以及它在中国完成艰巨的使命时是多么的生气勃勃。”

教区所遭受的损害大致上已得到补偿,当然补偿费也足够用来修理;而对于教友们的损失,中国官方始终没有答应法国公使的要求,认为教徒是中国人,他们应向地方官提出请求。<sup>③</sup>

这些话等于取消了天津条约第十三款。条约明明向法国保证“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

---

① 《江南教区消息报》，1877年6月1日；金式玉6月1日信；文成章8月4日、9月3日致自来尼信，见《法使馆》。

② 文成章1877年11月13日致自来尼信，见《徐档》，卷宗B8。

③ 见自来尼先生与总督的会谈记录。

其便”。宁国府教友之所以遭难受灾，是由于他们拒不接受方统领部下的士兵强逼他们的背教行为。可是在这点上，自来尼先生却毫无收获。同金式玉会谈的官员曾满面春风地说：“你们的公使没有为教友们提出什么要求，伏日章神父的尸体遭受侮辱，他也没说什么，也不要求惩办凶手……他只要求赔偿你们的物质损失，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正在商讨。”<sup>①</sup>

官员对教友们的这种不公正的态度，使神父们在本地教友面前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神父们由于得到赔款，多少能把这些钱用于修建圣堂、学校、住院等，而教友们却仍处在极端贫困之中；而且也有些官员在暗中挑拨，他们对教友们说，南京总督的赔款应当也有教友们的份。因此宁国府教友对神父们积怨怀恨了多年，神父们也深受其苦。神父们尽量接济最贫苦的教友，经过教友们的努力，教难造成的损害，终于逐渐克服了。<sup>②</sup>

法国公使交涉上的局部失败，使宁国的教会遭受了可怕的损害；但教会并没有消亡，教堂一座座重建了起来，传教士重新工作了，老教友们全部坚持信仰，无一人背教；新教友与望教者中虽有不少背教的，但忠心耿耿的还是大有人在，他们的坚贞不屈宽慰了给他们传教的神父们。传教事业前途黯淡，大批群众归化以及兴高采烈地奔向教堂的情景，从此似乎不会再有了；另外，人们对这次法国外交官在措施上的失败记忆犹新；要消除这些影响，还得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然而传教士们终于回到了危险最大的地区，而且没有遭到多大的痛苦，

---

<sup>①</sup> 金式玉 1877 年 5 月 25 日致文成章信，见柏立德：《日记》，1877 年 3 月 19 日。

<sup>②</sup> 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 313 页起。

难道这不能说是个奇迹吗？教区的神长们在重重教难漫无止境的绝望之中，看到了进教之佑圣母的特别保护。文成章会长于1877年5月24日，如1870年时的谷振声会长那样许愿给圣母，许愿在教难平息后，在宁国府的中心，建造一座圣母大堂；同年，教难地区的四名代表和总铎乔迁于同往佘山朝圣，联合广大朝圣群众的热烈祈祷，同向圣母呼吁。<sup>①</sup>

次年，遭难的各省似已恢复了和平，神长们应当还愿了。1878年5月24日，圣母进教之佑瞻礼日，金式玉神父在教难最剧烈的水东，为华丽的哥特式新堂行了奠基礼，祝圣了第一块基石，顾培原修士接着开始施工。当天，两年前曾死里逃生的项德来神父唱了大弥撒。同一天滕伯禄神父率领了四名代表去佘山谢恩，献上了一面华丽的锦旗，上面绣着备受教难考验的苏皖两省的名字。<sup>②</sup>

从此水东新堂，成了邻近各府、各县的教友们经常朝圣之地。每逢5月，圣堂常有人满之患，人们几乎不能想象1876年这些会口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灾难了。

这次教难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从开教以来，在这样大批的要求入教人中，第一次发觉不少人进教的目的并不纯正。传教士也开始扪心自问：过去人们是否把教徒吸收得太迅速了？新奉教者是否未经受足够考验，教理还没有弄明白，就急忙给他们付了洗？不少人在教难期间，竟令人心痛地背弃了信仰，追究一下原因，是否由于一开始就贪多贪快的缘故呢？传教士们这样谦逊地提出这些问题，使我非常感动。我从他们的书信和报告中，知道这些人都是坚贞、不畏艰难困苦、敢冒生

<sup>①</sup> 柏立德：《日记》，1877年5月30日。

<sup>②</sup> 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第823页起。

命危险的苦干者。但他们却在上级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轻率和错误。<sup>①</sup>

文成章会长在读到、听到这些书信和报告后，又亲自去巡视了教难发生的现场，给巴黎省会长神父写了一份简单而又光明磊落的报告书，总结了事故的经验教训。他在结束报告书时说：“敌人指控我们的种种罪过，我们是无辜的；但在天主台前，我们和我们的教友是否真的是无辜的呢？”他要求人们与其激昂愤慨地反对教难，毋宁反躬自省，深自谦抑。<sup>②</sup>从这时期起，教区对接受望教者，便采取了严格的制度，这制度一直沿袭到今天。

人们可能已注意到，在上述艰巨的谈判中，主教没有参与顾问，而只由他的副主教耶稣会教区会长用他的名义去指挥办理。

主教身体结实，所以能胜任三十年艰巨的传教工作。但当他 1871 年从罗马回来，人们都惊奇地感到他的体力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要象过去那样出外巡访会口，施行坚振等等。这工作原很艰巨，尤其是 1874 年崇明岛上的坚振，特别辛劳。崇明总铎区的神父们生怕他一病不起，就把他送回上海，那时他已完全精疲力竭了。人们看出他一系列中风的症状：舌端麻木了，行动迟钝了。于是，郎主教就定居在徐家汇，在沉默与祈祷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四年。<sup>③</sup>

---

① 书信和报告存在《存档》，卷宗 C2；其中有好几篇被柏立德收进《日记》，第 2、第 3 卷中。

② 文成章 1877 年 4 月 29 日信，见《法信》2669。

③ 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 2 卷第 422 页起；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 37 页；高龙肇：《江南传教史》，第 440 页。

郎主教对自己的工作极度认真负责，一见自己无力再尽主教之职，即禀呈总会长，请他同传信部协商，给江南教区选拔一位助理主教。<sup>①</sup>

那时主教的病情尚未恶化，教区会长神父洞悉教区情况，自可代理一时，选拔助理主教一事看来没有必要，反会增加教区行政上的麻烦。郎主教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sup>②</sup>

1875年的2月和3月间，主教突然病变，人们担心他会脑溢血；3月16日，主教自己要求领受终傅，高若天会长即为他施行了终傅圣事，徐家汇耶稣会全体会士与修道院修士都在旁与礼。郎主教亲自念了为主教们的信德宣誓的最后几行经文，双目含泪地倾听会长神父以教区名义向他致谢。主教领了圣事后感到欣慰，再加上徐家汇辅理修士们的精心护理，病情反而又好转了。1875年5月，他欣然给巴黎省会长写信说：“我庆幸地告诉你，我的健康已略有恢复。会长神父的仁爱关怀，文成章神父的细心照顾，教友们的热心祈祷，这一切导引吾主耶稣的慈父之手，使我起死回生了。”信上他又再次要求他曾多次向巴黎提出的“我尊敬的省会长神父，请允许我再向您对教区的仁爱和忠诚作呼吁。您知道，我们这里‘稼穡繁忙’，尤其自从南京地区的教务大规模开展以来，真感到工人太少了”。<sup>③</sup>

1875年6月16日，主教主持了奉献普世圣教会于耶稣圣心的大礼。事前数月，祈祷宗会向各教区发出通告，要求向

---

<sup>①</sup> 郎怀仁1874年6月14日呈总会长贝克斯信，见《中总》，第4卷第2章第37、38页。提名呈请提升为助理主教的三位是：步天衡、倪怀纶及潘如汉。

<sup>②</sup> 总会长贝克斯1874年5月1日、12月3日致郎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5。

<sup>③</sup>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424页。



庇护九世奏请批准这次壮举。江南教区欣然响应祈祷宗会的号召，即托圣心报馆转呈教宗一幅五丈长的绸缎，由善书者缮写申请表，有各地各区教友共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三人的签名。当 1875 年 6 月 10 日，上海接到教宗批准的喜讯时，整个教区上下都笑逐颜开，即定 6 月 16 日举行奉献大礼。这天，高若天会长在董家渡主教大堂举行大礼弥撒，郎主教在宝座上与祭。接着，神职人员和上层教友组成游行队伍，在大堂四周，在华盖锦幕下恭迎圣体。迎圣体礼仍由会长神父主持，主教由荣誉五六品搀扶，步行在圣体锦幕之前。高会长在显供圣体前，用拉丁文朗诵“奉献诵”，接着主教与神父们低声复念，由全体教友高声咏唱译成中文的“奉献诵”，最后全体共唱“我侪赞颂天主”的“谢主颂”，作为这次大礼的结束。上海其他各堂和近郊各堂，在同一天也同样举行了奉献大礼；这天为特敬耶稣圣心恭领圣体的中国教友计三千多人。<sup>①</sup>

前一天晚上，郎主教以教区名义发了一份电报，庆祝教宗被选登极三十周年；第二天，得罗马回电，教宗赐以宗座遐福，由安托内利枢机签名。董家渡圣母会会友负担了这次大礼的费用。

圣伯多禄圣保禄两位宗徒瞻礼，人们在董家渡大堂内又见到了郎主教。数年内，只有在佘山朝圣时和在圣衣院以及拯亡会的修女会客室里，主教去作了若干次的告别；此后在漫长的几个月里，抱病的主教只能在痛苦与祈祷中为教区的发展争得大量的圣宠。1878 年 2 月 27 日，人们还把他抬上董家渡大堂正祭台旁的圣楼上，参加了为近亡教宗庇护九世举

---

<sup>①</sup>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5 年，第 44 页起。

行的大礼追思弥撒；前一天，在江南教区祝贺教宗良十三世被选登极的拉丁文贺信上，主教还亲笔签了名。1878年11月27日，主教临终，<sup>①</sup>但他神志始终清楚，毫无痛苦地渐渐断了气。

郎主教的丧礼定于12月5日在董家渡大堂举行。使整个上海对江南教区的宗座代牧主教得有表示深沉爱戴的机会。令人特别注意的是，上海道台关怀备至，特派来了一队得力的军队，使主教的棺柩能从黄浦江码头隆重、安全地迎进董家渡主教大堂。<sup>②</sup>

数星期之后，主教的遗体便安葬于董家渡大堂，圣依纳爵祭台的左角附近的墓穴里。

鉴于郎主教对耶稣会始终忠诚与热爱，耶稣会总会长特请极了解主教并熟悉他在职期间各个阶段情况的薛孔昭神父，用拉丁文写了一本《郎怀仁主教小传》，这本小传于1879年在法国出版。<sup>③</sup>

主教的传记由法国郎格尔教区的皮埃尔神父，根据薛孔昭写的小传，加入教区内神父们的大量书信和报告以及若干未发表过的信件和史料，集合而成。这本《郎怀仁主教传》于1892年在法国出版。

1878年，<sup>④</sup>罗马得知郎主教的健康情况后，在1878年12

---

① 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2卷第442页起。

② 同上，第444页起。

③ 见薛孔昭1878年12月3日致参赞神父信，见《中总》，第4卷第8章第8页。

④ 总会长贝克斯1878年6月27日呈传信部信，见《传全》，第260卷第322页。

月3日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定在呈报候选者中名列前茅的倪怀纶为助理主教，经教宗良十三世于1878年12月8日御批钦定。<sup>①</sup>就在这时候，郎主教逝世的消息突然传到，于是新任命的助理主教，即升为宗座代牧主教。

---

<sup>①</sup> 见《传全》，第250卷第323页起。

## 第二章

### 教务细节

#### 一、上海

上海的变化 董家渡修道院 名人来访 教友  
善会 洋泾浜 本堂生活 耶稣教教徒的攻击 老  
天主堂周围的事业

在郎怀仁主教任期的最初几年，上海城经历着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清兵和太平军作战时，在外国军队的保护下，有成千上万的外地人涌来上海。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各自回老家去了。原来为他们建造的出租房屋都空出来，又找不到新房客。江苏的新巡抚李鸿章用尽一切办法阻止洋人同内地通商；傲慢地拒绝筑造铁路的计划，从上海到苏州这一段路上，连上海到吴淞这么短的铁路都不准建造；他还命人拆毁了从上海租界联通佘山岛<sup>①</sup>所架设的电线。

由于这些原因，市场上各行各业的发展停滞了，而巨大的浪费并不因此而减少；人们不敢设想“商业大王”的黄金时代业已结束。结果一连串的经济危机在1865年与1866年间爆发了，许多洋商和华商破产了。当时，上海十一家外国银行有六家停止付款，过去曾是洋商巨擘的颠地洋行也关闭拍卖了。<sup>②</sup>

不用说，这时期的投机倒把正是我们在这段历史中必须注意的一点，对我们的传教工作极为不利，也不利于外侨以及受其影响的中国人。在租界上，风俗败坏得令人哀叹。1864年，在一次房地产经租人大会上，巴夏礼勋爵竟大胆承认说，筑在租界上的一万间中国房屋中，有六百六十八间名誉极坏；大烟铺、茶馆以及各种戏院还不计在内。1869年，德萨默塞特公爵在上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竟称上海是“罪恶的渊藪”。租界内的英国大商人认为这些评语有损名誉，曾提出抗议，要求公开辩护，并进行调查。经过再三考虑后，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毫无疑问，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sup>③</sup>

1865年与1866年的大破坏，必然要导致宗教精神与风化道德的大复兴。于布内伯爵写道：“上海经受了这次的致命打击，暂时看来它是贫穷潦倒了，可是也因这些错误的教训而使它苏醒了。”<sup>④</sup>他又说：“目前投机拍板成交的时代过去了；正规的、安静的、合乎欧洲式的商业时期又来到了。先前得势的大洋商固然不喜欢，他们叽咕抱怨，而正常的贸易却正在发展。”<sup>⑤</sup>

耶稣教的三一堂于1866年5月16日行奠基礼，行的是共济会的礼仪；1869年8月1日，行了开堂礼。由于仁爱会修女的努力，公济医院为欧籍病人提供了一切物质和精神的

---

① 见麦克莱伦：《上海史话》，第57页起。

② 同上，第59页。于布内男爵于1872年到上海，曾仔细地分析了这种情况，见《周游世界记》，第2卷第263页。

③ 见麦克莱伦：《上海史话》，第70、80页。

④ 见《周游世界记》，第2卷第263页。于布尔指出租界内本地人的数字惊人地下降。1862年至1863年，在租界内计有华人二十五万人，其中八万人住在法租界。1869年这些数字降低到八万六千五百零九人与三万二千人（第264页）。

⑤ 见《周游世界记》，第2卷第271页。

保证。在静安寺路<sup>①</sup>两旁盖造起许多别墅，富裕的洋人能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这对他们的品德大有裨益。图书馆、博物院、亚洲会的一个支会都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了。为上海洋商们提供了种种健康和有益的消遣场所。<sup>②</sup>

上海的许多中国教友，那时也大发其财；他们是外国银行和洋行的忠诚而又聪明的职员，洋商因他们而获利甚丰。他们在这些机构内，工资和地位也都是很高的。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些富裕的教友人家积极地资助教区各项事业，其中尤以张、宋两家比较突出，值得一提。

在郎怀仁主教任期内，由于许多情况发生变化，使上海神父和欧洲及内地的交往更便利了；首先是 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了；1871 年，香港同吴淞的海底电缆接通了；<sup>③</sup> 1872 年，中国招商局成立，航行长江中的轮船增加了。<sup>④</sup> 上海教友的各个集中点必须分别进行探讨，因每个集中点各有其专门的事业和显著的特点。

随着主教的常驻，大修院的迁来，主教大堂旁边的神父住院便成为教区的首要建筑物。当郎主教移驻江南时，董家渡住有十九名耶稣会会士、六位神父、十名读书修士，其中八名中国人与两名欧洲人和修道院修士一同受课，此外还有三名辅理修士。1867 年，因小修道院合并到徐汇公学，<sup>⑤</sup> 因此人数减少了；1872 年，大修道院与耶稣会神学院也迁到了徐家汇；

---

① 今南京西路。——译者

② 麦克莱伦：《上海史话》，第 60、63、67 页。

③ 从那时开始，教区即用电报向法国耶稣会报告传教士死亡的消息。

④ 麦克莱伦：《上海史话》，第 74 页。

⑤ 见本卷第 88 页起。

同年，小修院的高年级修生又回到董家渡，使主教在举行大礼时，能有足够多的辅礼人员。<sup>①</sup>

1873年至1874年，大修院同神学院分开，重回董家渡；但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它的学生的数字实在太少了；1877年至1878年，读神学的与读哲学的修士终于又回到徐家汇；他们董家渡的住所遂由小修道院占用。

当时求学之风很盛，由于上海重获和平，尤其在可怕的叛乱之后，和平更显得甜美可爱。郎主教最关心的是宗教教理问题，他常常密切注意修院修士们和青年神父们的学习与工作；<sup>②</sup>遇有特殊贡献者，他必交口称誉，给予奖励。例如他使其中最卓越的黄伯禄神父，荣获教宗庇护九世御赐的一枚金牌，金牌上还用中文刻着“德学超群”的赞词；<sup>③</sup>大家知道这位杰出的汉学家，确实不负为学者的美名。

1867年10月11日，郎主教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信上<sup>④</sup>声明，说他认为急需成立一个“本地神职班，它的首领必须是一位同罗马有联系的本地主教，即就其内部，有其永久存在与传下去的基础，而不必再借助于外来传教士”。可是在他的任期内，本地神职神父的人数并未有所增加。1866年、1868年、1871年、1872年晋升的神父只填补了神职班中死亡者的空缺；他从前任主教那里接过了十二位本地神父，他也把同样的人数移交给他的继任人。足以抵偿的是，在他任期内，有十三位耶稣会的本地神父加入了外籍传教士之列。总之，

---

① 见徐家汇修道院《日记》。

② 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30—31页。

③ 黄神父传略，见《中国总讯》，1910年7月，第613页。

④ 见《中总》，第4卷第2章第17页。

江南教友家庭提供给教区的传教神父，总数还是增加了一倍以上，即从1865年至1878年，由十二位增加至二十五位。

在郎主教任期内，董家渡神父住院曾多次接待名人来访。先后有三位南京的总督，路过上海时拜访了教区的上级，教区上级也作了回访，彼此平起平坐，平等相待。1871年，征服太平军的曾国藩接任了被刺死的马新贻之职，人们正担心着他将对教友采取什么态度，正好11月中旬，他路过上海，郎主教即去拜访了他，受到他友好的接待；数小时后，总督由他的大批随员伴同，来董家渡作了回访；教友们高兴地在堂场上搭起了彩牌楼，挂起了彩绸与欢迎标语。曾国藩也仔细地参观了住院、修院与大教堂，并请人给他讲解祭台、圣像与雕像的意义；当他参观教堂时，唱经楼上的竹制管风琴为之伴奏乐曲。<sup>①</sup>

1875年4月，只当几个月南京署理总督的刘坤一以及继任的沈葆楨，在同年11月，都路过上海。那时郎主教正在重病期间，不能胜任这些隆重的接待仪式，所以两次都由教区会长高若天出面在董家渡接待了他们。有一、两件细节值得一提。刘坤一在这时期，尤其在《备忘录》发出的第二天，向会长神父发表声明说：“我知道江南的教友们都能和睦相处，你们传教士也没有什么诉讼官司之事，这证明你们的主教办事贤明，处理有方，我谨表祝贺并致谢意。”<sup>②</sup>

福州兵工厂<sup>③</sup>的前任督办沈葆楨，在由日意格督造、装有

---

① 乔迁于1871年11月信，见《神学院》，1872年7月。

② 柏立德：《日记》，1875年4月，第145、149页；《中国通讯》，1875年，第40页。

③ 即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的“福建船政局”。——译者



二十门大炮的战舰上，接待了前来拜访的教区代表；沈葆楨满口赞扬他在福州兵工厂认识的一些法国军官和工程师，并许诺必将公正地对待教友。可惜，十个月之后，我们已看到，这位总督在黄神父被惨杀和宁国府骚乱后的诉讼中，表现出何等恶劣的敌意；他竟拒绝接见为请他实践在上海的诺言而专程去会访的高若天会长。<sup>①</sup>

于是，人们便进一步明白了与中国大官们交往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至少这些外交上的交往在上海产生了一些好的后果；教友们感到有了保障而高兴，教外人对教区的上级也表示尊敬了。此外，这些大官员们前来参观正是我们宣传宗教基本真理的好机会。因为每次都有一位本地神父为来宾讲解，并答复贵宾们善意提出的许多问题。

在董家渡住院，最值得关心的事业是由许多最富有与最有声望的教友们组成的善会——圣母无玷始胎会，简称圣母会。1874年有五十六名会员，大多数是船主。每星期日，他们集合在自己的小圣堂里做会期、恭望弥撒、聆听训言。

这座圣母会小堂是1874年1月5日由郎主教隆重祝圣的。当祝圣礼结束时，圣母会的蓝色会旗升了起来，泊在主教大堂前黄浦江内的三十二艘教友沙船，也同时升起了他们的船旗，鸣礼炮三十二响，向圣母致敬。接着，郎主教举行弥撒；会友们都身穿礼服，胸佩会徽。会徽上有号码，是由教宗庇护九世特为他们祝圣的。

圣母会在董家渡拥有小堂外，还有一所俱乐部，内有图书以及文娱用品，因此，青年会友们便可摆脱大城市的许多有害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49页起。

风气的诱惑。全体会员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避静，他们谨守会规，使神父们深受感动。<sup>①</sup>

还有一支由女青年组成的善会——女圣母会。1874年有七十五名会友，十六名见习候补会友；她们也有她们的小堂与特有的神业功课。<sup>②</sup>

这些善会的主要目的，不仅教给会友们本人成圣成贤的方法，更主要的是使他们成为劝化周围教外人士的宗徒。我们已经看到，教友们对他们的教外同胞往往是藐视和漠不关心的，唯有—种真挚丰富的内心生活才能使他们或她们战胜这种冷漠态度，补充欠缺的救灵神火。

从那时起，董家渡教友乐善好施的声誉渐为众所周知了。1868年，郎主教之所以能给罗马宗座呈献一万五千六百法郎，就是得力于董家渡教友的捐献。<sup>③</sup>会长文成章神父于1878年记述道：“他们是本省教区中最富裕的教友，象湖广、山东、天津、蒙古等教区，都受到他们热心慷慨的恩泽；今年，仅董家渡一地教友就为救济北方饥民捐献了一万多法郎。”<sup>④</sup>

城内的陆家与艾家的先辈过去在教难中曾帮助过圣教会，董家渡的神父们为了表示酬谢，还是定期去这两家私堂举行弥撒和开四规，城内的老天主堂收回之后，还遵循这个惯例。<sup>⑤</sup>

当时，法国官方还是信仰天主的，当一艘扯三色旗的军舰来到上海，洋泾浜天主堂每逢主日及大瞻礼日即为军人们举行弥撒。弥撒礼仪举行得象在法国本国一样隆重；仪仗队，穿着制服的外交官与军官以及司令舰上的军乐队，这一切吸引了无数中外人士纷纷来堂观礼。院长苏念澄神父原是个艺术家，他召集租界内的音乐家与歌唱家组成“则济利亚会”，在大

瞻礼日出色地演唱了名家名曲。演奏咏唱得如此优美动听，

- ① 见《中国通讯》，1874年，第37页。  
 ② 同上，第39页。  
 ③ 郎主教的记录，见《中总》，第4卷第2章第20页。  
 ④ 文成章1878年9月6日信，见《中总》，第4卷第1章第18页。  
 ⑤ 董家渡负责人名单：

	代理院长	理 家	修 道 院		
1864—1865年	胡国治	施宣三	贝米德	施宣三	
1865—1866年	胡国治	帅维则	帅维则	陶淑世	陈雅各
1866—1867年	院长缺额	步天衢	薛孔昭	顾福格	
1867—1868年	院长缺额	步天衢	薛孔昭	应儒望	
1868—1869年	禄理格	南志恒	应儒望	薛孔昭	费赖之 文成章
1869—1870年	禄理格	南志恒	薛孔昭	应儒望	文成章 高若天
1870—1871年	禄理格	南志恒	薛孔昭	文成章	费赖之 高若天 (神师)
1871—1872年	步天衢	石可桢	薛孔昭	应儒望	文成章 费赖之 (神师)
1872—1873年	禄理格	杜若兰	薛孔昭	费赖之	
1873—1874年	步天衢	陈雅各	薛孔昭	顾福格	
1874—1875年	步天衢	陈雅各	薛孔昭		
1875—1876年	步天衢	陈雅各	顾福格		
1876—1877年	步天衢	陈雅各	陈雅各	费赖之	
1877—1878年	步天衢	兰廷玉	龚 柴		
1878—1879年	谷振声	兰廷玉	李问渔	龚 柴	

	住 院	教区帐房	神学院修士	辅理修士
1864—1865年	姚继白	葛宗默	哲学生 6 神学生 3	3
1865—1866年	余如陵	(帐房迁到	哲学生 6	4
1866—1867年	姚继白	余如陵 洋泾浜)	神学生 10	4
1867—1868年	姚继白	南志恒	神学生 10	3
1868—1869年			神学生 14 哲学生 4	6
1869—1870年			神学生 15	5
1870—1871年			神学生 12 哲学生 10	4
1871—1872年			神学生 14 哲学生 9	4
1872—1873年				3
1873—1874年	姚继白		神学院迁至徐家汇	3
1874—1875年	姚继白			3
1875—1876年	姚继白			3
1876—1877年	姚继白			2
1877—1878年	沈则信			2
1878—1879年	沈则信			2

以至地方报纸，甚至耶稣教的报纸也大加赞赏。1875年与1878年的复活节以及1878年的诸圣节的演奏，至今还留有美名；克朗茨与韦隆两位海军上将又能以身作则，在许多军官前，他们身穿戎装，带头虔望弥撒。<sup>①</sup>

从那时候起，神父们即提出，洋泾浜当前和今后常常会遇到的困难，即中外教友的流动性太大，几乎不能奠定一项永久性的事业。“在那里人们可遇到三百多名外侨教友，我几乎要讲各民族的语言。再有四百五十八名中国教友，除上海人以外，有来自全国各省各地的人；而这支辗转流动的民众却年年有增有减。”

上海近郊的成千教友也涌来上海，他们多数是为洋商服务的；可他们在这个大城市逗留，往往对他们是有损无益的。但按杜若兰神父1873年至1874年的统计，这年度的教友领恩体者竟有一万多人次，足资证明租界内当年的教友生活还是严肃的。<sup>②</sup>

洋泾浜会口的组成既然如此多样混杂，迫使神父们十分审慎，毋使触犯任何一方，以致引起严重的后果。1867年2月，范世熙神父在讲道台上严词斥责耶稣教徒和共济会，当年领事自来尼先生正在望弥撒，他马上写信给会长谷振声神父，抗议这样的布道，并要求讲道者严加注意。他在信上说：“如此严厉地攻击共济会与耶稣教教徒，是否明智？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极少数，这样岂不是自设陷阱，让上海的英文报刊杂志狠狠地攻击我们气量狭小，心存偏

---

① 《中国通讯》，1876年，第47页；高龙肇：《江南传教史》，第273页。

② 《中国通讯》，1875年，第45页。

见？请别忘记，我们在中国还是极少数。”<sup>①</sup>会长神父经过调查后，承认他的批评是有根据有理由的。<sup>②</sup>

数月后，上海法租界署理领事达伯理先生看到在中国的天主堂里，没有象在叙利亚或君士坦丁堡那样给我们的政府代表以同样的荣誉，感到惊奇；这件事竟控告到传信部，传信部却来了一封饶有风趣的答复，结论是：“根据文件，法国外交官在近东的地位，在远东的中国和日本不适用。”<sup>③</sup>

虹口的耶稣圣心堂是1875年施工建造，1876年6月1日祝圣的。那时，该堂由洋泾浜的一位神父带管。郎主教逝世后，虹口这所会口才开始自治。

远在这座新堂开堂之前，那里已开展了一项很令人关心的工作。虹口地区聚居着许多马尼拉人，他们是停泊在黄浦江中轮船上的雇佣者，他们也都是满怀信德的天主教教友，对神父们非常忠诚。从教区初创时开始，他们曾从多方面为神父们效劳。<sup>④</sup>可惜他们所受的宗教教育太少了，他们中许多人同上海妇女有不合教规的结合。1867年，由洋泾浜的一位西西里神父曹冠伦，一连数月呕心沥血地对他们进行公教教育与道德修养教育。1868年1月3日，曹神父与世长逝了。曹神父虽过早地死了，而他的事业仍继续不衰，这些马尼拉人同澳门来的葡萄牙人成了这座新堂口的基本教友。<sup>⑤</sup>

---

① 自来尼1867年2月14日信，见《徐档》，卷宗B8。

② 谷振声1867年2月18日致自来尼信，见《法领》。

③ 这件事的案卷(1869年7月至1870年3月)见《徐档》，卷宗B1，郎主教在罗马曾同巴尔纳博枢机商榷过。

④ 见本书，第1卷第212页起。

⑤ 费赖之1868年1月信，见《通讯》，第6卷第135页。

当时，城内的老天主堂内虽有一位神父常驻，但仍属洋泾浜管辖。常驻的那位神父就得照顾城内七百多名教友。前面我们已叙述到，那里的主要事业是若瑟修会的初学院<sup>①</sup>和一座住宿学校。<sup>②</sup>住宿生大都来自浦东。该校教育比徐汇公学简化，收费也比较低。还有几所只收走读学生的小学，地区街道里弄的教外家长们都乐意送他们的子女到天主堂办的小学来上学。1873年至1874年，住宿学校又添了座新校舍，能容纳百余名住宿生。<sup>③</sup>

伏日章神父创立的一所老人院与一所医院，靠了几家本地富裕教友的大力援助，也得以继续维持。<sup>④</sup>

郎主教任期内，上海的耶稣教徒从来没有反对过天主教的事业；相反，在与叛军作战的悲惨日子里，神父们还多次赞扬他们的仁爱精神。<sup>⑤</sup>

战争结束、和平恢复后，天主教的事业有着惊人的发展，耶稣教教徒就开始攻击天主教了。这里，我只叙述在郎主教任内发生的几件特别针对洋泾浜神父们的事情。我已在前面记叙了公济医院创办的经过。<sup>⑥</sup>该医院开办以来一直坚守着诺言。由于仁爱会修女的忠诚服务，耶稣教教徒归正天主教的已屡见不鲜。于是，几位传道员激动了。1867年，他们在《中国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文章，抨击天主教的神

---

① 见本卷第212页。

② 这座学校原名“伯尔各满公学”。——译者

③ 《中国通讯》，1875—1876年，第51、53页。

④ 见本卷第212页起。

⑤ 见本书，第1卷第172、176页；又本卷第187页起。

⑥ 见本卷第91页。

父、修女对病人们施加了所谓精神压力。<sup>①</sup>

神父们不必答辩，身受仁爱会修女们护理的人士主动起来为他们辩护；其中一位虽是个十足的耶稣教教徒，却气愤地把天主教神父、修女们的热心服务精神同耶稣教的若干传道士对待同教者病员的冷漠态度，在刊物上作了鲜明的对照。<sup>②</sup>

1875年，类似的攻击又起来了；当时上海英工部局的董事会几乎由清一色的耶稣教教徒组成。它拟改组公济医院，提出该医院的产权得由工部局买下，作为工部局的分支机构，医院的行政权也得由工部局支配。这样一来，势必要把仁爱会修女逐出医院大门。原来该医院是股东们集资所办，医院行政一向由股东会委聘管理。股东们在报纸上对这个改组竭力反对，并提出折衷方案：医院主权仍属股东会，医院行政则由一个“托管委员会”管理；托管委员会的成员是英法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总董、三位领事团的代表以及英法租界上的代表数人组成。尽管英工部局反对，但这一方案还是由租界纳税人大会审议通过并采纳执行了。<sup>③</sup>

1877年初，公济医院院舍感到太小了，于是迁到苏州河北广场上的新建筑里。遣使会帐房埃梅里神父负责搬迁事务。他还在附近为仁爱会修女们准备了一座建筑，日后既可作为她们的初学院，又可作为她们在中国的女会长的住院。<sup>④</sup>

1869年，耶稣教教徒采取另一种方式来攻击我们教区。

---

① 曹冠伦 1867年10月18日信：见《通讯》第6卷第146页。

② 同上。

③ 见前七卷：《江南传教史》，第277页。

④ 同上。

阿礼国先生对上述事件提出异议之后，<sup>①</sup>上海的英文晚报带头响应，引起了一场很激烈的舆论战，攻击法国传教士的所谓政治活动。1869年3月，来上海任署理总领事的达伯理先生已密切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6月8日与9日的报纸上发表声明，要求实事求是地澄清问题，并肯定法国只是忠于1860年条约中保护传教士的职责这一条款，而这些传教士既无政治使命，更无政治野心，他们只专心致力于传教工作。<sup>②</sup>这个声明虽使这些敌对行为平息一时，但不久我们又将多次见到这种仇恨的表现。<sup>③</sup>

由于总领事葛笃先生和我们的外交官员软弱无能，洋泾浜的神父们在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岁月中，共同承受了上海全体法国侨民都感到屈辱难受的所谓宁波会馆（四明公所）的惨痛事件。<sup>④</sup>由于外交人员的软弱，当时人们担心会使中国的一些莠民更胆大妄为地发起暴动，反对上海的天主教事业，发生象宁国府许多会口那样的人命事件。<sup>⑤</sup>幸亏事态没有扩大，显然这是出于天主上智的特恩。<sup>⑥</sup>

## 二、徐家汇

神父住院 神学院与徐汇公学 学习计划 翻译学校的计划 土山湾 工场间 印刷所 主要印刷品

1872年与1873年，驻法国的江南教区帐房塔扬神父聆听了中国各教区的好友兼保护人罗淑亚伯爵的意见，拟订了



① 见本卷第 200 页。

② 见《神学院》，1869 年 12 月，第 55 页。

③ 见本卷后面。

④ 见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506 页。

⑤ 见费赖之：《日记》，1874 年，第 44 页起，详记着这次事件的细节及教区面临的危险。

⑥ 上海洋泾浜若瑟堂的教士名单：

	院 长	理 家	住 院
1864—1865 年		禄理格	金式玉 叶春荣
1865—1866 年		苏念澄	金式玉
1866—1867 年	苏念澄		范世熙
1867—1868 年	苏念澄	曹冠伦	
1868—1869 年	苏念澄		顾安德(明安)
1869—1870 年	苏念澄		笄谦受
1870—1871 年	苏念澄	笄谦受	夏若望(祝三) 程先民
1871—1872 年	禄理格	笄谦受	苏念澄 程先民
1872—1873 年	苏念澄	陈雅各	笄谦受 程先民
1873—1874 年	苏念澄	杜若兰	笄谦受
1874—1875 年	苏念澄	杜若兰	
1875—1876 年	苏念澄	杜若兰	许若翰 韩伯禄
1877—1878 年	苏念澄	杜若兰	
1878—1879 年	苏念澄	杜若兰	富守和
	虹 口	虹口圣方济学校	老天主堂
1864—1865 年			顾安德
1865—1866 年			顾安德
1866—1867 年			伏日章
1867—1868 年			伏日章
1868—1869 年			伏日章
1869—1870 年			伏日章
1870—1871 年			帅维则
1871—1872 年			帅维则
1872—1873 年			帅维则
1873—1874 年			帅维则
1874—1875 年		戴尔第	黄神父
1875—1876 年		戴尔第	许若翰
1876—1877 年	笄谦受	戴尔第	禄理格
1877—1878 年	孟惟理	戴尔第 梁蕃德	禄理格
1878—1879 年	顾福格	卜艾炎 茅承功 梁蕃德	禄理格 冯秋筋

注：洋泾浜帐房还有一位辅理修士濮永清。

一份为江南与直隶东南两个教区提供并征召更多更好的传教士的计划，<sup>①</sup> 并建议法国和中国的神长们对这一计划进行探讨。

计划中规定，今后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不仅有已升了神父的人和神学院修士，而且还有年青的刚入学的修士，让他们在中国学完整个学程。<sup>②</sup> 会士的院舍和修道院属两教区公有；初学院与文学院就设在讲普通话的直隶东南教区，聘请文人学士为这些未来的传教士们的教授；<sup>③</sup> 哲学院、神学院及第三年初学的卒试院则设在徐家汇，这样就可以把许多未来中国之前，对法国漫长的学年感到厌烦的法国青年，不论是修院生或传教学校<sup>④</sup> 的学生，直接交给了两个教区。使这些青年传教士一开始就完全能掌握并熟练地讲普通话；象十七、十八世纪的老传教士们那样，赢得文人学士的尊敬；以后，他们只要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就够了。两个教区合并起来的资金足够培养这些修士，并提供可与欧洲相媲美的理院和教授。计划还拟定，两教区的修道院必须同神学院完全分开，他们的神修与学业必须另立一种特殊的章程。

这个计划很有诱惑力。巴黎与香巴尼两省的省会长都愿

---

① 塔扬神父计划的副本在徐家汇存有好几份，见《徐档》，卷宗 F16.20；葛光被：《鄂尔璧神父传》，第 237 页起。

② 耶稣会会士升神父的整个学程是：初学两年、文学三年、哲学三年、出试两年、神学四年（第三年升神父）；入初学院之前称求生。升神父后过一年初学生活称卒试。初学时期不读书，专务精神修养。——译者

③ 当时法国政府想在直隶东南教区，即献县的神父住院里开办一所译员学校，请直隶最好的文人当教授。两教区的文学院修士跟着同班上课（塔扬神父回忆）。

④ 传教学校是从幼年培养修道生的学校，比上海教区备修院的备修生年龄还要小。——译者

采纳。<sup>①</sup> 罗马总会长与法国的参赞吕比荣神父也表示赞同。<sup>②</sup> 结果由于杜巴尔主教与直隶东南区会长鄂尔璧神父的坚决反对，他们先打电报，后写长函申说理由，这个计划全部吹了。<sup>③</sup>

他俩不信这些未来的传教士的宗教修养与科学研究方面能在中国得到完整的教育。他们还担心，这些青年人是否能适应水土气候，尤其对尚未发育结实的青年来说，适应性更差。他们尤其不赞成塔扬的理论，认为如果欧洲人想精通中文，必须从幼年时学起。他们指出旧耶稣会的那些杰出的汉学家，都是西欧先受了完整的教育后来到中国的，而且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sup>④</sup>

虽有总会长神父的劝告，对立局面还是继续存在，大家各行其是。<sup>⑤</sup> 直隶东南教区至今还忠于它的老一套，只接受在西欧已读完神学升了神父的传教士。鄂尔璧神父只在1882年接受过神学院修士，按他的传记所载，认为经验证明这种做法并不理想。<sup>⑥</sup>

塔扬神父的计划在江南也同样引起异议；意籍神父几乎全部赞同直隶东南教区上级的意见。<sup>⑦</sup> 这时，薛孔昭神父还把他们的反对的理由加以引伸，写了一份回忆录寄到罗马和法

---

① 塔扬神父致鄂尔璧神父信；香巴尼省会长神父1873年3月4、7日致鄂尔璧神父信，见葛光被：《鄂尔璧神父传》，第236页起；塔扬1873年3月12日致江南会长信，见《徐档》，卷宗F20。

② 塔扬1873年7月27日信，见《徐档》，卷宗F20；葛光被：《鄂尔璧神父传》，第240页。

③ 同上。

④ 见葛光被：《鄂尔璧神父传》，第242页起。

⑤ 同上，第241页。

⑥ 同上，第248页。

⑦ 德蓬尔瓦1872年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4卷第4章第29页。

国。<sup>①</sup> 法籍神父多数赞成把读完哲学的修士派来中国，反对派遣更年轻的修士来，更反对派初学修士来。<sup>②</sup>

徐家汇神学院只接受巴黎省派来的外籍神学修士；江南的中国籍神学院修士往往就同他们合并起来同学习、同生活；直隶东南教区也不止一次地派来了他们的神学修士，常常受到徐家汇神学院弟兄般亲切的接待。

我们已经看到，从1872年与1873年开始，一直设在董家渡的耶稣会神学院是怎样回到了徐家汇的；接着在1877年至1878年，大修道院因学员人数太少，不足组成学习单位，又怎样同耶稣会读书修士合并的。同年，徐家汇高年级的拉丁生与公学一般学生分开，迁到了董家渡，住进由大修院迁出而空下来的屋子内，组合成为小修道院。<sup>③</sup>

徐汇公学逐步采取了耶稣会公学的方式。1875年，它拥有九十名住宿生。一般中国的富裕家庭常喜欢为自己的子女聘请家庭教师，而寄宿学校不合中华帝国的家庭习俗，因此，这个数字在当时该算得上是满意的了。<sup>④</sup>

1874年至1875年，一位《中国通讯》杂志的编者曾生动地描绘了一整天教学活动的情况，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⑤</sup> 他描绘说：学生们用震耳的声音朗诵经典作品，每个学生反复大声读唱从未有人给他讲解过的课文；这里是学生在

---

① 手抄稿存徐家汇会长神父私人档案。

② 见教区咨议会记录及会长私人档案，特别是1879年12月5日与1880年2月3日和4日的记录。会议是在巡阅使狄虚衷神父面前召开的，当时又提起这件事，在场的大多数（咨议员与总本堂）赞成青年传教士必须读完哲学后再来。

③ 见本卷第276页起。

④ 见《中国通讯》，1875年，第55页起。

⑤ 同上。

老师面前背书，背书时学生的头摇来摇去，甚至全身都左右摇摆起来；书法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因为学生识字的多少和写字笔法的挺秀，也经常是衡量一个人才学高低的标准；上讲解课时，老师讲解学生们已背诵得滚瓜烂熟而几乎一句也不懂的渊博的古文；最后是作文课，学龄最高的学生在学作奇特的八股文章。<sup>①</sup>有一位进士与两位举人替他们修改作业，学生们很关心老师们的评语。<sup>②</sup>神父们认为，这种中国的老式教学法太不理想，太限制约束了学生们的智力，欲试加改进，但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方法。公学内，部分船主及巨商子弟只学了一些应用文字与算术常识，不到学业结束，就离开了公学。

从1869年至1873年，人们又想按爱棠与葛罗<sup>③</sup>的计划，在徐家汇办一所翻译学校，让中国青年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法国青年则学习汉语。教区乐意支持这个计划，拟参照巴黎圣热纳维埃夫学校的章程与校规；但法国政府对这个提案未作答复。<sup>④</sup>

早在法国军队与中法联队驻扎徐家汇时，徐汇公学在上海侨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西乐队、法国式的军乐队或法国式训练的铜鼓喇叭队当然也吸引了徐家汇的青年们。因此，卓越的艺术家兰廷玉神父根据人们的爱好办了一个乐队，从法国运来了铜鼓、喇叭等乐器。1864年11月22日，圣女

---

① 见《中国通讯》，1874年，第56页。

② 见《中国通讯》，1875年，第59页。

③ 见本卷第99页起。

④ 德蓬尔瓦1869年4月16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4卷第4章第13页。

则济利亚瞻礼，徐家汇乐队在洋泾浜教堂演奏晨曲（弥撒曲），吸引了大批外侨听众；法领事葛笃先生感到自豪，当即给领队神父写了一封亲切的感谢信，祝贺他的成功，并附赠了三十元银洋，奖励青年演奏者。这笔款子供这些青年们饱尝一顿丰盛的酒席，以至他们久久难忘。<sup>①</sup>从此每逢大瞻礼日，洋泾浜总要请徐家汇乐队去参加演奏。

数年之后，1871年10月，于布内男爵来徐家汇参观时，证明当年的地方乐队的演奏能手并未衰退，他记述道：“在一位中国神父的指挥下，四个学生演奏了一支海顿的交响曲。这位可敬的指挥者，鼻子上架着一副大眼镜，手执一支小小指挥棒；他指挥着，激励着，他的指挥棒控制着一切；这些青年演奏者则双目盯着乐谱，满头大汗，终于较好地奏出了这位音乐大师最美妙的一首交响曲。海顿的名曲竟在中国，而且由中国人演奏了！为什么要秘而不宣呢？我们都很受感动呀！”<sup>②</sup>

1875年的统计表向我们显示了小修院于1860年重设在董家渡后以及徐汇公学从1852年创建后所取得的成绩。<sup>③</sup>

### 土山湾孤儿院

我们已经看到，1864年，孤儿们从上海搬迁到距离徐家汇约半华里、在同一小河畔的土山湾。<sup>④</sup>叛军战事之后，地方上被弃的孩子多得难以计数。上海的官员们曾收了五六百名送给教区抚养，教区苦无经费，又缺人手，只得婉辞谢绝。这批可怜的孩子便被圈在近南门的茅舍里。不久，一次瘟疫造成了大批孩子死亡；教区无能力抚养他们，只有派几位忠诚的传教先生去给垂死的孩子付洗；传教先生中有一位由葛必达神父培植的钱先生，在这种慈善事业中尤其出力，终子因服侍

病孩感染了瘟疫，就此牺牲了。<sup>③</sup>

这批被弃的苦孩中，比较有才能有希望成为好教友的就被送到土山湾，同神父们在回到破会口时收来的孤儿们合并

① 兰廷玉在1864年12月18日（《通讯》，第5卷第180页）记有一则完全中国式的细节：神父把一枚银元授给两名年龄最大的去买些糕饼。这两个小家伙买了二十只中国馒头（差不多近十斤），不到半小时，三十个青年乐师把二十只馒头都吞下了。但一个半小时后，当他们荣誉地入席参加节日盛宴时，却仍象腹空似的。

② 见于布内：《周游世界记》，第2卷第245页。

③ 见高龙肇：《江南传教史》，第239页起。

**小修院重设董家渡后的统计表(1860—1875年6月底)**

进小修院的学生	155	
出小修院的学生	100	占 64%
进大修院的学生	20	占 13%
出大修院的学生	9	占 6%
1875年留在小修院	20	占 16%
1875年留在大修院	11	占 7%
死亡	10	占6.5%
1875年由修院出来当教师	12	占 8%
1875年由修院出来当传教先生	12	占 8%

**徐汇公学统计表(1852年—1875年6月底)**

进公学的学生	600	
进耶稣会升神父	6	占3.3%
进耶稣会当读书修士	6	占3.3%
进耶稣会当辅理修士	6	占3.3%
入教区神职班	3	占3.3%
进小修院	35	
现在小修院	17	
考中秀才	20	占3.5%
当教师或传教先生	56	占9.1%
当堂口办事人员	67	占 11%
死亡	65	
在俗	229	占 38%

④ 见本卷第83页。

⑤ 叶春荣1865年8月28日、10月18日致圣婴善会总部信，见《通讯》，第5卷第246页。

在一起。1866年，孤儿院造了第二幢房屋；一座哥特式的华丽小堂也于1867年4月同时完工。<sup>①</sup>当时土山湾收养了三百四十二名孤儿：其中一百三十三名分配在各个工场，八十名搞农业，二十名从事园艺；还有一百零九名由于年龄太小，还不能参加体力劳动，就留在小学里读书读经。<sup>②</sup>

谁都知道，抚养这三百四十二名弃孩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幸亏圣婴善会总部的慷慨大方，给我们提供了一切需要。就在1861年，总部送来了一笔二十三万法郎的津贴，使教区与耶稣会多少弥补了些在战乱中的损失；这笔津贴中，八万法郎指定为“特别补助”；这笔特别补助，在以后“激烈斗争”的年代里，总部还坚持捐来。<sup>③</sup>

教区帐房隆盖神父于1865年向圣婴善会总部呈报了一份很受欢迎的统计表。全中国其他各教区总共抚养了一千三百二十二名孤儿，共花十八万七千五百八十八法郎，每名孤儿平均花去一百零三点八六法郎。而单单江南教区就有一千三百十二名孤儿，共花了八万六千法郎，每个孤儿为六十五点五五法郎；<sup>④</sup>必须承认，善用救济能鼓励人们给以新的更大的救济。

1865年与1866年，从石可桢神父与柏立德神父致总会长的信<sup>⑤</sup>以及费赖之神父的《1869年的江南教区》中，<sup>⑥</sup>使我们认识到土山湾这批小居民是多么的勤劳而活泼。

---

① 柏立德：《土山湾孤儿院》，见《徐档》，卷宗G40。

② 柏立德1865年11月27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64页。

③ 1861—1871年的经济总帐，见《徐档》，卷宗B12。

④ 隆盖1865年6月16日信，见《徐档》，卷宗B12。

⑤ 见《通讯》，第5卷第262页起；第6卷第52、56、59、230页。

⑥ 同上，第6卷第49页起。



当时孤儿们学习的主要手艺有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纺织以及农田耕作；此外，还有刻写印刷用的汉字、木版。<sup>①</sup>

人们特别注意到“雕刻、镀金、油漆、绘画工场”；这工场是由范廷佐修士的两位得意门生，陆伯都和刘必振两位辅理修士从徐家汇搬到土山湾的。他俩把自己的技术精心地传授给孤儿们，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sup>②</sup> 这所工场后来大大地发展了。中国教友喜爱的圣像绝大部分都由这所工场绘制印刷；还有圣堂里用的装饰和用具，在辽阔无边的中华帝国各地的无数教堂里，几乎都能看到。

当时，土山湾有一件农活已着手进行，后因种种困难而放弃了。1865年以后，曾有八十名孤儿在七名工人指导下从事农业生产。柏立德神父曾写信说：“孤儿院能有水稻田种种，真是求之不得。我们有的是人手，成本也不太贵。种水稻后，我们每年就有粮食，如遇灾荒，米珠薪桂，我们就可不必出高价买粮了。”<sup>③</sup> 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不久之后孤儿院工艺项目中不再出现农事这个项目了。”

很明显，这些可怜孩子的父母已被太平军杀死了，他们在肉体上与精神上都受到了摧残，教育他们要比教育前蔡家湾的一批孩子困难得多。理院神父们在信上毫不隐瞒地叙述了他们遇到的艰难困苦与所感受到的烦闷乏味。<sup>④</sup> 然而数年之

---

① 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52页。

② 柏立德1865年11月27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266页。

③ 同上，第269页。

④ 石可楨神父曾记述道，有许多孤儿为了能放任自由，宁愿受苦逃亡出走。见《通讯》，第5卷第262页。

后，土山湾机构成立了，曾目睹一切的费赖之神父记述道：“天主的圣宠在这些从泥泞道路上拾来的、粗野的、由逆性反常的、被满脑子教外思想的父母抛弃或出卖的孩子们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人们看到，就是这批孩子却能修到了忠诚服务、自我克制等种种美德，真可与我们法国最好的学生并驾齐驱，同受尊敬。我们的基本目的已达到了。我们培养成了一批教友工人；直到如今，孤儿院中从未有未领圣洗而死亡的。”<sup>①</sup>

由于许多教友家庭的请求，一所教友孤儿院于1874年8月并入了土山湾。<sup>②</sup>可是他们不能动用圣婴善会的经费，而教区又负担不起这笔开支，所以在1878年不得不取消了。<sup>③</sup>

蔡家湾的许多孤儿已到了他们自立谋生的年龄；<sup>④</sup>然而当时上海的大多数工场操纵在教外人手中，对他们来说真是危险重重。而且孤儿一旦有病，孤儿院也不能置之不理，神父们也不能不为之解决。圣婴善会要维持孤儿的生活，负担已够重的了。费赖之神父又写道：“当这批青年们自信已能出院自立谋生，<sup>⑤</sup>孤儿院就支持他们，供给他们生活上最急需的用品，如衣服、床褥等等，他们就这样离开了。他们自去投师、签订合同，合同上附有几个条件：（一）不参加一切迷信活动；（二）主日及大瞻礼日能自由去望弥撒；（三）每年数次回土山湾集会。如果失去师傅或东家，或因其他理由不能再留在外面

---

① 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52页。

② 见《中国通讯》，1875年，第70页。

③ 见柏立德：《日记》，1878年2月12日。

④ 柏立德：《中国溺婴记》，第179页上记述道，自1850年至1877年，孤儿院共有四百十九名分属了十七种手艺的学徒，他们满师后离开了孤儿院。

⑤ 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50页。

的话，他们就回到孤儿院，在他们看来，土山湾孤儿院就是他们的老家。一般在上海附近成家立业的孤儿，经常喜欢回来看看养育他们的旧居；瞻礼日来的人更多。大多数人都回来举行一年一次的避静神工。今年有三百四十人参加了避静，其中七十五人是老孤儿。董家渡的一位神父特别关心这些老孤儿，每逢主日便给他们培训讲道。”

数年之后，人们给已满师当工人的孤儿，在土山湾河对岸盖造了几幢房屋，这就是目前旺盛的教友村“五埭头”的开端。<sup>①</sup>

从那时起直到如今，土山湾孤儿院为教区做着一件杰出的工作，那就是它的印书馆。这所孤儿院印书馆成了传教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在1869年，它至少已拥有“七十种作品的木版，都是有关宗教和引人热心的圣书，或为教外归化，或为圣教辩护，或为训导培养教友虔诚精修”。其中大部分是十七、十八世纪由利玛窦、柏应理、李玛诺、南怀仁、艾儒略、潘国光、庞迪我等旧耶稣会神父的优秀作品的再版；后又增加了李秀芳与晁德莅两位合著的《圣母月》和李秀芳著的《若瑟月》。<sup>②</sup>

1874年开始，活体铅字引进了土山湾，从此遂能供应廉价而又轻便的书本了。<sup>③</sup>

1878年，孤儿们出版了一本《中国溺婴记》，为身灵两利的育婴事业作辩护洗雪。1875年12月，萨尔塞在《十九世纪

---

① 见《中国通讯》，1875年，第70页。“五埭头”，今称汇南街。——译者

② 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54页起。

③ 见《中国通讯》，1875年，第60页。

杂志》上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认为中国溺婴杀婴并不比欧洲多;又认为圣婴善会劝募来的捐款送到传教区各修会,并非作为救中国婴孩,而是移作其他用途,所以这也是一桩令人痛恨的弄虚作假。<sup>①</sup>

论据是以几名旅游者的证明作为基础的。那时,多年任土山湾孤儿院院长的柏立德神父因病重在徐家汇治疗,他竭尽余力,耐心地收集了有关溺婴问题的资料;1877年3月1日,他把编著的《溺婴与圣婴善会事业》的手稿寄给了巴黎圣婴善会主任德吉拉尔丹先生。<sup>②</sup>在法国,由于印刷费昂贵,<sup>③</sup>该书的出版工作一再拖延,于是作者又重抄原稿,于1878年由土山湾先印了两百本。<sup>④</sup>

从此为圣婴善会辩护的人,就可从柏立德这本著作中找到有力的论证,驳斥萨尔塞的诬蔑。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上来证明。从中国皇帝的上谕和各省巡抚们的告示中都证明杀婴的罪行到处泛滥,并且在努力克服中;在儒释道三教的文人著作里,也承认这种绝灭人性的恶风陋习,并要他们的信徒与之斗争;从1874年至1878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也证明这问题至今存在;最后,还搜集了一些比文章更能说明问题的民间画,证明在中国许多家庭内,还有人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杀婴方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第二部分,叙述天主教从十七世纪开始已创办育婴事业,目的就是为了纠正消除这种罪行并陈述今日育婴堂的起源与现状。第三部

---

① 见柏立德:《中国溺婴记》,序文第3页起。

② 见柏立德:《日记》,1877年3月1日。

③ 同上,1877年10月10日。

④ 同上,1878年4月22日。

分, 阐述杀婴溺婴的恶习与中国的博爱慈善精神相违背, 并对清皇朝和各地努力收养弃孩表示尊敬, 但也指出教外人办这种事业存在的缺点。书的最后认为, 中国杀婴的原因是出于自私和迷信, 该书总共有六十六篇辩护文章。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 从欧洲航行到上海更方便了; 在郎主教任期内, 许多著名人士参观了徐家汇与土山湾; 他们对教区在徐光启墓畔创办的种种事业所作的评价, 是对神父工作的最好的表扬。<sup>①</sup>

<sup>①</sup> 德博瓦尔:《周游世界》,第15页;罗淑亚:《北京》,第177页;于布内:《周游世界记》,第2卷第243页。

#### 徐家汇的传教士名单

	院长	理家	公学与修院		神父住院	
1864—1865年	晁德莅	兰廷玉	晁德莅	夏祝三		
1865—1866年	谷振声	石可桢	夏祝三	许采白	叶春荣	潘如汉
			沈则宽		刘德耀	
1866—1867年	胡国治	帅维则	鲍伯尔		刘德耀	
1867—1868年	胡国治	富守和	夏祝三			
1868—1869年	步天衢	富守和	利唐乐			
1869—1870年	步天衢	帅维则	帅维则	许采白	范世熙	
1870—1871年	步天衢	石可桢	许采白	戴尔弟	范世熙	沈则恭
1871—1872年	晁德莅	南志恒	陈显文	马相伯		
1872—1873年	晁德莅	南志恒	沈则恭	马相伯		
1873—1874年	晁德莅	南志恒	马相伯		费赖之	奏郎升
					毕大民	
1874—1875年	帅维则	高龙肇	马相伯	倪栖梅	田梦云	柏立德
					白备德	宝维善
1875—1876年	帅维则	高龙肇	李问渔		柏立德	
1876—1877年	帅维则	高龙肇	许采白		柏立德	毕大民
					陶斯咏	
1877—1878年	聂溪后	石可桢	蒋邑虚	徐伯愚	费赖之	柏立德
			冯秋舫		晁德莅	
1878—1879年	聂溪后	石可桢	蒋邑虚	沈则恭	费赖之	薛孔昭
					晁德莅	柏立德

费赖之神父的回忆录，曾记述了俄国驻北京公使发表的总的感想：“我在上海只逗留三天，两天于我的私事，但假如我不去参观一下北京外国公使们如此赞赏的那个教会机构，我总觉得心头有些不安；现在我看到了，肯定他们所说的一切一点也没有夸大。”<sup>①</sup>

① 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55页起。

	初学院与神学院	科学工作	土山湾孤儿院	辅理修士
1864—1865年			石可楨 柏立德	6
1865—1866年			石可楨 柏立德	5
1866—1867年	晁德莅 初学生13		石可楨 柏立德	4
1867—1868年	晁德莅 初学生13		石可楨 柏立德	4
1868—1869年	晁德莅 文学士13		石可楨 姚继白	4
1869—1870年			石可楨 姚继白	6
1870—1871年			伏日章 姚继白	6
1871—1872年		韩伯禄	柏立德	8
1872—1873年		韩伯禄 高龙攀	石可楨	7
1873—1874年	文成章 应儒望 神学士14	韩伯禄 刘德耀	石可楨 严思愷	7
1874—1875年	文成章 应儒望 神学士14	韩伯禄 能恩斯	石可楨 严思愷	8
1875—1876年	文成章 应儒望 神学士14	韩伯禄 刘德耀	能恩斯 石可楨 施方礼	9
1876—1877年	薛孔昭 宝维善 神学士14	韩伯禄 刘德耀	能恩斯 石可楨 庞超	9
1877—1878年	薛孔昭 庞超 神学士15 鲍米思	韩伯禄 刘德耀	能恩斯 帅维则 沈则宽	11
1878—1879年	庞超 应儒望 鲍米思 乔迁于 神学士17	韩伯禄 庄其仪	能恩斯 沈则宽	10

### 三、女修会

圣衣会女修院的开创 迁到土山湾 拯亡会  
圣母院 圣若瑟院 上智小学 仁爱会修女 公济  
医院

#### 圣衣院

郎主教邀请圣衣会修女到中国，意在请她们用祈祷与苦功来扶助传教。这个目的，一开始就实践了。每年圣神降临瞻礼日，人们写了条子，然后抓阄儿，通知圣衣院修女，年内该为教区某某总铎区祈祷。郎主教和教区耶稣会的上级到处赞扬<sup>①</sup>王家堂和土山湾的圣衣院，说它们对江南传教事业的迅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是人们在现世不能全部了解的。我深深感谢圣衣院允许我翻阅她们修院的档案，我从中找了几个很生动的例子，说明初来中国的法国圣衣会修女是多么的勇敢以及中国教友多么迅速地敢于攀登神修的最高峰。<sup>②</sup>

当第一批圣衣会修女到中国后，有许多人认为，要引中国

---

<sup>①</sup> 圣衣院院长姆姆同代牧主教与教区会长们的信札，见《徐档》，卷宗 B16；见《中国通讯》，1874年第226页。

<sup>②</sup> 1882年，土山湾圣衣院在纪念圣女德肋撒逝世三百周年的纪念册上，竟这样声明说：“圣衣院这种苦身孤独静观的生活是完全符合中国的风俗与精神的……中国人对一切庄重严肃的事都很重视，对不为物质所累而能翱翔于物质之上的一切，都表示惊奇与折慕；为此，中国人都认圣衣院为修德成圣的理想之地。”见纪念册，第443页。

女子进圣衣会当修女还得等待多少时间哩！

可是中国教友想的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从圣衣院来华第一年，就有许多要求进会的中国女子前来初试，1869年圣神降临瞻礼，已接纳一名经座修女<sup>①</sup>；同年7月31日，第一名兜白头纱的修女被录取了；不久，其他女子也跟了上来；其中许多出身于上海富裕的教友家庭。她们虽心灵慷慨，但圣衣院的严峻生活，对中国妇女来说是太艰苦了，许多女子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第一批求进会的，大部分被迫中途退出，有的回归老家，有的转进会规不太严的女修会。写圣衣院院史的修女写道：“当初，我们常常怀疑，这些中国女子是否有足够的体力能恪守圣衣院严峻的会规？”在她们三年求入会初试期间，已遇到足够严峻的考验了，而她们还得学习三年法文，至少能学会念拉丁经文；而且学习时间也只能安排在确保她们能遵循法国女隐修院中<sup>②</sup>一切日常的祈祷与工作之余。

上海圣衣院的创业者，在这些初期的困难面前，并没有沮丧；一批批新进而持久的圣召，就是她们得到的报酬。1875年1月25日，圣衣院的初学院成立了，有二名学生。同年12月8日，玛尔大修女戴上白头纱，第一个发了她的初

---

① 圣衣院修女主要是祈祷与工作，因此分祈祷修女与工作修女。祈祷修女在圣堂祭台附近规定的座位上，按时唱念大日课，故称经座修女，她们戴的是黑头纱；工作修女则从事院内杂务工作，戴白头纱。进圣衣院当修女一般须经过三年初试时期，后正式初学。初学三年后发小愿，也称初愿；再过三年发大愿以迄终身，因也称终身愿。——译者

② 见本卷第167页。

圣衣院与外界绝对隔离，故称隐修院；加上修女终身素食，严守缄默，相互之间除对上级外，彼此不相交谈，又经常厉行守斋，克己苦身，故有时也称苦修院。——译者



愿。<sup>①</sup>

1877年10月14日，若瑟德肋撒修女发了大愿，翌日戴上了黑头纱。隐修院编年史上记载说：“最后，我们终于能安慰我们会祖母的在天之灵，并在她瞻礼庆日的前夕，把第一位中国修女的誓愿奉献给她，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良辰呀！”<sup>②</sup>

中国圣衣院成立初期的喜悦被一片愁云笼罩了；几乎所有的创业者都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了；好几天，初学修女只能到老师病榻之前聆听训诲；圣堂内的唱日课也间断了一二次，因为健在的只有一位修女了。因此，新的疑虑又起来了。人们不禁要问，西欧修女同圣衣院修会的生活究竟能否适应中国的气候水土？但没有一个创业者想回法国去，她们渐渐地适应了中国的水土、气候，来自法国拉瓦尔的圣衣院修女个个长寿，很明显，这是天主上智的保佑。

第一位院长耶稣玛利亚姆姆<sup>③</sup>在法国时体质纤弱；当她起程到中国的那天，修院医师宣称，按外表来看，她到不了上海，她中途必将被抛入海里喂鱼。可是事后，这位曾度银庆的院长，常风趣地说：“鱼非但没有吃掉我，我到中国后反而吃了许多鱼。”<sup>④</sup>当庆祝圣衣院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时，所有上海圣衣院的创业者都还健在。领她们来上海的倪怀纶主教主持

---

① 玛尔大修女死于1899年，年七十岁。

这里的“玛尔大”以及“若瑟德肋撒”都是修女们进会时的会名，和一般领洗时的教名不同。——译者

② 见《中国圣衣院建院史》。

③ 圣衣院修女，除院长称姆姆外，其余修女都称姊妹；其他女修会的称呼也各有不同；上海的教友一般译称众修女为姆姆。——译者

④ 见《耶稣玛利亚姆姆小传》（圣衣院档案），这位可敬的院长姆姆死于1908年10月17日，年七十三岁，修会年龄五十一年，其中四十年在中国。

了这次庆祝典礼。

初创时修女们最大的遗憾是不能每天望弥撒。当时因徐家汇神父太少，王家堂圣衣院每星期至多只能保证有三台弥撒，两台在公所，一台在经座前。其他日子，人们还是打钟、以拜苦路代望弥撒。1862年，神学院与修道院搬到徐家汇后，才有一位教书的神父每天去王家堂；每逢主日，神学院修士前去咏唱圣体降福，这样，这些好修女就已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sup>①</sup>

1870年，天津惨案后，神长们理所当然地要顾虑到上海的修女们，担心她们也许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想先把圣衣院修女送往租界或寄宿教友人家；可她们答称，除非教区上级正式颁下命令，否则她们决不开离隐修院的围墙；她们这种信赖天主的信心，深深感动了教区会长谷振声，他认为不该给她们颁下这项命令；当时上海的洋人态度鲜明，准备坚决抵抗任何暴动，这就镇住了那些想干一下类似天津事件的蠢蠢欲动的可怜虫。

1871年，从拉瓦尔又来了两名修女；1873年12月8日，郎主教祝圣了土山湾孤儿院对岸新建的隐修院的奠基石。由于马历耀修士的督造有方，一年后，修女们已能住进新会院。王家堂小公所曾因拯亡会和圣衣院修女初来中国时居住过而闻名，从此就冷落了。<sup>②</sup>为了铭感该公所的先辈教友曾为教区服务效劳，至今，每逢大瞻礼日，公所小堂还享有神父去举行弥撒的特恩。

---

① 见《中国圣衣院建院史》手稿。

② 同上。

1874年，土山湾圣衣院共有七名欧籍经座修女、五名经座初试修女、二名初学和二名戴白头纱的初试修女。<sup>①</sup>

土山湾圣衣院象王家堂第一座隐修院一样，不久就成为教友们施舍的对象；历任院长常称，在中国物质的生活要比在法国许多城市便利得多。按照这些隐修会的惯例，必须把修会所收到的，那怕最微小的东西，也要细心地写进修院日志，当作修院的传家宝，这使读者非常感动。在这些施主的名字中，有上海出名的教友人家及几乎全部法国驻沪的政界人士<sup>②</sup>，而且还有圣衣院四周许多贫苦的工人家庭和四乡的农民家庭。

### 拯 亡 会

圣母院从王家堂迁到徐家汇后，张家楼的孤女们也被领来了；从1870年起，圣母院的新建筑里住着二百二十人：有拯亡会修女、献堂会修女、寄宿学生和大小孤女。人们知道，郎主教把欧洲修女召来江南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她们的教导和表率来培植一支度修成生活的本地贞女。为此，他通知从1869年2月开始，在徐家汇圣母院举行一次各会口贞女的避静。应召来的很踊跃，毫无疑问，不少人是出于看看外国修女与参观新建院舍的好奇心而来的，总共竟来了五百八十四人。人们尽力设法把她们妥善安置，这次避静给她们每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从此，这个习惯年年继续；只是做避静的人，必须分

---

①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2卷第225页。

② 捐赠的情节是动人的，而且一切赠予几乎是在骚扰与危难时期进行的；法国驻上海的外交人员很赏识圣衣院修女的祈祷，帮助了他们办事有毅力，进展得顺利。

成几批了。<sup>①</sup>

1869年9月8日，开办献堂会初学院，当时有初学贞女三十三名，由圣心玛利亚姆姆下了极大的努力负责领导她们。她在致总会长姆姆信上写道：“我用中国话给她们讲神修的事，往往使她们失声大笑。因为她们听不懂我的中国话，有的连这种神修名称的词汇也不知道，或只知道这种词汇而不知其涵义；可是好耶稣自会在她们心中教导她们。”<sup>②</sup>

第一批献堂会初学修女的会规，除了常规的神修外，还有一些有关仁爱与传教的工作，例如：照料孤女，给女保守讲解教理，给孩子们传授要理问答等。

圣心玛利亚姆姆给总会长姆姆写了许多生动的信件，信上也列出了徐家汇圣母院在成立后的第一年年底已完成的善举，“我们这个如我去年所称的大村子，目前已觉得太小了；许多人似乎已在展翅高飞，飞向天堂，去汇合圣神降临前夕与我们永别的人……1869年，有九十五名女生，六十四名孤女，三十二名献堂会初学，外学堂有二十二名小女孩；每主日，通常有一百多名妇女来集合；有十九名女青年在周内来圣母院学习经言，有三、四名教外妇女在会客室学道培训，人们正期待着开一所望教妇女的保守间。”<sup>③</sup>

法国拯亡会的上级对在中国的创业极表慷慨。可是她们的事业要继续下去，主要还得靠本地修女的支持。1870年8

---

① 见《拯亡会修女传略》中所提到的圣心玛利亚姆姆，第150页。

② 同上，第189页（圣母院档案）。

③ 同上，第132页；1869年，院长姆姆给总会长姆姆写信说：“我的好姆姆，我在你的学校里学习后才知道，天主的事业是不会因缺少金钱而消亡的，然而会因缺少信德而毁灭。”

月13日,若翰伯尔各满瞻礼,拯亡会在徐家汇成立了初学院,共有七名中国女青年,其中五名来自献堂会初学院。院长姆姆记述道:“我发现她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可爱。我们用一半中文、一半法文和她们交谈,使她们每人可以省力些。此后,她们学会念小日课,念她们的经言;各个修女分工帮助她们,这种情景很动人,也很独特;我常常想,假如您总会长姆姆能看到、听到,您也会象我一样深受感动。”<sup>①</sup>

稍后,在保禄姆姆的信上证明,“这些虔诚热心的初学修女,洋溢着迷人的正直与慷慨”,她们虚心接受人们指出的意见和批评。<sup>②</sup>11月15日,圣女日多达瞻礼,十一名中国修女穿上了拯亡会会衣,献堂会的创始人施姆姆,看到穿会衣的修女大半是她先前的学生,更是喜泪直流。这年年终,在晁德莅神父指导下,拯亡会和献堂会两个修会的初学生,联合举行了避静神工。

不久,新生的圣母院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871年2月7日,拯亡会的创业者与第一任总会长上智玛利亚姆姆在巴黎圣善地逝世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曾多次表示,要从中国召回圣心玛利亚姆姆,认为她是最合适的继任人。<sup>③</sup>

这位可敬的创业者一死,署理总会长玛利亚仁慈之母姆姆立刻打电报,命令在中国的院长姆姆立刻回法国参加选举新总会长的大会。1871年6月9日,圣心玛利亚姆姆心碎肠断地离开了徐家汇圣母院。为了避免别离的痛苦,她对属下隐瞒了动身的日子,当众人都在弥撒后谢圣体的时候,她悄悄

① 见《拯亡会修女传略》,第198页。

② 同上,第200页起。

③ 同上,第217页起。

地离开了她创办的圣母院。经过四十七天的艰巨航程，她重新回到了法国；8月14日，在巴黎巴鲁耶尔路举行的选举大会上，她被任命继承玛利亚上智姆姆，当上拯亡会的总会长。

拯亡会在徐家汇以及后来在上海的事业，常得到这位新总会长姆姆最热心、最有力的关怀，其理由是不难明白的。1871年10月，若望姆姆和多明我姆姆两位修女启程来到上海；接着，以后几年又有几位拯亡会生力军相继而来。郎主教在任的末期，中国已有三十二名拯亡会修女。派来中国的修女都经过总会长姆姆亲自挑选，动身前，还亲自培训她们，并亲自教授简单的中国语言。她写给教区，特别是写给第一批中国初学修女的书信中倾注了慈母般的感情，说明这位创业者对自己亲手创立的事业还是那么地关切和眷恋。她指示圣母院院长姆姆，断定“献堂会是使中国归化的最重要的事业，必须全力以赴，这是从基层争取人的灵魂的工作，必须尽可能地同中国修女多多往来……至诚相待，慈爱相处，审慎持重，持之以恒，这样你必能赢得中国女子的心。有时她们城府很深不甚坦率，这只是由于她们意志薄弱，并非出自本质，你应该象慈母一般爱护她们、提高她们。母亲要看到自己子女未来的成就，而子女目前的缺点只归因于她们年龄小、没有经验以及身体衰弱；或归因于女佣和奶妈，总之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不该归罪于子女的本质。这个本质是可能被引上尽善尽美的最高峰的”。<sup>①</sup>

1873年9月8日，三名第一批献堂会修女，弥撒后发了忠于服务教会和忠于托管事业的誓言；第二天，她们动身到各

---

<sup>①</sup> 见《拯亡会修女传略》，第327页起。

自的岗位；从此，这些助手们的英勇的史实将融合在各堂口传教士的历史之中，我们行将看到神父们常把传教的成就大部分归功于献堂会修女。

同年11月15日，第一批拯亡会初学发了初愿；乘此机会，圣母院的华丽圣堂也行了开堂礼。第一批本地修女经受的艰巨考验，并不亚于欧洲的初学修女。圣母院每年收录的上百个弃孩，已足够使她们有立功修德的机会了。1873年的报告中提到：“几乎所有好天主的特宠者都是自然的失宠者。人们往往把残废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孩子送给我们。教外人不懂得母爱，他们送掉一个病孩好比舍弃一件废物那样。”<sup>①</sup>

献堂会或拯亡会的青年初学修女对这些被弃的婴孩都是忠心耿耿、爱护备至的，她们的老师也对她们的工作表示满意。<sup>②</sup>

圣母院给富裕家庭女孩办的寄宿学校也欣慰人心。费赖之神父在1869年记述道：“上教理课时，人们先用普通话给她们念，再用方言解释，教理课内容有福音经、教理详解及圣人行实。至于国文课，则按照她们领会的程度，讲解经典文和古文，另外还教她们写大小楷和作文，使她们能写书信和撮述一篇讲道的摘要。她们也学针线、做纸花、洗涤、缝补、熨烫圣堂用的祭服与台布，尤其刺绣神父们的祭服。这就是培育她们的全部学程。在圣母院学习两三年之后，她们回家或回公所（堂口）；有的结婚了，有的则当教师，给小女孩教经教书，给妇女和女望教者讲解教理，管理堂口和公所的事务。有时她们

---

<sup>①</sup> 见《圣心玛利亚姆姆传》，第334页；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57页起。

<sup>②</sup> 见《中国通讯》，1873年，第64、67页起。

得往返奔走,为的是去给教外病孩付洗。圣婴善会的年刊上,经常提及天主怎样多次祝福了她们的牺牲精神。”<sup>①</sup>

圣母院一开始,自然即成为徐家汇及其附近地区的许多女教友们宗教生活的中心地。这些从全国各地逃难来托庇于法国旗帜下的教友家庭,<sup>②</sup>对教理是一无所知的。为了补救这种情况,圣母院一开始就立了三个教友善会,徐家汇之所以成为热心堂口,就是靠这些善会起的家。第一是母亲会,取名真福格拉物尔教理会;每主日的下半天,女教友和女保守都来圣母院集合,听讲主要的信德道理,让坐在她们中间的初学修女解答问题<sup>③</sup>。1873年,参加讲座的共有五千四百零八人次。<sup>④</sup>

第二善会和第一善会类似,称圣女斐落默纳会,是集合本会口女青年的集会。斐落默纳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拯亡会热爱的阿尔斯本堂神父而起的。<sup>⑤</sup>这些女青年,每星期来圣母院学习两三次经言,聆听一段《圣经》诠释或圣人行实;1874年加入这个善会的有二百零三名女青年。<sup>⑥</sup>

由拯亡会修女与本地献堂会修女管理的徐汇本堂区的走读小学——外学堂,虽经多次教外人的竞争,教友人家的小女孩还是很快地集合起来了。<sup>⑦</sup>1874年,有五十三名小女生。学

---

① 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62页。

② 见本卷第71页。

③ 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66页。

④ 见《中国通讯》,1873年,第67页。

⑤ 阿尔斯本堂神父圣维雅内是拯亡会创办时的赞助人,他生前崇敬圣女斐落默纳。——译者

⑥ 见《中国通讯》,1874年,第277页。

⑦ 同上,1873年,第66页。



生们读书、读经，修女们用挂图来讲解教理问答与古新史略，作为当时的基本教育。<sup>①</sup>

还有 1872 年创办的圣婴会施诊所，不到一年，已有三千六百十六人次的诊治与二千六百四十一人次的施药。<sup>②</sup>

《中国通讯》的编者写道：“圣婴会施诊药房有两项显著的成绩：给修女们增加了病危婴孩付洗的机会，减少了中国教外人士对天主教的一切反感情绪。”<sup>③</sup>

施诊所的墙上挂满了介绍教理的各种挂图，所内常驻有一名拯亡会的本地修女，给发问者解答问题；1873 年至 1874 年间，教外妇女来询问教理的达二千四百二十一人次，她们或多或少受到了些宗教教育。<sup>④</sup>

前面我已经讲过，我们虽然对徐家汇的教外人做了那么多的热心与仁爱的的工作，但归化的教外人还是很少。1873 年 5 月，开了一所保守学堂，有三十九名女保守，其中九名领了圣洗；次年有二十一名女保守，十八名录取入教。<sup>⑤</sup>从此，圣母院就偏重对教友们成圣成贤的内修工作，对劝化教外人、争取教外人的工作则减少了。

圣母院也象徐汇公学和土山湾一样，接待路过上海的西欧名人。他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布内男爵说：“那位年轻的院长姆姆，德容道貌，和蔼可亲，她自然优雅地招待我们

---

① 见《中国通讯》，1874 年，第 66 页。

② 同上，1873 年，第 70 页。

③ 同上，1873—1874 年，有二十四名小孩和一名成人在施诊所领了洗礼。

④ 同上，1873 年，第 71 页。

⑤ 同上，1873 年，第 68 页；1874 年，第 228 页。

入室参观。她讲的法语完全是巴黎近郊圣日尔曼区的口音，她似乎跳出繁华之地，把自己淹没在这里的一片寂寞之中，牺牲她最美好的岁月与健康，也许连自己的生命，为了圣召赋予的严峻使命，她艰苦地工作着……这些由家人送来或被从路上拾来的苦孩子却找到了从天涯另一个角落赶来救她们的母亲。”<sup>①</sup>

拯亡会在 1873 年开办的洋泾浜若瑟院的工作，却又是另一种事业。<sup>②</sup>那时，拯亡会修女在该地进行的是偏重对租界上欧侨妇女的工作。若瑟院开了一所若瑟学校，该校第一年开学时只有十八名学生，放学时却增加到了四十名。几个好奇的耶稣教妇女前去探访，由于受到修女们很好的接待，竟大胆要求修女们给她们教授法语与音乐；这样，这些太太们就分成七人与八人两个小组；随之而来的探访者，也很快地和法国修女们建立了友谊。其中一位对修女们说：“看到你们的忠心服务，广行善举以及你们接待众人的一片不辞辛劳的好心，我不能相信你们是走在错路上。而最使我钦佩的，是你们笑颜常开，证明你们是真正幸福的人。”

麦克利恩小姐曾在中国与日本传教多年。她是米尔德梅差会的一名女执事，她在 1875 年宣誓回归天主教一事，在上海曾轰动一时。最触及她灵魂深处的是因为她亲眼看到洋泾浜女修院充满着幸福与和平。她说：“一个妇女团体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而生活得又如此幸福，那只能来自她们自称已掌握的唯一真理。”1875 年 12 月 24 日，在没有任何大礼的情

---

① 见于布内：《周游世界记》，第 2 卷第 247 页。

② 见本卷第 208 页起。

况下，洋泾浜若瑟堂接受她改进了天主教。许多耶稣教徒以为天主教神父们对这位名震一时者的宣誓归正，必将大张旗鼓地举行盛大仪式。所以他们都拥到天主堂来，想看麦克利恩小姐在弥撒中领受附有条件的圣洗礼。当他们一知道数小时前他们的女执事，现已成为天主教教友时，他们就大失所望，沮丧而散。<sup>①</sup>可惜，麦克利恩小姐没有持之以恒；由于她反复无常的性格与判断能力的薄弱，认为天主教的教义教规对她心灵负担太沉重；不久，她又回到了耶稣教。<sup>②</sup>

从第一年开始，修女们就让这些学生参加音乐与文艺表演；演出非常成功，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好。1874年2月，七十位几乎都是基督教教徒的太太们观看了十五名女孩子的初次表演，一致赞扬演出成功。翌日，一位观看演出的耶稣教女传道在上海英文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赞扬的报道；接着就同修女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位女传道竟要求修女们教她怎样按照圣依纳爵神操书来作默想。

这些女学生坚持参加学校的集会，她们从不缺席。1875年，英国海军上将邀请她们到军舰上参加舞会，被邀请的几乎都是若瑟学校的女生，由于她们要参加姆姆那里同日召开的集会而拒绝邀请，军舰上的舞会只得改期。该校学生多半是耶稣教教徒，同学中只有十四、五名是天主教教徒，她们是规定要上圣堂行公共敬礼的，而耶稣教学生则可去可不去。不久，她们几乎全体要求参加天主教的教礼，并参加了咏唱队。1875年5月，这些青年耶稣教教徒把许多最美丽的鲜花供到

---

① 见《神学院》，1876年，第49页起。

② 见柏立德：《日记》，1877年5月28日；《耶稣会法国省历年函牍》，1874—1879年，第361页起。

圣母圣像前，在圣体降福时，她们也全体跪着。当她们患病时，她们也要求天主教老师前去探访；这样，修女们就开始同许多有势力的大家庭有了来往，关系很好。从最初几年起，洋泾浜修女们把许多天主教青年妇女及女青年引向天主，有的就在上海修会里成了修女们的接班人。<sup>①</sup>

这些工作“虽全出乎忘我精神，但对外界究竟太招摇了，这不适合拯亡会的惯例，然而修会的生存，必须维持这种惯例”。<sup>②</sup>所以一开始，同时就办了另一项更低微而不久即获得大安慰的工作。

在若瑟学校的女生中，有许多欧亚混血儿；在社会上，在学校里，她们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1875年，拯亡会为她们创办了上智学校，向她们授以初级的文化知识并更多地教以种种手艺，使她们将来谋生的道路更宽。例如：当保姆、服务员、女管家、商店营业员等等。该校两个第一批学生是上海跑马场场长的女孩，后来她俩都进了高等学校。1876年年底，上智学校已有四十二名学生，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参照我们法国寄宿生的章程。不久，两租界的领事馆和工部局、公董局就常把父母双亡的或父母行为不正而被遗弃的无依无靠的苦孩子送来上智学校。

最后是洋泾浜圣母院，主要集合许多教内外的中国妇女，由一位拯亡会本地修女保禄米基管理；另外还办了一所兴旺的小学，专为教育附近的孩子。

法领事葛笃先生和领事夫人都曾慷慨地捐助，鼓励了这

---

<sup>①</sup> 见《中国通讯》，1873年，第76页起；1874年，第229页；又1875年教务工作报告（《徐档》，卷宗E42）。

<sup>②</sup> 见《圣心玛利亚姆姆传》，第562页起。

些初创的事业。他认为这些事业对法国的声望和天主教的传教事业都很重要。1875年2月,这位领事在观看了学生的游艺会后,请这些小演员和小朋友们吃了一顿很好的点心。<sup>①</sup>

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成了洋泾浜圣母院的施恩者,有些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1878年4月,在若瑟学校学生为上智寄宿学校举行募捐游艺表演会后,一名推小车的车夫,把一只沉重的木箱子放在修女们的门房里,箱内有银洋二千圆,分二十筒;由于他没有具名,至今没法得知赠予者为谁。箱上只简单地写着“给穷苦的女孩们”。<sup>②</sup>

我叙述这些拯亡会修女在上海和徐家汇所办的事业,使人们理解了教区常年通讯的编辑提出的非常正确的意见:“我们的常年通讯应包括拯亡会修女事业的报告,她们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这些勇毅的修女为教区所作的贡献很大,不能让它默默无闻。”<sup>③</sup>

我们已经看到了当时称为法国医院的初创史。读了创始人德若丽娅修女的书信后,使我们了解这项工作的种种特殊困难以及由于修女们的尽职忠诚、服务细致,加上她们内心的欢乐,终于使她们战胜了一切。<sup>④</sup>修女们对几乎尽是英国人而又是耶稣教教徒的病人平易接近,使他们感到惊奇。院长修女记述道:“我们的病人举止很得体,很有礼貌;他们对我们的护理工作以及对他们的爱护都感到惊奇;他们不能相信我们

---

① 见《圣心玛利亚姆姆传》,第564页起。

② 见柏立德:《日记》,1878年4月9日,第80页起。

③ 见《耶稣会法国省历年函牍》中《法国、中国传教区》,1874—1879年,第109页。

④ 见马佐:《北堂女英雄》,第7章第149页起。

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爱天主的缘故。”

修女们与病人们的接触往来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大部分病人是耶稣教教徒，而且牧师们也曾指示医院的管理人员，要他们一再密切注意一切形似改宗劝教的活动。“我们祈祷着，我们忘我地服务着，我们不时向他们散布一、两句好话，只让天主的圣宠来获得成果。”必须相信，这种方式很有成效；因为不久，当各派耶稣教教徒联合起来攻击修女们和访病的洋泾浜神父时，这些身受医院治疗的老病员，却负起了保卫他们恩人的责任，使这些攻击平息了下去。<sup>①</sup>

修女们主要的老病号是各种战舰或商船上的水手以及1868年至1875年英法联军在上海逗留时的士兵们。德若丽娅修女在书信中作了许多生动的描述。病员中“法国人是些大孩子，他们时常口出粗话，对宗教也不虔诚，随口叽咕，常有意作弄别人；而他们又是那样的乐观、滑稽、正直、好心，真令人不能不钟爱他们”。爱尔兰人则是另一种印象，“他们简单朴素，热心虔诚；当法国人说笑戏玩时，我们的爱尔兰人正在念经祈祷”。8月15日那天，医院里一些康复得快的疗养者，把小圣堂装饰得特别华丽，好让修女们意想不到；当看到修女们喜出望外时，“他们就象顽皮的孩子，围在修女四周蹦蹦跳跳起来”。

由于修女们细心护理照顾病人，使租界上外侨的健康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在这以前，由于外侨投医无门，往往造成了大量死亡。德若丽娅修女欣然写道：“瘟疫和流行病在我们的面前退却了，仰仗天主的帮助，我们轻而易举地几乎治

<sup>①</sup> 见本卷第283页。

愈了全部病人。”

据医院办事人员报告，<sup>①</sup> 1864年至1878年，先是六名，后来增加为十名修女，1867年起由修女们负责医院。她们护理了五千一百三十七名病人，<sup>②</sup> 其中二千二百七十八名是耶稣教教徒，一千四百三十九名天主教教友。<sup>③</sup> 病人大部分是英国人，其次是法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

前面我已经谈到了医院的领导权问题。<sup>④</sup> 1877年，医院的行政管理由股东会转到了上海的全体董事会。同年，医院搬到了虹口美租界。<sup>⑤</sup>

创办人明文规定，医院只收欧美病人，中国病人一律不收。因此，德若丽娅修女一心要盖造一座照料本地病人的附属医院。当她一透露自己的愿望，欧籍病人立即劝募经费，帮助修女们成此善举。一个爱尔兰士兵首先捐献了一百五十法郎。法国水兵未能抢先，却后来居上，而且显得更为慷慨。以后又募捐到租界。人们举行音乐会、义卖和认捐活动，庆贺成功。当时上海的太太们除了两位外，其余都是耶稣教教徒，在一位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太太的带头下，劝募工作做得非常热心、卖力。贫穷的店员伙计们把加班加点的额外所得捐给修女们；女工们则参加义务劳动，做了不少喜人的小物件，当作义卖品。<sup>⑥</sup>

---

① 见《上海公济医院报告》，高龙馨神父曾转载于他的《江南传教史》，第610页起及附录七。

② 1864年与1866年的数字没有记录。

③ 从1868年开始，人们才标出宗教上的区别。

④ 见本卷第283页。

⑤ 1877年的《上海公济医院报告》，见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611页。

⑥ 马佐：《北堂女英雄》。

在郎主教任期内的最后几年中，专收中国病人的安当医院开办起来了。在倪怀纶主教时期行将看到慰人的进展。德岩丽娅修女不曾见到这个新兴事业的建成，她已被任命为中国巡回使姆姆的参赞前往北京。在那里，她住了三十多年。1900年北堂被围时，她荣获了英雄服务的花冠。<sup>①</sup>

#### 四、教区东部

浦东 浦西 苏州 常州 崇明 海门

在郎怀仁主教任期内，教区的人名录，又恢复了已停用的教区东部与西部的名称。

教区西部包括安徽全省和大江以北的各总铎区；教区东部包括长江以南各地区以及崇明与海门。教区东部几乎全是老教友，西部则为新教友区，因而传教方法各有不同。

关于教区东部的史料留存的不多；在骇人的叛军战事之后，传教士又重新干起许多细小而有效的工作，这点我在上面已叙述过；教区有许多工作要整顿，但人们想到法国军队对上海城曾帮过大忙，神父们又慈善地接济过难民，因此整修工作进行得很顺利。<sup>②</sup>

郎主教在他体力所允许的情况下，很愿为教区的整修工作贡献一份力量。经过充分准备的主教行坚振巡访，为许多总铎区，真是一个重振教友精神生活的良好机会。

---

① 乌佐：《北堂女英雄》结论部分。

② 《南京教区通讯录》，第2卷第115页。



1868年，主教先到松江府去巡访。当年该区总本堂杜若兰神父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我扼要地复述一下，很能说明郎主教行动的用意及其巡访所取得的成果。<sup>①</sup>

郎主教前去巡访的几座堂口，共有三万五千名教友；十二位神父为了主教巡访时能很好地合作，给教友们做了准备工作：如听告解、给要领坚振的教友讲教理等。

1868年2月18日，主教巡访开始了。下午二时，主教到了第一个巡访站。这是一座四周围有十四只小会口的比较大的中心堂口；在那里，主教预定驻留两天。“堂口办事人穿着盛装礼服，他们后面跟着一批好奇的群众，簇拥到主教船前或坐轿前迎接，一时乐队丝竹齐奏、鞭炮共鸣，向周围民众报告主教大人的驾临”。圣堂大门口竖起了彩牌楼，主教穿着主教红色大礼袍，在堂门口，本堂神父给主教呈上十字苦像，主教口亲后，本堂神父向主教运香，再呈上圣水帚，主教洒圣水，祝福在堂教友，然后到达祭台前，咏唱祝文并颁赐四十日大赦，并向教友们宣布他此次巡访的目的。迎接礼毕，办事人把主教带到寓室，向他呈报各个会口的情况。伴随主教的神父们整个晚上留在堂内听教友们的告解，甚至直到深夜，因为每个教友都愿翌日在主教手中得领圣体。翌日清晨，教堂已被夜间不能进堂的女教友们包围，神父们又忙着听她们的神工。大约七八时许，本堂神父和辅祭人等率领办事人列队去迎请主教进圣堂……这时，圣堂内男女教友正分组高声朗诵中国经文。行列到弥撒间，主教登宝座作献祭准备；接着，主教头戴高帽，手执权杖，向台下众教友训话，接下来举行坚振礼。因为主教五

<sup>①</sup> 《南京教区通讯录》，第6卷第210页起。

年只巡访一次，因此领坚振的人特别多。坚振礼毕，主教再作第二次训话后才开始举行弥撒。这台弥撒一般只是一台小弥撒，由教友们朗诵，更确切地说是高唱弥撒规程；主祭朗诵福音经<sup>①</sup>后，由一位神父讲道……接着就是给要在主教手中领圣体的数百名教友送圣体。弥撒礼毕，主教给在堂教友颁赐宗座祝福及全大赦。宗教礼仪结束时已近正午了。

郎主教身材高大，体格健全，相貌堂堂，在行宗教礼仪时更显得尊严庄重。这种外表仪态为教内教外人已是一种布道，一种宣传。主教谢圣体完毕，便被引请到接待室；在那里，许多教友都来向他谈谈自己和亲友们的家常事。在这些热心人中间，有许多人主教是早已熟识的。

下午两三时，主教又进堂，考问孩子们的经言要理。堂中央搭着追思台，教友们在念着“已亡日课”；主教在考问孩子们教理后，即为会口中的亡者举行追思礼；直到晚上，主教才得略事休息。

这时，大部分神父已离开第一只堂到第二只邻近的堂口，作迎接主教的准备工作；主教同两三位伴随他的神父留在第一只堂口。第二天，主教做了弥撒，最后一次祝福了教友后，堂口办事人便恭送主教上船或坐轿，到主教要去巡访的第二只堂口，那里的神父教友再用同样的礼仪迎送主教。

郎主教在这次巡视中参加了一次纯中国式的祝寿大会。当时，余山山麓各会口的教友们正在给一位多年为这些会口服务的老神父祝寿。这位老神父就是在教区的本地神父们同

---

<sup>①</sup> 福音经是指弥撒中，主祭在台左朗诵当天新经中的一个规定的片段，紧接上是布道，题材一般就采取当天所念的圣经。——译者

罗伯济主教闹纠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沈玛窦神父；他曾因不服从罗主教<sup>①</sup>而一度被摘权，继而他屈从了教区的新制度，即恢复了神权。1868年，人们给他做晋升司铎五十周年的金庆；郎怀仁主教被邀请主持4月30日的祝寿大庆。早上，主教同这位可敬的寿翁光荣地举行了大礼弥撒。接下来便是一顿丰盛的宴会，附近教友几乎全部被邀请入席。宴会共用了一千斤大米，宰了二十头猪。郎怀仁主教赠送给老神父一只精制的圣爵作纪念，老神父通过郎主教，献给教宗一百元银洋。<sup>②</sup>

佘山朝圣的创始以及松江天主堂住院的收回，<sup>③</sup>在浦西的天主教教友看来，是最值得重视的大事。

虽然由于法国的种种帮助为天主教传教士带来不少好处，但中国人民与教会的对立情绪，尤其在文人势力较大的城市，并未因此而消失。1864年2月，在嘉定县发生的事件证明人们决不能在有隐患的稳定状态中高枕而卧。有一位中国神父，按照天津条约第十九款规定，在近城的钱塘镇买进了一方为建造圣堂与孤儿院的土地。嘉定知县命令废除契约，归还地价银，借口说外国人不得居住内地。神父们便向上海署理领事喇慕呼吁，领事便走访上海道台。道台推说是北京新来的指令禁止他干预其事。喇慕先生说：“如在两天之内不得解决，我将带大队人马亲赴嘉定去料理。”当时驻在徐家汇的“和风”号的一小分队海军接到了准备出发的通知，小分队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出征。道台看到事情恶化，马上表示道歉，命令嘉定知县让步；就在这支小分队即将出发的前夕，道台答应了一切要求。“和风”号水兵们因不能出征而大失所望。

当时在浦东，传教士们在书信中用大量篇幅记叙了为纪

① 见本书，第1卷第96页。

② 见本卷第214页；《南京教区通讯录》，第1卷第28页。

③ 鲍伯尔神父1864年10月16日信，见《通讯》，第5卷第176页。

松江、浦南、佘山负责人员名单

	松 江	浦 南	佘 山
1864—1865年	陆我春 罗礼恩 顾斯恭	宋永誉 龙在田	利庸乐 熊臣尧
		康治泰 沈玛竇	蒋超凡 卫德宣
1865—1866年	陆我春 龙在田 马义谷	葛宗默 顾思恭 夏祝三	利庸乐 蒋超凡
		康治泰 熊臣尧	南志恒 卫德宣

松江、浦南并成一区属于一位地区会长

1866—1867年	杜若兰 蒋超凡	葛宗默 沈玛竇	夏祝三 马义谷	龙在田 顾斯恭	卫德宣
1867—1868年	杜若兰 熊臣尧	沈玛竇 顾斯恭	龙在田	蒋超凡 张星伯	卫德宣
1868—1869年	杜若兰	柏立德 沈玛竇	曹廷桂	张星伯 熊臣尧	卫德宣
1869—1870年	利庸乐 熊臣尧	柏立德 陈士谦	倪怀纶 许采白	沈玛竇 曹廷桂	张星伯
1870—1871年	利庸乐	德怀璋 倪怀纶	李问渔	龙在田 曹廷桂	沈玛竇
1871—1872年	利庸乐 伏日章	柏立德	程先民	龙在田 曹廷桂	沈玛竇
1872—1873年	利庸乐 曹廷桂	伏日章 柏立德	李问渔	倪怀纶	沈玛竇
1873—1874年	利庸乐	柏立德 程先民	沈玛竇	曹廷桂	沈则信
1874—1875年	富守和	顾福格 毕大民	程先民	沈玛竇 曹廷桂	沈则信
1875—1876年	富守和 金士乔	葛宗默 朱 梁	德怀璋 沈玛竇	毕大民 宝维善	程先民
1876—1877年	富守和 曹廷桂	应儒望 沈玛竇	程先民	季增爵 金士乔	朱 梁
1877—1878年	富守和 曹廷桂	许采白 沈玛竇	宝维善	唐际虞 金士乔	朱 梁
1878—1879年	帅维则 朱 梁	许采白 曹廷桂	郁炳蔚 沈玛竇	倪栖梅 唐际虞	金士乔

原注：1875—1876年起取消地区会长，只称总本堂。

念费都尔神父而建立的钱家天主堂四周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郎主教乘祝圣新堂的机会，邀请法国领事、许多法国海军军官以及地方上主要官员和绅士团聚一堂，共庆典礼。在大礼中，主教郑重指出，法国传教士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和平。<sup>①</sup>

这次庆祝功效绵长，这是教友绅上钱景楠想出来的好主意，他真是一位辅助传教的宗徒。在1868年12月8日瞻礼后几个月，钱家天主堂的本堂神父写道：“我们做了圣母圣心敬礼，真是何等壮观！教友济济一堂，不下两千多名；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三百名领圣体，五名成人领洗；在圣母月内，圣母圣心会的会友付洗了一百多名婴孩，到处神火炎炎，虔诚出众。钱景楠为人简朴，满腔热忱，实可钦佩。”耶稣圣体瞻礼，举行了盛大的恭迎圣体礼仪，天主教给了地方很大的生命力。圣体公然在大街小巷游行，一路锦帐绣幔，彩旗鲜花；本堂区的各村各镇都派代表参加，许多教外人也怀着敬意赶来观礼，他们同教友一样，圣体过处跪地叩拜。<sup>②</sup>

但教外人的归化进教依然寥寥无几；因为教士们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致力于教友们的神修与叛教者的归正运动；1868年至1869年，康治泰与德怀璋两神父满心喜悦，因为他们已带领了五百多名叛教者回归圣教，重守教规。<sup>③</sup>

从那时起，人们已注意到唐墓桥四周各会口的特殊情况；这座人口密集的堂口，方圆只有三、四华里，教友又很虔诚，小堂常常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原想盖造一座大圣堂，按法国那样

---

① 见本卷第171页。

② 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110页起。

③ 同上，第102页。

作为中心教堂,使附近教友保证能望到主日弥撒。<sup>①</sup>可是当时会口很穷,一时还不能实现这个计划。

1874年,教区在文苑集中的苏州城成立了一个汉学研究中心的中心研究所。晁德莅神父就在那里为他的精心著作搜集到许多丰富的资料。<sup>②</sup>

伊宗尹与徐听波两位神父成功地收回了江苏省省城的神父旧住院,为其他地区的收回教产开辟了道路。<sup>③</sup>在这被叛军蹂躏最严重的地区,半数以上的公所遭到破坏,由教区自费重

①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2卷第117页。

#### 浦东教士名单

	浦东北部	浦东南部
1864—1865年	伊宗尹 伏日章 吴德孚	谷振声 薛孔昭 杜若兰
1865—1866年	杜若兰 伏日章 葛宗默	晁德莅 薛孔昭 吴德孚

#### 南部、北部并成一区

1866—1867年	晁德莅 康治泰 利庸乐 德怀璋 桑理爵 吴德孚
1867—1868年	利庸乐 康治泰 德怀璋 桑理爵 吴德孚
1868—1869年	胡国治 康治泰 德怀璋 马义谷 吴德孚
1869—1870年	杜若兰 康治泰 德怀璋 吴德孚
1870—1871年	杜若兰 康治泰 柏立德 吴德孚
1871—1872年	杜若兰 康治泰 夏祝三 李问渔 季增爵 吴德孚
1872—1873年	步天衡 康治泰 夏祝三 季增爵 吴德孚
1873—1874年	禄理格 潘如汉 夏祝三 季增爵 吴德孚
1874—1875年	禄理格 潘如汉 夏祝三 季增爵 吴德孚
1875—1876年	禄理格 潘如汉 夏祝三 季增爵 杨振馨 蒋超凡 龙在田
1876—1877年	谷振声 施方礼 德怀璋 夏祝三 吴德孚 杨振馨 蒋超凡 龙在田
1877—1878年	谷振声 季增爵 吴德孚 夏祝三 杨振馨 蒋超凡 龙在田
1878—1879年	康治泰 葛宗默 季增爵 吴德孚 杨振馨 蒋超凡 龙在田

1866—1867年和1874—1876年两区由一位地区会长管理;1875—1876年只剩下一位总本堂(区会长名称取消);张玛塞禄神父在1864—1865年曾在浦东传教,1866年死于浦东。

② 高若天1874年9月11日致总会长贝克斯信,见《中总》,第4卷第5章第14页。

③ 见本卷第157页。

新修建，这反而使神父们从堂主堂董们的种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常熟附近的塘角，昆山附近的菘葭浜<sup>①</sup>，尤其是郎主教特别关心的会口，不久都成为许多热心教友的中心会口。<sup>②</sup>

建设一座新的传教据点是很艰难的，这里记叙一名女教友怎样慷慨忠诚、艰苦奋斗地发展新据点，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利庸乐神父的详细记叙<sup>③</sup>告诉人们，当时在地方官绅的恶势力下，传教士是怎样获得或收回传教据点的。多年来，松江区会长利庸乐神父常想在太湖边上为松江和苏州两总铎区内经常流动的渔民教友设立一所中心会口，洞庭山看来最为适宜，然而那里的绅士们的反对洋教的狂热也是最出名的。利神父决定派一位昆山人，即当时住在徐家汇的新教友，名亚纳周刘氏的孤孀，先去给教士开路。她懂得治疗幼儿病，受过很好的训练。因此，神父希望她在医学上的专长能有利于她与老百姓的接触。

这位女教友去洞庭山，真是作出了莫大的牺牲。她不但要忍受一切由教外绅士们策划、煽动的，明的或暗的迫害，而且要一连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精神上得不到象在徐家汇那样充裕的宗教上的帮助。这位勇敢的妇女竟毫不迟疑，一口答允。1871年9月，她坐船到了洞庭山。她想租一间房屋，但房东们都拒绝，因为绅士们预计她此次肩负的使命，早已对

---

① 今改为昆山陆家浜。

② 多年来任苏州总本堂的罗以礼神父记下了这段开教史的细节，发表在1865年的《江南通讯》，见《徐档》，卷宗H4。

③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1卷第116页起；著名汉学家黄伯禄神父自1872年起曾任该地本堂，也曾写了详细记录，存杨家桥苏州总铎的档案中。我从这两个记录中摘录下来，相互补充。

房东们施加了压力。那时，正巧镇上有一家富户的小孩患了重病，来请这位女教友去诊治；她开始有些犹豫不决；心想如果孩子服药而死，定将被控为庸医杀人，那么一切创业计划全部落空；但她信赖天主上智的信心胜于一切，接受了富户的邀请，并医好了病孩。富户非常感激，不顾绅士们的威胁，协助周刘氏先租借，后买进了一座合适的住房。1872年1月，利庸乐神父又鼓励周刘氏按法律手续，照规定接收了一幢有五间房间的屋子。她手捧圣母像，由许多焚香执烛的外教男女伴随着一起进屋；邻居还替她安置了家具，装饰了房间；她多次神奇地给人治愈疾病，比她的祈祷与药物更能博得人们的好感。果然，不出利神父所料，在太湖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教友不久都到洞庭山公所来了。这位慷慨的女创业者在他们中间做了许多传教工作。1872年1月底，苏州本堂神父黄伯禄到这所新公所做了弥撒；韩伯禄神父在采集植物标本时，也曾于3月间在那里逗留过一段时间。

这些成就当然不能不激怒教外绅士们；不久，人们得悉他们正准备对公所进行一次袭击。为了先发制人，黄神父于1872年4月初在四名苏州教友的陪同下来到了洞庭山。他的来临更激怒了地方官。1872年4月2日晚上，地方官派衙役前来通知神父和周刘氏，叫他们第二天必须撤离洞庭山，黄神父当然拒绝了。第二天，他亲往衙门与地方官交涉。许多绅士早就围绕在地方官左右，神父给他们读了天津条约与北京协定给予的权利，并声明教区决不会让步。地方官不敢向神父下手，只把卖主和中人扣押上了枷，因为周刘氏通过他们才能买到房屋；地方官还拿出由绅士们凑合的赎屋价银，借口说地方人民不要洋人，当官的不能拒绝民意。面对这种情况，总



本堂潘如汉神父自来支持本堂神父，一连好多天住在公所，给许多好奇而来的教外群众宣扬圣道，讲解要理。由于神父们态度坚决，地方官和绅士们终于妥协了。苏州的藩台大人原是潘如汉神父的老朋友，他就从中打了圆场，于是，周刘氏保住了这座房屋的所有权。1874年，她又买进邻近房屋，把公所扩大了。这位勇敢的女教友真是历尽种种艰辛；从徐家汇来与她同住的母亲以及一个女佣人，看到这种情况，认为不可久居，都离她而去。但她总不心灰意懒，在困难面前始终表现得很坚强。1880年底，她得急病而死。她为了开教，真可谓是鞠躬尽瘁的了。她留下遗愿，不要与教外亡夫同葬，而宁肯安葬在由她大胆开创的洞庭山圣堂之旁。墓上竖有十字架的石碑，碑上刻有黄伯禄神父写的一篇墓志，留作后人纪念。<sup>①</sup>

早在1847年，康熙皇帝御赐苏州教友的旧公墓顺利地归还了。原来这墓地之所以使全体教友和神父们特别留恋怀念，是因为那里除葬有许多神父、教友外，还葬着江南主教区最后一位旧耶稣会会士南怀仁主教。1877年，人们把南主教的坟墓加以重修，竖了大理石墓碑，碑上刻有中文与拉丁文的墓志。<sup>②</sup>

在郎主教任期内，常州府教务进展也很快。葛必达与桑理爵两神父曾引导两千多名望教者学习教理，后因叛军战事而中断。1870年后，郎主教命人在江阴城内造了一座圣堂和神父住院，教堂四周汇集有许多新教友。

---

<sup>①</sup> 引自黄伯禄神父札记及宝维善神父日记，保存在杨家桥的苏州总铎区档案内。

<sup>②</sup> 拉丁原文见柏立德：《日记》，1877年4月2日。

在叛军战乱的考验中，无锡的网船教友对信仰显示了出奇的忠贞；在三里桥小村的小堂边，竟聚集了近三千多名教友。1872年，郎主教给他们造了一座教区中最大的圣堂并附设了男女学校。从此，他们的子女能受到全部的宗教教育。1873年，郎主教到常州府巡访，并在无锡三里桥三千名教友前举行弥撒，庆祝耶稣圣诞。<sup>①</sup>

当时，人们多方设法想把教务开进常州府城，可是没有成功；因为城里的绅士们已组织了一个反洋教的联盟，所以谁也不敢出租或出卖土地给传教士，怕这些绅士们报复。神父们只得在城外教友船只往来频繁的运河边，造了一所朴素的公所。<sup>②</sup>

1875年的教难期间，我们已经看到，<sup>③</sup> 为了保持信仰，无锡的网船教友决不背教，他们既不怕充军，也不怕倾家荡产，受尽了种种磨难。

崇明与海门由于土地贫瘠、老百姓穷困，因此太平军没有光顾，神父们也因此能照常工作。在郎主教任期的最初几年，海门本堂卜理奥神父已在两个重要城镇建立了两所堂口。在盛产大米与棉花的和有许多庙宇而著名的如皋县，人们希望也能有一座钦崇真主的天主堂。后来，卜理奥神父结识了一位前制台衙门的老官员，凭这个关系，就不再害怕仇恨并拒绝洋教士的绅士们了。这位老官员暗中把自己的房屋售给传教士，当他们把一切手续办完后，1868年3月19日圣若瑟瞻礼，卜理奥神父亲赴如皋拜访了知县，报告知县他已来县定居，并把护照给他验看。这所新买的屋顶上竖起了十字架，一位教友老医师就在那里开始施诊给药，大受贫病者的欢迎。城中的绅士与文人虽向知县抗议，但也不起作用，因知县对上海

新近发生的一些情况很了解，因而自己也不愿同洋人产生什么纠纷。因此，虽然神父受了不少屈辱，但如皋的神父住院终于保存了下来。④

①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1卷第22页起；第2卷第71、98页起。

② 见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318页；又他的个人回忆，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2卷第81页起。

③ 见本卷第245页起。

### 苏州与常州的教士名单

	苏 州				常 州		
1864—1865年	桑理爵	张星伯					
1865—1866年	桑理爵(镇江)	张星伯(苏州)					
	兰廷玉(常熟)						
1866—1867年	伊宗尹	宋永誉	兰廷玉		罗礼思	叶春荣	
1867—1868年	伊宗尹	宋永誉	顾福格		兰廷玉	叶春荣	
1868—1869年	伊宗尹	范世熙	顾福格	宋永誉	兰廷玉	叶春荣	
1869—1870年	顾福格	宋永誉	黄伯禄		兰廷玉	潘如汉	
1870—1871年	晁德莅	宋永誉	黄伯禄		潘如汉	叶春荣	
1871—1872年	潘如汉	许采白	卫德宣	顾斯恭	叶春荣	高龙馨	
1872—1873年	潘如汉	宋永誉	顾斯恭		沈则恭	叶春荣	滕伯禄
1873—1874年	谷振声	宋永誉	许采白		沈则恭	叶春荣	滕伯禄
1874—1875年	谷振声	晁德莅	陶斯咏	宋永誉	沈则恭	叶春荣	滕伯禄
	许采白						
1875—1876年	谷振声	薛孔昭	宋永誉	严思愠	叶春荣	沈则恭	滕伯禄
	张星伯				黄斐烈		
1876—1877年	宋永誉	顾福格	严思愠	张星伯	潘如汉	沈则恭	葛宗默
					黄斐烈		
1877—1878年	潘如汉	顾福格	宋永誉	田云梦	彭安多	葛宗杰	沈则恭
					叶春荣		
1878—1879年	宝维善	田云梦	龚 良	沈则恭	潘如汉	彭安多	高龙馨
					颜待尼	夏祝三	

1866—1867年，苏常两府并成一个总铎区；1871—1876年中，开头四年属于一位地区会长，第五年各属于一位总本堂；1877—1878年又属一位总本堂。1867—1868年，第一次分为两个总铎区，共持续了四年。1876—1877年又分为两个总铎区，只有一年时间。后于1878—1879年第二次又分为两个总铎区。以后就不再变更。

1871—1872年，人们打算从无锡发展到广德州。

④ 卜理奥 1868年7月2日信，见《通讯》，第8卷第247页起；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206页起。

同年年底，卜神父在他本堂区另一端的大镇上，用类似的方法造起了一座小小的住院。<sup>①</sup> 这所住院不久便成为育婴事业的中心。

与此同时，茅家镇中心座堂也建成了，然而经过了种种曲折，如：土地拥有者十分迷信，生怕卖土地给天主堂会引起家人死亡或患病；再有地方官和绅士们的反对，还有些土地找不到真正的主人等等。1868年9月14日，光荣十字架瞻礼，十字架终于在茅家镇堂顶上竖立起来了。

教外人归化较少的海门，由于创办了育婴事业，总算获得了比较好的新教友。1874年，一位传教士记述道：“目前海门总铎区约有一千五百名出身于拜偶像家庭的教友；育婴堂收养了一些被不人道的父母抛弃的婴孩；这些孩子目前已长大成人，已经组成了三百多个小家庭。”当时有人记述了许多教外父母归化天主教的动人事迹。往昔，他们在苦难的岁月里舍弃了幼小的子女，可是，由于天主教育婴堂的救援，几年以后，这些孩子已长大成人，而且都找到了体面的工作；这些心地正直的老乡们的亲身感受，为天主教慈善事业下了最好的结论。<sup>②</sup>

当时，在崇明和海门，育婴事业是教区的光荣。在郎主教之前，崇明已有<sup>③</sup> 两所孤儿院，后来在岛上又添设了三所。1872年后，光岛上中心住院的大公所一处，每年收养弃孩就在一千名以上；在郎主教任期内，有二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名教

---

① 高龙肇：《江南传教史》，第108页。

②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1卷第34页。

③ 见本卷第122页起。

外人的孩子。<sup>①</sup>在病危时,由岛上的传教士或他们的助手们付了圣洗。

## 五、教区西部

镇江 南京 安庆 宁国府

### 镇 江

郎主教在职期间,教区西部包括江苏的北部和安徽全省。从那时起,人们已多次讨论要划分另一个独立教区,但由于该

<sup>①</sup> 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322页。

#### 负责海门与崇明的神父名单

	海 门			崇 明		
1864—1865年	雷通骏	帅维则	黄伯禄	卜理奥	步天衢	
1865—1866年	卜理奥	黄伯禄	富守和	禄理格	步天衢	
1866—1867年	卜理奥	禄理格	黄伯禄	富守和	顾 颢	
1867—1868年	卜理奥	范世熙	黄伯禄	禄理格	葛宗默	
1868—1869年	卜理奥	夏祝三	黄伯禄	计雅三	葛宗默	
1869—1870年	卜理奥	夏祝三	陈显文	卫德宣	葛宗默	
1870—1871年	卜理奥	卫德宣	沈神父	沈则信	葛宗默	
1871—1872年	葛宗默	沈则恭	沈则信	富守和	姚继白	
1872—1873年	葛宗默	罗以礼	沈则信	李儒良	富守和	卫德宣
1873—1874年	葛宗默	戴尔第	李儒良	富守和	罗以礼	
1874—1875年	南志恒	费赖之		罗以礼	施方礼	
1875—1876年	南志恒	费赖之	罗以礼	顾 颢	白备德	沈则信 唐际虞
1876—1877年	南志恒	彭安多	顾 颢	白备德	罗以礼	唐际虞
1877—1878年	罗以礼	陈显文	顾 颢	白备德	沈则信	卫宣德 黄斐理
1878—1879年	罗以礼	陈显文	张孟伯	严思愠	卫德宣	顾 颢 黄斐理

地区教务不够发展,划分后还难以自立。<sup>①</sup>

叛军战事一结束,几位挑选出来的传教士即被派往这遥远的无人光顾的地区。上面我曾述及关于镇江、南京、安庆、宁国府等一些会口的开办经过。<sup>②</sup>现在我从当时神父们的书信与汇报中,摘要叙述几个富有代表性的插曲。

最初几年的传教活动在镇江、南京和安庆这三个主要中心开展之后,既然在宁国得到了良好的收获,于是有必要在这个府城成立第四个中心站。

镇江的开教事业必须归功于不知疲倦的金式玉神父,是他打下了开教的基础。当他从安徽西部艰苦地远行回来后,<sup>③</sup>他一心想恢复沿运河的许多老会口。他在丹阳买了一块土地,可是丹阳的知县出自李鸿章的门下,并执行上司的秘密阴险的指令。<sup>④</sup>知县竭力反对在他县治内建立教堂,并把卖土地给神父的卖主关进监狱。金式玉神父只得向镇江的英美领事求援;由于两位领事的干涉,镇江道台指令丹阳知县遵守条约,因而神父住院得以盖造起来,老教友们也逐渐聚居到住院周围,若干新教友也加入了教友的行列。在郎主教任职的末年,大约有四百名教友,分成四五个会口,属于丹阳住院。<sup>⑤</sup>

在镇江,因为有许多外侨与英美两国领事的帮助,扬子江

---

① 省会长德蓬尔瓦 1870 年 7 月致总会长贝克斯信,见《中总》,第 4 卷第 4 章第 25 页。

② 见本卷第 160 页起。

③ 见本卷第 154 页。

④ 见本卷第 136 页。

⑤ 金式玉 1867 年 7 月 21 日信,见《通讯》,第 8 卷第 132 页;费赖之:《1869 年的江南教区》,第 21、214 页;《南京教区通讯录》,第 1 卷第 17 页;第 2 卷第 142 页。

内又有外国军舰与商船频繁行驶,相对地来说保证了安全,使教区的重要传教工作得以开展。金式玉神父在他的住院近旁布置了一个施诊所、一所孤儿院与三所小学校。1871年,因为这些建筑四周尽是住房,无法发展,于是就搬到了租界,即目前的所在地。镇江老会口的大部分教友在叛军战乱中逃散了,新会口的教友是由外地移来或新奉教者。在这座城里,肆无忌惮的文人与商人为数不多。在郎主教任期的末年,常来教堂的教友约有三百五十至四百名。他们大多不住在城内,而是住在附近的农村里。<sup>①</sup>

在大运河畔的扬州,由于传教士缺少可靠的证明文件,只好放弃收回旧教产的要求。1865年,雷遁骏神父租了一间小屋,1866年,金式玉神父把它买了下来。小屋四周有老会口的一些残余房屋。1875年,在扬州有四百二十五名教友;1875年,耶稣圣心堂建立,1876年1月1日主教祝圣了该堂。<sup>②</sup>

在镇江、扬州与丹阳这三个传教站,金式玉神父特别靠天主教的慈善事业使人接受教理。他请了董家渡医院主任潘奥定修士到那里工作。1860年至1866年,这位好修士不仅对逃来上海的难民<sup>③</sup>做了许多好事,而且他培植了象他那样忠心服务的中国青年教友当医务人员。人们希望设在运河沿岸的新兴事业能取得同样的成就。潘奥定修士于1886年到

---

<sup>①</sup> 金式玉1868年7月22日信,见《通讯》,第8卷第265页;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273页;《通讯》,第1卷第16页;第2卷第142页。

<sup>②</sup>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1卷第13页;第2卷第125页;《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1月15日、事务工作表。

<sup>③</sup> 见本卷第83页。

镇江,把一生精力献给了镇江和扬州。<sup>①</sup>

看了他写给上级与法国朋友们的书信后,使人对他的工作成绩和工作方式有了一个概念。他开始是从精心培养几个忠心帮助他的青年教友着手的。1866年至1867年冬天,他特别探访船上的病人;几百个垂危病孩受了洗礼,就是他创业时的成绩。1867年3月,扬州与镇江的施诊所办起来了,获得了意外的成绩。3月12日,修士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来镇江已九个月了,我们医治了许多病人;每天总有好几百人来看病,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精力与时间的许可……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已治愈了六百至七百人;我们还给六百名病危的婴孩付了洗。”<sup>②</sup>

1867年3月17日,扬州开办了施诊所,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潘修士在信上说,那些可怜的病人等待施诊所开门,有时在路上等候达数小时之久。诊所门一开,他们蜂拥而入,迫使我们必须装上牢固的木栅来维持秩序。“一连数天,我们发了五百至六百张门诊券,由于没有时间,只能让许多病人空等了……这种施诊所给教外人的归化创造了条件,并已得到慰人的成绩。虽然我因需要去上海或南京,离开了几个月,可是我的助手们已给九百四十九名孩子付了洗”。<sup>③</sup>

这位好修士有个计划,他打算在教区已成立堂口的城镇中都设立施诊所,一直设立到安庆。由他培养的医务人员去管理,他自己负责视察检查。在各施诊所旁边再为望教者设

<sup>①</sup> 1866年,潘修士曾到南京护理体质很弱的雷通骏神父。见本卷第151页。

<sup>②</sup> 见《通讯》,第8卷第167页起。潘奥定修士的好几封信已汇编成集,取名:《施诊所事业——潘奥定修士》。

<sup>③</sup> 见《施诊所事业——潘奥定修士》。



立保守间。潘修士原受有超出辅理修士的教育，而且既善交际又会接待，更能循循善诱，给人们出好主意，<sup>①</sup>真配得上是一位杰出的传教先生。天主欣赏他的善意善志。5月24日，一次闪电式的霍乱传染，把这位健壮的护理修士压倒了。金式玉神父马上把他送上一艘汽船；5月27日，潘修士在到达上海之前逝世了。他只有三十九岁零几个月。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到镇江，几乎全部耶稣教教徒的欧美侨民的商行都下了半旗致哀，把他的死亡看做是公丧。这时期，教区内部的往来信札一致称誉这位内修功深，忠恳为人服务的修士为“潘圣人”。<sup>②</sup>

上述各地施诊所仍由潘修士培养的本地医务人员继续负责管理，但取得的成绩大不如前，因此潘修士生前的抱负就不能实现了。每个施诊所旁边都设有育婴堂，由在徐家汇圣母院受过培训的许多女教友、贞女或孤孀前去服务。她们宁愿背井离乡，忍受一连几个主日或几个月缺乏宗教授助的生活，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使这些被舍弃的孩子们能获得付洗神恩和公教教育。1875年，有一千二百三十一名教外孩子领了圣洗，九十一名被收养在南京教区的各个孤儿院里。<sup>③</sup>

孤儿院中的工作，不仅繁重，而且有时竟要求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干。1868年发生在镇江和扬州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sup>④</sup>

---

① 《潘奥定修士小传》，见《耶稣会法国省历年函牒》，1876年，第194页。

② 同上。

③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2卷第234、246页。

④ 叶春荣1868年11月16日致圣婴善会会长信，见《通讯》，第8卷第293页；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9页；当时英驻沪领事麦华陀先生还写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1868年8月扬州发生的攻击英国基督教教会传教士的事件，并附有当时牧师们的书信。见《英国议会文件》，4097号（1869年），第1卷第2页。

这一年，一些驻在镇江的耶稣教牧师们也去扬州建立了一个布道站。他们办慈善事业不如天主教神父们那么审慎。由于他们的冒失、不明智，也连累了天主堂。因为人民群众不懂如何区别欧洲人。8月22日，攻击孤儿院的小册子又激起了民众的愤恨，一些暴徒袭击了金式玉神父所建造的新屋。他们还打开了两具放在坟地上的装着死孩的棺材，可是他们发现死孩的眼珠和心脏并不缺少，于是，他们的愿望落空了，接着便去冲击并捣毁基督教牧师的住宅。牧师及牧师夫人们只得逃往运河边，坐船到了镇江；他们的住宅被洗劫一空。同时，扬州知府为使民众满意，贴出告示，证明对洋人的控告事属确凿，并禁止洋人再在本城出现。数天之后，镇江也孕育着一次类似的暴动。镇江道台靠了一支防守租界的满洲兵，事情才得以平息。

英法两国对他们侨民所受到的侮辱，立刻提出了抗议，一艘英国巡洋舰和一艘法国炮舰立刻驶往南京；总督还象过去那样，用无休止的谈判来拖延时间。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为使交涉从速进行，扣留了曾国藩出钱造的一艘华丽的大轮船；直到总督赔礼道歉后，才得放行。11月14日，麦华陀把暴动中的受害者由武装卫队隆重地护送回扬州，并由扬州大小官员迎接，簇拥着送进已整修一新的英国牧师住宅。地方官还贴出盛赞洋人事业的告示，对主犯予以降职或惩罚，并责令其赔款道歉。

当时曾有人担心耶稣教的成功会转而损害天主教的利益，因为从恭亲王、南京总督以及扬州官员们同英国人来往的书信中都有迹象表明，他们要把事件的责任推向金式玉神父及其他的中国助手。在他们看来，罗马天主教的立堂开教并

没有得到地方官的许可。另外，天主教孤儿院管理人员的不慎所造成的许多婴孩死亡事件也激怒了对洋人区别不清的中国民众。<sup>①</sup>

在南京总督的告示中，只提到保护英国人；为此，天主教传教士仍然得被驱逐出城。

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勋爵对中国官方的这个意见表示赞同。<sup>②</sup>而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麦华陀先生并没有被清朝这个卑劣的诡计所迷惑。他公正地听了金式玉神父的解释之后，认为必须重视神父们提出的种种要求，在天主教和耶稣教两教的传教士之间，必须不分畛域，<sup>③</sup>一视同仁。

麦华陀把南京总督给他的一份关于赔礼道歉告示的副本交给金式玉神父，让他贴在扬州的孤儿院大门上，扬州府台也应麦华陀先生的要求，发了一张“承认天主教传教士有权在堂内收养孤儿的告示”。当时神父们在书信中，对这位英国领事的高尚风格作了高度的评价。<sup>④</sup>

自从官员们接受了这次教训之后，便取得了成效。多年来，扬州一带对天主教和耶稣教同样尊重，育婴事业也盛极一时。

1868年，金式玉神父来淮安府时，曾买进一座房屋。在这座房屋周围集合了两三百名劫后余生的教友。淮安知府曾

---

① 见《英国议会文件》所载牧师们的信件（4097号[1869年]，第1卷第9、16、44页）。

② 麦华陀1868年9月15日致阿礼国信，阿礼国1868年9月11日致斯坦利信（同上，第13、26页）。

③ 麦华陀9月15日致阿礼国信（同上，第13页）。

④ 同上，第74页。

充公了这座房屋。由于上海法国领事的强硬交涉，加上扬州事件的合理解决，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地方官。终于在1869年7月，按法定手续把这座房屋归还给了神父们。从1868年至1875年，在扬州与淮安之间的运河两岸，若干城镇还建立了几个传教基地。1875年，从镇江到淮安，加起来也只有四百二十五名教友。在这些商业繁荣而道德败坏的地方，教外人归正的很少，传教工作徒见心力交瘁而成绩甚微。

但是安徽五河这所老会口正是名不虚传。分散在十七个小村里的四百名教友，在郎主教任期内组织起来了。当时还没有固定常驻的神父。每年两次，有一位神父前去走访，并给教友们行圣事满四规。为了准备一所比较稳定的住所，在六处教友最多的会口盖了一座以泥土为墙、茅柴为顶的小堂。因为该地木料奇缺，建筑木材须从南京或镇江由水路运来。可是地方官员对这简陋的建筑物也忧心忡忡，他们幻想这便是隐藏未来叛乱者的堡垒。负责这个遥远会口的刘德耀神父，费了许多口舌，再加上他的审慎机智，才使官员们放了心。1874年，人们更果敢了，在县城里造起了一间小砖屋、一座小圣堂和一所可容二十多个孩子住宿的小学校。离校只几步远，有由一位本地老贞女管理的小小圣母院，这样就能保证让一些家庭出身比较好的孩子们得到更多的教育。<sup>①</sup>

每次创立新事业，每次必须同地方官和文人们作斗争。有一些细节令人厌烦，因此我们只发表1868年5月金式玉神父写的几行文字，从中我们就能觉察到，当时这些边远地区会口

---

<sup>①</sup> 《南京教区通讯录》，第1卷第13页、第2卷第125页以及教务工作表上能找到许多创业中的形形色色的困难及地方官与文人惯用的对卖主威胁、恐吓或撕毁契约的手法。

的负责人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和忘我精神去进行斗争。“为每寸土地，每个新建筑，我们都得同知县、总督本人力争。他们轮流地，有时联合一起地来反对我们。我们提出条约，他们不承认，我们拿出护照，他们不理睬，或装出恭维的样子；而对我们提议要办的事情则永远是反对、不准；有时干脆断然拒绝，有时却给我们提意见而同时煽动绅士、文人与民众起来反对。”<sup>①</sup>

1874年与1875年，负责五河的神父们曾两次远行到安徽北部，直至河南边境。当时有几家河南教友已定居在安徽颍州府地区，由于同饮淮河之水，他们同五河教友彼此有了联系。这些从河南迁来的教友多数住在霍丘附近。1874年末，他们邀请当时在五河的孟惟理神父前去走访。孟神父欣然接受邀请，到他们那里过了耶稣圣诞瞻礼。孟神父还利用他这次长途旅行中的每个旅站宣讲教理，使许多好奇而来围观的群众有认识天主教的机会。<sup>②</sup>

1878年，还有其他河南来的教友，请五河本堂德怀璋神父到安徽边缘的亳州（今亳县），以后他就常去走访他们。但由于地方官与绅士们的反对，始终没法建造起一所固定的教堂。<sup>③</sup>

## 南 京

我们已经看到，雷遯骏神父不管李鸿章怎样恶意反对，用绝大的毅力才在这座火城城垣之内造了一座神父住院。由于

<sup>①</sup> 见《通讯》，第5卷第216页。

<sup>②</sup>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2卷第147页。

<sup>③</sup> 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8年7月；《神学院》，1880年附录。

总督马新贻的保护,才使这座新机构免于彻底毁灭。<sup>①</sup>

当时,人们对南京会口曾寄予极大的希望。在叛军战争期间,无数从南京外逃的人投奔上海,得到了神父们的帮助和照顾,也受了教育,领了洗礼。<sup>②</sup>假如他们能坚持信仰,那么凭他们的善言善行,一定能吸引许多同乡人信奉天主教。而且两江总督之旁,再驻有一位江南主教,似乎也非常适宜。所以,郎主教确曾认真地想离开上海,移驻到他顶着主教职衔的南京大城去。<sup>③</sup>

当时有人提议,在这座文人集中的名城大规模地创办科学事业,象过去旧耶稣会曾在那里举办过卓越的天文台那样,这确是因地制宜之举。所以,刘德耀、高龙馨、韩伯禄等神父都在南京住了多年,准备成立一个科学研究中心站。<sup>④</sup>晁德莅神父在那里也逗留过一个时期。<sup>⑤</sup>

由顾培原修士设计督造的神父住院,可住二十多人。院内设有一间朴素雅致的中国式客厅,专为临时接待来南京上访总督的外交官与法国海军将领们。在1868年,那所住院是南京唯一的西式房屋,因此吸引了不少好奇者前来参观。<sup>⑥</sup>

可惜不久人们就放弃了这种幻想,并再次证明,凡文人集中和声势浩大的大城,对福音常是最冷酷最无情的地方。在

---

① 见本卷第185页。

② 见本卷第71页。

③ 1871年的咨议会议,见《徐档》,卷宗E6。那时期,有人主张有一位助理主教常驻南京,专管讲普通话的地区(谷振声1869年8月致总会长贝克斯信,见《中心》,第4卷第4章第14页)。

④ 见本卷第205页。

⑤ 见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330页。

⑥ 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244页。

上海受洗的难民，一回老家几乎全部都背教了，再也不同神父们往来。任何地区的教友都没有南京人那样易于轻信散布于民间的攻击教会的种种谣言。由于受各衙门、各种人捏造编著散发到民间的小册子的影响，孩子们一见神父就远避逃跑，怕被剖心挖眼；施诊给药与其他慈善事业在别处是那么普遍，而在南京却吸引不了教外人。<sup>①</sup>

此外，耶稣教教徒在南京对外境却考虑得更为深远，他们已建立了不少教育的与慈善事业的机构；虽然信教的不多，但在社会上、政治上确起了真正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天主教的教义教规当然不利；神父们对那些在英美教会学校读过书的或在他们机构内办过事的人也做了大量的传教工作，但是毫无效果。<sup>②</sup>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南京的神父住院从未起过初创时所期望的作用。1874年，总本堂倪怀纶神父伤感地写道：“我们休想再发展了，我们在这里停滞不前，老是留在起点上作伤心的旁观者。因时至今日，我们的任何努力都丝毫改变不了原有的状态。”<sup>③</sup>

文人的仇恨、民众的偏见以及1870年的事件足资证明，天主教在南京不可能建立计划中的科学事业，于是就决定建立在有洋人保护，保证太平的徐家汇。<sup>④</sup>

神父们在南京的工作就只能局限于照顾几百名遵守教

---

① 见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第244页；又《南京教区通讯录》，第1卷第12页起；第2卷第121页。

②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2卷第257页；方殿华：《南京今昔》，第296页。

③ 同上，第1卷第13页。

④ 见本卷第205页起。

规、虔诚热心、但多疑胆小的教友们，他们对劝化教外同胞是漠不关心、缺乏热忱的。在 1875 年，南京有三百七十四名教友，分属于五所小堂：一所在城内神父住院旁，一所在东门外，另一所在西门外，其余两所则在乡间。城内住院附设一座走读学校。1875 年，有学生六十多名，几乎全数是教外学生；一座小小的寄宿学校，1874 年有寄宿生二十五名；两所施诊所，一所为男子，一所为妇女；这些就是在郎主教任期内，在这个大城市所能创办的仅有的一些事业。<sup>①</sup>

## 安 庆 -

1871 年，在马新贻总督拨让的土地上建造的神父住院完工了。它马上显示了它的重要地位。1873 年，在安庆成立了一座外事衙门，神父们遇到什么困难，便可向它反映。这个机构是由安庆府台和三个知县级的助理组成的。<sup>②</sup>

安庆的会长或总本堂从此就得和这座衙门商讨处理传教士的事件，这样既耗费许多精力与时间，而且往往又吃力不讨好。

那时，每年两次由安庆派一位神父去走访婺源县东门地方的老教友。1875 年，林福恒神父被派了去，并肩负着必须尽一切办法建立一所固定住院的使命。不料他一到，却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风波。他所路过的城镇，满街满墙都贴满了种种侮辱洋人的揭帖，唱的尽是老调，禁止民众和神父接近，禁止出卖任何东西给神父，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幸亏安庆

---

① 见《南京教区通讯录》，第 1 卷第 13 页；第 2 卷第 122 页。

② 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 年 1 月 1 日。



负责外事衙门的官员是认识神父并尊重神父们的，他派了一位特派员到那地方，努力平息民愤，开诚布公地解说洋人在中国的真正情况。<sup>①</sup>可是地方官声称，对文人团体的排外狂热，他实无能为力。于是，神父们只好暂时放弃在这遥远的地区建立一个固定住院的打算。<sup>②</sup>

神父们每年两次远行走访教友，常常会遇到危险。1877年5月，荣云锦神父路过东门时，被一批由道士煽动的无赖围攻，威胁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幸逢一名经常往来于上海，并熟悉神父们的茶商<sup>③</sup>挺身调解，替神父解了围。

位于长江右岸安庆对面的池州府，由于发生了一连串的教会事件，使神父们在许多县城里建造了住院。1873年，住在东流的一名望教者和教他要理的传教先生住所发生了失窃事件并受了侮辱，金式玉马上同一位代表巡抚的官员前往交涉，得到了一方土地作为赔偿。1874年，德怀璋神父路过旌德县，看到墙上贴有侮辱他的揭帖，去交涉后，也得到了官方的允许，购买了一块小小的土地。<sup>④</sup>在大通镇对面江心的荷叶洲岛上，德怀璋的一所小小住院不幸于1874年被洗劫并焚毁。

在郎主教任期的末年，池州府各县虽然困难重重，但神父们几乎都有了落脚点，并拥有二百名左右教友。

1873年9月，金式玉神父在六安州安排了一位中国神父李问渔，请他负责照料那些从河南移来的，曾历尽地方性教难

① 见《江南教区消息报》，1876年1月1日。

② 同上，3月15日。

③ 荣云锦1877年5月1日、7月1日信，见《通讯》。

④ 金式玉1874年5月3日信，见《神学院》，1874年，第2、4页；高龙馨：《江南传教史》，第340页起。

而仍忠贞不屈的望教者或新教友。<sup>①</sup>

这位出身于上海附近的李神父，在这严峻酷寒的贫瘠山区吃了不少苦，他的一只脚冻坏了，竟两个月不能起床。这期间，一次地方性的教难又起来了。地方上的文人学士们编写了大批诽谤天主堂的小册子和揭帖，并指挥攻击神父与新教友，六安州的甚至安庆的大官员都无能也不敢出面干预。这些暴动者曾两次冲进神父住院，要把李神父清除出境；可是在两次暴动中，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教外人生怕会出人命案，才救了李神父的生命。李神父不管任何艰难险阻，坚守岗位，只在上级命令他来沪治病时，才回到徐家汇。<sup>②</sup>

## 宁 国 府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1876年的宁国府事件发生后，长江两岸教友们的反响以及神父们又怎样冒着种种艰险，在池州府与六安州安置和定居下来。勇毅的金式玉神父在一封信中写道：“为了使教友们保持信仰，传教士在老教友会口还得付出代价；那么，在教区前哨，在全部是教外人的地区，要去负责创立新会口，该遭受多大的困难啊！这里我暂且不说过那种游牧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光是整天劳累地奔波，在这边远的异民族之中要什么没什么的，就已经够艰苦的了；不过也有些老乡们对我们多少是怀有好意的，这里我也不说了。我只提我们在创建立足点时，到处碰到的反对势力。事实证明，每创建一个新的立足点，就是取得了一场胜利。要赢得这场胜利，

---

① 见本卷第242页。

② 金式玉1874年6月8日信。



须得冒种种危险,甚至牺牲生命。”<sup>①</sup>

宁国府的许多美好会口在初创伊始,即遭受 1876 年的几乎全部毁灭的可怕教难,我已在上面教区史总论中叙述过。<sup>②</sup>这里我只提一下郎主教逝世时该总铎区的情况。当时宁国总铎区有六位神父,管理着三十三座圣堂或小堂,共三千零六十六名教友;1875 年至 1876 年,有教友三千五百零四名;1876 年至 1877 年,降为三千二百二十五名;教难使教友人数减少了五百多名,其中有死去的、迁出的和背教的。我已在上面说过,<sup>③</sup>背教的都是些新教友,他们大概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准备就领了洗礼,因此信德不深,经不起风浪。而那些老教友则表现了出奇的忠贞不屈,他们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们成了宁国府教会的救星,许多新教友继续团聚在他们的周围。<sup>④</sup>

在每年的教务统计表上,1874 年至 1875 年,人们才第一次注上属太平府的芜湖的名字。到过宁国府或安庆的神父们已经认识到,这座扬子江畔旺盛的县城非常重要,它扼守在通往宁国府的大河口,河道两岸尽是特别肥沃的土地。1875 年,马嘉理被杀案发生后,1876 年 9 月 13 日,英公使威妥玛在同中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芜湖为新辟通商口岸之一。1877 年 4 月 1 日又成立了租界。<sup>⑤</sup>教区在这座城里原已拥有一座小房产,曾作为宁国府被驱逐神父们的避难所。<sup>⑥</sup>1878 年 3 月,金式玉神父又买进了邻近的土地,把它扩大了。

① 金式玉 1874 年 5 月 8 日信。

② 见本卷第 221 页起。

③ 本见卷第 267 页。

④ 见本卷第 233 页。

⑤ 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2 卷第 84 页。

⑥ 见本卷第 262 页。

人们看到,1866年安徽省,原只有三所会口和受各方攻击的五百十四名教友,可是在郎主教任期的末年,在安徽省九个府<sup>①</sup>已都有圣堂或小堂了,在这些大小教堂周围已有三千四百九十九名教友及七百九十四名学生。<sup>②</sup>

## 六、总 结

历年的教务年表给我们指出了郎怀仁主教在他任期内的传教工作的成绩。1866年至1867年,叛军战事后,教区共有十二位外国神父与十四位中国神父;1878年,有五十五位外国神父与二十六位中国神父。同时,教友数字从七万三千八百四十七名增加到九万四千三百十名。由于中国教友家庭的人丁兴旺,这增加的数字还不算太多;事实上,除宁国府外,成人的领洗并不多;这时期的最高数字,是1874年至1875年的二千一百九十一名的成人领洗;保守望教者的人数也从未到过八千名。<sup>③</sup>

可是告解与四规圣体和恩体数字的增加是令人欣慰的。告解数字从十二万七千零八十八到二十八万九千四百六十五人次,圣体数字从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九到三十二万零六百

① 安庆、颍州、六安、泗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

② 高龙攀摘自《耶稣会会士录》附篇,第569页。

### 西部教区负责教士名单

1864—1865年	雷通骏	桑理爵	张星伯
1865—1866年	雷通骏	金式玉	桑理爵 熊臣尧
1866—1867年	雷通骏	金式玉	熊臣尧
1867—1868年	雷通骏	金式玉	刘德耀 韩伯禄 张西满
1868—1869年	金式玉	刘德耀	韩伯禄 高龙攀

三十五人次。假如人们想到,除了上海若干本堂区外,其他会口的教友每月只能见到神父一次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已是很

	南 京	芜湖、镇江
1869—1870年	高龙擎	刘德耀 富守和 马义谷
1870—1871年	胡国治 高龙擎 费赖之 叶春荣 沈则宽	刘德耀 富守和 马义谷
1871—1872年	兰廷玉 顾福格 卞良弼 沈则宽 高龙擎	刘德耀 金式玉 马义谷
1872—1873年	兰廷玉 顾福格 卞良弼 沈则宽 华敦义	刘德耀 金式玉 马义谷 孟惟理
1873—1874年	倪怀纶 荣云锦	孟惟理 康治泰 卫德宣 马义谷
1874—1875年	倪怀纶 兰廷玉	孟惟理 康治泰 卫德宣 马义谷
1875—1876年	兰廷玉 晁德苙 郁炳蔚	孟惟理 康治泰 卫德宣 马义谷
1876—1877年	兰廷玉 晁德苙	孟惟理 康治泰 金式玉 郁炳蔚 卫德宣
1877—1878年	刘德耀	德怀璋 康治泰 高龙擎 南志恒 陶斯咏
1878—1879年	刘德耀	德怀璋 施方礼 步天衢 刘德耀 陶斯咏 南志恒
	安 庆	宁 国 府
1869—1870年	金式玉 韩伯祿	
1870—1871年	金式玉 沈薰良	
1871—1872年	项德来 德怀璋 沈薰良	
1872—1873年	项德来 德怀璋 沈薰良 许采白 丁若韩	
1873—1874年	金式玉 项德来 李问渔 德怀璋 丁若韩 陶斯咏	兰廷玉 伏日章 乔迁于 卞良弼 林福恒 沈则宽 沈薰良
1874—1875年	金式玉 荣云锦 德怀璋 林福恒 丁若韩 李问渔	乔迁于 伏日章 项德来 卞良弼 笪谦受 丁若韩
1875—1876年	倪怀纶 田云梦 荣云锦 林福恒 金式玉	乔迁于 项德来 伏日章 卞良弼 笪谦受 丁若韩
1876—1877年	项德来 荣云锦 林福恒	乔迁于 田云梦 卞良弼 丁若韩 鲍来思 李问渔 沈则恭 倪怀纶 滕伯祿
1877—1878年	项德来 荣云锦 施方礼 丁若韩	金式玉 乔迁于 卞良弼 毕大民 李问渔
1878—1879年	项德来 宋永誉 林福恒 孟惟理	沈薰良 滕伯祿 黄廷章(修士)

③ 最佳的一年是 1873—1874 年,望教者七千五百六十七人。

可观的了。

郎主教及其神父们主要着重于教育事业，因此学校大大地发展了。1866年至1867年有二百五十九所男校，计教友学生二千六百七十人，教外学生一千二百五十一人；1878年至1879年有三百六十三所学校，教友学生四千零十五人，教外学生二千九百十三人。1866年至1867年，女校有一百零六所，教友女生一千四百零一人，教外女生一百零七人；1878年至1879年，女校增至二百九十七所，教友女生三千四百三十八人，教外女生二百四十四人；由教区聘请的男女教师，1866年至1867年有二百五十五人，1878年至1879年为四百十三人。

圣婴善会的育婴事业又返回到太平军战争时期达到的数字，这是值得表扬的；1861年至1862年有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七个教外婴孩受了洗礼。其中四千零九十四名留在孤儿院或过继给人家抚养。恢复和平后，这些数字降低了，在郎主教任期的最后几年又回升了。1878年至1879年，育婴事业曾记有一万七千六百十一个教外婴孩领了洗，六千九百个被弃婴孩由该会的经费抚养维持。

从教区的具体情况来看，教友会口从四百十六处增加到五百八十四处。在江苏省的十二个府治中，传教士已进入到十个府，<sup>①</sup>在安徽省的十一个府治中已进入到九个府。<sup>②</sup>

总之，人们可以说，在江苏省长江的北部与东部（海门除外）以及整个安徽省（宁国府除外），那时基督的福音还没有认

---

① 那时只有徐州与海州两府还没有成立教友会口。

② 凤阳、庐州、和州、滁州在1875—1879年还没有建立教友会口。

真地传入，但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几乎处处都已建立了立足点。每个立足点周围，正围聚着为数不多的新教友，为未来教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这项工作中，郎主教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传教事业。由于他爱护属下助手们，与耶稣会上级的关系又融洽无间，因此大大地推进了教会事业的发展。法国参赞吕比荣神父在1879年4月23日致教区会长文成章神父的信上，报告了薛孔昭神父著的《郎怀仁主教小传》即将付印，并说：“郎怀仁主教意志纯正，事主热忱，对本修会一片孺慕深情……他的传记真值得本修会留作永久纪念。”<sup>①</sup>

---

<sup>①</sup> 见《徐档》，卷宗 F18。

## 附 录 一

### 1840 年至 1878 年的南京署理主教与 宗座代牧主教

#### 1. 罗伯济(类思)主教

罗主教，维罗纳人，湖广区传教士；1838 年 10 月 1 日接到南京主教毕学源委任他为大代权的信，1839 年初到江南；由于怕同当时遣使会盛神父在行使职权上有争执，因盛神父也曾被毕主教委为大代权，所以他就放弃了江南大代权的职权，重又回到湖广。1840 年 1 月 10 日，罗马教宗诏令任命他为山东宗座代牧顶加诺贝主教衔；1840 年 1 月 23 日，罗马又任命他兼南京主教区署理，1841 年 3 月 14 日受祝圣。经罗马批准，他又选择了那不勒斯圣家会会士赵方济作为南京主教区教务行政的助理，并在 1847 年圣神降临瞻礼日亲自把赵祝圣为顶索利主教衔的助理主教。1847 年 11 月 21 日，罗主教动身回罗马；1848 年 5 月他向教廷提出辞职。

#### 2. 赵方济主教

赵主教，那不勒斯圣家会会士；1848 年 11 月 2 日，南京神职班获信得知他来接任视事。他也经罗马批准，选拔了方济各会会士徐类思神父为助理主教；1849 年 9 月 11 日，把他祝圣为顶塞斯皮斯主教衔的主教。1855 年 4 月 8 日，赵主教因病回罗马；1855 年 11 月 2 日，在那不勒斯的圣家书院逝世。

#### 3. 徐类思(伯达)主教(方济各会会士)



1856年年初，徐类思主教接受了南京署理主教的职衔。1856年1月21日，罗马撤销了南京主教区，改为托于耶稣会会士管理的宗座代牧区；徐主教移驻到湖广作代牧。7月26日，他向南京教区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们传达了罗马的这个新决定。

#### 4. 年文思主教

耶稣会总会长贝克斯神父，在1856年3月21日曾推荐年文思神父为江南“临时代牧”。1859年5月24日，罗马诏令，任命年文思神父为江南宗座代牧，顶贝里特主教衔，同年10月2日受祝圣于董家渡。1862年7月31日，他死于直隶东南教区的献县张家庄。年主教死后，先由梅德尔神父（梅死于1863年5月15日）、后由鄂尔璧神父相继为署理代权。

#### 5. 郎怀仁主教

1864年9月9日，罗马诏令他由直隶东南教区移驻到江南，1865年3月22日他到了上海；1878年11月27日，死于徐家汇。

## 附 录 二

### 1840 年至 1878 年的教务巡 阅使与教区会长

#### 巡 阅 使

伏伯禄, 巡阅使兼教区会长, 1854 年 8 月 18 日至 1855 年 11 月 21 日。

戴元英, 江南教区和直隶东南教区巡阅使, 1865 年 12 月 10 日至 1866 年 5 月 18 日。

#### 教 区 会 长

南格禄, 1841 年 4 月 15 日至 1848 年 4 月 15 日。

卜亦奥, 1848 年 4 月 15 日至 1851 年 4 月 15 日。

翁毅阁, 1851 年 4 月 15 日至 1854 年 8 月 18 日。

伏伯禄, 1854 年 8 月 18 日至 1855 年 11 月 21 日。

梅德尔, 1855 年 11 月 21 日至 1862 年 11 月 23 日。

鄂尔璧, 1862 年 11 月 23 日至 1866 年 5 月 6 日。

谷振声, 1866 年 5 月 6 日至 1873 年 2 月 7 日。

高若天, 1873 年 2 月 7 日至 1876 年 10 月 30 日。

文成章, 1876 年 10 月 30 日至 1882 年 9 月 6 日。

## 附 录 三

### 1848年至1878年的法驻沪领事<sup>①</sup>

1. 敏体尼领事, 1848年10月8日到任, 1853年6月10日休假离任。

2. 爱棠(一译伊担)署理领事, 1853年6月15日至1857年6月14日。

3. 敏体尼, 1857年6月14日复任, 1858年5月26日法王谕令提升为总领事; 1859年6月28日离上海。

4. 爱棠署理领事, 1859年6月28日至1863年3月2日。

5. 穆布孙总领事, 1863年3月2日到任, 同年10月28日逝世。

6. 喇慕署理总领事, 1863年11月4日至1864年4月18日。

7. 葛笃署理总领事, 1864年4月18日至1864年12月22日。

8. 白来尼(一译白罗尼)总领事, 1864年12月22日至1869年3月20日。

9. 达伯理署理总领事, 1869年3月20日至11月23日。

10. 梅让总领事, 1869年11月23日至1872年6月10日。

11. 沙白纶署理总领事, 1872年6月10日至1872年9月9日。
12. 葛笃总领事, 1872年9月9日至1875年4月24日。
13. 李梅署理总领事, 1875年4月24日至5月25日。
14. 沙白纶署理总领事, 1875年5月25日至1876年2月13日。
15. 葛笃总领事, 1876年2月13日复任至1878年3月28日。
16. 李梅署理总领事, 1878年3月28日复任至1880年4月22日。

---

① 根据上海法国领事署文案长张志瀛(雪香)编著的《法领政略表》一书(1913年出版)。

## 附录四

### 教区的进展(1878年至1923年)<sup>①</sup>

从1878年起,在江南教区担任工作的是宗座代牧倪怀纶主教(1879年至1898年)和苏建章主教。苏主教在任不到两个月(1899年6月25日至8月10日),因巡视教区时中了暑,死于芜湖,姚宗李主教继任他的工作。姚主教从1900年至1922年统辖着江南教区。罗马把教区按行省划分之后,姚主教成为江苏代牧,不久改称南京代牧。从1921年起,安徽省成为一个新的代牧区,和江苏省完全分开,由耶稣会的都灵、莱昂、卡斯蒂利亚三个耶稣会省分担全省教务。

要编写最近四十五年的传教史,为时尚早。除了上述的事业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的成就:在郎主教任期内,江苏的徐州和海州在教务方面还是荒地,而现在也已有了些教友会口。徐州教务进展特别快,教友之多,除上海附近地区外,就要算徐州了。现在江苏省内,淮扬和徐海两道<sup>②</sup>还有四个县没有教友;徐海道、淮扬道和金陵道还有八个县没有成立堂口。江苏省内的受洗人数,从1900年的十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一人增加到1923年的二十万二千零二十八人;在1921年教区划分时,安徽省也已有教友七万三千九百十二人。

对于教育事业,除郎主教时期创办的外,又增添了许多新事业。一所大学包括男女两部:男子部称“震旦大学”,设在上海,有男生三百五十三人,其中非教徒二百七十三人;女子部

称“启明女校”<sup>③</sup>，设在徐家汇，专收教外女生，有女生四百零八人。徐汇公学有寄宿男生四百七十三人。崇德女校有寄宿教友女生二百六十人。为了适应青年一代的需要，教学外语以法文为主，另外还教授其他一些学科，进展很快。在扬州和南京都开办了震旦大学预备科。修道院内的修士们都通晓法语。法国的文学是我们文化的宝库，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修士们的神修生活和科学知识。

“主母会”，即“圣母小昆仲会”的教师修士来上海后，对教区发展教育事业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接管了一所法公董局办的中法学堂（学生五百三十人，其中教外生四百八十八人），最近又创办了一所专为法侨子弟的“贞德学堂”。拯亡会修女除了洋泾浜若瑟院有四百三十名女生和上智学校的一百三十八名女孤儿外，在虹口“圣家院”又开办了一所为走读学生的学校，共有外国儿童五百四十五人，中国儿童七百四十七人。拯亡会修女附设在上海三座大堂<sup>④</sup>的初级和高级小学发展得更为迅速。初级小学计有教友男生四百零四人，非教友男生一千四百三十八人，教友女生三百九十八人，非教友女生一千八百十人，高级小学男生二百十三人，女生三百七十人。

在郊区，各总铎区、各本堂区均附设有读经学堂，计有学

---

① 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第2卷写到1878年郎主教死后为止，第3卷写倪怀纶主教时期（1878—1900年），资料早已收集，出版也已预告，然因故未曾付印，后又几经沧桑，资料遗稿俱已散失。现将作者在1925年出版的《江南传教史简编》一书中的第五章译载于此，以作补遗。——译者

② 中华民国成立后，“府”取消了，1923年新制度只有“道”和“县”。

③ 启明女校创办时，原想办成女子大学，因条件不足，只办了中学；1926年圣心会修女来上海后，才正式开办了女子大学，附属于震旦大学，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译者

④ 指设立在董家渡，洋泾浜，虹口的三座大堂。

童一万六千四百十二人，初小男生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女生五百十八人；高小有男生三百四十人。不久前，在徐家汇又创办了一所培养教师人才的“徐汇师范”，有男青年二十九人。

除公济医院之外，在法租界内又开办了“广慈医院”。1923年一年内，曾治疗外侨病员五百八十四人，中国病员三千八百六十人，病亡的有二百零六人，临死前受洗入教的有一百四十九人。“方济各圣母传教会”（简称方济各）修女替代仁爱会修女管理了公济医院后，1923年曾接纳病人三千零八十人。另有一所善堂医院“新普育堂”，是由地方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教外绅士创办的，专为治疗中国贫病者。善堂创办人把该堂行政管理工作的委托给了仁爱会修女，该善堂主要领导工作由天主教几位教友绅士负责，新普育堂内设有小堂，奉圣若瑟为主保，它周围所做的一些善举，真可说是仁恩广被，普育群生。

安老会修女接管了建造在南市机厂街的一所宽敞漂亮的安老院，该院是代替董家渡的老人院的。新院可容纳三百名男女老人，但额位必须很早申请。

仁爱会、拯亡会、方济各会的修女们，在这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及其近郊，设立了施诊所二十多处，每年免费施诊给药达四十万人次以上。

科学工作也有发展。徐家汇天文台分成三个部门：气象台留在原地，星象台搬到佘山，地磁台设在葑葭浜。“汉学研究所”出版了多种刊物，其中以《汉学杂纂》各书广传西欧，尤负盛名。从此以后，土山湾的印刷事业也世界闻名了。

教区神职人员的人数也有进展，1923年，计本地神职人员有六十六人，其中十六人系耶稣会会士，外籍耶稣会会士一

百零一人,大修院修士四十八人,小修院修生二十六人;在徐汇公学还有拉丁生一百人,使神职人员后继有人。

上述多种多样的教区事业,冀培尔神父在法国希望书社1924年出版的《耶稣会传教士》一书的第二部分,有比较详尽的记述,谨向读者推荐。<sup>①</sup>

---

<sup>①</sup> 1924年的5月、6月间,江南传教区有其最光荣的日子,它有幸接待了来自全中国参加首次全国主教会议的中国各地主教。大会开幕式、闭幕式以及追悼已亡传教士的隆重大礼,都是在徐家汇圣依纳爵大堂举行的,曾目睹这些盛况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 主要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S.J. 指耶稣会; C.M. 指遣使会; M.E. 指外方传教会;  
O.F.M. 指方济各会)

### A

Adinolfi, François (S. J.)	利庸乐
Affnaër	阿夫纳埃
Aiguebelle, Paul de	德克碑
Aimery, Michel (C. M.)	艾梅理
Alcock, Rutherford	阿礼国
Aleni, Jules (S. J.)	艾儒略
Alvarez	阿尔瓦雷
Amaral, T. M. F.	亚马勒
Ambrosi	昂布罗齐
André, Alexandre (S. J.)	项德来
Andrieu, Joseph	安于仁
Anouilhi, J. B. (C. M.)	董若翰主教
Argy, Charles de (S. J.)	伊宗尹
Athemis, Tristan de (S. J.)	谈方济

### B

Baldus, Jean Henri (C. M.)	安若望主教
----------------------------	-------

Balfour, G.	巴富尔
Barnabo	巴尔纳博主教
Barran (M. E.)	巴朗
Basujau, Hippolyte (S. J.)	苏念澄
Becker, E.	葛光被
Beckx, Pierre (S. J.)	贝克斯总会长
Becourt, Lefèbvre de	德贝古尔
Bellonct, M. de	伯洛内
Bentzman, de	德邦茨芒
Bernard, Auguste (S. J.)	潘奥定
Berneux, Siméon-François (M. E.)	张敬一主教
Berthemy	柏尔德密
Bési, Louis de	罗伯济(类思)主教
Bies, Jacques (S. J.)	卞良弼
Bizeul, Sévère (S. J.)	桑必寿
Bonham, George	文翰
Bonnefoy	博纳富瓦
Bonne, W. J.	文惠廉
Borjia, Pereira de	德博尔吉亚主教
Borniet, André (S. J.)	年文思主教
Boulanger (S. J.)	布朗热
Bourboulon, A. de	布尔布隆
Bourdilleau, Narcisse (S. J.)	卜理奥
Bouvier	布维埃主教
Boyer, Joseph-André (M. E.)	包若瑟
Brancati	潘国光
Brenier de Montmorant	白来尼(白罗尼)
Broullion, Nicolas (S. J.)	翁毅阁

Bruce, Frédéric W. A.	卜魯斯(普魯斯)
Brueyre, Benjamin (S. J.)	李秀芳
Buglio, Louis (S. J.)	利类思
Buratti	比拉蒂
Burgevine, Henri	白齐文
Butel	比泰尔

### C

Cadolini	卡多利尼
Caldor, Alexandre	卡尔代
Carayon	翁羊铎
Carr, Lewis	卡尔
Carrère, Adrien de (S. J.)	雷通骏
Castellazzo, Louis (O. F. M.)	江类思主教
Catte, Ignace (S. J.)	德良弼
Cécille	塞西尔
Chanoine	夏努安
Chapdeleine (M. E.)	马赖
Charner	夏尔内
Chauvin, Louis (S. J.)	文成章
Chérubini (O. F. M.)	谢吕比尼
Chevalier, Stanislas (S. J.)	蔡尚质
Clarendon	克拉兰敦
Clavelin, Stanislas (S. J.)	葛必达
Clerc, Alexis	克莱克
Cléret	克莱雷
Colombel, Auguste	高龙肇
Colombert	高龙贝主教

Combelles (C. M.)	龚伯察
Constantini, Celce	刚恒毅主教
Contade, de	龚大德
Cordeil, Louis	高慎思
Cordier, H.	高田
Cornulier-Lucinière	科尔尼利埃-吕西尼埃
Corte, Della (S. J.)	谷振声
Courcelles, de	德库塞尔
Courcy, C. de	顾随
Couvreur, Clément (S. J.)	顾福格

## D

Dabry de Thiersant	达伯理
Daniel, Jacques (S. J.)	德耀章
Daveluy, Antoine (M. E.)	安斐理主教
David, Armand (C. M.)	达维德
Debrix	滕伯禄
Decazes	德卡兹
Dechevrens, Marc (S. J.)	能恩斯
D'Elia, Paschal (S. J.)	德礼贤
Delamarre (M. E.)	德拉马
Delaplace, Louis (C. M.)	田类思主教
Deleuze, Léopold (S. J.)	委良材
Dent, L.	颠地
Desjacques, Marin (S. J.)	杜若兰
Deswarames	德瓦拉姆
Dracopoli	龙保理
Dubar, Edouard (S. J.)	杜巴尔主教

Ducis, Joan-Baptista (S. J.)  
Dufriche-Desgenettes  
Dugout, Henri (S. J.)  
Dupanloup, Félix  
Duperré  
Duplan

杜惠伯  
譚澤德  
屠恩烈  
迪庞卢  
迪佩雷  
迪普朗

## E

Edan, Victor  
Eléonore des Martyres  
Elgin, Earl of  
Estève, François (S. J.)  
Etienne (C. M.)  
Eugène, Smet

爱棠  
埃莱奥诺  
额尔金  
艾方济  
艾蒂安总会长  
欧仁·斯梅

## F

Fabre  
Faivre, Jean Ferdinand  
Fallier  
Faucon  
Favier, Alphonse  
Féliciani  
Femiani, Antoine (S. J.)  
Ferrand, Emile (S. J.)  
Ferrer, Jean (S. J.)  
Ferrière Le Vayer, de  
Fessard, Michel (S. J.)  
Fioramonti

法布尔  
盛若翰  
法利埃  
福孔  
樊国梁主教  
费利西亚尼  
伏日章  
富守和  
范廷佐  
德费里埃·勒韦耶  
戴元英  
菲奥拉蒙蒂主教

Fishbourne  
Fontanier, H. V.  
Forbes  
Forcade, Théodore  
Forrest  
Forth-Rouen  
Foucault, Auguste (S. J.)  
Fouillot  
Fournier, Pierre (S. J.)  
Franclet  
François d'Assise St.  
François-Xavier St. (S. J.)  
Fransoni, Card  
Frin, Julien (S. J.)

费世班  
丰大业  
福布斯  
福尔卡德主教  
福雷斯特  
陆英  
高若天  
富约  
伏伯禄  
弗朗格莱  
圣方济各(五伤)  
圣方济沙勿略  
弗朗索尼枢机  
林福恒

## G

Gaillard, Louis (S. J.)  
Gama, Louis de (S. J.)  
Gandar, Dominique (S. J.)  
Garnier, F.  
Garnier, Valentinus (S. J.)  
Genevoise, F.  
Génouilly, Rigault de  
Gérard, A.  
Giaquinto, François (S. J.)  
Gillivray, Mac D.  
Giquel, Prosper  
Girardin, de

方殿华  
德加马  
康治泰  
安邨  
倪怀纶主教  
热纳瓦兹  
德热努伊  
施阿兰  
夏显德  
季理斐  
日意格  
德吉拉尔丹主教

Godeaux	葛筠
Gonnet, Joseph (S. J.)	鄂尔璧
Gordon, Charles	戈登
Gotteland, Claude (S. J.)	南格禄
Goussery, Jean (S. J.)	顾培原
Gouvéa, Alexandre de (C. M.)	汤士选主教
Grandidier, François (S. J.)	狄虚衷
Grandière, de la	德拉格朗迪埃尔
Grant, James Hope	克灵顿
Gravière, Julien de la	德拉格拉维埃尔
Grillo	孟惟理
Gros, J. B. L.	葛罗
Guidée, A. (S. J.)	吉代
Guillet	吉耶
Guizot	基佐
Gutzlaff, C. Auguste	郭士立

## H

Haouisée, Auguste (S. J.)	惠济良主教
Harcourt, B. de	德阿尔古
Havret, Henri (S. J.)	夏鸣雷
Hélot, Louis (S. J.)	罗礼思
Henriquez, Antoine-Joseph (S. J.)	黄安多
Henriquez, Dominique Joseph (C. M.)	昂里凯
Henry, Yve (S. J.)	姚缙唐
Hersant, Casimir (S. J.)	翁寿祺
Heude, Pierre	韩伯禄
Hope, J.	贺布

Hubac	于巴克
Huc, Evariste-Régis (C. M.)	古伯察
<b>J</b>	
Jacquemin, Claude (S. J.)	彭加德
Jamin	雅曼
Jancigny, de	真盛意
Janson, Forbin	让松主教
Jaurias, Hélène de	埃莱娜·德若丽娅
Joset	若泽
<b>K</b>	
Kierk	基尔克
Kleckowski	哥士耆
Krantz	克朗茨
<b>L</b>	
Labat-Borderie	拉巴-博尔德里
Lagrené, T. M. M. J. de	刺萼尼
Laguerre	辣厄尔
Laimé, Faustin	艾尔梅
Laimbeckhoven, Godefroid Xavier de (S. J.)	南怀仁主教
Lallemand, de	兰盟
Languillat, Adrien (S. J.)	郎怀仁主教
Lapierre	拉皮埃尔
Largteau	拉尔热托
Launay, Auguste (S. J.)	洛内



Launay, Victor (S. J.)	南志恒
Lavaissière, Pierre (C. M.)	石伯祿
Lavisse	拉维斯
Lavollée	拉沃莱
Le Brethon de Coligny	勒伯勒东
Leboucq, Prosper (S. J.)	徐斫波
Le Chauff	勒肖夫
Le Cornec, Guliehme (S. J.)	乔迂于
Leduc, Théophile (S. J.)	陶飞罗
Le Lec, Henri (S. J.)	刘德耀
Lemaire	李梅
Lemaitre, Mathurin (S. J.)	梅德尔
Lemos, de	吴雅阁
Leveillé, Victor (S. J.)	卫德宣
Libois (M. E.)	李波
Longobardi, Nicolas (S. J.)	龙仁民
Loriquet, Jean (S. J.)	禄理格
Luca, Pierre de (O. F. M.)	吕伯多
Luquet	吕凯主教

## M

Macaire	马凯尔
Maillard (S. J.)	马亚尔
Maistre Ambroise (M. E.)	李盎博
Mangieri (O. F. M.)	芒吉里
Maresca, F. Xavier	赵方济主教
Margary	马嘉理
Marie-Amélie	玛丽-阿梅利

Mariot, Leo (S. J.)	马历耀
Marolles, de	德马罗尔
Marquès	马吉士
Marshall, Humphrey	马沙利
Massa, Auguste (S. J.)	马奥定
Massa, Cajétan (S. J.)	马驱堂
Massa, Louis (S. J.)	马理师
Massa, Nicolas (S. J.)	马义谷
Massa, René (S. J.)	马再新
Massot	马索
Maudet	莫代
Meadows, J. A. T.	密妥士
Meadows, T. T.	密迪乐
Medhurst, Rev. W. H.	麦都思牧师
Medhurst, W. H.	麦华陀
Méjean	梅让
Mercier	梅西埃
Milne	美魏荣
Miranda, Joseph Joachin (C. M.)	米朗达
Moidrey, Joseph de (S. J.)	马德赉
Moidrey, Tardif de	达耳地福·买忒勒
Moirez, Amand (S. J.)	穆瓦雷
Montalto	蒙塔尔托
Montigny, de	敏体尼
Mouly (C. M.)	孟振生主教
Moura, Joao Castro (C. M.)	赵若望

N

Nerciati	内尔西亚
Noël, François (S. J.)	卫方济
Novella, Joseph (O. F. M.)	诺韦拉主教
Novion	诺维翁

O

Oliphant, L.	俄理范
Olivaint (S. J.)	奥利万

P

Pacelli, Paul (S. J.)	柏葆禄
Pajot, Louis (S. J.)	柏理师
Palatre, Gabriel (S. J.)	柏立德
Pallu du Parc	帕吕
Paris, Prosper (S. J.)	姚宗李主教
Parkers, Harry	巴夏礼
Pédicini, Cord	佩迪西尼枢机
Pellicia (O. F. M.)	佩利西亚
Perboyre, Jean Gabriel (C. M.)	董若翰
Pfister, Aloys (S. J.)	费赖之
Pingrenon, Hubert (S. J.)	平乃公
Pirés Pereira, Cajétan (C. M.)	毕学源主教
Plas, de	德柏拉
Plet, François (S. J.)	贝来德
Poissemieux, Auguste (S. J.)	卜亦奥
Pombal, Sébastiao	蓬巴尔
Ponlevoy, de (S. J.)	德蓬尔瓦
Pottinger, Henry	璞鼎查

Pouplard, Alexandre (S. J.)

Poussou (C. M.)

Poutiatine

Protet, A

潘如汉

普苏

普提雅廷

卜罗德

## R

Rabeau, Henri (S. J.)

Rambaud

Rammazoli, Angelo

Ratti, Menton de

Ravary, François (S. J.)

Ravignan, Xavier de (S. J.)

Régnauld

Remi

Recci, Mathieu (S. J.)

Richard, Louis (S. J.)

Rizzo, Alph (S. J.)

Rizzolatti, Joseph (O. F. M.)

Roberts, Issachar I.

Rocha, Jean de (S. J.)

Rochechouart, de

Rocquemaurel, de

Roothaan (S. J.)

Roquette

Rose, Alexandre (S. J.)

Rossi, Gabriel (S. J.)

Rouland

Rubillon (S. J.)

鲍恒理

朗博

拉马佐利主教

德拉善

兰廷玉

德拉维尼昂

勒尼奥

雷米

利玛竇

夏之时

曹冠伦

里佐拉蒂主教

罗孝全

罗如望

罗淑亚

德罗克莫雷尔

罗当总会长

罗凯特

施于民

罗以礼

鲁朗

吕比荣

Russo

吕素

S

Saguez, Jules (S. J.)  
Salhorgne (C. M.)  
Salvetti, Joachim (O. F. M.)  
Sambiaso, François (S. J.)  
Schettino (O. F. M.)  
Schmitz  
Sécher, Henri (S. J.)  
Seckinger, Joseph (S. J.)  
Sédille, Charles (S. J.)  
Sentinier, Maurice (S. J.)  
Servièrre, Joseph de la (S. J.)  
Sica, Louis (S. J.)  
Silveira  
Simon, Jean Baptiste (S. J.)  
Sinoquet, Pamphile (S. J.)  
Smith, Arthur  
Spasiano  
Spelta, Louis-Célestin (O. F. M.)  
Stanley  
Staveley, C. W.

石怀德  
萨洛涅  
艾若亚敬主教  
毕方济  
舍蒂诺  
施米茨  
施宣三  
金式玉  
帅维则  
桑理爵  
史式徽  
薛孔昭  
西尔韦拉  
苏继章主教  
辛斐禄  
斯密司  
施伯相  
徐类思主教  
斯坦利  
士迪佛立

T

Taffin  
Tailhan (S. J.)  
Thomine-Desmazures

笪良仁  
塔扬  
杜多明主教

Thouvenel	图弗内尔
Tinguy, Constantin (S. J.)	丁恭思
Torrette, J. B. (C. M.)	陶若翰
Tricault	特里科
Trégaro	特雷加罗
Twardy, John	戴尔第

### U

Umpierre	翁璧玉
----------	-----

### V

Van Passen, Adrien (S. J.)	方百胜
Vanni, Adam (S. J.)	瓦尼
Varannes, A. des	瓦拉纳
Verbiest, Ferdinand (S. J.)	南怀仁
Véron	韦隆
Vérrolles Emmanuel J. F. (M. E.)	方济各主教
Vuillaume, Victor (S. J.)	费都尔

### W

Wade, Thomas	威妥玛
Ward, F. T.	华尔
Werner, Théodore (S. J.)	魏道味
Wuilbert, Joan-Baptiste (S. J.)	费尔伯

### Y

Yuetot, Louis (S. J.)	伊再可
-----------------------	-----

**Z**

Zanoli, Eustache-Guy-Modeste

(O. F. M.)

明希圣主教

Zottoli, Ange (S. J.)

晁德佐

